

# 1 引 言

## 1.1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历史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形成社会意识的一个主要工具。政治争论往往依赖于追溯历史事件，政治对手总要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证明，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纲领则反射着“过去的教训”。历史学家集科学工作者和政治意见的代理人两任于一身，他们的工作始终带有政治使命。

科学与政治的这种相互联系在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片面地以有利于政治的方式加以利用。当时，学术研究被置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之下了。然而，历史科学研究的停滞和知名历史学家的沉默充分表明，这种科学观既不是有效的，也未被普遍认可。当时，有人把历史科学宣传为一种政治的常用工具，但这一观点似乎只为少数历史学家所赞同，而这些历史学家是否具有科学的资格，还是大可怀疑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被以绝对对

立和专一的极端形式加以解释了。因此，可以理解，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就特别注意政治与历史编纂的关系，并且明确要求历史编纂为政治利益服务。这种情况适合于自司马迁起中国全部传统的历史编纂<sup>〔1〕</sup>。这种历史编纂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科学”，而是为当朝统治者的合法性提供证明的工具。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今——不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它恰恰处在政治与科学的紧密联系之中——作一番考察将是十分有益的。本论文的目的就是要对此作出一点贡献。

考察的基础是分析利用 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出版物。在这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仅指那些或者从其科学的自我认识或者从其政治活动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居的历史学家，形式上也因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个术语的使用并非要把那些未加入中共的历史学家规定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要把那些在此被冠以这个称号的历史学家确认为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因概念使用而产生的限制外，还有另一个必要的限制。由于资料繁多，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人士探讨历史问题的主要出版物，示范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我选择了范文澜、何干之、侯外庐、胡绳、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他们早在 1949 年以前就着手研究历史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们也积极参与了建立一种广泛的、机构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活动，或者从其政治地位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sup>[2]</sup>。当然，关于选择的标准还要详细地予以规定。

在做了这样的预先声明之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确立如下了：我把 19 世纪末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和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输入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的前提来处理。30 年代初发生的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的讨论则是中国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讨论标志着狭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始。借此，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有关的特殊的历史科学的起始点便被列举出来了。

3 和 40 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自 1937 年起在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及其在抗日战争中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则构成了一般的政治联系框架。属于这个框架的还有从当时政治形势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关于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观点；历史学家恰恰以此为依据，他们甚至还参与了这些观点的表述。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分歧意见在统一战线和抗战初期可以分别用毛泽东和王明的名字来标识，这些分歧意见当然也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述之中，其情形正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逐渐得以贯彻一样。但

是在这里，历史学家决不只是某一已经被决定下来的政治路线的辩护士，而是整个争论过程的一个载体，这个争论过程出现在政治路线确立之前。

本论文所利用的历史学家的论著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历史科学范围，而是涉及：(1)关于现实政治 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论著<sup>(3)</sup>；(2)关于新的、与政治发展的新要求相适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论著；(3)关于中国历史和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著。只有把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包括在内，才能更好地考察这些观念对其历史科学论著的影响，并说明把政治观念转用到历史叙述方面的情况。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历史学家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著当作政治论文，把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著当作哲学—意识形态论文——即使也带有政治观点——来分类，但是对于那些研究历史对象的论著却很难分门别类。难就难在不好区别下列两种论著，一种论著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科学地编写中国历史；另一种论著则按照传统方法，借助于某一历史问题来讨论现实政治，它也具有政治论文或政治评论性质。这两种论著通常是无法作出明确区分的，因为两种成分往往共同出现在同一论著之中。对历史进行科学处理，主要表现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把特殊的中国的发展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而传统的把历史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的做法则主要是与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与之相应，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对象的论著：在有关规律性问题的章节中，除了介绍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社会的“合法则”发展的理论观点外，也试图描述这些观点在各个历史学家那里的发展情况；而在关于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问题的章节中，传统的借助历史类比这一注疏学工具来接近历史的方法与包括历史比较法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历史学家当中的相互渗透问题则处于中心位置。

## 1.2 史料和研究状况

本论文的史料基础主要是那些被我挑选出来作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论著，包括他们在 1949 年以前的所有出版物、专著、学术论文和有关历史、政治、军事及其他问题的文章，还有书评和杂记——只要我能搜集到。个别情况下我也用了他们后来写作的东西。1949 年以前在其他作家<sup>(4)</sup>的部分文章和个别文章中，已经含有对历史学家自我的学术认识和历史科学的发展进程的反省了。这两种史料在此都被看作原始资料，只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与发展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史料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作为历史科学发展的产物而形成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特定作用，即为这个发展进程提供证据，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历史科学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叙述 30 和 40 年代的政治发展情况和传统的历史

编纂与历史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发展情况时，我主要依靠现有的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有关 30 和 40 年代中共党史的论著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共内部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的发展过程。有人虽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这些问题上，例如特茨尤耶·卡塔奥克的研究<sup>(5)</sup>但又主要集中于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迄今为止，人们只在文献学意义上收录了历史学家在这些年间所发表的论著，而且很不完全<sup>(6)</sup>。因此，首先要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清点，而且要与查阅和分析利用 1930—1949 年在中国出版的专著、杂志和报纸同步进行。在这里，首先必须找出历史学家曾经发表过文章的杂志和报纸；附录中有一份期刊名单。这些出版物的印数往往很少，而且大都在地方上发行。就杂志而言，大多又是不定期的，期数也寥寥。因此单个图书馆的收藏——至少在西欧和美国——肯定不完全。我为本论文广泛利用了联邦德国图书馆、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和美国 4 家最大的收藏东亚学图书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胡佛协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相对而言我掌握的专著较多较全<sup>(7)</sup>。查阅已经到手的期刊，有几位历史学家每人多达 60 余个题目；除了少数例外，设法搞到并利用这些文章也是有可能的。

历史学家的论著并非都是作为正式出版物发表的。中共当时也编辑了一些油印出版物作为内部讲课和学习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上述图书馆中无存，因此我也

无法搞到。从我所研究的历史学家那里，至少从吕振羽那里，可以得知他曾编过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油印材料<sup>(8)</sup>，它们包含一些超出他一般论著的内容。

虽然已有不少论文和几部专著泛泛地论述过古代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它们或详或略地涉及到政治与历史编纂或历史科学的关系问题。对于古代中国这里特别要提及由 W·G·比斯利和 E·G·普利布兰克所编辑的论文集里的文章，其中，作者根据几位主要代表的情况示范性地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主要特征。查尔斯·S·加德纳、韩玉珊和金毓黻则作了详细的总体论述。1980年初在由吴泽编辑的两部论文集《中国史学史论集》中，收集了一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关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论文。1968年阿尔伯特·费尔维克编辑出版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的论文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编纂作了极为重要的概述，介绍了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内容以及历史科学的组织。人们对中国历史科学发展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也反映在新近出现的讨论之中。J·沙波尼尔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观的论文描述了中国历史科学自1897年以来的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其重点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且侧重于历史理论；H·W·许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的著作则从50年代关于分期问题的争论这个侧面，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此外，还有个别文章是关于某一发展阶段

的 例如 50 年代<sup>(9)</sup>和“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年）<sup>(10)</sup>历史科学的发展。历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乔健、L·Y·初、N·达斯、詹姆斯·P·哈里森和王刚武（音译——译者）的文章中受到特别的探讨。

自 1977 年以来，政治与历史科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的论著中也成为一个中心问题了<sup>(11)</sup>。最后值得提及的还有詹姆斯·P·哈里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农民革命的评价的资料丰富的专著。该书尤其论述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图像和与之相关的新的历史意识的开创。

上列论著大都集中于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个别结构因素或者它的整体结构与发展进程，特别是深入到了历史科学在政治或社会环境中的功能问题。在此，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哈罗德·卡恩和阿尔伯特·费尔维克指出人们往往过于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只当作“用一种正统毛主义来替代另一种正统儒家学说的旧事物的变种”来理解当作旧传统的继续来理解按照这个传统，历史的目的就是政治的目的。然后，他们一方面列举了一些既存在于传统的历史编纂也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纂中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与传统的决裂虽然不是完全的，但却是不容回避的。”<sup>(12)</sup>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阶段，迄今尚未出现全面的论述，然而研究这一阶段却可以澄清卡恩和费尔维克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便成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

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轫的个别专著为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奠定了基础。这里特别要提及阿利夫·德里克发表于1978年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渊源的专著和莫里斯·迈斯纳早在1967年就发表的关于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专著。迈斯纳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财富的研究上；从个人修养和所受教育来说，李大钊仍属于传统型的学者。<sup>〔13〕</sup>约瑟夫·R·利文森关于梁启超的著作也是涉及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重新定向的一般问题的。劳伦斯·A·施奈德以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例，论述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过程，而顾颉刚本人也写有一本富有启发性的自传。戴维·T·罗伊关于郭沫若的著作只涉及这位伟大学者早年的生平，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仅有一丝瓜葛。

迄今为止关于30和4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专题论文尚未出现，只有几篇文章是泛论历史科学与历史编纂的，个别文章还只具文献报道性质（例如阿瑟·W·胡麦尔、肯尼思·斯科特·拉陶雷特和李树青的文章）不过，在罗伯特·H·G·李和邓嗣禹的论著中历史科学的主要发展线索却受到了突出强调。总的说来，这些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也没有把30和40年代的形成过程——它自己的历史——当作研究对象。不

过，研究业已起步，1978年以来，针对历史学家翦伯赞，有人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其中，翦早年的史学研究工作受到特别的重视<sup>[14]</sup>。对于1949年以前的发展情况主要有一些同时代人的记述——一部分是由我所选中的历史学家写的。有的论文，例如吕振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在60年代初和今天得以重新印发。相比之下，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1966年以前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更加重视并进行反思。

“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所有论著都是以下列看法为基础的，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甚或更早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看作是统一的，把它的主要代表看作一个团结一致的团体。与之相应，它的发展过程——倘若有人谈起——也被处理为一个均质的过程。只是从60年代中期，当政治争论及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不再把各个历史学家的不同观点孤零零地解释为学术争论的表现，而是当作历史科学观的根本分歧的表现（达斯·哈里森），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提出下列问题，即这种不同的科学观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本论文应对此作出一些解释。

### 1.3 方法上的思考

本论文自以为是关于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过程的历史—实证研究。在此，政治与历史科

学的关系问题处于首要地位，因为有必要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发展中明显可见的问题，尤其是把学术置于现实政治之下的做法，予以说明和解释。因此，本论文主要是以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且在这个关系中也是以历史理论问题为内容的，但它不是特别的历史理论著作。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本身并不研究那些被历史学家谈论过的历史理论问题，甚至也不把它们放到一般的学术讨论关系之中；其二它也不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阐述个人的历史理论观点。事实上，历史学家所谈论的历史理论问题，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均没有被深入讨论过；但是现在这些问题被重新抓住了。在这里，本论文只想在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以形成的复杂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方面有所贡献，研究状况的叙述已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证。

历史学家所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只在它们对历史科学的形成所具有的的功能的意义上予以论述。例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问题就只在它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时，例如历史学家作为中国化的宣传员角色和历史科学与历史编纂在中国化概念中的功能，才加以讨论。此外，对历史科学发展过程的叙述也包括把历史学家的讨论要点整理得更清楚，对个别受到讨论和议论的历史理论一哲学问题（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理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等）的理论加工可以附着在这些要点上。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必须首先确

定 1949 年以前主要历史学家的论著，它们可以作为研究这个对象的原始资料来利用。它们也构成了新发掘的资料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些论著要进行文献学式的编目、按年代排序、根据系统观点分类。在审查史料的陈述价值时，要特别注意各史料的形成和使用目的以及不同的形成和加工阶段（草稿、第一稿和修正稿）目的在于从现有的原始资料中揭示历史事实<sup>[15]</sup>。此外，还要注意准确理解原文和翻译的问题，尤其要在较大的范围内摘录引文和参考章节。在此，我尽量复述与中文文本原文具有同等价值的内容，而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即所谓忠实原文文字的翻译。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使在表达层面上出现术语范围内的翻译转换时，也要保持内容层面上信息内容的相同。如果较少地把本论文中政治的或学术的论断与中文形式的表达手段像在文学作品中那样紧密联结起来的话，就可以使上述做法变得较为容易。然而尽管如此，在翻译当中仍会出现问题，应当简要地予以说明。

因为在汉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系统的关系中，文字符号<sup>[16]</sup>的语义和功能方面通常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对于原始语言汉语在目的语言德语中的某种特定的词汇统一来说，不存在语义—功能价值完全相同的文字符号。因此我只好借助语言的社会关系试着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把“国粹”译为“nationale Essenz”，因为这种表达最接近中文术语的概念内容，但是“国粹主义”却不可在表达层面上保持平行地译为“Doktrin von der nationalen Essenz”而应——为了保

持内容层面信息内容的相同——译为“Doktrin von der Superiorität alles Chinesischen”。翻译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用统一的术语来表达，这也是本论文的一项成果。例如“阶级”和“劳役地租”在中文里就是用不同术语复述的<sup>[17]</sup>。那些业已输入中文词汇里的术语在德文中同样被当作了术语。当涉及出自马克思主义术语库的术语时，这一点就不特别成问题了，因为这些术语的概念和范畴已在德语语言系统中得到充分发展了，它们的等价物在德语语言中已经存在，毋庸本人重新构造和选择。可以直率地称之为倒译<sup>[18]</sup>。

必须指出，用德语语言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系统复述马克思主义中文术语的做法并非没有一点问题——即使对此别无选择。由此而产生的翻译在术语方面是完美的，但这种完美却又会使人产生一种概念一致的印象。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学家此时正处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于一个具有巨大差别的社会的不同阶段，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概念的统一并非毫无困难地先天就有。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有的地方在语言表达、术语、意思、理解或者误解、概念等方面出现了分歧，那么这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内容问题<sup>[19]</sup>。

在解释史料时，我主要采用了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首先根据史料追述各个历史学家的的发展过程，然后相互比较，以便揭示整个进程。通过比较历史学家选择研究对象的历史理论观点、问题的提出、政治动机以及在文化一意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可以发现他们观点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过程主要的典型的特征，即既统一又对立。为了在叙述当中也体现出这一点，我在每一章或每一节的开始部分都对历史学家的主要论点和那些对于形成过程有典型意义的标志作了简要概述，然后再逐个地予以详细叙述，或者按照历史学家，或者按照研究对象，分类叙述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

我也把某一特定观点的存在或者某些围绕特定的历史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当作历史事实看待。在解说历史事实时，编年解说法优先。这一点也表现在主要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叙述方法和分类之中。但是，为了强调说明因果关系，例如历史学家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与其历史科学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他们的历史理论思考与其付诸实践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个结构因素之间的内部联系，在主要部分中也含有按系统进行的分类，但在这一分类中，按时间顺序叙述的叙述方法又是主要的。

由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政治一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而且联系历史科学的发展，并非所有应当予以考虑的史料都能够掌握，对于历史事实也不能溯本求源——这种情况是由必要的选择性工作，即只局限于几位代表人物所造成的——，所以要把叙述过的进程和关系上升到理论性的一般化高度还受到某些限制。因此，在叙述当中，历史学家本人所选择的抽象层面大多都被保留了下来，可以以此来说明历史学家学术的政治的论证及其工

作方法，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进程。

## 2 历史学家小传

要划定那些可以被称作历史学家的科学工作者的圈子，并非易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传统的儒学修养基础上转向研究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的，恰恰在这个背弃传统的历史编纂和意识形态而接受近代科学观的时期，在学术上出现了一种分化。这种情况也特别适应于专业化的科学方法的发展。通常，人们并不根据特殊的方法，而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定义单个学科。因此，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重心很容易发生位移；他们的兴趣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分别转移到哲学、历史、文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上。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统一性和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观点也为单个学科的不完善性提供了一个借口，对此，历史学家毫无疑义。

由于资料繁多，有必要借助一些知名人士的出版物示范性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这些知名人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创立历史科学的活动或者在这一发展的主要阶段表现突出。我试图选择这样一些主要的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和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和历史科学的建设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其发展产生了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我选择了范文澜、何干之、侯外庐、胡绳、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作家。虽然就其研究工作的重点和主要的活动范围而言，把这些知名人士统称为“历史学家”并不完全合适。但是我在本论文中仍把他们当作“历史学家”，因为本论文主要涉及他们在历史编纂和历史科学领域中的活动。自然，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我选择这些科学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关于他们在 1949 年以前的活动的资料还相当贫乏。正如本论文所显示的那样，就是这些被选中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贡献，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极不相同。至于本论文没有顾及到的这个或那个历史学家，可能与本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学家一样，甚或更有资格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的代表人物，关于他们肯定会另有论著问世。

最接近西方专业历史学家概念的恐怕要数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和范文澜了，他们很早就开始把他们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历史领域，并且完成了一些较大的历史研究项目——大都称作“通史”。吕振羽和侯外庐在 1949 年以前也写过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侯外庐还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而翦伯赞对此——虽然是在历史理论方面——也颇有涉猎。他们在 1949 年以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影响广泛，而且还致力于历史科学的组织建设。胡绳首先是作为哲学家知名的，但早在 40 年代初他就写了多篇关于非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历

史观和历史理论的论文，自 40 年代中期起，他更加认识到加强历史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他本人也更加积极地从事近代史研究了。何干之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关于历史的。但他本人自称是经济学家，因此他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然而与胡绳不同，何在 1949 年以后主要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成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主持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该书于 1956 年出版。

历史学家不同的学术开端使我们有可能对 1949 年以前的历史研究描绘出一个宽阔的横断面。此外，把那些并非直接涉及历史问题的论文也包括在内，这个做法可以防止过分狭隘地局限于纯历史科学范围。事实上，在我选出的作家的论著中，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与历史科学理论紧密联系，仅此就可以把历史科学的发展编排到一般的哲学一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的发展之中。

写主要历史学家小传的目的在于，叙述那些被我选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学术和政治成长过程。在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历史科学的发展过程将被作为整体而加以突出，与之不同，这里应当就单个历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作连续的叙述。在此，我所记叙的重点是 1949 年以前的情况，但为了保证画面的完整，历史学家在 1949 年以后的发展也要简略提及

## 2.1 吕振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吕振羽可谓最具独特风格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政治思想史和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1949年以后他在学术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

1900年，吕振羽出生于湖南省邵阳；毛泽东的故乡也在湖南。1926年吕从湖南大学毕业，随后便在国共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范围内参加了北伐战争并且主要在江西省搞政治工作<sup>[1]</sup>。1928年吕来到北平<sup>[2]</sup>以后几年他在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和左派的中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sup>[3]</sup>；间或还有范文澜也在中国大学讲学。

这个时期，吕振羽的政治活动还局限在大学范围内：组织进步团体，出版学术杂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sup>[4]</sup>。此外在20年代末，他还就外交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等，作过多次报告，提出了废除由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民族压迫条款的要求，主张中国应在“民族国际”中居领导地位<sup>[5]</sup>。他的第一个出版物也是论述外交问题的。他还与他的乡党翦伯赞一起编写了一部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较大的著作<sup>[6]</sup>该书同他的《中日问题批判》一样也被当作“共产主义书籍”而遭到国民党的查禁<sup>[7]</sup>。1931年以后，在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中，吕更加积极地从事政治活

动了，他支持进步大学生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sup>〔8〕</sup>。在历史科学领域，他的研究工作也成绩卓著，所有这些都使他获得了“红色教授”的声望<sup>〔9〕</sup>。

根据《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30年代初吕振羽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过学<sup>〔10〕</sup>。按照他本人的陈述，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史了<sup>〔11〕</sup>。1930年吕在一篇发表在一份日文杂志上的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分期问题的观点<sup>〔12〕</sup>，这些观点后来在他计划写作的社会史头两册（1934年和1935年分别涉及原始社会时期<sup>〔13〕</sup>和殷周奴隶制时代<sup>〔14〕</sup>）中，通过广泛的史料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证。吕写作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在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框架内，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sup>〔15〕</sup>。他自称是李达的“学生”<sup>〔16〕</sup>而不像侯外庐那样自称是郭沫若的学生<sup>〔17〕</sup>。当时郭沫若在接近中共的学术圈内，以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吕振羽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得出了与郭沫若完全不同的结论，尽管依据同样的史料。同时，吕还发表了一部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他从“各派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sup>〔18〕</sup>出发，重新评价了直至19世纪的政治思想发展史。后来，他把这些著作统统编排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sup>〔19〕</sup>行列，而后者曾是抗日战争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吕起初并没有参加关于这场文化运动的自我认识和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他只是从事着实际政治工作。1935—1937年间，吕作为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参加了与国民党就民族

统一战线问题举行的南京谈判；1936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谈判结束后，吕接受中共的派遣，于1937年来到湖南，创建了“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等组织，还在塘田建立了一所党校——战时讲学院<sup>[20]</sup>，并在此讲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sup>[21]</sup>。后来，他又到中共华中局高级党校任教，他在教学时，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探讨了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并同毛泽东一样把五四运动评价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sup>[22]</sup>。此外，他还讲授了社会经济史等课程<sup>[23]</sup>。

1939年夏天，吕被调往<sup>[24]</sup>重庆。他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也在自上海迁来的复旦大学担任讲师，继续研究历史和理论问题<sup>[25]</sup>。吕重新提出了那些早在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就得到激烈争论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在中国的存在和分期问题<sup>[26]</sup>。他也深入探讨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创立新文化和在这种新文化范围内的自我认识以及新的历史学方法问题<sup>[27]</sup>。在此，他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观<sup>[28]</sup>。在论述文化运动和由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问题时，吕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要求并在若干地方发表了不同意见<sup>[29]</sup>。

1941年1月，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重庆的形势骤然紧张，同胡绳一样，吕振羽也离开国统区，前往江苏“解放区”；他在这里的中共华中局党校任教。1942年吕跟随刘少奇去了延安，后来又担任过刘少奇的政治

秘书和学习秘书<sup>[30]</sup>。此外，他也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抗日大学教书<sup>[31]</sup>，讲授了外国侵华史等课程<sup>[32]</sup>。1945年他作为新四军的代表，参加了延安解放区人民大会<sup>[33]</sup>。

关于吕振羽参加1942年整风运动的情况，我没见到任何报道。然而，1943年吕积极投入了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运动，他极力要论证，“中国的命运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sup>[34]</sup>。在这个关系中，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把它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sup>[35]</sup>。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新民族文化”的论述被称作“最高典范”<sup>[36]</sup>。吕也积极宣传毛泽东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sup>[37]</sup>要求，并努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贯彻这些要求。早在1941年他就写了一部《简明中国通史》，该书作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教材，通俗地阐述了吕振羽关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向封建制过渡阶段诸问题的主要论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sup>[38]</sup>，重新采用按照王朝分期的原则。后来在1943年在延安党报《解放日报》的一系列文章中，吕进一步把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叙述通俗化了。在这里，吕主要选取了一些在现实政治生活可以找到相似物的中国古代的历史现象，例如帝国的统一<sup>[39]</sup>、中间阶级的动摇<sup>[40]</sup>、甚或干部问题<sup>[41]</sup>。

抗战结束后，吕振羽随新四军进入东北。他既是大连党委委员<sup>[42]</sup>又是辽宁省委常委<sup>[43]</sup>，还有其他职务。1947

年他定居哈尔滨，完成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在该书中，吕特别注重给予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平等地位，力避他先前著作中的错误。据他本人说，他原先的著作仍然深受传统史学大汉族主义的影响<sup>[44]</sup>。1949年以前吕振羽主要在下列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群众》、《时事类编》、《读书月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苏文化》、《理论与现实》、《文史》和《解放日报》。

1949年共产党人胜利后，吕先在东北担任过一系列党政职务，1950年（原著误，应为1949年——译者）担任大连大学校长。在历史学界，他曾是中国历史学会的理事和《历史研究》的编委。1961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吕振羽1955年即是学部委员了——译者）<sup>[45]</sup>。此外，他还通过他的活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挥着影响<sup>[46]</sup>。

早在1963年吕振羽就“丧失”了“自由”<sup>[47]</sup>，1967年初他又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才获释出狱。“文化大革命”期间，吕主要受到了下列指控：（1）参加过南京谈判，此举被说成“与蒋介石合作”；（2）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的说法，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在于攻击刘少奇<sup>[48]</sup>。那么吕很早就被剥夺自由一事就不足为怪了。吕振羽在囚禁期间曾在报纸的边角写下了3000多首诗和若干简短的历史评论<sup>[49]</sup>。然而当1974年“尊法批儒”运动展开之时，他却拒绝参加，相反，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揭发陈伯达的反革命真实面目”<sup>[50]</sup>。

1979年，吕振羽被完全平反。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开始撰写他的《革命回忆录》<sup>[51]</sup>。他的主要著作获得再版发行<sup>[52]</sup>。1980年7月17日他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逝世<sup>[53]</sup>。

## 2.2 翦伯赞

翦伯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阶段担任过多种政治职务，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组织和理论方面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系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sup>[54]</sup>，是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由于他本人属于少数民族，所以他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作用问题，坚决反对传统史学的大汉族主义。

翦伯赞曾在常德中学念过书；常德是位于洞庭湖西南的一个城市。1916—1919年翦又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直到1923年才回到常德当中学教师。1924年他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攻读经济学<sup>[55]</sup>。1925年回到中国，此后便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了。他担任过曹锟的政治顾问，后者是所谓直系集团的头子，1920—1924年任北京中央政府总统。1926—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翦转入国民党中央供职，直到1935—1936年，他的政治活

动始终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1927—1928年翦伯赞担任阎锡山部下商震将军的秘书。1929年又成为他的乡党国民党左派分子覃振的秘书。1934年覃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身份赴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和美国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考察访问，翦作陪同<sup>[56]</sup>。

早在1930年，翦就在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下，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性质”问题<sup>[57]</sup>。与此同时，他还同他的乡党吕振羽合写了一部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著作<sup>[58]</sup>。此外，他也翻译了斯大林的一些文章，并以《苏联集体农庄》的书名结集出版。他在一些政论文章中，深刻分析了日本日益扩大的侵华行为。1937年5月，翦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48年才得到承认<sup>[59]</sup>。

1937年日本军队大举入侵，翦伯赞作为难民由南京返回故乡湖南省，他在一个教师培训学校谋到了职位，后来在1939年的时候又成为当时已迁到溆浦的民国大学的讲师<sup>[60]</sup>。此间，翦在长沙建立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并由该协会出版《中苏文化》杂志。他和侯外庐、吕振羽随后几年所写的历史和政治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在该杂志上<sup>[61]</sup>。

1938年翦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许多哲学和政治问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并运用于中国历史<sup>[62]</sup>。《教程》明确反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学派<sup>[63]</sup>。后来翦还进一步批判了这个学派；按照吕振羽的意见，翦的批判过重<sup>[64]</sup>。翦抓住

中国社会史领域的一些争论问题，特别是分期问题，深刻反省了他本人的研究方法<sup>[65]</sup>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有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sup>[66]</sup>。翦在研究宋、明时期的历史时，重点探讨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斗争，现在，他把这一研究与抗日战争结合了起来。他相信，这些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文章至少能对当时的社会斗争有所贡献<sup>[67]</sup>。自1939年起，翦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监视<sup>[68]</sup>，他的著作也遭到国民党的严格审查<sup>[69]</sup>。

1940年，翦伯赞奉湖南省党委之命，前往重庆。尽管他后来抱怨当时与世界大事和战争的隔离<sup>[70]</sup>，但他在重庆仍通过他的历史论文和关于一般政治形势的文章，参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战。他除了用现实化的历史论文形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外，还在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争论中，探讨了一些近现代史问题，例如1924年北京国民军的起义<sup>[71]</sup>，或者直接涉及抗战问题。

1941年初，国民党对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的迫害日益加剧。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命令知识分子党员退出实际的政治工作<sup>[72]</sup>。翦伯赞此时也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了。他埋头钻研细微问题，特别是中国史前期的问题。这就为他编写《中国史纲》作好了准备；《史纲》的头两卷论述了从开始到汉末的中国历史，翦可以在他发表于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基础上进行建筑。《史纲》第1卷出版于1944年，第2卷1947年。根据同行的评定，它以其“良好的构造和新思想”<sup>[73]</sup>而独具特色，是“这个时期最

有影响的著作”之一<sup>[74]</sup>。此外，翦还深入探讨了历史科学的自我认识<sup>[75]</sup>和文化运动的一般问题<sup>[76]</sup>。

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翦没有公开表态，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尚未被确认为中共党员。然而他反对在学术界搞这样的“整风”，主张按照个人的见解去研究历史<sup>[77]</sup>。在他看来，唯一的条件是：“用可靠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不要用空话去原则地强调阶级性（原著误应为“阶段性”——译者）”<sup>[78]</sup>。在他写的关于历史研究的历史理论文章中，他已经指出了一些主要原则：反对原先历史编撰中的大汉族主义和汉族中心论，强调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sup>[79]</sup>。他对小所有者这一中间社会群的论述<sup>[80]</sup>，可以说是对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种辩护，他认为小所有者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

这些年间，翦伯赞始终没有公开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展开争论，他运用隐蔽的影射手法进行批判<sup>[81]</sup>。例如他在抗战末期考察了从改良政策到暴力政策的转变<sup>[82]</sup>，考察了南明政权的腐败政治<sup>[83]</sup>等等。

抗战结束后，翦作为民主同盟的主要代表之一被提名为拟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但是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召开，翦便于1946年同他的许多同事一起先去南京，后赴上海。他除了在复旦大学讲授历史理论外，还兼任其他工作<sup>[84]</sup>。他与侯外庐一起主编《唯民》周刊，从他的《中国史纲》中节选了若干片断在该刊物上发表<sup>[85]</sup>。政治上，他积极参与了组织上海高等院校教师的

工作。他是民主同盟上海总部的工作人员，1947年当该总部被迫关闭时，翦就根据中共的指示，同侯外庐一起去了香港<sup>[86]</sup>。他在那里继续在民主同盟范围内工作，此外还任教于达德大学，1948年参加过考古研究<sup>[87]</sup>。1948年底，共产党人胜利在望，翦同郭沫若——他们早在重庆时期就建立了联系——、马叙伦、许广平及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北上大连<sup>[88]</sup>。

1949年以前，翦曾在下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大学月刊》、《读书月报》、《读书与出版》、《理论与现实》、《群众》、《时事类编》、《文粹》、《文风》、《中华论坛》、《中苏文化》、《中原》。

1949年以后，翦先是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和若干友好协会中任职。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1954年政治协商会议解散（政协并未解散——译者）后，他又参加了全国人大。50年代，他在国家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工作，该委员会在文化政策的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翦还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然而，翦的主要影响还是在历史学界。他先任燕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后来又在民族学院工作。自1954年（原著误应为1952年——译者）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这一职务直到1966年，是他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基础。此外，翦还是一些重要的历史杂志如《历史研究》、《新建设》和《人文科学》等的编委。1955年，他被选入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该院第三历史所的工作<sup>[89]</sup>。50年代，他

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并作为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在国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sup>[90]</sup>。1962年3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sup>[91]</sup>。“文化大革命”中翦伯赞成了文革小组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该小组现今被称为“四人帮”。他被当作“亲蒋反共的极端反动的人物”<sup>[92]</sup>而受到批判和迫害，最后竟在1968年12月被逼致死<sup>[93]</sup>。自1978年起，翦逐渐获得平反，1979年2月22日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官方追悼会<sup>[94]</sup>。他那部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作为内部资料印发的四卷本《中国史纲要》于1979年正式出现在书店，人们对他的历史理论思想也开始进行讨论和研究了。

## 2.3 侯 外 庐

侯外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主要致力于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研究。

侯外庐1906年<sup>[95]</sup>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西王智村。1922年<sup>[96]</sup>他来到北京，听了李大钊等人的讲课，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参加了学生运动。1924年他在北京法政大学注册，同时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历史。1926年冬他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经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1930年侯外庐离开巴黎，经莫斯科回国，先抵哈尔滨。他在那里的法政大学教了两年书，后来又回到北平大学举办辩证唯物主

义讲座。1932年12月他因为参加纪念广州公社起义活动而遭到逮捕，次年9月获释后便回故乡山西省找了一份新工作<sup>[97]</sup>，在太原民族革命大学举行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原理的讲座；该讲座的讲稿于1938年公开发表<sup>[98]</sup>。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上半年，侯居住在西安。由于害怕国民党追捕，他旋即又离开西安，先在武汉作短暂停留，与一家出版社商谈《资本论》的翻译事宜，后又去了重庆。此时他已与中共失去联系多年<sup>[99]</sup>。到达重庆后，他马上在文化、政治和学术界积极开展活动。他参加了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以后几年，他在由中苏文化协会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政论和学术文章，1943年还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就其政治观点来看，他拥护国民党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他看来，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对于世界范围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贡献，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此外，侯还在文章中宣传一种批判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据说该运动应当在文化领域内与政治的统一战线相适应<sup>[100]</sup>。他也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sup>[101]</sup>、历史遗产的内容与形式<sup>[102]</sup>等问题的争论中表现突出；这些争论多数是在中共党内展开的。同何干之和胡绳一样，他也致力于鲁迅研究，研究被鲁迅严厉批判过的农民传统的封建行为方式<sup>[103]</sup>。在这些年间的意识形态讨论中，他在中共内部好象采取了一种与陈伯达对立的立场。

在1942年党内的整风运动中，侯外庐也没有直接表态。但是在以整风运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的

讨论中，他却站在王实味一边，而后者是整风运动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侯也没有参加 1943 年由中共发起的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运动，在重庆的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直到 1945 年他才在一篇关于法律制度的文章中，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示反对对个人的压制，反对特权和超经济的强制<sup>[104]</sup>。抗战时期，除了参加这些政治一意识形态讨论外，侯也对中国古代史和哲学史进行了广泛研究。在此之前侯外庐已经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多年研究，这一研究为他从理论上分析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命题奠定了基础<sup>[105]</sup>。1942 年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中，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价中国的哲学家。与此同时他又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中阐述了他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观点，并为他的“中国古典社会的亚细亚性”和在一般的历史发展法则内“中国的特殊路径”等命题铺平了道路<sup>[106]</sup>。以后几年他继续完善这些命题<sup>[107]</sup>甚至在他发表于 1949 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中，更进一步地详细论证了这些命题。在历史研究领域，侯外庐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古代史上，但在哲学史方面，他却涉及到了近代早期的思想家<sup>[108]</sup>。

抗战结束后，中共提名侯外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代表；该会议的任务是为计划建立的联合政府制订政治纲领。国民党起初接受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但不久又表示拒绝<sup>[109]</sup>。由于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迫害日益加剧，侯外庐只好离开重庆。他先是去了上海，成为《文汇报》每周副刊的主编和《唯民》周报哲学专栏

的撰稿人。因为被怀疑煽动大学生反对国民党，侯被迫于1947年同他的许多同事一起流亡香港。他在香港任教于达德大学，此时翦伯赞也在该校<sup>〔110〕</sup>。

侯在抗战即将结束时写了一部《新哲学教程》，试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sup>〔111〕</sup>。普及科学知识的努力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也明显可见，侯在自序中明确表示要把该书纳入“中国化”的整体之中<sup>〔112〕</sup>。内容上属于这一关系的还有1948年的一篇论文，侯在该论文中第一次分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概念<sup>〔113〕</sup>。

1949年以前，侯外庐主要在下列期刊和报纸上发表文章：《读书与出版》、《理论与现实》、《群众》、《时事类编》、《唯民》、《文风》、《中国学术》、《中华论坛》、《中山文化季刊》、《中苏文化》和《新华日报》。他同翦伯赞一样，有时也与吕振羽一起，经常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章。他本人也曾担任过《读书与出版》、《理论与现实》<sup>〔114〕</sup>、《中苏文化》等刊物的主编或编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成为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直到1966年。此外，他还被选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同胡绳一样，当该机构在最近几年重新活跃后，他又是其成员之一了<sup>〔115〕</sup>。除了这些行政职务外，侯在学术界更居重要地位。他是中国史学会和哲学史学会理事。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61年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攻击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sup>〔116〕</sup>。有人指控他坚持非正统思想，犯有严重错误。他

因此深受侮辱，多次被拉去批斗，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sup>〔117〕</sup>。自 1979 年 9 月起，侯重新公开露面<sup>〔118〕</sup>。此间，他完全恢复了名誉，他在 50 年代的部分著作也被再版发行<sup>〔119〕</sup>。

## 2.4 范 文 澜

范文澜是中共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在国外也非常知名<sup>〔120〕</sup>。按照霍华德·L·布尔曼的说法，他之所以如此知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他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声望与学识拿来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服务，而这个新的正统观念就是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历史结果结合起来”<sup>〔121〕</sup>。自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延安开始机构化以来，范文澜就积极参与了历史科学的组织建设和内容规定。1949 年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 3 所（后改名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代历史学家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范文澜 1893 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1898—1906 年入私塾启蒙，攻读中国古典作家作品，1909—1912 年在上海和杭州上中学，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人文科学。他在 1917 年大学毕业后曾为该校校长蔡元培当过短时间的私人秘书。按照中文史料，1918—1921 年范文澜去了河南省的一所中学任教<sup>〔122〕</sup>。与之不同，布尔曼指出，1919—1921 年间范曾赴日本师从川上一和牧野柞等

人<sup>[123]</sup>。范也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干过数月统计员，但他对这种职业很不满意，于是便在 1921 年返回华北并在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了古代文学和历史讲师<sup>[124]</sup>。1925 年范参加了“五卅”运动，1926 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不久又与之失去了联系。1927 年 5 月由于受到天津当局逮捕的威胁——有人指控他发表过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说并收藏了别的不受欢迎的东西——范逃离天津 暂避北京 在那里 他作为讲师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他也重新接上了中共党员关系。1930 年阎锡山与蒋介石交恶，范文澜因收藏共产主义杂志而遭到短时间的监禁<sup>[125]</sup>。

1932 年，范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任该院院长。1934 年底他又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 监禁 4 个月后才由蔡元培和北平大学其他讲师具保获释。1935 年范担任了中法大学的讲师，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呼吁抗击日本侵略者<sup>[126]</sup>。霍华德·L·布尔曼说 范的被捕与“一二·九”运动有关 获释后，由于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他不得不在医院度过一整年时间<sup>[127]</sup>。关于范何时被捕的问题 这里不能深究。从原始资料中可以发现，1936 年范又开始在开封河南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文学史和古典作家作品了。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成为接近中共的《风雨》周刊的合作者并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

1938 年 6 月开封陷落后，河南大学被迁移到与湖北省接壤的鸡公山。范在那里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了联系，

再度参加了战争地区——主要在桐柏山——的政治工作。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sup>[128]</sup>。范似乎要以他的实际行动消除某些党员先前加在他身上的机会主义的指责<sup>[129]</sup>。1939年底当国共两党军队第一次军事冲突发生之际，中共党组织决定把范文澜送到延安。范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新生活<sup>[130]</sup>。但是直到1939年范的著述活动仍主要不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领域，我没有搜集到他在进行抗日宣传期间可能写过的文章。30年代初范主要致力于校勘古典作家的文本，1931年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五行说的论文，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展开了争论<sup>[131]</sup>。此间他在1930年编写的中国忠臣义士传曾被多次再版发行<sup>[132]</sup>。他针对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任务而写的论文可以作为仅有者而列入抗战初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行列<sup>[133]</sup>。

范文澜是在1940年1月到达延安的。他最初担任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兼管新建历史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同时，他也负责集体编纂中国通史工作<sup>[134]</sup>。然而，与马列学院的同事们的合作却遇到了困难，以致于范最后于1942年底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的头两册叙述到19世纪中叶<sup>[135]</sup>。1943年第3册也出版了，该书后来改名为《中国近代史》述及1840—1901年<sup>[136]</sup>。

1940年范第一次依据斯大林的论述——他早在1939年在河南时就研读过斯大林的著作<sup>[137]</sup>——并在与吴玉章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概述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看法<sup>[138]</sup>。现在他在《简编》中进一步深

化了他的观点；《简编》的目的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 显示社会发展法则”<sup>〔139〕</sup>。中共把该书指定为边区干部培训的官方教材<sup>〔140〕</sup>。

1942年，范积极投入了整风运动，运动后期，1943年，他担任了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sup>〔141〕</sup>。他与在延安的主要理论家艾思奇一道，发起了反对王实味的斗争<sup>〔142〕</sup>。在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多篇文章中，范批判了王实味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纪律观，认为王实味完全“不可救药”了<sup>〔143〕</sup>。有的党员以为批王实味批得过火了，对此范表示坚决反对<sup>〔144〕</sup>。他还联系整风运动，把毛泽东的“古今中外论”上升到历史理论原则的高度，称之为“马、恩、列、斯整部思想方法论的最简要的综合”<sup>〔145〕</sup>。范广泛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按照它的精神对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发表过意见。在另一组《解放日报》文章中，范从历史<sup>〔146〕</sup>和文化<sup>〔147〕</sup>方面强调了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1943年8月，范文澜在《解放日报》的一篇大社论中，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展开了公开论战，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进行辩护：“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的主要力量，……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主幸福的伟大政党”<sup>〔148〕</sup>。与之相关，范还发表文章，研究了曾国藩和袁世凯等历史人物<sup>〔149〕</sup>。这是一些政治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历史事件被现实化了。

抗战胜利后，范文澜于1946年担任了新建的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范兼任该室

主任<sup>[150]</sup>。1949年以前,《解放日报》是范发表文章的主要报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因其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职务而成为仅次于郭沫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那部经过多次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和被翻译成俄文和德文并多次再版的《中国近代史》,直到现在仍是书店出售的唯一的标准著作<sup>[151]</sup>。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在北京逝世<sup>[152]</sup>。

## 2.5 胡 绳

胡绳主要是以写作哲学和理论文章知名的。他是“党的宣传工作组织者的坚实核心的成员”<sup>[153]</sup>尤其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表现突出。

1919年,胡绳出生于上海附近一个教师家庭。他于1934年在上海读完中学以后来到北平,在北平大学学习哲学除了专业课他还跟赫尔穆特·威廉学过短时间的德语。但是一年后他又回到上海,自学深造,他认为这样更好一些。

早在中学时期胡绳就于1931年参加了南京反日爱国的示威游行,并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影响下,特别是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他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

马克思主义了。他仔细阅读了瞿秋白的一些文章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sup>〔154〕</sup>。自 1935 年起，胡绳的头一批政治文章在倾向共产主义的《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艾思奇也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读书生活》杂志在“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绳以后数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爱国运动中的政治工作。胡绳还同何干之一起为在新启蒙运动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操劳<sup>〔155〕</sup>。他尤其关注青年人的动向，而他后来所写文章的主要读者也是青年一代。

抗战爆发时，胡绳先去了武汉，1938 年再去重庆，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党员身份直到 1941 年才得以承认。抗战开始以来，胡绳主要从事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先在以抗日为宗旨的《全民抗战》或《读书月报》。自 1941 年起直至抗战结束又在共产党人的《新华日报》工作。1941 年 1 月国共两党军队发生冲突后，他同其他一些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有邹韬奋——一起，因为国民党迫害的威胁，被迫迁居香港<sup>〔156〕</sup>。一年后他们再返重庆，并且是通过扬子江东边的游击区回到重庆的<sup>〔157〕</sup>。

胡绳在抗战开始后所阐述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如统一战线、抗战各阶段的划分和把边区评价为新型国家的胚胎形式和样板等<sup>〔158〕</sup>，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毛泽东的观点的。自 1937 年起胡绳加强了对哲学、理论和伦理问题的研究，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历史遗产的作用问题；胡绳属于最早提出必须把辩证法唯物论中

国化的观点者<sup>[159]</sup>。以后几年，胡绳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对手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里特别涉及到对后者的哲学前提的批判，例如对钱穆、冯友兰、胡适等人所坚持的哲学前提的批判。胡在这个关系中撰写了近 200 篇杂记和一系列哲学论文。

1942 年胡绳作为《新华日报》的编辑参加了整风范围内的党内讨论；1942—1943 年《新华日报》由陈伯达主管。整风运动主要的批判目标是王实味，但是我尚未发现胡绳在这个时期写有公开表示拥护或反对王实味的署名文章，不过，这一斗争在他的哲学文章中确有反映。这个时期，胡绳在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至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改变了观点，这一改变是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准绳并与他本人以往的思想相违背的<sup>[160]</sup>。

可以理解，1943 年的反蒋运动在重庆是无法公开进行的。因此，胡也只好借写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旁敲侧击。他用历史影射的手法，在一些论文中，特别是在 1946 年匿名发表的《二千年间》中“以古喻今”<sup>[161]</sup>。

1945 年抗战结束后，胡绳同何干之一样致力于构思未来国家形态的发展方案。他认为“使生产力发展，使人民能够丰足，国家能够富强”<sup>[162]</sup>最为重要。解放战争时期，胡再次自我批评地分析了抗战中的文化学术运动，例如他修正了原先对文化运动的评价，表示赞成毛泽东的观点<sup>[163]</sup>。他还重新规定了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首先他认为必须实现抗战期间已经提出的学术的“中国化”和“通俗化”口号<sup>[164]</sup>。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愈益转向了历

史研究，因为他把研究和整理本国历史，首先是近代史，看作理论中国化的绝对必要的前提<sup>[165]</sup>。他自1946年起零星发表了一些关于近代史的论文，这就为他在1948年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作好了准备工作。1946年胡离开重庆，他在上海度过了战后的最初两年，也在上海写了大量政论文章。他还在《文粹》和《理论与现实》杂志社协助工作。正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胡绳在这些年间也致力于争取知识分子与中共合作<sup>[166]</sup>。

1948年政治形势异常紧张，胡绳同翦伯赞和范文澜一起去了香港<sup>[167]</sup>。在那里，他站在周扬一边，参加了反对胡风的运动<sup>[168]</sup>。同年4月他又离开香港，前往此时已被“解放”的石家庄，承担了中共北方局宣传文化部的领导工作<sup>[169]</sup>。

1949年以前，胡绳主要在下列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北方文化》、《读书生活》、《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民主青年》、《群众》、《新文化》、《中华论坛》、《解放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绳在民主青年组织和哲学学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1954年他成为中共党校哲学部副部长，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又任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副主编。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胡被重新安排到东北局宣传部工作达一年半，1963年返回北京中央宣传机关<sup>[170]</sup>。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绳也受到了冲击。1966—1969

年他作为《红旗》杂志的编辑经常受到“审查”因为在以陈伯达为主编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中，帮派斗争特别激烈。此后，胡又被遣送到石家庄的一所干校劳动改造达4年之久。1973年返京后，胡开始撰写一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的新作。1976年他被委任编辑毛泽东的著作目前正在增订第5卷和编辑第6卷<sup>[171]</sup>。胡绳的著作已在书店消失多年现在自1978年起又开始再版发行了<sup>[172]</sup>，胡本人也新写了一些历史论文<sup>[173]</sup>。1978年以来他作为上海的代表在第5届全国人大中占有一个席位。

## 2.6 何干之

何干之是“30年代上海文化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sup>[174]</sup>他在延安发展成为理论家和党的历史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尤其在编写党史、培训青年干部和青年教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75]</sup>。

何干之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一个华侨家庭。1925年开始在中山大学学习。在广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他阅读了一些进步杂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即使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没有使他丧失这一兴趣。1929年他留学日本，对共产主义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他研读了马列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决心回国宣传马

列主义。

自1932年起，何干之任教于广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国民大学。他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他还与接近中共的上海文化总同盟取得了联系，并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部。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创立了左联、社联、剧联等分支机构。作为“文总广州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sup>〔176〕</sup>，他发起了多次政治讨论，出版内部刊物，散发革命传单，演出抗日戏剧。

这些政治活动使何干之在1933年秋丢掉了师范学校的教师工作并受到通缉。他被迫迁移上海。1934年5月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在社联党团和文总宣传部工作。一年后，上海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何与党失去了联系。他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了文总分部的工作。1936年何返回上海，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sup>〔177〕</sup>。

从这个时候起，何干之开始研究当时受到广泛讨论的有关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了。按照他本人的自述，他虽然在30年代初就对历史科学的方法和内容问题进行过探讨，但是直到政治关系急剧紧张之际，他才真正开始他的学术工作，开始以这种方式反对统治者<sup>〔178〕</sup>。现在，他全力以赴地与前苏联、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就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停滞性与分期问题展开了争论，发表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转变期的中国》以及迟至1937年才在延安撰写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阐述了他的观点。刘炼强调指出，何在这场论战中毫不犹豫地

站到了共产党人王学文一边，坚决反对“中国托派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反对严灵峰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sup>〔179〕</sup>。

1936年底、1937年初，何干之全力支持新启蒙运动<sup>〔180〕</sup>。他在这一关系中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他作为头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员，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作一广泛论述。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何干之总是赋予由政治经济学决定的社会史观以优先权，但在这部近代史著作中，他却相反地深入研究了上层建筑现象，整个近代史都被他纳入新文化运动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干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周扬、艾思奇一起前往延安。他们是第一批到边区来的“文化工作者”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亲自接见。何在延安才读到毛泽东的文章，他与毛泽东就他后来未能实现的编写中国民族史的计划，进行过个人间的书信往来。他试图强调说明中国历史上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孰是孰非。对于这个计划，毛泽东表示支持，并称赞它“对于当前的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毛还向何指出：“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sup>〔181〕</sup>

何干之一边在延安陕北公学讲学，一边写作。1939年陕北公学与其它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在晋察冀边区日本封锁线后面的阜平；每当日军前来“扫

荡”大学就自动“解散”，待日军撤退后再集合起来继续上课。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也用这种方法经受住了日军1941年和1942年两次采用“焦土”战术而进行的战役。

在1941—1942年整风运动的背景下，何干之转向了文学和伦理学问题。他同胡绳一样，特别研究了为鲁迅所痛斥的农民传统的封建行为方式和规范。但是，他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仍得出结论说，新创立的文学和政治必须与这些现实情况相结合<sup>〔182〕</sup>。他的文学艺术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非常接近。同毛泽东一样，他也根据这样的观点来解释鲁迅，强调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否认把文学当作批判的武器——不论在什么社会。1943年何干之重新回到延安，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关于何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刘炼没有予以详细说明<sup>〔183〕</sup>。同年何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命运二种》的文章，同他的同事范文澜和吕振羽一样积极投入了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sup>〔184〕</sup>。除了作为宣传员的活动外，何干之在抗战期间也担任过政治职务，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和“解放区”人民大会预备会议的代表。此外，他也参加了1945年中共的“七大”。

1945年以后，何又返回华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院院长。他讲授过《论新民主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等多门课程<sup>〔185〕</sup>。1946年何成为《北方文化》杂志的编委，该杂志在当时已经成了“解放区”的张家口出版发行。在何干之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论述

的重点。何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的必需”<sup>〔186〕</sup>但要辩证看待要以发展资本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sup>〔187〕</sup>。因此，他既拥护美国资本主义帮助工业建设<sup>〔188〕</sup>，赞成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同时也主张建立合作社<sup>〔189〕</sup>。

在战后所写的文章中，何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说毛泽东的著作。他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此间正在发展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sup>〔190〕</sup>。这些文章也主要发表在《北方文化》上，该杂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91〕</sup>。同一时期，他也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同40年代初一样，他又开始大力宣传鲁迅了<sup>〔192〕</sup>。鲁迅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发展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即坚决拥护中共的事业，反对国民党。何干之写的《刘邦与项羽》一文<sup>〔193〕</sup>只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符合一篇关于古代史的论文的性质，尽管其题目带有很大欺骗性。刘邦是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创始人，他在这里代表着毛泽东，而蒋介石则被等同于历史上的失败者项羽。

1949年以前，何主要在中共下列政治理论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北方文化》、《读书》、《民主青年》、《文粹》、《自修大学》、《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他在1947年写的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同胡绳的文章一起被收录在一本文集中<sup>〔194〕</sup>。

1949年以后，何干之继续从事于培训党的干部工作。他搜集党史资料，承担了培养高等院校党史教师的任

务<sup>〔195〕</sup>。他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的一个中心——的教授，领导着一个由北京各高校讲师组成的、为高等院校编写现代史教材的工作小组。1954年该工作小组提交了第一份初稿，经过认真讨论，1956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sup>〔196〕</sup>。该书至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现代史最全面的论著，1959年被译成英文<sup>〔197〕</sup>。早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康生<sup>〔198〕</sup>就图谋迫害何干之了，他攻击中国人民大学大多数教师是“资产阶级右派”并且据刘炼说，诬蔑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何干之针锋相对，他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中，坚决主张系统学习和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左”的片面性。他的观点被当作“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sup>〔199〕</sup>。

1962年周恩来交付何干之一项研究任务，即向第三世界国家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介绍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和各派的政治演变。许多助教参加了这项研究，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初稿，然而该稿未能得到最后的修改加工。

“文化大革命”当中，何干之被攻击为“反革命”和“三反分子”<sup>〔200〕</sup>，受到上百次的批斗，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特别是在后来的“监督劳动”中，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直到1969年5月他才从“犯走资派错误”的污点中“解放”出来，但是他那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的写作党史的工作计划却无法实现了。几个月后，1969年11

月何死于心脏病,他是在苏家坨人民公社前沙涧村的土路上猝发心肌梗塞的<sup>〔201〕</sup>。1979年1月他被正式平反<sup>〔202〕</sup>。

## 3 1927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前提

### 3.1 在西方影响下意识形态的重新定向

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对峙中，19 世纪的中国被拖出了政治、经济孤立的境地。国家和社会已不能应付这种对峙。这一点首先最明显地表现在军事力量薄弱，无力抵抗西方的入侵上，也表现在政治制度腐败，无力接受这一挑战上，最后还表现在日益增长的对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前提的怀疑，这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就是“坚信本国文化的无与伦比和以此为基础的秩序思想的普遍性”<sup>〔1〕</sup>。自 19 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无不冥思苦索，希望找到一个“富国强兵”的办法。大多数人一致认为，中国必须依靠西方而近代化。60 和 70 年代，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一般技术被看作“挽救中国”的重要手段。到 90 年代改良主义者则开始宣传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国家政治组织方法了。同时，对导致军事软弱的“思想”原因的追问，也促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

这些思想家和从张之洞到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者的努力，尽管细节上千差万别，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从整个社会的形势中追寻中国比西方列强软弱的原因，而只是孤立地在社会的部分领域里寻找，首先在军事技术的狭窄范围，然后又在政治制度和思想范围。他们看到的不是社会整体，而是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个别现象，以为可以通过吸收和采用西方社会某些成份的唯意志论行为来改造这些现象，使之适应新的关系，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洗刷民族的耻辱。正如从中国社会的部分领域中追寻原因的情形一样，这些思想家也把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与其赖以形成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他们调和主义地处理和不加区别地利用那些看上去似乎对他们有用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直到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中，才逐渐得以克服。当时，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发展已经进入了理论家的视野<sup>(2)</sup>。

现在，一方面，与西方的对峙导致了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更富有批判性地考察本国的文化和思想遗产了；在此，人们既试图找到一些积极的有益于革新的因素，也试图发现那些消极的应予抛弃的因素。要求重新评估思想史的发展和那些素来被人视为中国的精神基础的东西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此产生的重新评估的需求便是中国近代历史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前提和动机<sup>(3)</sup>。1898 年改良主义运动的主要首脑康有为(1858—1929 年)和梁启超(1873—1927 年)便是第

一批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宣传社会进步和社会进化理论的人。如果说康有为在此还要引用儒家学说的范畴为这些新思想进行辩护，即通过新的文本解说使之合法化<sup>[4]</sup>，那么梁启超就首先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思想家联系起来<sup>[5]</sup>。

在剖析旧传统的范围内，梁启超也对作为思想传统的一个主要因素的传统的历史编纂<sup>[6]</sup>产生了怀疑。他同章太炎（1868—1936年）一样也把中国的衰微归咎于民族意识的缺乏，并用传统历史编纂的不完备性来解释这种欠缺<sup>[7]</sup>。他热切要求一种新型的历史编纂以便创造新的民族意识。

在这里，对旧式历史编纂的主要特征作一简要回顾是合适的，而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改革恰恰就是针对这些特征的。传统的历史编纂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倾向，并且大多是“作为政治调整措施和对过去的道义解说”<sup>[8]</sup>而发挥作用的。后来，皇室委托历史学家班固（32—92年）编写上一个王朝的历史，随之“历史编纂……便成为国家的一种工具了”<sup>[9]</sup>。以后，在唐代（618—907年），“史官”的设立更加重了历史编纂的国家政治性质。在这种传统的历史编纂当中，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被按照现实政治的要求加以解释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褒贬完全出自观察者的好恶；不是从历史背景和时代关系出发进行评价，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现代化。历史解说的主要手段是一种根源于大一统传统的类比法。这样，正如历史为现实辩护一样，历史也成了一种可以多方面运用的政治

斗争的工具。理论家和政治家都从各自时代的现实需要和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寻找历史的合法性证明，他们用这种方法各自选取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教训”来支持他们的立场观点。

刘知几(661—721年)最早对这种把历史编纂与统治者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他提出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并以此提出了那些政治上无权的阶层的要求，要求不受政治束缚地解释历史。然而，他并没有从总体上对以儒家学说为依据的历史编纂的政治—伦理功能表示怀疑<sup>[10]</sup>。

18世纪时章学诚(1738—1801年)重新抓住了历史编纂的政治功能问题。他首次用进步的<sup>[11]</sup>、着眼于未来的观点规定了历史编纂的社会任务，坚决反对历史编纂的保守性：历史编纂不应为论证现存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服务而应为改革现实贡献力量以便掌握未来<sup>[12]</sup>。

这些试图依靠赞成改革、放眼未来的社会力量，重新确立历史编纂与政治的关系的主张，在帝国时期无法得到贯彻。只有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大变革之际，传统的历史编纂才受到普遍怀疑，上述主张又被重新提出。

梁启超在论述新史学时，明确提到了刘知几和章学诚等人对历史编纂的思考，力图证明：西方的历史科学思想早已被中国思想家们以类似的方式阐发过了。这样，他不仅能够把历史编纂理解为一门科学学科<sup>[13]</sup>而且也能够从本民族的传统中推导出这门学科。另一方面，梁也深

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历史发展进程的显著特点就是强大的种族和民族同弱小的种族和民族互相为生存而斗争。他为中国的软弱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同时也说明了必须通过战斗来克服软弱的道理。梁启超指出，新的历史编纂必须作“民族主义的仆人”，要以唤醒民族意识为己任，而这种民族意识就体现在反对压迫中国的政治行动之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在 1903 年公布了新的研究重点。与传统的历史编纂相反，现今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皇室宫廷，应当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个别名人，应当是现代而不仅仅是过去<sup>[14]</sup>。后来，梁又把这些要求具体归纳为以下四点：（1）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说明它的兴盛与衰落；（2）必须把那些非汉族的中国民族写入历史书中，必须抛弃沿袭已久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编纂；（3）既要研究中国文化<sup>[15]</sup>的发展，也要说明别国文化对中国的发展的影响；（4）要研究中华民族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研究未来中国对世界的责任<sup>[16]</sup>。梁启超所主张的是一种新的、具有强烈民族性的历史编纂，他的主张与旧的大一统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历史观有着显著区别，这些主张总而言之即是试图把中国历史编纂学传统中的进步因素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综合起来。梁的思想之所以会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产生巨大影响，由此便可以得到说明。然而，当梁启超仍致力于在历史编纂中综合传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时候，五四运

动中更加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却主张与本国传统彻底决裂。诸如胡适(1891—1962年)、陈独秀(1879—1942年)等知识分子力求更全面地接受西方思想,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现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被引进来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革新运动的高峰,它的目标是彻底清除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和“所有带有这一学说的烙印的价值观和准则”<sup>〔17〕</sup>。大力传播近代科学思想。“科学”成了西方思想价值的典范。知识分子们尽管持不同的科学观,但都一致把科学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工具和方法<sup>〔18〕</sup>。科学和理论被当作无时间限制的规范而与历史上已经过时的中国传统价值对立起来。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非历史主义对待西方文明价值的态度,与之平行,另一方面却是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对旧中国社会的批判,这个社会被看作万恶之源<sup>〔19〕</sup>。

胡适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整理国故”的要求。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哲学和哲学史遗产。一方面应当通过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对传统的历史编纂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大量史料编写中国历史并突出表现每一学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生影响的历史关系及其历史意义<sup>〔20〕</sup>。

这些重新评估思想史传统的基本原则在20年代尤其被顾颉刚(1895—1980年)和集结在《古史辨》系列出版物周围的历史学家运用到历史传说的全部领域。这些历史学家把按照史料批判方法重新组织和重新解释儒家

经典作品看作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步。然而顾颉刚的历史研究在 20 年代完全是由政治动机决定的。他试图找出目前国家衰微的原因，并且相信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克服这种状况的解决办法<sup>[21]</sup>。不过与这种政治动机相反，顾颉刚的著作同“古史辨派”其他成员的著作一样都没有转向解释历史、探寻联系——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的轨道，而是停留在对历史资料进行文本考订和开发文学作品充当历史史料阶段。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就是思想史和政治发展史，是由大人物创造的。他们既没有看到历史的整体性，也没有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 3.2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阿利夫·德里克曾把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输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899 年终于 1918 年。1899 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首次见诸于中文文献，但是此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还极其有限<sup>[22]</sup>。只有陈独秀，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又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阐述了一种由经济决定的解释历史和社会的理论<sup>[23]</sup>。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虽然开始受到了讨论，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讨论范围的尝试还没有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社会主义还被看作与中国现实无干的东西<sup>[24]</sup>。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才在较大范围内受到人们关注。按照德里克的观点，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阶段便由此开始，这个阶段持续到 20 年代中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日益扩大，特别是作为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也在政治领域明显增加了。对于那些正在探索克服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的出路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感兴趣，而是出于实践的考虑，他们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发现一种即使在落后的中国也行之有效的科学和政治方法。十月革命使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洗刷民族耻辱方面的可行性；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中只用一击便从本国压迫者和在军事上经济上远远优越于他们的外来敌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人们经常称李大钊（1888—1927 年）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sup>〔25〕</sup>，他同陈独秀一样，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位领袖和中共的创始人。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了下列信念，即“十月革命也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从压迫者中解放出来的道路”<sup>〔26〕</sup>。由于新俄国是唯一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并把沙皇俄国曾经攫取的特权重新归还中国的大国，所以人们更加拥护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这种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动机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愈发突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抗日爱国运动，它是由 1919 年 4 月底巴黎和会决议激起的。在巴黎和会上，德国先前在山东的殖民地和德意志帝

国所拥有的其他特权没有归还给作为协约国的盟友的中国，而是转交给了日本，后者早在 1915 年就以 21 条要求，企图置中国于其影响之下。现在，中国具有民族意识的反传统力量，特别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奋起反抗这一新的民族屈辱；后来当运动扩大的时候，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代表也参加了。他们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罢工和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和其他力图保持中国的从属地位的列强，他们也愤怒谴责本国的政治家和军阀，后者与外国人沆瀣一气，割据一方，置民族大业和国家的统一于不顾，而国家的统一正是抵御外国入侵的前提条件。

现在，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根据西方列强的行为，对由这些列强所代表的思想和价值观采取批判态度并对俄国的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后者处于第二位——成为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戮力同心，渴望实现的社会目标。开始的时候，似乎所有西方思想都适合于用来挽救中国，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化过程。自 1919 年夏天起 社会主义的思想越来越被人接受，传播日趋广泛，甚至逐渐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发生了尖锐对立。五四运动开始分裂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两大派<sup>[27]</sup>。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 1919 年夏天关于“问题与主义”和“井田制”的争论中发生了头一次碰撞。一方面深受约翰·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胡适，只赞成在中国实行

自由主义的改良，即建立民主制和推行工业化，否认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像李大钊、胡汉民等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激励的知识分子，却极力主张必须进行一次革命性的社会改造。这样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坚决维护唯物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的问题“若无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是无法解决的<sup>〔28〕</sup>。在他看来，中国虽然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前提，但是已经具备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也可以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因为全体中国人民深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危害<sup>〔29〕</sup>。胡汉民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主要是以孙中山思想为依据的<sup>〔30〕</sup>。为了论证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转向了中国古代一个一直存有争议的现象，即由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胡汉民竭力把井田制理论解释成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念<sup>〔31〕</sup>。其内容是平均分配财产的幼稚思想<sup>〔32〕</sup>，这种思想不仅在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代表那里，而且在后来像瞿秋白（1899—1935年）那样的共产党人那里都有存在<sup>〔33〕</sup>。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国民党的其他知名领导人，如廖仲凯（1878—1925年）、戴季陶（1890—1949年）和朱执信（1885—1920年）等在关于井田制的论战中都站在胡汉民一边，开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考察。他们赞成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求对中国社会实行必要的激进的政治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思想相对立的。然而他们并未

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理论仍停留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上<sup>[34]</sup>。

在延至 20 年代初的这些早期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只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流派内部的一种思潮。“历史唯物主义看上去像是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进化论的变种”<sup>[35]</sup>。在大量成立于五四运动氛围的学会当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外，人们也深入研究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思潮<sup>[36]</sup>。例如，李大钊起初就试图把无政府主义的互助思想（克鲁泡特金）与阶级斗争学说协调起来。他直到 1919 年 7 月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基本特征<sup>[37]</sup>。

只是从 1920 年起，随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流派内部才出现一个新的分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主要致力于研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过的社会主义思想<sup>[38]</sup>。后来，特别是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播才受到巨大的推动。“中共在中国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扩大它的影响。”<sup>[39]</sup>《新青年》和《前锋》这两份共产主义杂志尤其服务于这个目的。现在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日益增多。到 1921 年，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等都有了中译本<sup>[40]</sup>。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第 3 部分也被翻译出版<sup>[41]</sup>。到 1924 年总共有马克思的论著 14 篇、列宁的文

章 13 篇，以及马克思和列宁每人一部的传记，斯大林、托洛茨基、考茨基、倍倍尔和恩格斯等人的若干论文，共产国际的若干文件等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sup>〔42〕</sup>。此外，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搞到了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sup>〔42〕</sup>。1923 年陈独秀在与胡适进行的一场争论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明确解释；该争论与同年关于“科学与世界观”的论战有密切联系<sup>〔44〕</sup>。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按照阿利夫·德里克的观点是在 1924—1927 年国共两党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统一战线不仅在政治领域促进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文化界学术界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觉醒阶段。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更多的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开来，这就为 30 年代初的大论战创造了条件。

### 3.3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发轫

在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下列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两个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形成也颇为重要。第一个因素是民族政治的动机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首先因为它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和被压迫民众反抗本国统治者的斗争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功能，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所主张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反对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的功能，却退到民族动机背后去了。

另一方面，如同接受其他西方思想的情形一样，人们也用类似折中主义的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处理方法在具有强烈唯心主义特色和以各式各样的调合主义著称的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有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最初被当作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而加以采纳，而且，由于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不足，知识分子们往往不能明确区别从空想社会主义经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不同思潮。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过传统的教育和训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社会观和思想习惯，尚处于学习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的初期阶段<sup>[46]</sup>。因此他们总是抓住某些个别的、按照自己的社会和思想习惯比较容易理解并且看上去有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素，而且恰恰是那些与中国过去的思想理论具有实际的或想象的类似之处的理论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社会经济已经取得重大进步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发展的，这个事实也妨碍着他们对一些概念和定理的内容的理解<sup>[47]</sup>。

在考察李大钊历史观的逐渐形成时，必须注意这个背景。李大钊早在1920年就采用了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命题，例如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原则。当时他已经看到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sup>[48]</sup>。他从社会的

整体性出发，要求历史必须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而在社会生活的进展之中，经济生活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的生活与思想变化最终的决定性原因<sup>[49]</sup>。不过，社会进步并不只是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条件变化的结果，人类自身作为社会的生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sup>[50]</sup>。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是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义上的历史观，即把历史看作人与他的物质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的历史观<sup>[51]</sup>。李大钊从历史进步的概念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在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主观因素即人的活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sup>[52]</sup>。赖讷·米勒认为李大钊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关系，特别是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关系”并“一步一步地把科学的阶级概念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在社会生产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者）主要方面的统一性引入社会思想，首先是进步力量的社会思想”<sup>[53]</sup>。

李大钊还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一般的世界革命进程之中，但是他并没有从历史理论方面说明这种政治归类。李既不了解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也没有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作整体分析，他只考察了个别的社会部分领域<sup>[54]</sup>。他没有详细研究中国社会的过去，只把中国社会泛泛地描述为一个农业经济组织，历经 2000 多年而未曾改变。李也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中国历史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没有按照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划分历史时期，而是强调东、西方发展的不同，并且认为这些不同主要是由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sup>[55]</sup>。完全在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武器的倾向的意义上，李大钊也把阶级斗争首先当作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来理解。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种族对抗<sup>[56]</sup>。在他看来，那种被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革命即是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的决定性力量<sup>[57]</sup>。这样，一个至今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命题很早就被提出来了。

1921年以后，李大钊在文章中更加强调民族因素了。1924年他号召历史学家发展“民族经历论”致力于研究民族心理学。他说：“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sup>[58]</sup>

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动机还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的解说上，这些解说也汇入了他的政治理论著作。例如他最早不再把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6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起义——和19世纪其他起义运动仅仅地和首先地解释为反对满清王朝统治的斗争，而是把它们解释为人民群众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阶级斗争问题退到民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问题之后了。在李看来，这种解释与他承认外国帝国主义入侵客观上对中国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的做法<sup>[59]</sup>并不矛盾。

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李大钊之研究历史也完全是为政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sup>[60]</sup>。在学术观点与政治目标的密切结合上，他与梁启超以及他那一代人大多数思想家完全相同。

李大钊是第一位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作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他的宣传活动对于推动社会科学——倾向理论和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本人却不能继续为这个计划工作了。1927年李大钊年仅39岁就因其在中共和统一战线的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活动，被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宪兵逮捕入狱，稍后又被处以绞刑。

## 4 30 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

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这一政治事件是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社会整体结构及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蒋介石对革命力量的打击标志着1925—1927年“大革命”的终结<sup>〔1〕</sup>。在大革命期间，国家的民族统一曾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但是现在，民族的统一独立和社会改革这两个最紧迫的时代要求重新出现了问题。

对于这些年来积极活动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来说，现在关于政治失败的原因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了。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们第一次不再把失败的原因仅仅归咎于个别团体和个人的行为，甚或归咎于超自然的命运的支配，而是从社会和历史条件中探寻了<sup>〔2〕</sup>。1927—1934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讨论成为意识形态和学术争论的中心题目。翦伯赞和吕振羽也在这一讨论关系中发表了他们的头一批著作；他们或者作为中共党员或者作为国民党党员早在“大革命”时

期就开始政治活动了。他们同我所选择的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在这些讨论中虽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是这些早期的讨论与他们后来的工作却有不可忽视的联系，他们在这些讨论中为其历史研究获得了十分重要的印象和动机，这里业已被提出的内容和方法问题后来又重新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之中。

#### 4.1 1927年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瓦解后的政治一意识形态形势

1925—1927年“大革命”的高涨是建立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股最强大的激进政治力量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1866—1925年）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特派员同当时还非常年轻、人数也很少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在1923年为政治联合铺平了道路。联合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国家的统一，反对地方军阀的分裂割据；恢复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此外，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正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表述的那样，也在计划之列。在这里，上层的改革要与下层的革命，即组织动员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力量利益的政党——国民党<sup>〔3〕</sup>。该党已被按照苏联的榜样加以改组，并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作为联合的形式，人们制订了“内部联盟”的政策，就是说中共党员得以允许以个人名

义加入国民党并作为国民党党员支持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

自合作开始起国共两党之间就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这些分歧尤其表现在对下列问题的不同态度上，即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动员工人，特别是组织和动员农民？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除了民族问题也涉及阶级问题？当工农运动——多数是自发的——迅速发展起来，中共的政治影响明显扩大而地主和资产阶级日益担心自己成为革命运动攻击的对象的时候，这些分歧更达到了尖锐化程度。蒋介石周围并由他代表的国民党右翼逐渐在其为民族统一而奋斗的战友当中看到一种比他们与之斗争的地方军阀和外国列强更大的危险。鉴于矛盾的激化，中共必须在或者继续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或者以土地革命为代价尽力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于是自 1926 年起便对整个统一战线进行了重新评估。最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决定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同时也试图加强继承孙中山遗产的国民党左翼力量，反对右翼。此外，中共仍想继续支持农村的革命运动<sup>(4)</sup>。1927 年蒋介石声明断绝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同年 7 月国民党左翼转到汪精卫一边，公开反对他们过去的同路人；汪精卫与共产党人共同组成武汉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人受到了大规模迫害，而在由地方军阀统治的北方诸省，反共措施甚至更早就被实施了。数千人惨遭杀害，成立不久的农民协会和工会被强行解散，城市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余者也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

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失败了。这一政策主要是在斯大林的影响下，由共产国际制定的，它是以下列评估为基础的，即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看作是由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然而，这一政策失败了。在此次失败的影响下，由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先前早已作出的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不同评估在共产国际内部重新获得重要性。与斯大林相反，他们对半封建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由此推论出的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表示怀疑，宣传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sup>(5)</sup>或者至少赞成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特殊的亚细亚结构的继续存在，缺少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因此也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与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革命的对象<sup>(6)</sup>。这样，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从一开始就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执。关于中国的每一次讨论——政治的或学术的——都附加了政治爆炸力。

不论中国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还是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的理论，都要联系这个政治斗争背景来看。这两种理论都是作为关于统一战线和整个革命的失败的解释模式发展起来的。它们不仅对中国是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了质疑，而且也对由此而得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提出了质疑。取而代之，它们论证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非资本

主义的革命的必要性。

在苏联，围绕中国社会性质而展开的政治论战早在1928年夏天就结束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的争论以有利于斯大林的结局而告终；共产国际否定了视中国现社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命题<sup>〔7〕</sup>。然而 尽管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政治决定，在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中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的讨论仍继续进行<sup>〔8〕</sup>。直到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会议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的拥护者才明确否认与托派的联系，承认封建社会说符合中国的现实，但是他们同先前一样仍然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的主张<sup>〔9〕</sup>。戈根等人以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为依据：“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10〕</sup>。这段文字被解释为：在社会形态的序列中，亚细亚社会时间上早于奴隶制<sup>〔11〕</sup>。然而稍后不久，半官方的布里高金报告却反对第四种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反对那种主张个别国家有特殊的发展道路的观点。该报告只承认“劳动力与生产结合的三种对抗形式：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sup>〔12〕</sup>。最后取得的一致意见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并非独立的生产方式，而是其他社会形态，封建制或奴隶制的变种<sup>〔13〕</sup>。1938年，斯大林以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暂时了结了这一论战，斯大林把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顺序规定为：原始公社制

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进程<sup>[14]</sup>。

苏联的政治和学术讨论对中国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与其苏联同事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在他们的著作中，苏联的讨论的政治成分和政治含义也有所反映。但是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深受统一战线失败的打击，直到讨论进行了很久以后，才作出反应。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中共最终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年以后，凡是主张别种评估的人均被当作托派而排挤出党。中共在“六大”上重新强调：“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15]</sup>，声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错误的政策和策略，而这种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又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统一战线的任务的错误评估造成的，对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应负主要责任。人们指控这条“机会主义路线”拿党的独立性来冒险，对国民党未从阶级立场出发进行批判，对“暂时的同盟者”的“反动密谋”毫无戒备，党放弃了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自愿地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sup>[16]</sup>。此外，中共还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强大——它使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分裂——，归因于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归因于大地主的雇佣军和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sup>[17]</sup>。在统一战线时期，国民党主要被评价为资产阶级的政党，现在则被说成是封建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成分只占少数<sup>[18]</sup>。

但是在规定未来的任务和现行政策时，却出现了与上述对全社会形势的分析相矛盾的地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中共一方面坚决坚持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基本评估，正如它曾经把这个评估当作制订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的情形一样，但是一旦它从 1927 年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就不得不彻底改变它的现行政策。同先前一样，中共仍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作主要任务，革命的主要内容仍是土地革命，革命的目标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的民主专政<sup>[19]</sup>。与之相应，革命的社会载体是工人和农民，而民族资产阶级则被视为革命的敌人。打倒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实际上，中共在此并没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在眼里，它重视的是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的实现只是这一发展的第一阶段。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经过的过渡，在“六大”上也只被当作力量对比的问题来看待<sup>[20]</sup>。

中共“六大”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定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坚持这一主张的人还认为上述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特点<sup>[21]</sup>。现在这一评估被一些身为中共党员或者接近中共的理论家所采用，后来又在政治和学术讨论中被加以深化。这主要涉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性质诸问题的争论，其高潮是 1932—1933 年和 1934—1935 年以同样

名称命名的两次大论战<sup>〔22〕</sup>。在这些讨论中，赞同中共的评估的人们首先致力于证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统一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不过，参加讨论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人们，并不只限于这些接近中共的知识分子。早在 1925—1927 年“大革命”时期，许多人就对“新社会科学”——这一名称包括所有倾向把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当作主导因素来解释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尝试——发生了浓厚兴趣，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出版物骤然增多。大量受到激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激励的知识分子开始拥护“大革命”的目标，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他们同中共和共产国际一样，致力于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为第三代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现在也主要运用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来解答革命的实践问题了。他们一般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而是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sup>〔23〕</sup>。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未来”<sup>〔24〕</sup>。

## 4.2 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阶级分析的尝试

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向共产党人提出了制订一套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的任务。于是，关于革命的

性质、革命的推动力量和反对力量等问题的讨论便广泛展开了。应当揭示革命进程中的矛盾和阶级关系，说明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两大任务而准备的革命力量。要制订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必须首先确定中国的社会性质，其主要问题是：应当把中国社会的方位定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或一般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哪一点上？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sup>[25]</sup>

参加社会性质讨论的人可以分为三派。与苏联的政治和学术讨论相对应，中共内部最初也有两种观点：多数派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已经在共产国际中得到了贯彻；少数派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在 1929 年被清除出党，这同托派在苏联的下场类似。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第三派，他们可算国民党的左翼<sup>[26]</sup>。阿利夫·德里克根据该派的自我意识把他们同样看作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中国社会的力量，并把他们包括在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论述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则把这个第三派称为“假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兜售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货色<sup>[27]</sup>。

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第一阶段所有三派都参加了，而且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sup>[28]</sup>，这一阶段狭义上以 1932—1933 年主要论文的发表而告终<sup>[29]</sup>。在第二阶段在 1934—1935 年开展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参加者主要是接近中

共的人和托洛茨基分子<sup>[30]</sup>。各派人士都集中在各自刊物的周围，人们也常常按照他们各自刊物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共产党人<sup>[31]</sup>在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团结在《新思潮》杂志周围，其主要代表有潘东周和王学文。而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产党人代表则主要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发表文章。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有孙冶方、钱俊瑞和薛暮桥等人<sup>[32]</sup>。属于这一派的范文澜、吕振羽和翦伯赞也参加过讨论，并发表了他们的头一批文章<sup>[33]</sup>。

托洛茨基分子在第一场论战中主要在《动力》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第二场论战中则在《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陈独秀，最初还有任曙和严灵峰，后来则主要有王宜昌和张志澄<sup>[34]</sup>。

那些接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集结在《新生命》杂志周围。除了陶希圣这位知名代表外，值得提及的有顾孟余、陈公博<sup>[35]</sup>、梅思平、樊仲云和萨孟武等人<sup>[36]</sup>。

按照阿利夫·德里克的说法，所有这三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的效力，都在他们的文章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论证模式<sup>[37]</sup>。但是德里克在别处也指出，他们应用的一些概念，即使听起来一样，其内容并非无条件地相同。例如，国民党人并不把封建主义概念应用到社会总体结构上，而是只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sup>[38]</sup>，同样，他们也只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放在政治领域里考察，政治领域与经济的社会结构脱节，于是他们的革命概念只包含政治成分<sup>[39]</sup>。阿利夫·德里

克就此解释说，这些知识分子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取而代之，他们赞成所有爱国者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政治统一而进行合作<sup>[40]</sup>。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不适合中国<sup>[41]</sup>。吕振羽指责该派的主要代表陶希圣，说他实际是以这种解说来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sup>[42]</sup>。至少从陶以后的政治活动来看，这一指责是有道理的。陶在其后来的论著中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先前的表面联系都没有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投靠了国民党勾结日本人的势力。最后又去了台湾，并在那里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可以把这一发展过程看作大多数国民党知识分子早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立场的继续。他们在进行论证时，虽然经常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但最终在政治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他们并不想为全社会的革命寻求一种可行的战略，而是致力于从民族立场出发，为在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为民族独立斗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与之相反，另外两派的目标却不只是革命运动中的民族任务，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变革<sup>[43]</sup>。特别是共产党人，他们在苏区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这一革命了，现在他们又从革命中推导出下列的迫切要求，即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确定革命的阶级和该阶级的任务。

按照何干之的观点，确定社会性质的核心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和封建残余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

关系的了解<sup>[44]</sup>。为此，共产党人在其分析中动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的观点，他们把国家事态深受外国列强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制约、封建残余在农村占主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及其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等等情况看作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评估由王学文和潘东周在1930年5月第一次用“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概念表示出来<sup>[45]</sup>，其理论根据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中的作用的论述<sup>[46]</sup>。两位作者论证说，现今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决不能把它当成主导因素。部分地存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如它在封建社会中的情形一样——，部分地已经出现商品经济——如在资本主义中的情形一样——因此，中国的经济<sup>[47]</sup>乃是一种“过渡形式”是半封建经济<sup>[48]</sup>。何干之说，这种半封建经济恰好是中国社会的一面的特征<sup>[49]</sup>。王学文等人认为，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对象<sup>[50]</sup>。共产党人同样力图证明：帝国主义并未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相反还加强了这一势力。他们也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是两个不同范畴，帝国主义严重破坏了民族资本<sup>[51]</sup>。由此便生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困扰，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共产党人的结论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盟友虽然不能被排斥在民族解放斗争之外，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者却不是资产阶级，而必须是工人和农民<sup>[52]</sup>。

在论战的参加者当中，托派最少有内聚力，他们彼此之间也经常发生口角<sup>[53]</sup>。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那个主要由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所阐述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命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民族解放斗争必须与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进行，斗争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已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而是要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sup>[54]</sup>。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观点大体如此。1929年陈独秀概括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命题，并以此反对中共“六大”制订的土地纲领。同年，他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按照陈独秀的意见，中国农村的封建残余已被商业资本限制住了；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和资本侵入中国农村之后，中国农村就完全处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了。1925—1927年间资产阶级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胜利，一方面封建残余受到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开始繁荣起来。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是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等资本主义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以后，才有可能<sup>[55]</sup>。

按照何干之的说法，任曙和严灵峰也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发挥了一种客观的进步作用，因为它破坏了封建势力，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在这一点上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观点相同<sup>[56]</sup>。他们以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存在为证据，并超出托洛茨基的论述把它与资本主义社

会的存在相提并论<sup>[57]</sup>。既然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在中国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它就是革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并无质的差别，两者本质上完全相同<sup>[58]</sup>。

1934年，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这些问题又被提及。讨论再次活跃的原因主要在于东北诸省自从被日本占领以来，城市资本对农村的影响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特别引起了王宜昌和张志澄的注意，他们联系任曙和严灵峰的观点，重新开始论证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共产党人方面则在论战中进一步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按照何干之的观点，这一分析在1934年以前尚不完整<sup>[59]</sup>。

此次论战再一次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1）国际资本与中国资本的关系；（2）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sup>[60]</sup>。鉴于第一，通过最近几年大规模地吸收资本，农村已采用了机械，已有了农业经营，有了大农场；第二，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已经在农村成为主导因素，王宜昌认为：尽管农村继续作为农业居民点而存在，但其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sup>[61]</sup>。

与之相反，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家却主张：帝国主义虽然把商品引进了农业生产，并借助商品交换支配了农村经济，但是农村经济仍停留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搀和在一起，农村经济仍具有半封建性质<sup>[62]</sup>。这些思考，按照何干之的看法，是由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确定社会性质方面的意义

的不同评估而造成的。托洛茨基分子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就是主要的评估标准。共产党人则主张首先要研究生产关系问题，这里主要指所有制关系。何干之本人要求，在确定生产方式时，要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基础<sup>〔63〕</sup>。

两派在确定社会性质方面观点尽管如此不同，他们或者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推论出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或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但两派都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他们来说，资产阶级本身也是革命的对象<sup>〔64〕</sup>，虽然共产党人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压迫。两派都认为，正在进行的革命必须涉及社会各领域，它只有在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

### 4.3 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确定历史方位的尝试

与社会性质论战同时，知识分子们又展开了另一场讨论，它通常被称为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但就其内容来看，称之为“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论战”更合适。它与社会性质论战同时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一种双重关系。政治上，两场论战都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确定革命的未来发展。两者的政治动机对于知识分子转入历史研究起了决定性作用。学术上，马克思主义或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观中的“社会性质”和“合法性（即‘规律性’或‘合乎规律性’）——译者概念仅仅表示社会在其历史状态中的同时或非同时方面。

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也主要是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讨论，狭义上只包括 1930—1933 年它在《读书杂志》的一次争论中达到了高潮；1933 年，由于政治原因，《读书杂志》被迫停刊。阿利夫·德里克断言，1933 年以后，讨论虽仍继续，但已明显呈衰退趋势，已经不再有全新的观点出现，讨论常常陷入争执和琐屑之事，只能固守自己观点的排他性<sup>[65]</sup>。德里克还认为，1933 年以后，参加讨论者原有的对其历史论著的直接政治意义的信心也日渐丧失，而这种政治意义先前却是重要的动机因素<sup>[66]</sup>。德里克所谓“讨论的衰退”和“对直接政治意义的信心日渐丧失”等语，虽然适合于那些被他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较大范围内的历史学家<sup>[67]</sup>，却不甚贴切。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郭沫若等人在论战中提出的论纲，只是他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批判中国历史特殊论的出发点。本论文所涉及的诸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在论战中受到了重要激发。翦伯赞和吕振羽就是在这一论战中，首次以其文章而崭露头角的<sup>[68]</sup>。

讨论是由两篇独立完成的关于西周史（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71 年）的论文开始的。1929 年陶希圣发表论文指出，西周时期，中国已经是封建社会了，而跟随其

后的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陶认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这个时期，商业资本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素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标志不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阶级斗争，而是政治压迫；同样，社会的发展也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外部影响<sup>〔69〕</sup>。陶甚至完全否认阶级的存在；那些被他当作政治领导层而加以突出的士大夫自然算不上什么阶级<sup>〔70〕</sup>。陶希圣历史观的主要因素是商业资本在中国的较早形成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陶在这种商业资本的存在中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的主要特征<sup>〔71〕</sup>。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主要是在拉狄克1927年的命题的影响下形成的<sup>〔72〕</sup>。以后几年陶希圣因受到激烈批评，而且也由于他的政治观点的自然发展——至少翦伯赞这样认为——，曾多次修改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评估和他的分期意见，但他原则上并未放弃把中国历史视为一个特殊发展的观点<sup>〔73〕</sup>。

完全同陶希圣一样托洛茨基分子例如李季也强调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即使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而只当作一个过渡形态的因素来看待。李季不把帝国时期称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sup>〔75〕</sup>。按照德里克的说法，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很少联系关于中国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设想来论证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存在，而是偏爱于论证拉狄克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的命题。与之相反，吕振羽指出，李季、胡秋原等人都是从历史学家路

德维希·马札亚尔关于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存在观点出发的。例如胡秋原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亚洲专制主义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李季则把亚细亚社会视作“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它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原始的农村公社解体以后，欧洲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走上了亚细亚社会道路，而欧洲则开辟了希腊—罗马奴隶制道路<sup>[76]</sup>。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说明每位作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因素。重要的是，不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都具有论证中国历史的特殊发展并为当前指出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的功能，按照共产党人的推论，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中共“六大”的政治评估。正因为如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关于中国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命题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其中包括我准备重点研究的几位历史学家。

在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共产党人方面首先由郭沫若开始了讨论。1930年郭试图具体证明“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sup>[77]</sup>，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于中国。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同陶希圣一样也集中研究了西周时期，然而与陶的结论相反，郭把西周时期确定为中国的奴隶制时代。他还以奴隶制度为例，说明中国社会所经过的发展过程完全同摩尔根和恩格斯为其他社会描述的发展过程一样<sup>[78]</sup>。同时，他争论道，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也经历了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以欧洲历史为例而概括出来的几个发展阶段：部落社会时代（郭沫若把这一时代等同于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社会，但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奴隶制时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时代。在此 郭沫若认为，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以前，原始部落社会存在的条件就出现了，此后便开始了奴隶制时代，东周时期（公元前 771—前 221 年）继而出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郭把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止的帝国时期规定为封建时代，此后便是资本主义时代<sup>[79]</sup>。这种分期的尝试是中国历史学家第一次摆脱传统的、由历史循环论决定的、按照王朝世系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开始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的分期。不过，郭所选择的一些重大事件主要还是与王朝更迭有关的。对于郭来说，在这第一部历史著作中，首要的任务是突出强调中国历史上那些与摩尔根和恩格斯分析过的历史现象类似甚或完全相同的因素。应当把中国历史理解为普遍的、按照一般规律发展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陶希圣和郭沫若的不同命题激起了热烈讨论，知识分子们不仅对他们的理论方法，而且也对他们的个别结论以及对个别资料的解说，展开了激烈争论<sup>[80]</sup>。在这一争论中，特别是苏联和日本历史学家的一些成果也被纳入讨论范围内。首先是历史分期、奴隶制、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

在论战中，历史学家第一次触及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重新审查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命题。他们开始探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被当作一般与特殊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过的那样——，即使人们后来才能用这样的概念来表述，而其核心则是历史发展一般的客观规律的存在问题和由此推论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必要性问题，这也是现实政治的重要问题。

托洛茨基分子和以陶希圣为首的国民党知识分子早在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就是共产主义观点的反对者，现在，这两派又站到一起了。他们在文章中全部把重点放在中国的特殊性上，虽然细节不同，而且常有争议。比这两派的代表在关于社会性质问题上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的情形更加明显，他们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中坚决主张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与世界历史一般发展过程不同的、特殊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应，他们也认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需要特殊条件。这一点在政治上具体体现在他们对革命的否定上。共产党人或者接近共产党人的历史学家则站在另一边，他们的著名代表就是郭沫若。他们强调一般，原则上肯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存在，并且指出这一规律也适应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他们也认为，中国历史肯定经历过这一发展的所有阶段。中国社会，对于郭沫若及其战友来说，并没有任何与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不同或者相反的特殊性，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如此，他们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是，革命在中国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 4.4 论战对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发展的影响

关于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的论战主要是由现实的政治事件引起的，但它们首先在学术发展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共产党人在其讨论文章中依据并深化了中共的评估，同时又对他们学术的和政治的对手大加抨击。在这种行为中，人们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些为现实政治观点进行辩护的努力；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人们也可以发现某种自觉的把马克思主义范畴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的试图。

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因素受到了关注并第一次被带入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在此基础上，在以后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sup>(81)</sup>历史学家便可以进行建设了。论战的参加者第一次使当前与过去建立了科学的联系，过去的社会现象被描述为当前发展状况的原因。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原理的承认意味着对传统的把历史当作当前的事例宝库的观念的否定。与承认因果关系原理密切相关，人们也承认一种按照普遍有效的合乎规律的原则发展的世界历史，而且这一发展具有进步的性质，就是说，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高于前一阶段。与传统的视中国文化为无与伦比的观点不同，也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中国的独特发展的观点不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中国

的社会和历史理解为这个一般的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作为承认合乎规律发展的逻辑结果，历史分期问题便重新出现了。历史学家拒绝了传统的按照王朝世系分期的做法，试图展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相适应、与时间顺序一致的发展进程的内部结构。

与承认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原理和合乎规律性原理密切相关，还有一种社会总体论<sup>[82]</sup>。整个社会被确定为阶级社会，而历史也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历史。

然而人们在历史著作中并没有把这种新的总体性意识完全表达出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优先的基本命题相适应，人们也对基于经济因素和经济发展的论证表示关注，尤其当讨论的参加者力求与传统的突出个人和政治的历史编纂区别开来时。不过人们当时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那个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被称作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因此，尽管出发点是社会的总体性，但是决定论和经济论倾向仍在著作中清晰可见。

对传统的关于中国的唯一性和优越性观点的批判是历史编纂科学化进程的起点。在此，中国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一般与特殊的问题也第一次受到人们的注意。在对这一关系的不同规定中，共产党人把一般和世界历史的原则绝对化了，而他的敌人则把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了。在论述的层面上，世界历史的发展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发展缺乏统一，这就表现出机械论、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论证方式。随后几年，在

此基础上，而且肯定不只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它使社会性质问题得以重新提出——而且也在苏联和日本的讨论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了一个新的认识过程，其目标是，打破一般与特殊的抽象对立，从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范围内，说明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

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使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展现在历史学家面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大为扩充。然而，从这些讨论中重新被提出的关于奴隶制、封建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的问题，在学术上决不能被看作已经解决了。此外，争论并非完全以自己独立的研究工作为基础，许多参加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论时往往紧跟苏联或日本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述，这样的讨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研究结果的交流，不如说是用刚刚学来的论据进行回击。对于我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对讨论当中的这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特征以及同先前一样存在着的各种观点的政治含义的认识无疑是一个挑战，他们因此开始在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把对一般与特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发展的辩证关系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转移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在此，秦朝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同先前一样仍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个主要领域。

## 5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

### 5.1 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

自从 1931 年日本人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以来，日本的侵华政策越来越加剧。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让步政策来遏止日本人的侵略，而中国共产党却愈益把团结抵抗的要求诉诸舆论，同时，它逐渐放弃了自 1927 年以来实行的与非共产主义势力坚决对抗的政策，致力于谋求与所有倾向抗日的团体合作。这一转向过程在 1935 年 8 月 1 日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阵线的纲领中告一段落，而这个纲领是在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制订的<sup>①</sup>。

1935 年 8 月 1 日的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国防政府”建立一支抗日联军，但是，统一战线的呼吁实际上把执政党国民党排除在外。国民党被指控降日卖国，因此同样是一切

民族爱国力量的主要敌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应当是中国共产党。纲领以争取处于国共两党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并集结在民族救亡运动周围的爱国团体为首要目标，这些团体曾于 30 年代初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和实行民主的要求<sup>[2]</sup>，如今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共自己的主张了。不过同先前一样中共仍坚持 1928 年“六大”的评估坚持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求与之相应，中共也把出自它的社会革命纲领的要求写进了建议实行的国策<sup>[3]</sup>。直到 1935 年 12 月中共才同爱国力量首次实行实际的合作；当时，共产党人和非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共同抗议日本人的进一步进攻，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由于这些反对派不断施加政治压力，也由于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以及不抵抗政策本身的破产——它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也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这样，国民党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它使结束内战和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一事在 1937 年间成为可能。而在中共内部，为了能够接受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也把国民党包括在内并承认由国民党组织的国民政府为最高领导机构——也必须作出进一步的重新定向。为此中共方面陈绍禹（王明）自 1936 年初就在理论领域中采取决定性行动了。陈放弃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命题，把国民党纳入了统一战线并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取代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sup>[4]</sup>。为了论证中共政策的这一

改变的必要性，人们不再像中共“六大”那样把国民党首先看作封建阶级的政党，而是看作资产阶级的政党<sup>[5]</sup>；在评价资产阶级的时候，也着重强调它革命的一面，强调它所受到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由此而产生的反帝要求。最后，1937年2月，中共第一次向国民党提议，组建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

这就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袭击北平以南卢沟桥中国阵地、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的形势。蒋介石声明他不能再容忍，并向北方派遣了增援部队。8月日本人进攻上海，11月占领之。现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暂时把它的军事总部转移到武汉，以便从那里阻挡日本人的进攻。此外，国民党还决定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

中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提出的统一战线建议包含下列要点，即在停止进攻苏区、实行民主改革、积极抗日的条件下，中共方面愿向国民党提供四项保证：（1）不再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2）把中共控制下的地区视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把红军视为国民革命军；（3）在特区建立民主制度；（4）在由中共控制地区停止没收大地主土地。抗战爆发后，这些建议在一份致国民政府的声明中得到了重申和补充。中共表示愿意把它的军队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之下，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官方的思想体系<sup>[6]</sup>。

由陈绍禹重新起草的基本原则和中共的四项保证，第一次鉴于更重要的民族任务而明确表示放弃阶级斗争

纲领，就是说放弃剥夺地主土地的政策，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这些原则和保证在中共内部却引起了很大的抵触 因为中共有过 1927 年毁灭性失败的惨痛经历。一方面有人坚决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这些人后来被批判为“左倾”。另一方面 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当中，也开展了一场长时间的、复杂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即使没有继续到 1946 年民族统一战线最后破裂之际，也至少继续到了毛泽东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得以贯彻的时候<sup>(7)</sup>。争论的中心点是关于革命和抗战的领导权问题，以及中共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而且应当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实行一种独立自主的政策。对于理论家来说，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在政治领域，动员民众和土地革命问题也受到了讨论，军事上则主要涉及战略问题和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军的关系。所有出自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都促使历史学家和政治宣传家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构思。

对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不同评估突出表现在 1937 年 4 月(原著误 应为 8 月——译者)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此次会议中共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且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再援引这个纲领。在纲领中，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被看作同样重要，核心是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纲领没有对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作出明确说明，然而，国民党却继续受到批评，中共在民族统一战

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受到有力强调。决议重申早在 2 月份就作出的四项保证，暂时放弃实行土地革命，只要求减租减息，但是与此同时，新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却为统一战线联盟制造了新的冲突材料。尽管如此，到 1937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与国民党还是达成了一份《国共合作宣言》，它实际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直到 1937 年 12 月在南京大屠杀和德意志—日本轴心国形成的影响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决定完全服从反法西斯主义的抗战大局，承认国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支持现有的国民政府，致力于加强和扩大统一的军队。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声明，中国共产党即使抗战胜利后也愿意为国家建设而进行协作<sup>〔8〕</sup>。据此 民族统一战线便获得一种长远的前景，远远超出了共同的民族自卫范围。在这些决议的实施方面，陈绍禹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陈是在 1937 年底同共产党其他高级领导人一起从莫斯科返回延安的。

这个与国民党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头几个月内，在日本军队大规模地全面发起进攻的压力下，运作良好，即使同先前一样，在由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中，仍有当局侵扰中共办事处的事件发生。早在 1937 年 8 月 朱德领导下的红军就被改编为八路军，现在，它穿起了国民政府的制服，正式获得了补给品。10 月长江以南的共产党游击队以同样的方式作为新四军而听命于国民政府。中共设立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也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代表被邀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并作

为代表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sup>〔9〕</sup>。自 1938 年 3 月以来在武汉 后来又在重庆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获准出版 该报一直发行到 1946 年，即使间或遭到过国民党的查封也未停止。抗日宣传空前兴盛。郭沫若自 20 年代起就同情共产党人，现在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sup>〔10〕</sup>。周恩来则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然而，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军事防御战方面却未能获得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顺利发展相适应的成功。国民政府军，包括共产党的部分军队，挡不住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那位在此期间已被人颂扬为抗战的象征和领袖的蒋介石采用了以地域换时间的战术，接连放弃了多条防御线<sup>〔11〕</sup>。

这种发展情况不能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维持产生影响，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就是阻止和击退日本人的侵略。于是，在中共内部很快便出现了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未来的讨论。毛泽东自 1938 年 5 月起就对 1937 年 12 月的政治局决议提出了质疑，首先涉及如何进行战争的军事问题。毛泽东认为，独立于国民党而进行的游击战比由国民政府最高指挥领导的正规战更重要，并由此发展了一套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持久战战略<sup>〔12〕</sup>。这个时期，尽管军事上屡遭挫折，但不论国民党领袖还是像陈绍禹这样的中共领导人都希望迅速战胜日本人，迅速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sup>〔13〕</sup>。军事上的失败和国民党对中共所实行的广泛动员民众抗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做法的不满最终

导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其目标是共产党人独立进行战争——在政治局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加上 1938 年春天张国焘离开延安并因其“危害党的行为”而被开除出党；张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也是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者，包括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当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讨论重新高涨时，张国焘这位热衷于在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上与国民党建立“真正统一战线”的重要人物，不再参与决策了<sup>[14]</sup>。要求修改 甚或修正中共在 1937 年 12 月确定下来的路线的呼声后来在关于保卫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的争论中达到了顶点；武汉自 1938 年初起就受到了日本军队的包围。争论的主要对手是毛泽东和陈绍禹。

陈绍禹称武汉保卫战与西班牙内战中的马德里保卫战具有同等意义。他想以武汉保卫战的胜利作为向日本人反攻的开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宁肯拥护“全体中国人的政府”<sup>[15]</sup>。支持这个计划的不仅有坚决执行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决议的意愿，而且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即通过发动城市民众，保卫和夺回城市，以便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施加压力，促进民主改革。按照陈的意见，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可由此而变得容易一些，因为中共可以得到无产阶级和城市民众的支持<sup>[16]</sup>。与之相反，毛泽东并不认为武汉保卫战有什么特殊意义。在他的民族统一战线方案中，共产主义边区的扩大最为重要。首先要在农民和农村民众的支持下，逐渐扩大这些地区，然后在军事上通过游击战争赶走日本人。应当以温和的土地改革争取

农民来支持抗战和中共的目标。

1938年10—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人们期待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会议被武汉陷落的消息蒙上了阴影，陈绍禹的计划因此而过时了，新的战略思考成为必要。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重新提出他的三阶段持久战战略，并为政治局所接受。对于即使战后也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和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毛的政治见解基本上与12月决议一致，只是在各点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毛泽东虽然也承认国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但他认为两党的“团结”要“通过斗争”而陈绍禹则把“相互尊重政治上组织上的自主”看作“首要的基本条件”<sup>〔17〕</sup>。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得到了政治局的赞同，它不仅使人们了解了毛泽东意向中的重新规定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而且也对党内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5—6月毛泽东在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中第一次就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发表了意见<sup>〔18〕</sup>此后他便开始以其对“外国模式”、“空洞的、抽象的废话”和“教条主义”等等的批判向当时党的主要理论家，例如在莫斯科进修过的陈绍禹之流发起了攻击，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表明了他的理论家资格<sup>〔19〕</sup>。

中共党内形势发生上述变化之际，恰逢抗战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共两党合作的外部压力有所减轻。1938年底，在控制了华北和华东比较发达地区之后，日本军队暂

时停止了进攻。现在，日本人试图劝说国民政府谈判关系正常化了，这将意味着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征服，实际上就是投降。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华赴日本谈判。1940年初，他被委任为南京傀儡政府元首，该政府也被称为“国民政府”。共产党人担心其他主要势力也投靠日本人，遂于1939年初在延安召开军民讨汪大会，痛斥“汪精卫之流的叛国罪行”<sup>[20]</sup>。不过蒋介石保证要继续进行战斗，依然号召“抗战到底”<sup>[21]</sup>。

但是，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人越来越丧失信任了。自抗战开始以来，共产党人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张。它的军队总数从1937年的大约92000人增加到1939年的大约320000人，1940年更增至大约500000人<sup>[22]</sup>，与之相应，它的影响范围也扩大了，包括日本封锁线之后的游击区。鉴于这种发展情况和下列事实，即自1938年底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不再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中日军队之间的阵线直到1944年几乎保持不变<sup>[23]</sup>，国民党内又重新出现了压制中共影响的倾向。1939年4月和6月，以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确切地说新四军为一方面，以国民党军队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已出现小规模摩擦<sup>[24]</sup>。9月，国民党领导层作出决定，要对共产党人加强“管束”<sup>[25]</sup>。他们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重新推行保甲制度<sup>[26]</sup>，加强对居民的控制。1939年12月，蒋介石从与日本人对峙的前线撤回国民军，以便设立边区封锁线。国民政府还完全停止了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的那份本来就数量不大的补给；从现在起，共产党人必须自己筹集

一切必需品了。在国统区，一种反共气氛开始形成，支持中共的政治活动受到阻挠，而且随着镇压的不断升级，最后竟完全无法进行了<sup>[27]</sup>。鉴于这种情况，中共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sup>[28]</sup>。同时，毛泽东也于1939年6月以其对“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的谴责，谴责了蒋介石<sup>[29]</sup>。

1939年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sup>[30]</sup>、《新民主主义论》<sup>[31]</sup>两篇文章，全面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阶级力量，规定了中共军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任务。他在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当前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或者说“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的国家形式应当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sup>[32]</sup>。毛泽东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纲领，该纲领不仅可以被看作统一战线战略的理论工具，而且按照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的意见，其目标是“针对将来联盟瓦解的可能性，为党作出应变的准备”<sup>[33]</sup>。毛泽东对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批判，对中共领导地位的权力要求以及同样重新提出的剥夺地主土地的要求<sup>[34]</sup>都意味着脱离了1937年12月党的民族统一战线路线，脱离了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毛在这里所作出的评估从总体上为所有在统一战线和抗战时期，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和理论工作构筑了一个框架。然而，《新民主主义论》最初在

中共党内只能部分地得以贯彻；1940年6月中共还重申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也没有采取剥夺地主土地的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领导层而言的“大资产阶级无法变好”<sup>[35]</sup>的命题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向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提出了广泛要求。他试图论证共产党人的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关于这一点，应当联系他欲树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地位的意图来看。1939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在延安掀起了一场学习运动，其目的在于让人们熟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的应用<sup>[36]</sup>。1942年2月中共又开展了一场正式的整风运动。在此，毛泽东把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推广开来，并使之成为党的义务。毛的意识形态观点之所以能够得以贯彻，主要因为他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早在9月份，陈绍禹、博古、张闻天等人就已经丧失了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sup>[37]</sup>。

1941年的皖南事变使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降到了低谷，并且中共多方面地陷入困境。从1939年发生初次摩擦到1940年夏天中共与国民党虽然尚能就相邻地区边界的划分和补给问题达成协议<sup>[38]</sup>；中共同意把它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的军队撤回北岸。但仍有些国民党将领认为，包括大本营在内的部分中共军队撤离得太慢，他们于是便在1941年1月包围了这些军队，并几乎完全消灭之。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破产了”<sup>[39]</sup>。中共从国民参政会撤出

了它的代表，国共两党之间约有两年之久未再进行会谈。相反，双方的冲突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边区以南地方；这些地方一直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中。

1941年7月，日本人又向共产党人在华北的抗日基地发起新的军事进攻。对于中共来说，这真是火上浇油。日本人在进攻中运用了“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无不烧杀劫掠一空。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军事的、政治的压迫之下，八路军从1940年的400000人减少到1941年的303000人；1940年中共控制地区有居民100000000人，而到1941年只有50000000人了<sup>[40]</sup>。此外，国民党部分极右派还在1942年春在重庆发起了一场政治宣传运动，叫嚣要灭绝中共，取消边区。中共估计国民党军队会对边区发动直接进攻。

自1938年起，中共就开始在个别边区建立地方自治机构了。1940年3月又在这些自治机构中实行所谓的“三三制”就是说，共产党人占1/3席位，其余2/3席位分别由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党员占据。中共把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组织到各种群众协会里，建立自卫队、民兵和互助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军事上、经济上的困难。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抗日了，以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也兴起来了。为了能够经济上自给自足，军队和行政机关也参加了大生产运动。自1943年起，高通货膨胀率出现下落，这样，尽管有封锁和军事威胁，边区经济又恢复了正常。

边区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措施经常被称为“延安模

式”<sup>[42]</sup>，中共自己则把它们说成是坚决实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本来也是应当如此实施的。早在 40 年代，边区和在边区成长起来的党的知识分子“新人”就被称为未来社会的样板。此外，就意识形态和学术发展而言，饶有趣味的是，中共在这些年间在延安首次为科学研究建立起了一些基础设施：大学、出版社、出版机构和学会，如历史学会等。

中共担心边区受到攻击，便在 1942 和 1943 年冬天重新谋求与国民党缓和关系，重申“一切为了抗战”的口号。在缓和关系的希望破灭后，当时已经收敛起对国民党的批判的共产党人——至少毛泽东这样认为——在 1943 年 7 月又开始了正常的批判。批判的靶子便是蒋介石是年 3 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该书中 蒋介石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进行了攻击，指出只有国民党才能拯救中国<sup>[43]</sup>。直到 1943 年 9 月 国民党才回到一种比较客观的争论形式上来，而中共也停止了激烈的批判运动<sup>[44]</sup>。蒋介石声明中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应当用政治来对待<sup>[45]</sup>。国民党放弃了进攻边区的军事行动计划 这是有其背景的。自 1942 年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部分地由于苛捐杂税的负担，部分地由于征兵的强制，农民暴动不断发生。自迁都重庆起，蒋介石就与四川地方上的土匪头子达成妥协，但是现在，这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军队内部危机四伏 1943 年底一些青年军官甚至密谋兵变<sup>[46]</sup>。

除了国统区的这些骚乱外，其他方面的形势发展也

对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影响。1944年3月,日本人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了一个新的战争阶段,这是自1938年以来的头一次进攻,其目标是征服华中和西南等重要地区。对于蒋介石来说,形势十分严峻。河南省尚未摆脱1943年大饥荒的后果就在4个周内沦陷了,尤其是因为农民也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队了,他们在上一年被国民党军队压榨净尽<sup>[47]</sup>。在西南战场,日本人从武汉一楔子打到了印度支那边界,国民政府的补给被截断。蒋介石的内政和党务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甚至公开抨击蒋介石,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改革<sup>[48]</sup>。就连此间集结在民主同盟中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也拥护这些要求。他们请求召开所有抗日团体的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除了要求承认边区和共产党军队的合法性外,联合政府问题也是与共产党人谈判的中心点,这一谈判在1944年4—8月间重新举行。

谈判中,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政治见识不再抱多大希望,而是宁可寄希望于美国;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了。中共相信,美国为了有效进行反对共同敌人日本的战争,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建立一个中共也可以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希望与美国进行军事、文化和政治合作的氛围里<sup>[49]</sup>在中共领导人的公告中,下列说法日渐增多,即赞成借助外国的资助,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sup>[50]</sup>。直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还重申中美两国要进行长期合作<sup>[51]</sup>。这是中共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承认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必要性。

但是到 1944 年底，政府的民主改革和与美国进行密切合作的希望全都落空了。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全力支持蒋介石，对他口头答应的民主改革表示满意。

1945 年 4 月共产党人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此时，抗战胜利已经在望。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过去几年里，只有共产党既代表了民族利益，又代表了人民利益。真正执行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只有中共才能扭转中国的命运，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后来，联合政府和民主联盟——该联盟能够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求又被提了出来，而这里所强调的中共的领导权要求又退居次要了〔52〕。

日本投降后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颁布命令声称共产党军队无权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然而，国共两党军队在接管原日本占领区上展开了竞赛。共产党人主要在农村和东北扩展自己的势力，而蒋介石军队则借助美国的空军，占领了若干大工业城市。1944 年中共曾期望与美国合作，在这种希望落空后，中共又希望大国继续保持中立，但是现在，连中立的希望也逐渐失掉基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抗的形势。8 月底，毛泽东亲自飞抵重庆，国共两党再次举行谈判。蒋介石指出共产党人在参加政府之前，首先应当放弃对其军队和边区的最高指挥权，而毛泽东却要求先组建民主政府，表示愿把军队置于该政府的最高指挥权之下。谈判后来达成一份关于迅速召

1/5

{53}

1949

## 5. 2

1935

1935

•

{54}

历史学家直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活动是与树立新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和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制订新任务、新课题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新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又是以中共的决议或党的主要政治家、理论家的论述为依据的。历史学家把由共产国际在1926、1927年和中共在“六大”作出并在30年代初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得到进一步深化的对中国社会的评估，当作他们思考的牢固基础，这些思考归根结底仍是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他们的出发点是把中国社会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推论出反帝反封建和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导致了对下列两大问题的研究：一是详细规定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的关系；二是规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形式、承担者、领导力量和主要任务。早在1926、1928年和30年代初就有人试图把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与世界历史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述。它在当时导致把中国社会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sup>〔57〕</sup>——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看作应当争取实现的国家形式的观点。然而现在，人们在一般的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对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作出了更加精确的阐述，这一点也特别适合于对民主革命的评价。正统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特殊的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讨论最初是附着在三民主

义概念上的 后来 在毛泽东于 1940 年把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等同起来之后，它又附着在新民主主义概念上了。历史学家在否定方面都一致认为：民主共和国既不当是纯资产阶级的，也不应当是纯社会主义的。但在肯定方面，他们却意见纷呈。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民主”<sup>[58]</sup>和作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民主，其性质并未超出资本主义范畴<sup>[59]</sup>到一种“大同”意义上的社会——它也一直理解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sup>[60]</sup>——各种观点应有尽有。

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精确阐述取决于每位作家的政治立场。翦伯赞和侯外庐，胡绳和吕振羽在 1940 年以前也部分地强调民族任务优先于社会任务，强调各政党各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强调国民党对革命或者说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领导；他们认为，这是由中国的民主发展的特殊性造成的。与之相反，何干之以及后来的胡绳和吕振羽<sup>[61]</sup>则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强调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等位，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强调农民是革命的主要承担者、共产主义边区是民主国家的样板、游击战或整个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必然结果。与 30 年代初相比，他们在协助论证政策和策略方面的作用和知识分子作为积极的鼓动家、宣传家的直接作用更加显著了。这样，从确定社会性质而产生出来的关于文化、学术发展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问题便进入了本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学家的视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

程中，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成功能，或者换言之，宣传作用，便附加到迄今为止一直居于首位的战略形成功能上了。

历史学家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演化，大体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1937 和 1938 年 即抗战的头两年 在此期间，人们对民族统一战线方案进行了多方面论证。从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民族自卫的优先权至少在口头上得到了承认。(2)1939 和 1940 年以后 在此期间，由于同国民党的对抗不断加剧，人们又开始重新考虑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了。这个阶段总的特点是，除了民族问题，阶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 5.2.1 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性质

30 年代初，在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人们第一次使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著名用语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个专门用语没有为实际政策明确规定次序上的先后，它可以让人们根据具体形势确定政治重心。30 年代初，在第一次统一战线瓦解之后，反对封建地主和国民党——在该党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结成一体——的斗争成了首要任务。这样，在中共的斗争中，反封建因素便占了上风。由于封建地主与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中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之间有着多方面联系，所以，反封建斗争也常常会转变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情况不仅在国内对中共的联盟政

策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在中共的对外政策上导致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强调。

随着日本侵华行为的加剧和日本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野心越来越大，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先前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般性要求现在变成了具体的进行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实践。抗日战争首先被理解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反帝斗争，高于反帝斗争。事实上，后来在抗战过程中也的确出现过包括中共在内的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联盟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日本的情况。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重又作为盟友而成为可以接受的了。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新的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两个目标先后次序的确定是与对社会性质的评估一致的，正如“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用语所反映的情形一样。因此，这方面并不存在产生障碍的理由。现在自1937年起人们普遍赞成与国民党缔结民族自卫同盟了。然而，在与国民党联盟，建立抗击外来敌人的自卫组织的要求实现以后，一个新问题又突出出来，它无法用1928和1930年的用语来涵盖，这就是如何处理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与在国内实行社会变革的斗争两者之间的关系；同先前一样，社会变革仍被认为是迫切需要的。于是，人们便开始谈论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辩证法了。

反对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的社会解放斗争有什么关系？怎样把这两个目标统一起来？毫无疑问，至少在战争初期，民族解放斗争居于首

位，但是它也有助于社会解放吗？另一方面，在民族斗争的条件下，究竟应不应该提出社会要求？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势必对中共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盟政策和抗战的进行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在党的高级领导人当中，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评估，而这些不同的评估既是理论思考的结果，也是由具体的战争进程和盟友国民党的实际行为所致。这些不同的评估在历史学家就有关问题所写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他们或者直接针对这些问题发表见解，或者间接地在其历史论著中表达自己的意见。

历史学家关于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问题的观点游移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极其简要地概述如下：一种意见以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论纲——该论纲在1920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sup>[62]</sup>——为依据强调争取民族自决斗争与反封建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说必须人为地制造这种一致性。1937年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上述观点，把民族统一战线规定为长期的政治路线，不以抗战的时间为限。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两个运动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策略，倾向于从策略方面看待统一战线，试图在争取社会进步和与抗战的盟友作斗争的行动中，扩大党的地位。具体说来，这就意味着，即使在抗战时期也要把赢得尽可能多的地位以便将来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始终不渝地坚持这种观点，他把中日间的战争视为中共发展的极好机会。他曾经说：“我们所制订的政策 70%是加强自己的力量，20%是让步，10%是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斗争”<sup>[63]</sup>。

侯外庐是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在 1933 年 9 月获释出狱，次年便到了太原，以后又在那里的民族革命大学举行过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讲座；这些讲座的讲稿于 1938 年以书的形式发表。在这里，侯强调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必需，是一条长期的政治路线，并非短时限的政策<sup>[64]</sup>或策略<sup>[65]</sup>。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把民族统一战线只看作“对立的统一”<sup>[66]</sup>的观点，坚决强调它作为运动也具有革命的性质。他直截了当地把别种观点说成是某些人争夺领导权的诡计<sup>[67]</sup>。他说，现存的社会矛盾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虽然未被消除，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更大的矛盾<sup>[68]</sup>。由民族危机和世界性的民主变革——侯把后者当作附加的论据而引入——所决定的社会变革因此要求确定一个新的先后次序：现在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建立在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抗战的基础<sup>[69]</sup>。侯完全支持首先由陈绍禹所宣扬的、1937 年 12 月也被政治局公布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sup>[70]</sup>。侯把这个口号解释为，社会任务应当从属于民族任务。他说，阶级利益跟随民族利益，阶级对抗被调和了。他把下列情况看作积极的倾向，即从由阶级利益对抗造成的激烈内战发展成为由阶级利益联合而出现的和平统一<sup>[71]</sup>，并强调指出，在像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阶级合作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sup>[72]</sup>。侯外庐关于阶级调和的阶级利益联合思想和他在抗战进行过程中视为可能的重新规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思想致使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中国究竟是否有进行十月革命的必要？他不仅把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十月革命，就是说宣传无产阶级暴力的阶级革命，视为有害，而且还坚持认为，如果民众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能够协调一致的话——正如他所希望和追求的那样——那么这样的革命在中国就纯属多余。侯在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中看到了中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sup>[73]</sup>。

侯希望进行一场“和平的革命”——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用这样的措辞——他是这样论证的：抗战是一场全民战争，它原则上不同于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革命<sup>[74]</sup>。然而，民族解放斗争同时又具有社会成分，它在外部的可以被等同于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因此在内部也是与后一种斗争统一的<sup>[75]</sup>。这样，侯虽然没有明确地赋予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外部的优先权，但同时却想从内部统一的命题出发，把民族斗争与民主斗争结合起来。他的特殊民主的思想是与这种特有的、就中国的内部关系而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念相适应的。他说，在今日的中国既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条件，也没有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人们应当谋求的只是把“由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和“由上而下的民主改进”两者“相互配合”<sup>[76]</sup>。在合法的民主运动中应当支持民主改进，然而这并不是阶级斗争的任务<sup>[77]</sup>。就其性质而言，民主革命现在已不再是暴力革命，而是合法的民主运动了<sup>[78]</sup>。这样，在侯外庐看来，中共和国民党也是在阶级调合与合作的意义上共同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他不加限制地把

国民党说成是抗战和民族解放的领导者<sup>[79]</sup>。侯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激进的民主道路”，德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均不足以垂鉴，中国革命必须自己寻求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即使当前俄国已成为榜样，也不可以完全仿效俄国的方法，只可学习它的精神<sup>[80]</sup>。

侯的这些见解也影响着他的民主概念。他在“抗战的民主”和继抗战而来的“建国的民主”之间作了区别。这两个阶段的基础应当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侯看来，两个阶段的主要区别是：在第一阶段只能达到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在第二阶段则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sup>[81]</sup>。他认为，这两个阶段都是以“资产阶级法权”的民主为典型特征的。侯不想继续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意义上理解建国的民主阶段，他要把后者归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建国的民主既不是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专政，也不是所谓从封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民主，它是一种特有的民主，近似于否定资产阶级的形式骗局。

“这样的宪政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以抗战胜利过后各阶级力量，在新的形势之下，共同建立共和国的半殖民地解放后的特殊民主。”<sup>[82]</sup>从这一共同性出发，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可能性就有了<sup>[83]</sup>。侯外庐为这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任务作了如下概述：削减封建残余，计划国家生产，光大民生主义，调整阶级利益<sup>[84]</sup>保障直接生产者们的最高民主权利，厉行彻底的社会政策，实行大多数民众的劳动政策，消灭官僚制度实行彻底的地方自治，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准，等

等<sup>[85]</sup>。1940年初侯重申这一纲领并且强调人们现在还不能破坏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必须真正地而不只是形式上地推行资产阶级法权<sup>[86]</sup>。

这里对侯外庐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因为他在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性质问题的讨论中是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论最主要、最系统的代表者。与之相对的则是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十分接近于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前的立场，代表着党内那些顽固反对把国民党包容到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人的意见。这里之所以把它们放在第二位介绍，主要因为这些观点的代表者并不十分强硬地对抗业已出现的于1937年获得通过的党的新路线。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到1939年和1940年，在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如此恶化，以致于出现了新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讨论。

何干之口头表示要使民族利益高于一切<sup>[87]</sup>但他实际上早在1937年中期就把拥护民主政府和宪法看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了<sup>[88]</sup>。他明确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但却认为中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向着“未来社会”的前途迈进。这一方面可以通过统一的新政权的推动来实现，该政权要在“合理的计划”之下发展合乎全民族要求的产业，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助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来实现<sup>[89]</sup>。何反对把资本主义当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的观点，反对机械地把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模式搬到中国来，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

会的发展的特殊性<sup>〔90〕</sup>。他是这样描述这一发展道路的：首先，中国革命有双重任务，即反帝和反封建的彻底变革；第二，与其他国家的民主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承担者是社会下层人民。因此，它必须开辟一条与欧洲的民主革命不同的道路<sup>〔91〕</sup>。

在这种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的认识中，已经显露出一种新的对民主概念的定义，它与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基本一样。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需介绍一下其他历史学家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系问题的观点。一旦从他们零星发表的有关政治问题的言论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画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观点并不与上面概述过的两种观点的其中一种完全一致。

胡绳和翦伯赞也把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看作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点与侯外庐观点一致<sup>〔92〕</sup>。但是翦伯赞把论证的重点放在抗战而不是民族统一战线上。同侯类似，翦也认为抗战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把这个阶段理解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形态中，中国残余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因素都被否定了<sup>〔93〕</sup>。翦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开始向着独立自由与幸福的社会之转化的过程”<sup>〔94〕</sup>。对于他来说，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紧密相联：起初是削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后来则是消灭这种属性，“跃入”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完成中国历史之“变革的过程”<sup>〔95〕</sup>。抗战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具有与俄国十

月革命完全相同的意义，因为两者都担负着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十月革命是阶级解放而民族革命战争则是民族解放<sup>〔96〕</sup>。

在翦伯赞那里，对抗战的社会成分的刻意强调也表现在他对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变革斗争的统一的强调上，而民主变革斗争又首先被等同于争取实行宪政的斗争。翦强调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变革斗争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把宪政的实行看作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又是实行宪政的推动力量<sup>〔97〕</sup>。翦对民主共和国和三民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解又与辛亥革命（1911年）紧密相联；按照他的意见，民主革命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并应当在抗战中结束的<sup>〔98〕</sup>。

对于胡绳来说，在最初几年，他对抗战的一般意义的认识与侯和翦的认识相似。按照他的观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导致各阶层各政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而奋斗<sup>〔99〕</sup>，而这个新式的国家恰恰有赖于广大民众的支持<sup>〔100〕</sup>。胡绳正是在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到独立自由的国家的质变中看到了抗战的意义<sup>〔101〕</sup>。

胡绳也对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表示支持。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抗战，另一方面，抗战又加强了民族统一战线<sup>〔102〕</sup>。同侯外庐一样，胡绳也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了，民族统一战线仍有必要，对于他来说，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就在于：团结全国抗日和进行国家建设，它实

现了全民的利益。然而，胡和翦尽管强调团结各阶层各党派的必要性，但并不像侯外庐走得那样远，以致于明确主张阶级调和。相反，吕振羽却按照孙中山的意愿拥护阶级调和政策，即使只局限于为反对民族敌人而进行共同斗争的时期<sup>〔103〕</sup>。

在描述经过抗战将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方面，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侯外庐的设想外，胡绳也发表了一些见解；它们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在以下方面完全一致，即胡也为中国设想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形态。对于胡绳来说，抗战不只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它同时也是一场促进中国人民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将会形成，而且农民也第一次参与了社会变革。中国应当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概念出自 1938 年 12 月 14 日《新华日报》——，它的基本原则是依靠广大民众。胡绳早已在边区的新生活形式中看到了这个新式国家的模型<sup>〔104〕</sup>，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把这个新式国家归于社会主义范畴还是资本主义范畴。后来他在别处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越过了它的发展高峰，已不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了<sup>〔105〕</sup>。他的理论观点是：正像有不同方式的资本主义一样，如在美国或德国，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社会<sup>〔106〕</sup>。

关于历史学家在民族统一战线第一阶段对中国的发展的特殊形式的讨论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当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政治上陷入危机的时候，

由侯外庐、胡绳、吕振羽所一致主张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统一论便不再继续发展了。在抗战的第一阶段，特别是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之前，事态的发展似乎证明了那些赋予抗战社会进步的革命意义并热切期望迅速胜利和在国内实行民主变革的历史学家的观点的正确性。然而，由于抗战迟迟未能取得成功，也由于 1939 年以来与盟友国民党的冲突日益增多，所以关于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孰先孰后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就有可能使他的主张产生影响了。毛泽东倾向认为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具有同等地位，甚至说民族斗争应当服从社会斗争。正如后面还要论述的情况一样，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论的主张者虽然仍固执己见，但从现在起，已不再掌握主动权了。

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末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用“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来表达他的社会目标思想，该共和国既不是苏维埃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sup>[107]</sup>。他同历史学家一样，主张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在这个国家中，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军队厉行合作<sup>[108]</sup>。1939 年 10 月，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1)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2)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sup>[109]</sup>。后来他在 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又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和他关于民族任务与民主任务的关系的观点。新三民主义的社会观处于他的论证的中心，而新三民主义则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sup>[110]</sup>。按照他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在共产主义边

区中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后还要把它推广于全中国。

毛泽东论述道：当前的民族和民主革命——在此两者是等位的——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它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sup>〔111〕</sup>。它区别于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它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sup>〔112〕</sup>。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中的“新”字便意味着，这场革命虽然就其性质来说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因此，它是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与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sup>〔113〕</sup>。

从历史学家后来就民族和社会问题发表的言论来看，其规模远不如抗战初期，他们大都马上附和了毛泽东的观点，只有个别人暂时仍持批评意见。胡绳尤其支持毛的观点，何干之在1940年后未再发表任何意见。胡绳虽然担心统治阶级会出卖民族利益<sup>〔114〕</sup>，但他们仍然拥护全民族的大团结以及民主与进步<sup>〔115〕</sup>。1940年2月，毛泽东也把团结与进步说成是两个具有同等地位的要求，它们与抗战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sup>〔116〕</sup>。这样，即使那些主张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人也能够很容易地拥护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了。但是对于实际政治来说，这种理论

上的让步并未长期发生作用。就连胡绳后来也转到最终承认社会斗争的优先权的观点上来，而毛泽东的意图恰恰如此。胡在 1943 年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运动中要求揭发而不是调和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sup>〔117〕</sup>。他现在的意见是，战争的进步性绝对要求用革命的方式否定、克服政治经济的落后性，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跳跃”<sup>〔118〕</sup>。

然而，翦伯赞和吕振羽似乎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把现阶段社会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的观点，不过，吕振羽只是针对文化领域而发表意见的<sup>〔119〕</sup>。翦伯赞在 1940 年以后仍把抗战称作独立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形态”，其独特性在于，它既要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又要清除一切资本主义因素<sup>〔120〕</sup>而毛泽东却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按照翦的意见，在抗战过程中，最初是削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继而消灭这种属性，最终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sup>〔121〕</sup>。吕振羽则把战胜日本法西斯看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因此，他声称新民主主义是未来的一项任务<sup>〔122〕</sup>。在翦和吕的意识中，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仍被理解为自 1911 年开始的民主革命的完成<sup>〔123〕</sup>这就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或者新三民主义论大不相同了。在毛泽东看来，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早已结束了 1911 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类型的革命，此后，中国革命已经处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了<sup>〔124〕</sup>。

侯外庐直到抗战结束后才逐渐地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他在 1946 年还再次出版了他写于 1938—1939 年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sup>[125]</sup>。在这些文章中，他对有关问题的观点未作任何改动，只在重新写的关于资本问题的章节中向毛泽东的过渡阶段概念作了一些让步，因为他现在也把民主主义称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桥梁”<sup>[126]</sup>。直到 1948 年 7 月和 8 月侯外庐才发表两篇文章<sup>[127]</sup>，把毛泽东的新三民主义论评论为孙中山纲领的继续发展和新中国的理论基石。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清除了封建尘垢，结束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为社会主义扫清了道路<sup>[128]</sup>。他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强调新民主主义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农民的民主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工人阶级<sup>[129]</sup>。不过他并不愿把新民主主义看作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的正常发展”即使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他论证中国的发展的正常性时说，恰恰与各自的社会条件相适应，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化”，而其他国家却要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的民主革命。在此，他显然是以列宁的论述为依据的。侯外庐把新民主主义视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专政，但他没有提及民族资产阶级，相反，毛泽东早在 1940 年就把该阶级包括在联盟之中了。新民主主义一方面应当发展资本主义成分，但不能使之垄断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

资本主义<sup>[130]</sup>。发展资本主义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而且也以此第一次为中共提供了理论根据并通过相应的措施在共产主义边区得到实行<sup>[131]</sup>。这些事实特别在 1945 年抗战结束后，导致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在未来发展中的价值的思考。但是中共在严重束缚经济生活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和私人资本的发展”两者之间作了严格区别。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 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sup>[132]</sup>

在本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学家圈子里，何干之和胡绳也针对这些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主要探讨了未来的发展方案。胡绳尤其关心“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富裕 国家富强”<sup>[133]</sup>。实行民主和结束内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他看来，“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sup>[134]</sup>并不是苏维埃类型的社会主义，而是第一，农业改革，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 第二 发展工业 给自由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第三，脱离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控制；第四，建立民主政制，这是实现前三项任务的保障<sup>[135]</sup>。胡要求自由发展私人资本，要求资本主义与工人合作，但他拒绝与官僚资本合作<sup>[136]</sup>。他认为 解放农民是巩固民主基础的关键。因此，他反对那种视农民解放运动，即剥夺地主财产并分配土

地给农民‘已经过火了’的观点<sup>[137]</sup>。他现在对‘民主’的认识是“三万万的农民的解放和千千万万农民的转入城市成为工人”广大的农村里处处桑树成行<sup>[138]</sup> 每一个城市里烟囱林立（即工业化——作者）解放和提高生产力而给人民以自由和富足<sup>[139]</sup>。

何干之甚至把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称为“社会的必要”。但是人们必须辩证地看问题，要以发展资本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sup>[140]</sup>。因此，他赞成在工业建设中接受美国的资本援助<sup>[141]</sup>，赞成农村在建立合作社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关系<sup>[142]</sup>。

然而，胡绳和何干之的这些设想一旦涉及资本主义的建设，很快就被实际的发展所超过了。

## 5.2.2 对三民主义的解说——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政策的讨论

围绕民主这一概念而展开的争论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所有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论述之中。它反映了下列情况，即在抗战的条件下，进步政策只有在广泛的联盟中，就是说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才可以想象，而这样一个由若干利益不同，甚至部分地利益对立的党派所组成的联盟，必然要求建立一些能够自动运行的机制，依靠它们可以使矛盾得到调解或至少得到缓和。这种必要性是不依人们对联盟存在的时间长短和意义大小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为转移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持久的存在

和共同行动的活动范围。对于设计调解联盟内部矛盾的机制来说，民主概念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它完全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理解的意义上，把用民主方法来消除利益对立的要求置于首位。如此说来，人们也可以把民主概念转用到中国的特殊条件中，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一种把这个概念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扩大的努力。这样，论战不可避免地要上溯到早期阶段的民主概念，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外，三民主义对于联盟政策还有不可低估的优点，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主要力量都认为它是值得考虑的。三民主义一方面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在 1924 年的解说中的反帝和实行社会改革的主张也能为中共所接受，一部分共产党人只把它当作最低纲领，而另一部分共产党人则已经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因素了。这样，关于民主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涉及如何“正确”解释三民主义。这一点在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与中共和国民党在 1937 年达成的协议相应，由国民参政会起草的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三民主义作为“最高权威”<sup>〔143〕</sup>而发挥着作用——被双方当作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政治准则接受了下来。形式上与三民主义的联系已经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盟友之间造成了基本的意见一致，但是内容上它却为不同的解说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这一点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三民主义概念的发展过程就十分清楚了。

孙中山早在 1904 年就把他的政治要求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后来又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之，因此，1924—1925 年的三民主义在内容上与早期的三民主义差异很大。1911 年的三民主义首先要求推翻满清政府<sup>〔144〕</sup>；其次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帝国，它的基础应当是人民群众；第三是改善民生，发展工业使国家富强，为农民<sup>〔145〕</sup>‘平均地权’<sup>〔146〕</sup>。按照维希特鲍尔的解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试图把三民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原则；他相信，一旦实现了三民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就可以避免<sup>〔147〕</sup>。自 20 年代起，在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孙中山又开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了，例如他把民生主义扩大成为激进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种新的解释在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国民大会的宣言中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借助于这个宣言“内部联盟”的统一战线就是说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就形成了。在这里，民族主义被解释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sup>〔148〕</sup>。民权主义现在也标志着保障人民直接和间接的权力，既保障选举权，也保障创制、复决和罢免诸权。在与该原则相适应的民主之中，议会制被提高到较高水平，权力应当属于全体人民，不能由“少数人所得而私”<sup>〔149〕</sup>。民生主义则主要被解释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sup>〔150〕</sup>。

三民主义发展过程自身和由此而产生的具体政治措施规定的极不精确，在孙中山死后便使不同的政治团体

有可能各自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念对孙中山这位在此期间被尊崇为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的三民主义，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断章取义地论证他们的政治目标正是孙中山遗产的真正继续。不论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国民党党内的不同派别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引用三民主义权威<sup>[151]</sup>。

1927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破裂使争夺孙中山政治遗产的斗争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以后几年的内战中，共产党人不再那么看重引用三民主义了。一方面，他们只利用孙中山的个别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sup>[152]</sup>；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把三民主义据为己有并使之等同于他们的政策，所以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倾向<sup>[153]</sup>。但是，随着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讨论的开始，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又重新受到人们关注。由于还没有为民族统一战线制定政治行动纲领，所以三民主义便获得了一种可比较的作用。

在中共承认了三民主义为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基础之后<sup>[154]</sup>，中共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关于三民主义解说的讨论。这个讨论就其政治目的来说首先是要论证中共在边区的实际政策完全符合三民主义，是要通过三民主义的推论而赋予争取民主的政治要求和进行符合宪法的反对国民党政治的斗争以更大的意义。特别是在1937和1938年间，中共强调他们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具体化，他们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和孙中山的

继承人<sup>[155]</sup>。但到 1939 和 1940 年当国共两党军队发生冲突之际 又有人开始批判三民主义的“反动性”此后，共产党人即使在宣传三民主义的积极因素时，也变得更有选择了<sup>[156]</sup>。

同时，在一些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文章中，中共党内围绕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而展开的讨论情况也有所反映。例如人们以解说民生主义的形式探讨了在抗战条件下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sup>[157]</sup>。自 1940 年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等同起来以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讨论便转到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讨论上了，或者说与之并行。

历史学家当中，侯外庐表现尤为突出，他早在 1938 年或 1939 年便发表过一些关于三民主义的著述，这些著述在 1946 年稍加修改便又再版发行了<sup>[158]</sup>。其他历史学家虽然没有发表如此详细的言论，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包含有他们对于三民主义及其在抗战中的意义的主要见解。他们基本上都站在中共的政策一边，承认中共的政策是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国民党 1924 年表述的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真释”是“真三民主义”，并使之与 1911 年的三民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应当怎样理解这个“真三民主义”呢 这个问题自 1940 年毛泽东把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区别开来 并使“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等同起来以后 便十分清楚了。新三民主义现在被看作与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它同样是在 1924 年制定的——息息相关。与之相反 侯外庐除了 1924 年的解释 也联系

到早期的三民主义，他是在辛亥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三民主义的，而且他也把孙中山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含义的三民主义纳入其中。因此，当有人强调以三民主义为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原则差别时，侯外庐却试图突出三民主义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可能性，尤其是要说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倾向<sup>〔159〕</sup>。

(1) 民族主义。侯外庐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自卫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统一<sup>〔160〕</sup> 而其他人或者把它广义地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或者狭义地解释为“战胜日本法西斯”<sup>〔161〕</sup>。

(2) 民权主义。1939和1940年间，有人曾把民权主义解释为一种处于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制度，认为三民主义只可应用于资本主义阶段。而到1946年民权主义又被解释为“非资本主义的民主”。侯外庐反对上述意见，他把民权主义看作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式的民主，其中权利平等的原则将得以实现。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情况那样，侯外庐在1938和1940年区分了“抗战的民主”和“建国的民主”在前一种民主中只能达到形式上的平等，而在后一种民主中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它接近于“否定资本主义”<sup>〔162〕</sup>。

(3) 民生主义。侯外庐根据1924年国民党的宣言认为民生主义是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sup>〔163〕</sup> 也是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的原则<sup>〔164〕</sup>。其他人则没有涉及“节制资本”的口号。

侯外庐 特别是吕振羽 还对各个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解释，他们都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抗战时期终究是要从属于民族主义的。1940 年侯再次明确指出，抗战的民主是“低级的民主”，其任务是建立一种反对贪污腐化和叛国投敌、动员民众的政治制度<sup>[165]</sup>。同年 2 月吕振羽也强调说 民族主义 反对日本法西斯，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由此推论，民主的意义就在于 它能够在‘彻底的革命民权之高涨’的形势下，达成和加强全民族力量之团结，战胜日本法西斯，消灭汉奸。吕还把民生主义泛泛地解释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抗战士气，创设国防工业，以完成驱逐侵略者出境的工作<sup>[166]</sup>。从这种三民主义解说中不难看出，吕振羽差不多是在辛亥革命意义上理解三民主义的。

对于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的不同态度也表现在如何理解三民主义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纲领问题上。有人指出，若无科学的共产主义，真三民主义就不会在中国实现。而侯外庐肯定三民主义是整个建国阶段的‘理论’，他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是“世界革命的原则”<sup>[167]</sup>。联系三民主义对文化运动的理论指导作用，侯赋予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一种指导功能，而没有替马克思主义要求这种功能；在侯看来，孙中山的理论克服了实践与理想对立的错误观念，克服了数百年来学术精神与社会现实隔离的矛盾<sup>[168]</sup>。

这里所反映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也明显表现在确定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有人强调

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差别，反对混淆两者的做法，特别反对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侯外庐则在许多文章中试图说明民生主义既包括社会主义也包括共产主义<sup>〔169〕</sup>。他甚至援引孙中山的一些讲话，说三民主义已经在俄国实行了，在此，他最终得以把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特色的三民主义的实行等同起来<sup>〔170〕</sup>。他借此赋予孙中山主义一种普遍的适应性，希望它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可以对别的同样不甚发达的国家发挥作用<sup>〔171〕</sup>。

历史学家虽然对三民主义对于抗战政策和与之相关的建国政策的意义，从理论方面部分地作出了相对而言过高的评价，这里特别要提及侯外庐和吕振羽两人，但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却意见不一，这就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实际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侯外庐认为，抗战的民主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精神基础之上的<sup>〔172〕</sup>。吕振羽虽然在1940年承认蒋介石所执行的农工政策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而采取的措施<sup>〔173〕</sup>，但他同时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批评说，三民主义革命总体上未得到实现，民权主义政治、民生主义经济不是已完成地存在的东西，已经取得的成就只是创造了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sup>〔174〕</sup>。

### 5.2.3 社会载体和领导权

因为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阶级交叉的联盟，所以有许多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共产党人作出回答：哪些阶级应

当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或者说哪些阶级应当被排除在外？是否应当赋予一个或多个阶级特殊的地位？应当有一个领导阶级或阶层吗？谁应当在实践中承担政治领导任务？这些问题不仅仅以理论形式，而且也以活生生的实践形式呈现出来。在此，那些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性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大都愿意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尽量实用主义地处理问题。而那些主张民族统一战线应当不以抗战为限而长期存在，或者从社会性质出发把统一战线看作解放战争和革命的一个独立阶段的历史学家，则致力于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中共内部的讨论主要涉及应当把哪些社会力量纳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民族统一战线应不应该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逐渐地那种在共产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方案影响下形成的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小民族统一战线计划，扩大为不仅包括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一切爱国力量在内的大民族统一战线计划。就是历史学家也赞成一切政党和团体为抗战建国而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之中<sup>[175]</sup>。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共 1937 年初以来的纲领里。

抗战初期 历史学家一方面满足于看到在“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阵线”中，“上下团结一致”<sup>[176]</sup>或者“上与下的统一”<sup>[177]</sup>的情形。他们普遍宣扬各阶级各阶层合作 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sup>[178]</sup> 甚或侈谈“阶级利益联合的和平统一”<sup>[179]</sup>。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要精确规定哪些阶级和阶层应当被包括在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在此各个历

史学家所列举的名单不尽相同。何干之撒的网最大，他在1938年就不仅把资产阶级（市民）<sup>〔180〕</sup>、富农和地主而且把商人和买办——只要他们不投降敌人——都包括到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然更不用说了。在他看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大联合<sup>〔181〕</sup>。其他人则简单地通过列举不应该属于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和团体的方式，来确定联盟的规模。

所有作家都把汉奸，即那些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排斥在民族统一战线以外。此外，大多数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拒绝与封建势力合作——至少在文化领域。吕振羽反对与崇信孔子者合作<sup>〔182〕</sup>，侯外庐不愿与落后的封建害虫合作<sup>〔183〕</sup>，翦伯赞则对“封建余孽”持批判态度<sup>〔184〕</sup>。就是胡绳也要求把腐败落后分子从民族统一战线中清除出去<sup>〔185〕</sup>。还有人把陈独秀之流的托洛茨基分子称作“卖国贼”，把民族统一战线看作是与托派的立场对立的。

有的历史学家试图精确规定各社会力量在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中的地位。对于何干之来说，工人和农民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基本势力”<sup>〔186〕</sup>。“下层小资产阶级和果敢的知识分子”是“解放运动的忠实同盟者”<sup>〔187〕</sup>。1937年7月，何也把市民算作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了<sup>〔188〕</sup>。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他们与革命的关系<sup>〔189〕</sup>。此外，也有人只把农民视作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而在翦伯赞看来，工人和学生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主力军<sup>〔190〕</sup>。

那些把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等同起来的历史学家也谈到了在抗战影响下出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问题。1938

年胡绳和翦伯赞断言阶级力量的变动<sup>[191]</sup>。但是翦伯赞不在意地把政治范畴与社会经济的、伦理的范畴混为一谈，他说，在抗战中，“封建余孽”和机会主义者都转化为汉奸，大部分的中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而广大劳动者则转化为抗日游击军<sup>[192]</sup>。

在抗战的第二阶段中，在 1939、1940 年国共两党军队多次发生冲突之后，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就提出的阶级划分的方法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胡绳和吕振羽大谈落后力量和进步力量了<sup>[193]</sup>。新词汇的使用使下列说法变得容易了，即国民党——它现在又对共产党人持敌视态度了——虽然能够参加民族统一战线，但却没有能力承担统一战线和抗战的领导重任。他们鉴于国民党的投降妥协立场而称之为落后力量，这样，共产党人实际是把外交行为当作确定社会性质的标准了。与在欧洲通常可见的词汇应用不同，这里的“进步”和“倒退”概念主要不是从内政方面定义的范畴。

这种把外交政策吸收到阶级规定上的做法，在毛泽东关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述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毛泽东早在 1937 年 12 月就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明确指出，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两大敌人外，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革命的对象”<sup>[194]</sup>。毛在区别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时，考虑较多的也是他们的政治行为而不是诸如与外国资本的联系等经济标准。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国民党也是（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sup>[195]</sup>。

因此，不能无限制地把它当作民族统一战线的盟友，应当至少部分地把它当作“斗争的对象”<sup>〔196〕</sup>。历史学家遂在1943年5—12月的批判运动中，把国民党当作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批判了。他们完全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区分为依据的<sup>〔197〕</sup>。

在这里，确定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力量问题自然就转到新民主主义理论上了。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盟基础上的，它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sup>〔198〕</sup>，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未被算作决定中国命运的基本力量之一。有人马上把这一思想变成了自己的观点，但侯外庐等人却直到1948年才接受“民主联盟专政”的观念，而且侯认为，属于这一联盟的只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sup>〔199〕</sup>。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复杂结构是与中国的具体形势相适应的，它在理论上也使若干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联合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要求协调一致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若干阶级联合专政的观点决不是毛泽东新发明的思想，早在1926年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就对它进行过讨论<sup>〔200〕</sup>。这个观点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使盟友间的平等地位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求协调一致。尽管现有的居民结构不利于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求，但是坚持这一要求的做法却有其传统，早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在1926和1927年，这个领导权要求就被

提了出来。后来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有人又对中共的领导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证。不过，1937和1938年，在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的讨论中，中共一度放弃了对抗战乃至整个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领导权要求，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sup>[201]</sup>。

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家，例如侯外庐、翦伯赞和吕振羽等，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sup>[202]</sup>或者在抗战和整个民族统一战线中<sup>[203]</sup>的领导地位，或者主张：民族解放的任务虽然必须各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完成，因为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独自胜任，但其领导权却属于国民党<sup>[204]</sup>。但是也有人决不肯放弃中共的领导地位的原则，并宣称无产阶级是中国人民觉醒的首领，工人阶级在民族和农民运动中居于先锋地位。何干之也明确指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执行者”不是上层，而是下层国民<sup>[205]</sup>。他在1938年试图回避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谁最致力于抗战，谁就拥有这一领导权<sup>[206]</sup>。

这样，1939和1940年，当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个主要伙伴之间的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时，毛泽东就可以遵循一条从未完全中断的传统路线，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了。随后，一部分历史学家也靠拢过来<sup>[207]</sup>。他们当中那些参加了1943年反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的人在文章中力图证明，现在，“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首领”已经不能掌握“中国之命运”真正掌握着中国命运的非中国共产党莫属<sup>[208]</sup>。

## 5.2.4 把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置于 世界政治的发展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把抗战看作孤立的、其意义只局限于中国或亚洲的事件，而是把它纳入世界政治的一般发展之中，并赋予它一种世界政治意义。历史学家的观点与之相同，这一点在那些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家那里表现特别清楚<sup>[209]</sup>。在此，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在两个层面上被纳入了一般发展。其一是把抗战与其他被视为震撼世界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有时还把它与西班牙内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盛行这是那些经常被解释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大动荡事件之一<sup>[210]</sup>而抗战则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一场进步的革命战争<sup>[211]</sup>。其二是把抗战放到反对德、意、日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大统一战线之中。苏联、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和西班牙以及其他弱小国家<sup>[212]</sup>英国、法国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sup>[213]</sup>都被看作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此外，侯外庐认为，不仅抗战，而且还有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平运动的组成部分<sup>[214]</sup>。历史学家的这些评论都是以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为依据的<sup>[215]</sup>。

历史学家后来又从这些评论中推论出抗战的意义。翦伯赞认为，抗战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具有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相同的意义，因为两者都担负着人类解放的历史

使命；十月革命实现了阶级解放，而民族解放战争将要实现民族解放<sup>[216]</sup>。其他历史学家也赋予抗战重要的世界政治任务。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事件与世界的总体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中华民族的胜利将会鼓舞世界人民的斗争，反之，世界人民的斗争也会加速中国的民族解放<sup>[217]</sup>。不过从这种相互作用起历史学家首先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侯外庐甚至说道，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侵略斗争都依赖于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远比民主国家中的运动发达<sup>[218]</sup>。吕振羽也强调中国的抗战对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影响<sup>[219]</sup>并且着重指出，经过抗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加强<sup>[220]</sup>。侯外庐更多地从实际政策方面谈论把中国的抗战纳入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之中问题。他提到抗战爆发后苏联未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但他对于那种因为苏联没有进行军事干涉而怀疑苏联朋友的支持的真诚的做法又表示反对，显然，至少有一部分中共党员期望获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sup>[221]</sup>。

在确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有的历史学家能够无偏见地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政治事件。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上。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或开始阶段<sup>[222]</sup>胡绳和翦伯赞指出这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资利用的机会<sup>[223]</sup>。在此，与从理论上论证的把中国抗战纳入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关系之中的观点相反，对世界政治

进程浅显的民族主义解说无疑占了上风。

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关系的观点归根到底是以把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等同起来的做法为基础的。这种等同使历史学家能够断言抗战与世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出发重新强调中国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

### 5.2.5 动员民众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战，并在民众当中进行相应的宣传组织工作。这一点在历史学家的论著中也受到特别强调。历史学家既赞成国民党和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4月提出的动员全国民众、提高民族意识、抗战建国的一般性纲领要求<sup>[224]</sup>，也赞成中共在十大纲领中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sup>[225]</sup>的主张。然而国共两党对于动员民众的看法并不一致；在国民党看来，动员民众就是要把人民组织到抗日组织之中，提高民族意识并以财力物力支持抗战，但是中共却力求动员民众直至全民武装，正如它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游击队的情形一样<sup>[226]</sup>。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由此产生的问题首先是，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那些超出国民党政府措施框架而采取的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以及进行游击战争的行动？这个问题在军事战略上最终表现为由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与武装民众和游击战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般的理论上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

与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政府呢？还是应当自己掌握？

国民党提倡同日本人进行正规战，而中共却力求把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并且在抗战过程中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越来越把游击战放到了首位。与抗日宣传的情绪特征和煽动性相适应，对于两种战争形式的某一种的选择必然会直接反映到历史学家关于动员民众问题的争论中。抗战初期，历史学家大都主张把两个方案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强调“总动员全国民众，向敌人作最后的抗争”<sup>[227]</sup>的必要性，强调广泛发动群众<sup>[228]</sup>和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日运动<sup>[229]</sup>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赞成对“政府措施”的意义作明确说明<sup>[230]</sup>。侯外庐试图克服在动员民众与政府措施之间存在而且也被历史学家觉察到的矛盾，他虽然要求动员各阶层参加抗战，要求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但他的出发点却是：动员民众应当与新的抗战机构、国民参政会和军事委员会步调一致<sup>[231]</sup>。与其主张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与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观点相对应，他既赞许由政府发出的动员民众的号召，又赞许民众自发的抗日积极性，他认为政府必须珍视这种积极性<sup>[232]</sup>。在侯看来，社会运动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决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斗争与民族斗争内在本质联系的表现，正如正规战与游击战之间的联系一样。

这种主张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的观点是以历史学家因国民党在抗战最初几个月内的政策和部分的军事胜利

而产生的希望为基础的，它首先包含有下列意愿，即在政府规定的非军事框架内接受对动员民众的限制<sup>[233]</sup>。在此，下列希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希望把这种动员民众的政治艺术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动力，使之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随着国民政府对全民武装的认可而得到进一步发展<sup>[234]</sup>。于是，在抗战初期，特别是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竭力突出在发动中国人民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指出：抗日的重担虽然主要由中国农民承担了，但是工人、青年、妇女和一部分有产阶级也都在各种抗日组织中团结起来<sup>[235]</sup> 政治觉悟总的说来大有提高<sup>[236]</sup>。有的人虽然未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但也认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借助国民政府可以实现动员民众的目的，并且主张建立工作组，创办协会和报刊，研究抗战文化，整理加工旧戏剧和歌谣，用旧的形式宣传抗战的新内容（把新内容置于旧形式中 等等。然而 正如 1938 年夏天所显露的情形那样，国民党还不曾准备为保卫临时首都武汉而积极发动群众，直至全民武装，相反，它还阻挠共产党人在武汉进行抗日宣传工作<sup>[237]</sup> 因此 历史学家当中普遍出现了一种失望情绪。胡绳抱怨说，民众的动员还不够广泛，主要原因在于保甲制<sup>[238]</sup> 的妨碍<sup>[239]</sup> 而保甲制恰恰是国民党新近恢复建立的。

武汉陷落后，想要在与国民党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实行全民总动员和游击战根本不可能了。于是关于游击战的问题主要在共产党人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继续受到人们重视；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游击战作出

了高度评价。早在 1938 年，胡绳就在宣传政府动员民众措施的同时，抽象地提出过进行游击战的要求<sup>[240]</sup>，后来他更直接地把游击战说成是民族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而完全不提任何政府措施了<sup>[241]</sup>。侯外庐虽然也抽象地要求过军队和人民联合，但他却把这一联合与新的抗战机构联系在一起<sup>[242]</sup>。他在 1940 年 7 月说道：游击战是对实现原定目标的措施的有益调整（该措施若无这样的调整便不能使用——作者）他矜持地把游击战称作“山区里的运动战术”<sup>[243]</sup>。

以后数年，动员民众问题从另一个侧面又被重新提出。现在，下列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即应当动员哪些社会力量？用什么手段来进行动员？这些问题很快就成为关于新文化运动讨论的核心，也给予历史学家以一般的意识形态及学术新任务和由此而来的特殊的历史科学新任务。

### 5.3 历史学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识

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战这一新的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致认为，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势在必行。他们因此便开始从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要求出发，为文化领域制定新任务了。在他们看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应当完全服务于民族任务，对此，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是其前

提。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解当中“文化”包括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等等广泛领域。科学和思想、艺术、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统一的文化总体中被看作处于同一地位的各个部分领域；在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各个部分领域的功能基本相同，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在某一个部分领域例如文学中讨论的问题往往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部分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上，而对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同却很少考虑。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善于从“文化”或“文学”中发现“马克思主义”或“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许多关于“文化”或“文学”的论断的本来意义。在这样的理解中，宣传新文化与普及马克思主义没有明显区别。正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广泛的文化概念之中的做法排斥了通过“引进”或“接受”行为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中国化”概念的形成<sup>[244]</sup>。必须分清中国化概念中政治功能和理论内容之间的不同。下面，我们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形成于向西方学习氛围中的新文化是否具有推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实现的实现的政治作用？而对于那些与学习西方相关的理论问题，即如何选择和利用中外遗产可继承的内容也要予以专门论述<sup>[245]</sup>。

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文化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上层建筑概念等同。侯外庐大谈“政治与文化的统一”<sup>[246]</sup>吕振羽也指出“新文化的创造，主要上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要决定于社

会的物质条件<sup>〔247〕</sup>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翦伯赞用下列措辞来表述“文化”概念：“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这二者是相互作用的，自然归根到底社会经济的变革是历史变革之最基础的动力<sup>〔248〕</sup>。这样的“文化”概念无疑是上层建筑的同义词。

在涉及文化领域的政治讨论中，那些从动员民众的政治要求推导出来的与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相关的问题最引人注目。与文化和政治统一或者说两者紧密联系的观点相适应，历史学家也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对文化发展的特点、任务和社会推动力量作出了不同的评论。1936年秋，有人发出了在文化领域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号召，这一号召引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参加关于如何评价新条件下的文化运动问题的讨论的兴趣<sup>〔249〕</sup>并且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工作也产生了重要后果。有人用“新启蒙运动”概念作为这个文化统一战线的标志，认为，新启蒙运动应当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意义上，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儒家学说——并同所有非理性的迷信和神秘主义思潮作斗争，同时，它也应该遵循建设性的目标，对中国的现在和过去作出比以往的解释更合乎实际、更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sup>〔250〕</sup>。这样，虽然把新启蒙运动放在法国革命的传统当中，但同时也希望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以此便把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规定为新运动的哲学基础了。

倡议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在文化领域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接受

后，情况才发生变化。艾力求与政治统一战线并行，建立一个文化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但是艾思奇把文化运动主要看作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来保卫祖国的运动。就其性质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继续履行着由辛亥革命开始的任务。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个运动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应当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它的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sup>[251]</sup>

1937年春天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坛上——何干之参加了这一讨论<sup>[252]</sup>——不同意见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文化运动既不是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纯无产阶级的，它是一个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所有爱国的哲学流派都可以公平竞争，不允许任何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sup>[253]</sup>。抗战初年，在中共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之后，关于文化运动的上述观点便汇入了更加广泛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之中。“新启蒙运动”概念后来虽然仍有提及，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文化运动的讨论中已不再发挥特殊作用。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使用了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术语。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三民主义的内容有不同认识，所以这一术语在某些方面既有解说能力，又需要重新解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那种出自新启蒙运动讨论的、用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概念概括的、既非资产阶级也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的定性分析便构成了一个共同基

础 在此基础上 必须说明运动的特殊标志。“共同基础”这个概念在此决非明确规定的有约束力的一致，而是一种私下默许的意见相同，它以历史学家的论述为基础，并从这些论述中得以重建。尽管有这种可以确定的一致，但在解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仍出现了不同的着重点，它们导致了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诸方面的不同意见。正如后面还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在侯外庐那里这一点表现在他的“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概念上，侯把批判继承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传统，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与这个概念联系了起来<sup>[254]</sup>。在有的人那里，关于文化运动的讨论集中于使作为世界文化的进步因素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华民族的现实的要求，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sup>[255]</sup>。而胡绳的反法西斯主义民主文化——它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紧密联系——概念则在这里采取了中间立场<sup>[256]</sup>。

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sup>[257]</sup>都以欧洲早期资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概念为出发点，并且希望批判继承它们的传统，以便在联系中国的传统因素的情况下，创立新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在侯外庐和胡绳那里意味着接受 1919 年五四运动传统（在侯那里还包括辛亥革命的传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文化——积极的进步因素。文化运动被设想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包含人文主义、科学和理性等等多种多样的思想财富。侯外庐和胡绳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性质和任务，把它纳入了文化领域中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有人也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概念为出发点，主张批判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但是，

运动的顶峰应当是“新理性”，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侯外庐则把领导地位让给孙中山哲学，由唯心主义的“精神战胜物质”口号加以补充。尽管在理论目的和论证中有这样一些不同，这些作家都一致主张，作为文化领域中的实际措施，必须大力普及世界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现实。就是说，使之中国化。

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具有以下特征，即它不仅发生在共产党人的讨论之中，而且也出现在与那些既是他们的政治对手又是他们的盟友的人的文化和哲学观进行辩论之中。属于这一类的首先有针对法西斯主义观点而展开的论战、对儒家学说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观点的批判分析<sup>[258]</sup>。关于这些讨论的情况，在此不能详细介绍。我只对自己研究过的那些历史学家的文化观作一论述。

### 5.3.1 侯外庐“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

1938年夏天，侯外庐编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小册子。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国民党在1938年4月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已为文化运动规定好了大方向<sup>[259]</sup>。根据这个纲领，侯把文化运动称作“三民主义的文化运动”。在此，他遵循孙中山的指示，把三民主义与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等同起来。但是为了抗战，他宁愿依照何思敬<sup>[260]</sup>，把文化运动更具体地规定为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sup>[261]</sup>。在侯看来，这个概念既表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又表现了特殊

的中国的性质，后者不仅存在于对中国历史最好传统的继承之中，而且尤其也存在于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传统的继承之中<sup>〔262〕</sup>。

这样一来，侯就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两条路线的结合了，一条是世界文化的国际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潮，一条是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的民众的启蒙运动<sup>〔263〕</sup>。同时，对于他来说，新文化运动也是两条路线的批判继承。一方面应当继承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革命传统，但是对于 19 世纪或者 20 世纪初在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已经陷入“自由主义”和“假人文主义”泥潭的民主主义运动却应当予以抵制<sup>〔264〕</sup>。只有还算得上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传统，才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运动有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的批判继承也只限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 20、30 年代的革命。侯之所以把这些运动看作革命人文主义的因素，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还具有进步性质，因为人民群众已经掌握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进步内容，并与反帝反封建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因此也超过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对于侯来说，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不仅具有批判旧世界的旧观念和继承旧世界好的思想传统的特点，而且也具有重新确立一切价值和发展新知识的特点<sup>〔265〕</sup>。对于侯来说属于“革命人文主义精神”的，除了继承进步的民主传统外，还有对俄国革命的

基本价值的高度评价和彻底实行民主，直至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sup>〔266〕</sup>。与其把文化运动理解为两大思潮的汇合的观点相对应，侯也把革命人文主义文化运动的任务规定如下：国际主义的任务首先应当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意味着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政治民主和人类历史的进步；特殊的民族任务应当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和开展法国大革命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而奋斗，这个启蒙运动要以彻底根除落后的中世纪残余即封建主义为目标<sup>〔267〕</sup>并对本国的传统持批判继承态度<sup>〔268〕</sup>。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理解为文化运动的主要理论<sup>〔269〕</sup>。由于这个学说增加了“精神战胜物质”的口号，所以人们就可以克服对该学说进行自由主义和妥协主义的解释的缺点了<sup>〔270〕</sup>。

侯外庐对文化运动的定性分析是以他对政治发展的估价等同样的理论观点为基础的。在此，应当把“革命人文主义”的概念看作是与他的“三民主义的民主”、中国“激进的民主道路”和“特殊的民主制度”等概念平行的<sup>〔271〕</sup>。“革命人文主义”最终是有选择地批判继承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传统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侯使用世界进步文化的“中国化”概念来说明这种继承<sup>〔272〕</sup>。在他的思想中，处于首位的是对把中国的文化运动纳入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运动之中的行为的强调，是对特别起源于欧洲的进步资产阶级传统的批判接受和对由孙中山发起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批判继承。在此，尽管承认民

族自卫斗争的政治优先权，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封建这两项任务在文化运动中仍获得了同样重要的意义<sup>〔273〕</sup>。

### 5.3.2 胡绳‘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民主道路’

胡绳早在 1937 年就对开展一场新启蒙运动的号召表示响应，他特别抓住了五四运动“思想自由”的要求<sup>〔274〕</sup>。他拥护启蒙运动反对盲目信仰和崇拜的理性，要求一种不是抽象空洞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正的理论”<sup>〔275〕</sup>。与“新理性”概念不同，胡绳认为，“理性”概念首先涉及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真正的理论”的概念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相吻合。所谓“真正的理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实践”在此被理解为那场动员了一切爱国者参加的民族解放战争。胡绳也侈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276〕</sup>，但他并不十分强调通过新文化来收容和完善民族传统的问题，而是强调它在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对于胡绳来说，新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理性、科学和民主，在此，理性主义是决定上述三个概念的中心概念<sup>〔277〕</sup>。

胡绳把抗战看作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指出这场战争是人类理性反对非理性的斗争，并且认为文化领域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sup>〔278〕</sup>。在他看来，这场以理性和科学为一方面，以非理性和反科学为另一方面的斗争，是国际国内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反映<sup>〔279〕</sup>。在理性主义这个中心概念

中，胡绳抓住了早在五四运动就已经被提出来的民主和科学要求。对于他来说，这些要求包含有学习资产阶级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的成分。然而，与当时的“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拥护者例如陈独秀和胡适不同，胡绳并不想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是只主张接受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已经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今天仍然是进步的<sup>[280]</sup>。

1945年以后，胡绳进一步接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立一种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民族形式的文化的<sup>[281]</sup>要求了。理性主义，这个他在抗战时期的思想的中心概念，明显地不再提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绳仍对于把文化规定为民族的分析——这种情况在毛泽东那里尤其突出——感到不充分，主张进行阶级分析。在他看来，那种把文化仅仅规定为“民族的”做法大都出现在抗战初期，并使抗战时期的文化概念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相反，胡绳强调说，必须区别进步的和倒退的民族思想，民族文化的进步内容是科学的，对于民族也是有用的<sup>[282]</sup>。他把科学思想等同于反封建思想，并且认为属于这一思想的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其他学派和流派，就是说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他把“科学”泛泛地定义为“从客观实际中探索真理”<sup>[283]</sup>，而“民主”或者说民主文化则是一种以人民大众为基准的文化，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种与农民相联系的文化，一种能为农民所理解，为农民所接受的文化。他把他那与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概念表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基本上是农民的解放，中

国的民主文化基本上也不能不是在农民解放途中与农民相结合的文化。”<sup>[284]</sup>

## 5.4 政治—意识形态观念 对历史科学的影响

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它为历史科学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规定了新的重点；(2)它影响着历史研究的方法；(3)它把历史科学纳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总而言之，历史科学在上述三个方面中的变化使它获得了一种新的主要以变革现实为目的的特性，这一特性可以在继承历史遗产的概念<sup>[285]</sup>下加以理解。

### 一、历史科学的政治作用

民族自卫、宣传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迫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高度具体的方式，按照无可争议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探讨历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30年代初，处于正在形成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虽然已经从理论方面说明了政治（等于党的政策）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联，但还没有付诸实践。现在，历史学家因（民族）政治的需要，被迫服从下列要求了，即依照个人的见解并为了自身的利益，使他们的工作承担起为这种政治提供论证并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这个新的、目的在于使历史和历史科学有益于民族政治的

任务的提出，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历史观。虽然传统的历史编纂也一直是政治的工具，但它主要是为现存社会关系进行辩护，传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便压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就其自我意识而言，承担了传播革命思想的任务，而这种革命思想能够使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历史，因此，它具有一种解放的性质。

这些新任务反映在历史学家的著述里：a)编写历史科学的普及读物；b)从当前政治任务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选择历史的、当代史的题目和课题；c)通过分析历史与当前现实的关系，或者分析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从理论上对历史科学的政治作用作出初步的解释<sup>〔286〕</sup>。然而，这个时期人们还没有把科学与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当作理论问题提出来。

## 二、历史研究的方法

历史学家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的中心因素是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统一，或者说密切联系的政治命题，与之相应，在理论层面上则有一种主张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的观点，而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并未超出适用于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范围。这两种观点都是历史学家从他们当前的具体关系中提炼出来并作为历史事件的解说模式加以利用的。而那些经过如此剖析的历史事件就有可能，而且经常是无意识地获得一种与传统的历史编纂的优先论可比较的功能。

### a) 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命题

列宁曾经最先断言在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并且在社会主义苏联已经存在的条件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争取民主的反封建斗争有密切联系<sup>[287]</sup>。这个反帝解放运动的纲领——其中，民族斗争和民主斗争被联结在一起——，是列宁为特定的帝国主义时代制订的，但是现在，它却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运用于中国的抗战，并被加以详细说明和论证。后来，它又作为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命题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被写进历史著作里。

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在选择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上，并经常导致一种把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看作同等重要的观点。民族的乃至侵略的战争被解释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就是说人们往往有意识地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或者把阶级斗争移置到民族斗争的层面上。这种混淆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做法具体表现为例如历史学家总是把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同时描述为社会改革家 或者相反 既谴责“卖国贼”和“汉奸”又谴责镇压人民的反动独裁政策。

另一方面，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命题也清楚地反映在理论上。在这里 民族的或者种族的因素——经常简称为民族或者种族——被含蓄地，或者也明确地当作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但是这种移位并不妨碍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 b) 特殊的中国道路的概念

早在 1926 年，斯大林以及在他之后的共产国际，就把中国社会的性质说成是与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的或者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所谓的阶级社会制度不同的。斯大林联系最近时期的中国革命提到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这个政权主要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是引导中国向非资本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过渡政权”<sup>[288]</sup>。对当前社会及其追求的社会形式的这种定性分析附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观点，只是在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条件下，才引起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关注。30 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否定了由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特殊的中国社会”的命题之后——因为这些命题在现存关系中意味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适应性的怀疑——现在历史学家在抗战的新条件下认识到：要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它的特殊性，二是它与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的关系。特殊和一般不再被理解为互相对立的了，而是处于一种普遍存在的联系之中。这一点就现实形势而言又具体体现在关于中国的特殊道路的命题之中，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在各国有不同模式和不同形式的观点。于是，历史学家提出了诸如“特殊的民主制度（侯外庐）”“中国自己的道路（何干之）”以及“不同的民主道路（侯外庐）”或者“不同的民主运动形式（何干之）”以及“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胡绳）”等说法。人们并不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命题的否定，而是把它们理解为在一

般发展内确定方位的尝试。一旦人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特殊的发展形式的命题，马上就把它与先前的社会形态联系了起来。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因此便受到特别关注。

### 三、把历史科学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的需要，中国历史的研究就被赋予特殊的理论形成的意义。虽然首先在一部分历史学家那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否定历史传统的立场仍决定着对于本民族历史遗产的态度，以致于他们只承认西方和中国不久以前反法西斯主义民主文化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为继承对象。中国历史总的说来作为一种至少应当部分地加以继承的传统，抗战开始之际只在个别人那里有一定地位。

对于有的人来说 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传统 这是中国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同时还是创造一种本民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传统正是为下列目的服务的，即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为本国历史科学或经济学的形成奠定基础。胡绳直到 1946 年 8 月都对这些观点极表赞同，他在回顾 1941 年以来历史研究的成就和关于中国化问题的讨论结果时讲道：

“原来要做到‘学术中国化’并不就是把一般性的学术拿来用‘中国化’的词句叙述一下，并充实以‘中国化’的例证。假如这样做法 那就

仍不免于是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真正要做到‘学术中国化’其先决条件乃是——姑且这样说——‘中国学术化’。中国这有了五千年文化史的古国，已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当前的现实中又充满着最错综复杂的事实材料。这许多经验和材料都还是被散乱委弃着，没有加以排成、整理、使之条理化，而形成理论。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材料理论化了以后，于是我们自然就可以做到理论的中国化。”<sup>[289]</sup>

在胡绳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把政治的优先权移置到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任务上去的做法是怎样随之转向本民族传统上去的。这个传统很快就变成可以被吸收、继承的历史遗产了，并且为了能够完成当前的政治任务，人们还必须以它为出发点。如果说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文章仍是在下列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即必须中断与传统的联系，并以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之中为重点，那么现在，传统的积极方面已经在历史遗产的概念下显露出来。现在，人们在参照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了本民族传统的特殊性，指出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被认为对于当前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并使之服务于抗战的政治任务。

尽管历史学家们的政治目的不尽相同，研究课题多种多样，但是我们仍可以在历史理论的层面上，在关于历

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继承本民族历史遗产的两大题目范围内，确定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于历史科学的影响。

## 6 掌握‘历史的合法则性’和继承‘历史遗产’——1949年以前主要历史学家著作中政治与科学关系上的两个基本点

在抗战的条件下，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在历史观和学术目的论方面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当历史学家力图为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确定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主体地位时，他们本人也成为政治发展的客体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影响。

这里首先应当提及那些直接产生于战争进程的发展情况。抗战初期，大多数历史学家生活在北平、上海和太原等地，但是随着日本军队 1937 年向这些城市的进犯，他们便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平民阶层成员一起，被迫离开这些城市，向西逃亡。范文澜、何干之前往延安并在那里协助共产党人创建宣传和教育事业。翦伯赞和吕振羽先是随军返回湖南；翦在一所由国民政府设立的师范学校任教，吕起初任中共党校副校长，继而又在中共华中局高级党校任教员。后来在日本人深入进军的情况下，两人又都离开湖南而前往重庆；

抗战期间 侯外庐和胡绳也在此地。就工作条件、图书馆、出版机会和学术交流而言，国民政府之临时首都重庆远不如北平或上海，单是经常性的空袭这种直接的战争影响就足以迫使许多城市居民，包括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不得不在城郊寻找住处。另一方面恰恰知识分子又深受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之苦，常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sup>〔1〕</sup>。

此外，具有进步倾向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不得不忍受由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当局所强加的政治迫害 即使翦伯赞、侯外庐<sup>〔2〕</sup>等人并不以中共党员面貌出现，而是作为“民主人士<sup>〔3〕</sup>活动和知名的。

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第一阶段中，历史学家起初还可以在一种与前几年相比政治自由较大的气氛中进行活动。他们既可以积极拥护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目标，又可以支持中共的革命斗争。这样，翦伯赞等人便与师范学校的进步教授和学生一起在湖南举行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爪牙”的斗争<sup>〔4〕</sup>。1939年夏天在国共两党军队发生了初次摩擦之后，“民主主义”历史学家政治上开始受到监视，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上。1941年初 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进一步恶化，对进步力量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日益加剧，所以中共指示重庆进步文化的创造者们“闭关”政治活动；“深入研究学术 提高业务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新的斗争做好准备”<sup>〔5〕</sup>。

出于同样的原因 1941年以后，一种大规模转向历史，特别是转向古代史的情形出现了，而关于抗战和民族

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却数量锐减。但是同以前一样，学术研究工作仍有很大局限<sup>〔6〕</sup>。所有历史著作同其他手稿一样，出版之前必须经过国民党严格的书报检查<sup>〔7〕</sup>。

胡绳把造成 1940 年以后，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时尚这个情况的原因归结为两大因素。其一也是主要的，根据国际形势和抗战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必须从历史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踪迹。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发现规律，揭示某些方面的事实，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另一方面，胡绳认为，转向历史研究也是“限制言论”，即国民党当局政治性的书报检查与迫害的一个结果。人们由于不敢公开谈论时局，所以便从历史上挑选一些事例，用影射的方法发表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发展的批评意见<sup>〔8〕</sup>。

不管怎样，重庆的“民主主义”历史学家仍在日益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工作，并在抗战的岁月里——正如徐文珊所说的那样——在他们不可屈服的精神和他们坚定的意志力基础上，取得了某些成就<sup>〔9〕</sup>。

胡绳是否想使他关于历史研究成为时尚的论述也适应于生活在延安的历史学家，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从某些方面来说，延安历史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比其在重庆的同事更差，他们必须努力为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例如图书馆、工作场所和出版机会等等。然而对于范文澜、何干之以及吕振羽——后者在 1940 年以后间或在延安停留过——来说，他们所处的环

境完全不同于重庆“民主主义”历史学家，他们的身份和政治地位更与重庆历史学家迥异。如那些一直与蒋介石政府直接处于对立状态的人们不同<sup>〔10〕</sup> 延安的历史学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共党员，属于边区中的统治阶层，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比如在 1942 年的整风运动中和 1943 年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运动中。早在 1940 年，“中国历史研究会”就在范文澜的领导下创立起来了。1942 年由中共领导批准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头两卷出版，该书论述了直到鸦片战争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它是第一部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写的大部头的中国历史著作，被指定为中共和中共控制区内教育机构的教材<sup>〔11〕</sup>。

与生活在重庆的同事们相比，延安历史学家被更牢固地统一到党的生活之中，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不同的侧重点上。他们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断，而毛泽东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的领导地位。与之相反 重庆的“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却更忙于与其在重庆或昆明的同事<sup>〔12〕</sup>进行学术讨论。这些专业范围内的讨论也具有政治意义，即使它们并不直接涉及政党问题。这样，在抗战时期，空间的分离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工作关系，不仅影响到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观点，而且对于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学术讨论和政治争论也具有重要意义<sup>〔13〕</sup>。

最后，由抗战导致的民族主义态度也对历史学家的

工作方法和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民族主义态度在抗战时期作为广泛的基本思潮居于支配地位<sup>[14]</sup>。它体现在所有知识分子身上，只要他不与日本人勾结。为了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爱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到处举行有关历史的讲演和科普报告，编写喜闻乐见的历史剧<sup>[15]</sup>。不过这种民族主义被说成是与旧的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不同的<sup>[16]</sup>。它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少数民族也有其固定的地位<sup>[17]</sup>。吴玉章<sup>[18]</sup>在1938年就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民族任务，他论述道：“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有力工具。”<sup>[19]</sup>抗战结束后胡绳曾对文化界的民族立场和那种特别是在战争初年只从民族立场出发把整个社会人为地分成‘忠’和‘奸’两大派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说它是文化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局限于民族的做法往往被排外及复古主义者所利用，它最终不会为本民族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损害民族利益<sup>[20]</sup>。

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当作一个轴心来论述，它是由两个方面的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历史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在历史理论方面，关于历史的规律性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一个中心，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课题之中。在政治方面则是历史科学工作的可用性问题首当其冲，它被理解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继承历史遗产是以历史的合乎规律性为前提的；事实上，这两个复合体只涉及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方面，其中，或者客观方面或者主观

方面被置于首位。从客观方面来说，历史的发展是合乎规律地进行的，而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们可以认识这个规律，并且，因为历史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所以人们只有认识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才能从无意识的发展主体变为有意识的发展主体。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两个方面才能构成一条共同的切线，该切线可以被称作历史科学的主要发展路线。下面将分别从实践和方法论对这两个复合体加以论述。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是 30 年代初在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讨论中已经涉及到的规律性问题的延伸。在早期的讨论中，参加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把关于中国合乎规律的发展问题理解为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一般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正如它在党的官方解说中，特别是在苏联科学工作者的解说中所呈现的情形一样。相反，现在处于首位的则是有关规律性问题的其他方面，这不只是内在的学术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新出现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所致。从理论方面来看，规律性问题被当作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而提了出来，人们致力于使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特殊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一个整体。

同时 由于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具体需要 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又以特别的规模转向中国的历史现象了，他们期望通过研究这些现象，得出对现行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动员民众的政治一意识形态工作应有的启迪。这就是把历史理解为历史遗产的问题，人们既可以继承这个遗产的

积极内容，又可以拒绝其消极内容，并使之有益于行动的确立。这种继承是以合乎规律性概念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理解同样是建立在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命题基础之上的，它恰恰在这一点上触及了传统的历史优先论。

## 6.1 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把中国的特殊发展纳入一般 的世界历史发展之中

在关于中国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的讨论中，中心问题是确定以世界历史发展及其一般规律为一方面和以具体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的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走出 30 年代早期形式主义的、抽象的讨论阶段而开始从事具体的、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工作之际，突出地表现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欧洲引入中国的，因此某些以欧洲材料为依据加工出来的历史发展原理便被当作一般的概念和一般规律而引入中国学术界了。它们作为一般规律的表述主要是在对欧洲历史进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没有充分考虑欧洲以外的历史，所以它们还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要求充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欧洲历史来说，这些一般概念和一般规律在个别发展阶段和个别历史现象中的具体应用相对而言尚无问题，

因为它们与欧洲历史史料之间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但是如果把它们运用到别的、欧洲以外的社会——例如中国——，而在进行一般性的抽象时又未考虑到这些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并且在当时缺乏具体认识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考虑到——，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就会以充满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很少作为哲学思考的结果，而是作为受苏联和日本的研究的影响以及对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的不满的结果而进入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的。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人们对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从事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所给予的重视；争论是由于更加紧密地联系史料并从史料中产生出来的。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一般的、合乎规律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发展则是这一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他们断然否定所有从所谓中国特殊的、唯一的发展中推导出来的种种观点，不管其论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传统民族主义的。但是，究竟如何把中国历史嵌入世界历史发展这个一般框架之中呢？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的见解不尽相同。

那些曾就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明确发表过意见的历史学家断言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与之相应，他们也要求对中国历史进行具体的研究，既要说明中国历史的一般性又要说明它的特殊性。在此，一般也被理解为共同（翦伯赞、何干之）和相同（胡绳），特殊也被理解为个别（翦伯赞、何干之）和不同（胡绳），而当他们把这些关于一般与特殊的认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时，他们的理论观点

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上：一方面古代中国（和亚细亚）的发展被理解为古典古代的“变种”（翦伯赞、吕振羽）或封建制的“变种”，在此希腊—罗马的，或者说欧洲的道路被看作是典型的，是一般的纯粹表现，或者说是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形态的纯粹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古代的或者整个中国历史的特殊的中国（和亚细亚）道路的认识，它最终把中国道路看作一般的合乎规律地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化，当然，在世界范围内，与这个具体化处于同等地位的发展道路还有若干。这样，对于何干之和侯外庐来说，希腊或者日耳曼的道路便与中国和其他可能的道路一起构成一般的特殊具体化，而在翦伯赞和何干之那里，两种观点的因素兼而有之。上述两种观点都可以与苏联和日本历史学家特别是柯瓦列夫和早川二郎联系起来。虽然有人，例如侯外庐，已经看到这些观点的不同之处<sup>(21)</sup>，但是这些不同观点所赖以出现的不同的哲学—理论认识却未被列举和突出出来。

正如在把一般与特殊范畴运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上有种种不同的做法一样，历史学家也针对一般与特殊的联系得出了不同的方法论结论。大家都把一般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但是一些人把特殊只理解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殊也可以包括从具体中国历史中获取的特殊的规律性。吕振羽，就早期言论而言也包括胡绳，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直接结合起来，而侯外庐和翦

伯赞，以及胡绳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则强调：必须先从具体的中国历史中抽象出特殊的规律，然后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与这些特殊规律结合起来。

这些不同观点可能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反映，该进程自 1938 年开始作为最早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呼吁而出现，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仅指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直到抗战结束之际，胡绳才提出必须以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化作为中国化的前提的主张。这一发展进程在胡绳的著作中明显可见，胡绳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发展而且还指出这是一个一般的发展<sup>〔22〕</sup>。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不同认识中有其等价物。人们往往把这两个范畴对子相提并论，甚至鉴于它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功能，把它们等同了起来<sup>〔23〕</sup>。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应当作为认识、研究和编撰历史的指南针来应用<sup>〔24〕</sup>。人们批评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因为他们只限于“搬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公式主义地步，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sup>〔25〕</sup>。他们只是机械地把某些理论套用到中国历史上，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地进行争斗<sup>〔26〕</sup>。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早期论战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内容方面，而是在方法方面。只有少量的讨论内容实际延续下来<sup>〔27〕</sup>，而其结论既不能说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论战的真正价值仅仅在于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sup>〔28〕</sup>。不过，它在方法论上却给予中国历史学界一个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关键<sup>〔29〕</sup>而且何干之说道 至少就亚

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而言，它为后来的解答奠定了基础<sup>[30]</sup>。这样，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与 30 年代初的论战划清界限，以便把关于一般与特殊的新认识转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或至少使之在历史研究中提出问题。在此，必须注意时间上的显著差别；有的人早在 1934 年就提出了一般与特殊的问题，而侯外庐却直到 40 年代才就此问题发表意见，并把他的认识写进一部关于古代历史的著作中。

这些新尝试不仅受到过苏联和日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著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过政治—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后者是在论证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形成的。斯大林在 1938 年断言的五个时期的模式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sup>[31]</sup>同毛泽东以此为依据而在 1939 年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评估<sup>[32]</sup>一样，都对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学家基本都接受了那种由五个时期模式所规定的框架；对此，人们可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窥见一斑。就是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分期或停滞性问题的意见也经常出现在讨论当中<sup>[33]</sup>。然而我们仍无法断定：个别历史学家之所以吸收这些意见，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或者是因为它们复原了中国历史的真相，这些历史真相也为历史学家所觉察？

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思考首先以“通史”的形式出现在实际应用之中；这种通史就其结构和作者的意图来说是要叙述自上古到当今全部中国历史的。但是，主要因为时间关系，若干计划未能进行到底，往往只叙述到秦帝

国的建立<sup>[34]</sup>。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一个例外 该书涉及了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时期 并且它还在 40 年代中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找到了直到 1901 年的继续。但是同先前一样 除了史前史 古代史仍是叙述的中心 它包括殷朝（公元前 16 世纪—前 11 世纪）和周朝（公元前 11 世纪—前 221 年）并且有的作家认为它属于奴隶制社会形态，有的则把它归结为早期封建时代。关于奴隶制在中国是否存在的问题和与之紧密关联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见，在新的讨论层面上，在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发展之中方面，仍是中心点。其他如国有制、地理条件、中央集权、村社制和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以后的停滞或者说缓慢发展等等问题也都在这—关系中得到了论述。而恰恰是最后提到的停滞性问题在此几乎已经可以要求一种独特意义了。

所有这些个别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联系起来考察和论述，因此社会形态概念处于当时论著的中心并非偶然。在这个范畴中，关于历史发展中的一般与特殊的论断被搞成一种方法上可以利用的原则。经济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联系框架，其中，某些个别的历史事实可以被放置到一般的关系之中，一般表现于特殊，一般与特殊相互转化。

所有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承认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是分析历史发展的理论概念。然而，在确定那些对于说明某一特定社会形态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方面又有不同意见。郭沫若所主张的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

确定社会形态的观点，遭到了一致反对。与之相反，而且大都是在公开批判郭的观点的情况下，一方面有人，例如范文澜，主张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和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剥削关系，是确定社会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侯外庐却认为，不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单个儿，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为决定性的标准。

历史学家也把空间的广泛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原则与社会经济范畴结合起来。他们的出发点是承认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五种社会形态的存在。只有何干之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进贡制等同起来，把它描述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说它是一个过渡阶段，并非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

在努力从中国的发展中找出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的尝试中，有两点大家意见一致。首先，人们都承认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次，到这个时期为止的中华帝国一直属于封建社会。但是在确定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的开始上却存在着不同观点。范文澜、何干之、翦伯赞和吕振羽把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定在殷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此外何也把公元前2205—前1766年的夏朝说成是奴隶制社会）殷代末期开始向封建制过渡，而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已经是封建时代了。与之不同侯外庐认为向封建制的过渡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才开始出现，周朝仍是奴隶制社会。除了何干之算是一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独立阶段，而是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追随苏联和日本的科学工作者，把它与奴隶制社会形态（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或与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等同起来。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种单独发展的表现的命题虽然普遍遭到拒绝，但是那些集聚在该概念之下的特殊现象却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一般的具体化而受到重视和研究。当然，各个历史学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历史学家看来，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首先是——与欧洲的发展相比——奴隶制发展的不完善，以及——同样与欧洲的发展相比——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有人称之为停滞。现在，历史学家试图说明这些历史现象，揭示它们的历史根源。他们从中国生产力发展比欧洲缓慢的基本论断出发，除了地理因素，还首先从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在后来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残存，从城市和乡村不成功的分离，从国家所有制和中央集权或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特殊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特殊的所有制关系造成了特别残酷的三重的剥削）的存在等方面入手探讨原因。例如有人推论说，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农民起义严重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论点，内战、民族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民运动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素。这些主要受抗战影响而形成的论点同涉及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论点一样，在讨论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

把战争和起义看成阻遏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继续发展的障碍的观点在下列看法中，即认为部族、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同样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找到了对应物。把战争和民族斗争称作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决非偶然。不过，关于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问题已经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的问题范围，这里不便展开论述。

下面要详细论述的主要是上述那些在历史理论和历史科学关系中被提出的对象。这一论述将按照作者区分，目的在于公正评价历史学家各自的发展过程和各种论著。在此，作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说明。

### 6.1.1 吕 振 羽

吕振羽最早是在 1930 年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发表他关于中国历史也按照一般原则合乎规律地发展的意见的<sup>[35]</sup>。他试图按照五种形态的图式划分历史时期，并把中国历史纳入人类历史一般的发展进程之中。他把中国历史分为原始公社制时期、奴隶制时期（商、殷，公元前 16 世纪—前 12 世纪）、封建制时期（公元前 12 世纪—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和到目前为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sup>[36]</sup>。他在后来的所有著作中都坚持了这个分期，但也把例如封建主义这个相当长时期进一步分为初期的封建制时代（周代，公元前 11 世纪—前 221 年）和“变种

的”封建制时代或者说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公元前 221 年—鸦片战争）<sup>〔37〕</sup>。在原始社会中他又区分了传说之中的尧舜禹社会和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启（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他是禹的继承者<sup>〔38〕</sup>。

1934 年<sup>〔39〕</sup>吕振羽发表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前史即到公元前 16 世纪的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sup>〔40〕</sup>。这部关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著作是计划中的四卷本中国社会史纲的第一分册，关于殷周时代的第二分册出版于 1935 年而第三、第四分册却未按原计划出版<sup>〔41〕</sup>。吕以中国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和仰韶各期的出土物为史料<sup>〔42〕</sup>。他的目标是：除了给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外，还要特别地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决未表现出本质的特殊，而是世界历史统一进程的一部分<sup>〔43〕</sup>。在此他从“历史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的观点出发明确地依据了摩尔根、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的研究成果<sup>〔44〕</sup>，因为他们已经证实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并指出了这一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上所表现的各主要特征的一般性<sup>〔45〕</sup>。吕似乎认为，对于这些发展规律的共同性不应因为他所主张的关于日耳曼人未经过奴隶占有制阶段的见解而产生怀疑<sup>〔46〕</sup>。

对于那些以某种方式赋予中国历史某些特殊性的理论，吕振羽进行了坚决批判。他拒绝波格达诺夫“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sup>〔47〕</sup>，尤其拒绝了由马札亚尔所提出

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存在的观点<sup>[48]</sup>。吕虽不反对承认国家水利灌溉系统的存在，正像某些以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的主张者（如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等人一样，但也只把这个水利系统当作特殊的地理条件的结果看待，而不是当作“历史法则的一般特性”的改变看待<sup>[49]</sup>。马札亚尔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主要有：土地国有、各自独立的小农村公社的存在和专制的、通过官吏行使职权的国家政权等等<sup>[50]</sup>，所有这些都 被吕断言为虚构，完全是由于“把辩证法的首尾倒置起来”而造成的。吕振羽指责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代表者把地主对土地的占有隐蔽在“土地国有”的名义下，把土地对农民的束缚隐蔽在国家的“永佃制”的名义下，把地主的阶级构成隐蔽在“官僚”的名义下，以便于最终可以说明既没有地主阶级，也没有农民阶级，自然也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发生，而且当前也不可能发生<sup>[51]</sup>。但是在科瓦列夫的著作的影响下，并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吕振羽早在 1935 年就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sup>[52]</sup> 背离了他先前主要出于政治动机而完全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有以某种方式与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现象的立场。现在他承认“土地原则上为国家所有”而且事实上以永佃制的形式分配给自由民<sup>[53]</sup>。总之，他承认他先前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是错误的<sup>[54]</sup>，不过，他仍然认为殷代是奴隶制时代，只是这种奴隶制未得到分发展，仍停留在初期阶段。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列举了殷代社会的七个特征：

(1)生产工具以及同时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被役使为奴隶的战俘，而战胜者及其阶级<sup>[55]</sup>则不再参加生产了；

(2)农业和畜牧业均已达到很繁盛的程度，手工业也部分地出现了劳动分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3)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其中父家长制支配形态是占主导地位的形态。土地原则上为国家所有，分配于各村社各家长<sup>[56]</sup>。这种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吕来说主要是种族所有制，它最终是父家长支配之下的私人所有制<sup>[57]</sup>；

(4)除了土地以外，所有其他东西包括奴隶和家畜都归私人所有，掌握于家长手中；土地被分配给每一个自由民家庭成员 事实上具有“永远”占有的性质；

(5)农村公社中的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已经是一种国家政权了，它掌握在僧俗贵族手中，并借世袭国王的名义去行使；

(6)自由民阶级包括贵族、中小奴隶主和下层自由民。下层自由民基本上是自己劳动过活的，他们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居中间地位；

(7)已经出现了文字、天文历算和艺术作品<sup>[58]</sup>。

概括起来，吕振羽断言：殷代社会一方面已经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同一个部族内的一个集团占据着支配地位，而奴隶和被压迫者则主要是从异族战俘中征募来的。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态的农村公社继续存在，它们是在氏族社会末期从氏族公社及其家

族公社演化而来的。就连被压迫的异族也还保有原来的氏族公社的组织形态。最后，吕明确强调，这样的殷代社会决不是一个特殊的中国社会，在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曾有过的类似的现象<sup>[59]</sup>。

在评论吕振羽 1938 年以前所发表的著作时<sup>[60]</sup> 翦伯赞说道 吕振羽“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的思想方法”，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之史的发展之阐明比较地前进了一步<sup>[61]</sup>。但是翦同时也批评吕振羽在论述封建时代时仍存在某种形式化。按照吕的见解，封建制每一期都包含着发展、繁荣、衰落，他虽然指出了各个时期中所存在的矛盾，也承认农民战争是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但在各个时期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相对形式化地论述了农民革命的展开、继之出现的地主阶级的妥协和复由某一新兴阶级之发展而转入繁荣时期。在翦伯赞看来，这种论述与“真正活的历史”不符<sup>[62]</sup>。

1940 年吕振羽重新认真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以及历史分期问题<sup>[63]</sup>。他比以前更富自我批评地对他原有的观点，特别是处理方法作了检讨。他认为他过去未从活的历史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分析出发，只知从经典作家的理论宝库中搬弄原理或公式<sup>[64]</sup>。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认识、研究和处理问题的指南针，但并不是具体的历史。只有在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有内容的历史研究，并使原理和具体研究两者互相结合起来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sup>[65]</sup>。现在他甚至说 当时他没有

对普列汉诺夫的观点<sup>[66]</sup>作出正确分析，也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科瓦列夫对中国历史的详尽论述<sup>[67]</sup>和他本人对古代印度及其他古代亚细亚国家历史的研究促使他在此期间修正了自己的观点<sup>[68]</sup>。他明确承认中国殷代（公元前 1766—前 1122 年）“亚细亚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他在科瓦列夫的意义称这个亚细亚社会为‘古代东洋奴隶制度的‘变种’’<sup>[69]</sup>并同科瓦列夫一样把它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起来<sup>[70]</sup>。在吕振羽看来，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古代生产方式决不是机械的等同在此他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过的同样的等同为例证的<sup>[71]</sup>。他据此也驳斥了何干之 1937 年对科瓦列夫所作的批判；何批判科瓦列夫视古典奴隶制和东洋奴隶制为两个范畴的观点为“机械观”<sup>[72]</sup>。但是吕也没有采纳科瓦列夫关于封建主义东方变种的存在观点，因为他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具体的中国历史<sup>[73]</sup>。

吕振羽选出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已经阐述过的三个因素，不仅仅作为中国历史，而且也作为整个‘东洋奴隶制度的‘变种’’的主要标志：(1) 土地国有及中央集权。(2) 两种形态的公社，即统治种族的农村公社，在其内部存在着以奴隶主和自由民为一方面与以奴隶为另一方面的阶级对立<sup>[74]</sup> 被统治的异族氏族公社 在其内部存在着以氏族首长为国家代表和收税吏的原始氏族公社组织。第一种形态是主要的形态<sup>[75]</sup>。(3) 治水和‘公共事业’由国家承担<sup>[76]</sup>。

吕把这三个因素看作古代东洋各国并且不只限于中国的“独特的特征”与希腊、罗马典型的古代社会大不相同<sup>〔77〕</sup>。然而对于吕来说，它们只构成亚细亚社会一个方面的内容，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其“发展的不完成性”基础之上的。按照吕的意见，亚细亚社会的本质方面同先前一样，是社会的阶级构成<sup>〔78〕</sup>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点本质上是与希腊、罗马社会相同的。奴隶不仅承担了各种国家杂役和在贵族的家内服役而且广泛地参加农业、手工业、牧畜、商业和交通等生产事业<sup>〔79〕</sup>。

吕振羽详细阐述了与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度不同的作为“奴隶制度的变种”的古代中国社会的内容但也招致了何干之等人的批评。何指责吕虽然已经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指出殷代的奴隶制度不曾发展得“像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那样灿烂光华”，但却未作具体说明<sup>〔80〕</sup>。何在同一著作中虽然接受了吕在《研究》中所阐述的下列观点，即欧洲封建社会是由“罗马的世界原理”和“日耳曼的世界原理”相合流而形成的<sup>〔81〕</sup>但却反对日耳曼人当中未有奴隶制度存在的结论，反对那种由此推导出的关于该社会里存在着“变则”的命题。在何看来这种观点的主张者没有看到世界历史的全貌<sup>〔82〕</sup>。

按照吕振羽的见解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相关联的便是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因为历史学家经常从“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中寻找产生这种停滞性的原因<sup>〔83〕</sup>。早在1937年吕振羽就研究过日本历史学家佐野

袈沙美<sup>[84]</sup>的《中国历史读本》并且指出后者所谓中国自清朝至鸦片战争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亚细亚社会的理论是怎样为论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性服务的<sup>[85]</sup>。他认为，就连日本科学工作者秋泽修二的中国亚细亚社会观点——吕在1940年对此进行过研究——也是为使日本当前侵略中国的政策合法化服务的，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秋泽修二从中国社会特殊的亚细亚形态引申出停滞性的特征，并使这个“停滞的”中国和“前进的”日本对立起来。据说，当前的军阀统治就是停滞的政治支柱，只有日本进军中国才能使之灭亡并且开辟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sup>[86]</sup>

吕振羽承认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但他强调它决非停滞不前或者作循环运动。他把秋泽修二所宣扬的由日本法西斯来创造一个“亚洲新秩序”的主张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且以此达到了讨论的政治层面。吕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促进中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相反，日本的侵略将阻碍这一发展，使之停滞不前<sup>[87]</sup>。

1934年，吕振羽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而对某些被人挑选出来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历史现象予以了简单否认。但是现在，在1940年，他不再否认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比较迟缓”了，这一点并不因有关中国社会停滞性理论的政治含义而受到影响。吕肯定发展迟缓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他要求用“迟滞性”术语替代具有政治色彩的“停滞性”概念<sup>[88]</sup>。

在吕振羽看来，封建时代中国社会所谓的停滞性是由国家、地理条件和人口增长等某些特殊性造成的。否认这些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体的历史，就会堕落到公式主义或原理论。相反，夸大这些特殊性就不能把握历史的规律性，就会堕落到主观主义和多元论。因此，他强调这些特殊性并不触及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肯定人类社会遵循着一般规律，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但并没有预先规定各个阶段时间的长短和发展速度的快慢。中国的封建时代或许比其他国家为长，但是同时，中国的封建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sup>[89]</sup>，吕详细列举了四个原因来说明封建时代中国发展的相对缓慢<sup>[90]</sup>：

(1)在每次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以后在战争地区出现的大规模民族迁徙，一方面导致原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了破坏的生产因人口减少很晚才能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则导致新迁徙地尽管逃亡者的生产知识和生产经验都比较先进但由于缺乏设备等等，同样很晚才能达到原有的水平。这样，由于战争和民族迁徙，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得到缓和，因为生产力不断地在发生倒退，另一方面生产的连续发展也不会发生。

(2)历代外族如元（蒙古人）和清（满洲人）等入侵入主中国，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的生产者遭到屠杀，耕地变成了牧场，科学和技术研究也蒙受了危害。残酷的政治压迫制度同样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者和农民在苛重的负担和约束下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因此，商

业资本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手工业与农业直接结合——它们在沉重的压迫下无法分离——也阻碍了新的生产方法的形成。此外，按照吕的意见，一般的专制统治与过苛的封建榨取（即由本国统治阶级而不是由异族施加的压迫）在阻碍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附次的作  
用”。不过，吕是联系过大的军费开销、输纳和苛捐杂税等等统治者为了联合抗击外国侵略者、抵御他们的侵略而提高的税收，来解释这种压迫的<sup>[91]</sup>。

(3)在封建时代，中国四周各民族的生产都比中国落后。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封建贵族、官吏和地主所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超出了他们的胃口和他们的宗族能够消化的程度时，便必然逐渐出现挥霍浪费的倾向，以便使部分剩余物消费掉。因为不能通过与邻近居民的交换而得到满足，自秦朝以来虽然已经开始了与欧洲的交流，但地理位置和其他条件仍使之严重受阻，这样，国家的手工业企业便形成了，它们专门为贵族、官僚和地主生产。这就损害了私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削弱了商业资本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也损害了农业的发展<sup>[92]</sup>。

(4)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国际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sup>[93]</sup>。

吕再次强调，中国的这些特殊条件虽然阻碍了发展，但不能改变或阻止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进程。鸦片战争以前既没有“静止”、“退化”，也没有“复归”或者“循环”而是螺旋式的前进<sup>[94]</sup>。若无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可能早就发

展起来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可能早就完成了<sup>〔95〕</sup>。尽管发表了这些论述，但吕振羽本人在同一年仍坚持认为，关于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大进展<sup>〔96〕</sup>。

1940年吕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问题的文章。在这里他所论述的重点已不再是中国也经历过奴隶制阶段，在他看来，这一点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了，而是总结他的主要论据，再次论证殷商是中国史上的奴隶制阶段的观点<sup>〔97〕</sup>。他首先对郭沫若和早川二郎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前者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断定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0年）是奴隶制社会并把它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起来，东周（公元前770—前221年）以后为封建社会。1937年郭沫若又改正了这个观点，现在他称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则是封建社会。早川二郎则与雷哈德的结论相应，把周代说成是奴隶制<sup>〔98〕</sup>。吕振羽力图根据他本人对中国古籍的独特解说，驳斥郭沫若和早川二郎的观点，但他最终并非不以斯大林的权威为依据。后者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社会中农奴制度的特点<sup>〔99〕</sup>。

吕振羽早在1940年就概括论述了他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诸问题的认识。首先他详细论述了历史研究的任务，并把“究明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放在第一位。按照他的意见，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的“合

法则性’的规律恰恰在最近 10 年间被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诸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辅助学科所充分证实。一般就是基本确定的原则，但是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之而受到怀疑。吕振羽既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和观念论的实验主义等流派”，他们歪曲或者不承认历史的规律性，也反对“经济主义者”，他们虽然承认规律性，但却从一般出发否认历史的特殊性。

与之相反，吕振羽主张在一般的基础上认识特殊，从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统一出发。他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是：应当比较世界历史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奴隶制一般的必然现象，同样也不能把中世纪欧洲社会看作是封建主义一般的必然现象。吕的出发点是：当人类史开始进入到氏族制以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其他外在诸矛盾就显著地给予世界史各部分以各自的特殊性”〔100〕。然后他特别把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称作中国的发展进程的一个特殊性〔101〕。

在以后的著作中，吕振羽没有超出这里所概述的关于一般与特殊在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过程之中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水平〔102〕。然而如果不对他以后直到 1949 年所发表的其他著作作一介绍，本节还是不能结束。在这些著作中，吕振羽或者重复先前对有关问题的主张，或者以它们为已经明确了的前提。

1941 年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出版了 该书包括

到清朝末年（1840年）为止的中国历史时期<sup>〔103〕</sup>是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编写的教材。吕振羽在该书里同样想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过程来把握，而他自己1934年以来的所有论著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然而他在此要避免“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在内容方面要讲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不只限于汉族的历史，要避免传统的大民族主义观点<sup>〔104〕</sup>。与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5年）不同，现在他在这部简明扼要的《通史》中把重点放在对每个朝代“分析总的形势特点”、“检讨其时的方针政策”上<sup>〔105〕</sup>。实际上这部《简明中国通史》是他在1940年所总结的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殷周时代中国社会》一书的成果的通俗改写<sup>〔106〕</sup>。

在他发表于1940年以前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论述的中心<sup>〔107〕</sup>而在《简明中国通史》中，重心转移到论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上了，转移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那种特别在1948年作过许多补充的第二版中清晰可见的过分强调历史上的民族因素或者说种族因素的倾向，在关于历史遗产的一章中得到了极力发挥，即使这里明显形成的关于中国的发展的原理——正如吕振羽对它们所作的加工那样——对于处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自有其价值。就是1943年吕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以十分通俗的形式表述了他关于中国从原始社会到南北朝时期（589年）的历史发展的论纲，它们同样对中国社会合法则发展问题少有兴趣。

趣而侧重于当时的政治争论和历史遗产问题<sup>〔108〕</sup>。

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早在 1940 年就得以再版，前者作了大幅度修改，而后者只在风格上有所变动。为了使《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作为中国社会史第一册的特征更加显著，吕把它更名为《中国原始社会史》<sup>〔109〕</sup>。这部《社会史》后来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起在 1947 年作为《中国社会史纲》的第一册和第二册重新发表<sup>〔110〕</sup>但是作为《社会史》第三册的“中国专制的封建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写作计划却没有实现<sup>〔111〕</sup>。

最后还要提一下 1948 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在这本书中，吕叙述了中国各较大民族从起源到当前的历史<sup>〔112〕</sup>。在此，他再次对他原先所主张的历史分期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自 1930 年以来他基本上没有改动过这些观点。现在他承认，人们必须在新的史料和历史科学发展的新水平基础上，修正过去的论断<sup>〔113〕</sup>。

### 6.1.2 翦伯赞

同吕振羽一样，翦伯赞也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sup>〔114〕</sup>，尽管也未居显要地位。他对于中国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进程问题的观点，内容上、方法上都与吕振羽的观点一致。他同意吕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古代东洋奴隶制度‘变种’”的观点。不过他在理论上更加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坚实的历史

理论根底后来导致翦对他的同事的某些论述和工作方法部分地提出批评，尽管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的一致意见。

早在 1931 年翦就指出：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度和封建主义诸社会形态，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的‘合法则’性也适应于中国<sup>〔115〕</sup>。他据此提出的分期建议在 1938 年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成为他在 1944 年和 1947 年出版的《中国史纲》的基础。这些建议大体上与吕的建议相同。在《史纲》中 翦称殷代为“古代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形态。他还把封建社会分为若干阶段，从西周到战国末期（公元前 11 世纪—前 221 年）是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秦汉时代（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20 年）是封建社会的中期阶段。同吕振羽一样，翦也把母系氏族社会定在尧、舜、禹时期，但他又认为早在神农帝时代，甚或更早，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开始了<sup>〔116〕</sup>。在编写《史纲》时他认为关于分期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一方面同以前一样人们对殷代和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仍有争议，另一方面关于封建社会也未出现普遍承认的分期意见<sup>〔117〕</sup>。

完全同吕振羽一样，翦伯赞也明确反对主张中国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并且批判了那种断言中国没有奴隶制，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见。他在 1936 年对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列夫的观点表示赞同。科瓦列夫曾于 1934 年在其《古代社会论》一书中承认东洋社会有其特殊性，他也愿意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他在其中看到的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古代东洋奴隶制度的变种”<sup>〔118〕</sup>。按照翦伯赞的意见，科瓦列夫的这个命题不只

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的运用，而且也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科瓦列夫引用新的事实，推翻了先前机械论者和诡辩家的庸俗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解决了所有值得怀疑的重要问题<sup>〔119〕</sup>。

翦在 1937 年也对否定中国存在封建社会的种种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在他看来，属于这些理论的有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灭亡和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陶希圣）、马札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sup>〔120〕</sup>、专制社会的理论（胡秋原、王礼锡）<sup>〔121〕</sup>和关于一种特殊的超阶级的“士大夫阶层”的存在的理论。这是由某些‘资产阶级官僚’在错误解说瓦尔加所使用的概念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理论<sup>〔122〕</sup>。对于翦伯赞来说，封建制度在中国的存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曾经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存在，有地主、农奴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的存在，对农奴和农民的剥削是由于他们剩余劳动的产品被统治者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所占有这种方式而造成的。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则是封建主义的政治形式<sup>〔123〕</sup>。上述理论因为没有正确认识阶级关系，所以才有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牵连的情形<sup>〔124〕</sup>。在这一年的另一篇论文中，翦开始涉及历史理论问题。他特别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按照他的意见，在这两种方法中反映了整个社会中的利益对立<sup>〔125〕</sup>。

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哲学的阐述，这两大题目构成了翦伯赞于 1938 年发表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重点。翦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遗留下来

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教程》的历史方法基础<sup>〔126〕</sup>。一方面他从政治原因出发希望“彻底地澄清”错误的历史理论，揭露民族统一战线中“有害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恰恰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际斗争的指导，所以要以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为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奠定基础。以往的历史理论大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理论脱离实践，或者沉溺于“刻板的公式主义”或者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sup>〔127〕</sup>。因此，翦编写《教程》就是要为以后编写中国历史创造必要的历史理论基础，他也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sup>〔128〕</sup>而他本人后来就是在由《教程》所奠定的基础上编写《中国史纲》的。

对于翦来说，历史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它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范畴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规律最具体的现实”<sup>〔129〕</sup>。如果要认识这些发展规律，那么，按照翦的意见，一定不要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中寻找，而是要在历史本身中寻找。对此，翦要求“一种新的历史科学”。不难发现他在此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按照翦的意见这个“新的历史科学”具有以下四项任务：(1)以辩证唯物论的火炬去照明隐蔽在历史科学领域之内的诸敌对倾向；(2)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消灭站在劳动大众对面的那个阴影；(3)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阶级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联性；(4)使历史科学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sup>〔130〕</sup>。

在《教程》中 翦比较细致地讨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的基本命题和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这个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部《教程》。按照翦的意见 合乎规律性原则，这个从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中引申出的一般性结论，又来说明并指导历史的具体性和规律性。它涉及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结构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另一形态的转化之一般的法则及其特殊的形势<sup>(131)</sup>。翦说道 自马克思以来“历史的发展是服从种种一定的客观的法则”这一点便十分清楚了。这些法则既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绝对理性”或“神圣预启”而是被抽象了的、被综合了的、被思考了的实践，是全部人类具体历史之抽象的说明。作为这些法则的典范，翦列举了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都经过氏族社会才转化为阶级社会，或者人类的两性关系都在经过杂婚、普那路亚、对偶婚才进到所谓“一夫一妻制”等等事例。除了一般法则，历史学家也必须重视特殊形势，因为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基础上，在相互交替的发展阶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特殊性。一般法则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由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法则决定的。翦首先是从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后果方面来看待这种辩证关系的：历史学家不仅要从多种多样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特殊也存在于“合法则”性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同时研究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的特殊法则 虽然这些特殊法则“从属于一般法则”但它们却又正是“各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

机”。对于翦来说——在此他也是以列宁关于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为依据的——，历史中决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象，奴隶制度在希腊和在罗马就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形态。因此每一种一般自身都包含着特殊<sup>〔132〕</sup>。

翦把这种如此被理解的关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的一般的辩证规律运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从中引申出‘历史的关联性’概念<sup>〔133〕</sup>。他把关联性概念理解为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sup>〔134〕</sup>。联系时间关系 翦把历史定义为‘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的运动，一切依次继起的历史状态不过是“一大历史运动行程中诸历史阶段相续发展的诸过程<sup>〔135〕</sup>”。联系空间关系，翦特别强调了各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交互作用，指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浸润，深入探讨了每个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历史上自发的东西与外来的东西的相互交错过程<sup>〔136〕</sup>。翦详细分析了历史科学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中诸阶段的相续性和历史发展之空间的关联的认识<sup>〔137〕</sup>。他在《教程》中已经初步论述了他把一般与特殊当作历史中的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来理解的观点。他援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强调指出 奴隶制是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之独特的经济范畴，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一般社会体制，它总是出现在氏族共产社会之后<sup>〔138〕</sup>。对于那些或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东方社会之一独特的社会形态(普列汉诺夫、马札亚尔、李季)或者看作人类社会 development 过程上之前阶级社会的一般形态

(杜布罗夫斯基、哥德斯、秋泽修二、早川二郎 等种种观点 翦均表示拒绝<sup>[139]</sup>。他批判普列汉诺夫没有正确处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把古代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法则对立了起来。他也反对哥德斯，后者在 1931 年在批判普列汉诺夫和马札亚尔时，虽然从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出发具体说明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并把东方的历史作为一般的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去研究，但他在人类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没有看到特殊性，因而也忽略了东方社会曾经显示出来的不少特殊性的情况。这是由于把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内容对立起来而造成的<sup>[140]</sup>。

此外，翦也否定了那些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的观点。他说 这些观点的代表者“拘泥”于马克思的“文字”；“不管真实的历史怎样”；“拘泥”于马列两氏的“片断文句”；“忘记了史的唯物论之整个的理论”<sup>[141]</sup>。但是翦同样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此，马克思把古代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与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并列在一起。翦遂以这段话为证据，解释说，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古代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与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处于同一历史阶段<sup>[142]</sup>。翦本人还再次明确表示同意科瓦列夫的观点，即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阶段，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阶段相对应的。这种属于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社会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古代埃及、俄国、日本、印度和中亚细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以外的一种普遍

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sup>〔143〕</sup>。同古代东洋的奴隶制具有其特殊性，即奴隶只为其主人和主人家庭生产（翦在这里称之为“家内奴隶制”）的情形一样，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也有其特殊性，它们的奴隶既为其主人也为市场生产<sup>〔144〕</sup>。翦的出发点仍然是，不论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形式还是东方奴隶制形式，它们都只涉及一般的两个特殊特征。翦在采纳科瓦列夫的观点方面与何干之有所不同，何认为科瓦列夫是把希腊罗马的形式看作奴隶制的一般类型的体现，而亚细亚形式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sup>〔145〕</sup>。而且翦也因此与他在《教程》前几页中所讲的话发生了矛盾。在那里，他完全同科瓦列夫一样称亚细亚奴隶制是“变种”<sup>〔146〕</sup>。不过，他的本意在于强调科瓦列夫正确地把握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既不片面突出特殊，也不片面突出一般<sup>〔147〕</sup>。据此，翦不仅同吕振羽一样接受了科瓦列夫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的奴隶制问题的观点，而且也从马克思主义一般与特殊的范畴上对这一接受作出了论证。

翦伯赞坚决反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的观点，他只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比较西欧国家缓慢。在这个问题上，他部分地同意苏联学者鲍格呵夫<sup>〔148〕</sup>的观点。后者曾把中国封建社会划为六个发展阶段，并断言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封建主义之进一步的发展<sup>〔149〕</sup>。鲍格呵夫在解释中国社会几经反复的规则性时说，中国社会未曾经过劳动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地租形态。对此，翦只能表示部分地赞同，他与鲍格

呵夫 也与何干之<sup>[150]</sup> 不同 主张中国曾经存在过货币地租。此外，他还指出落后民族的经常入侵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速度缓慢和封建制度不断再生产的原因<sup>[151]</sup>。

在探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中的表现之前 应当简要介绍一下这部《史纲》的特点。翦在《史纲》的头两卷中——计划编写的其他几卷并未以这种形式出现——详细论述了中国史前史、氏族社会史和古代社会（殷代）史、封建社会早期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诸时代）史以及——在第二卷中——封建社会中期（秦代和汉代）的历史<sup>[152]</sup>。在简要介绍了包括官修史书、儒家经典著作、考古发掘报告直至由斯坦因发现的敦煌文书和汉代的画像石等等使用过的史料之后，他又对这些时期作了一个系统的概述。在章节划分和叙述方法方面，他遵循了他在《教程》中所发挥的方法论原理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史的唯物论，从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基础出发，把上层建筑的发展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变化上。生产力的发展——它在第一卷所占篇幅比第二卷大得多——、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论述。他把各时期新生产方式的载体与种族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征。在翦看来 殷族和周族 最后还有封建社会中期阶段的开创者——秦族 都是在军事冲突中余留下来的胜利者，正是他们为社会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sup>[153]</sup>。

翦伯赞极力避免在《史纲》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该书中从未出现——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

问题发表原则性的论断或争论意见。他只试图根据现有的史料叙述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sup>[154]</sup>的发展；“历史是具体的”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公认的定理<sup>[155]</sup>。但他在论述中有意套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阐述过的原理，例如他花了很大气力来证明：在殷代，随着国家和私有制的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也出现了，正如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所描述的情形一样<sup>[156]</sup>。

《中国史纲》被美国汉学家邓嗣禹评论为“有雄心的尝试”；“翦先生好像蔑视他所有的前人，但是他的著作的确构造得很好，有一些新思想。”<sup>[157]</sup>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内容完整的好印象，主要是因为翦伯赞时间和空间的关联性思想，它作为一般与特殊原理在历史发展上的应用，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部《史纲》，这就很容易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了。翦在叙述中也经常搬用他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所列举的事例<sup>[158]</sup>。他一方面强调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按照一般法则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序列。例如他论述道“中国必须经历‘古代社会’阶段，即奴隶制，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封建制之直接前提，即大土地所有与个人化的生产<sup>[159]</sup>”。他把所有制看作确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核心范畴<sup>[160]</sup>。按照他的观点，土地所有关系的改变在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必须经过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中国来说，翦指出了以下几个阶段：(1)氏族社会中全体氏族成员共同所有的阶段；(2)奴隶制时代氏族所有与部分由此产生的国家所有同时并存的阶段；(3)周代从氏族所有中发展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国家所有与从

奴隶制国家所有中发展起来的领主个人所有同时并存的阶段；(4)新的所有形式阶段，即商人和地主的所有，不过它就其名称而言还是领主所有。这种所有形式直到春秋末期才出现<sup>[161]</sup>。

从以上对所有形式的列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翦是从中国历史的某些现象中，选择例如国家所有的存在或者氏族所有在经过氏族社会阶段之后的继续存在作为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的，不过，与中国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性相比，这些特殊性毕竟是处于第二位的。另一方面，翦也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了，他试图以此来显示中国与世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联系，他把中国理解为全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国各部族又是全中国的一部分。这种纳入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首先翦运用了对比，例如他把在公元前 1760 年左右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黄河边出现的三大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和中国，说成是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sup>[162]</sup> 或者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公元前 3 世纪的中国、印度和罗马三个国家当作“世界历史的三大主动力”来论述。其次翦也具体地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世界的结合，并因此例如把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7 年）的历史纳入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发展之中<sup>[163]</sup>。在此，正如他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已经从理论上论证过的情形一样，他从世界历史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出发，并且突出了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他特别赋予东汉时期（25—220 年）的历史以重大意义。当时从中国历史的整体中有若干“碎片”被抛掷

了，即大月氏和北匈奴，它们后来成为中亚或者西欧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sup>〔164〕</sup>。

翦伯赞不仅从一般与特殊方面来看待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而且也把一般与特殊的范畴转用到中国历史自身。在此，他把整个中国视为一般、共同，而把中国内部的各个民族视为特殊、个别。他在共同运动和个别运动的交替中把中国历史理解为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发展。只要汉民族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的地位未因内部的动乱而发生动摇，只要它的历史力量尚未丧失，那么历史的共同运动就会发生。然而，一旦汉民族由于内部的动乱而趋于衰落，并且丧失了它的历史力量，那么中国历史的共同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出现的只是各个民族的运动，个别的运动。按照翦伯赞的意见，在这种共同运动和个别运动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历史发展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它的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sup>〔165〕</sup>。

空间的关联性命题在翦伯赞那里是与他把人民群众看作世界历史发展或者中国的发展的主动力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早在1938年在论述历史的空间关联性时，翦就事实上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等同起来了<sup>〔166〕</sup>。

与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即必须从人类历史的整体中抽象出这样的法则的认识相对应，翦伯赞也特别确立了他从中国历史抽象出来并加以一般化了的的历史法则。他不论在《中国史纲》还是在其他论文，都突出强调了下列特殊法则，即在专制君主和腐败政府的统治下，

小所有者和知识分子总是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先锋倡导改良运动的。但是这种改良运动注定要失败，随后便必然发生人民起义<sup>〔167〕</sup>或者说农民起义<sup>〔168〕</sup>。他在《史纲》中是如此表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农民叛乱总爆发的前夕，往往出现士大夫的政治抗争。士大夫的政治抗争，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只是要求政治的改良以挽救这个政权<sup>〔169〕</sup>。

翦伯赞还以下列历史现象，即中国国内动乱的出现总会引起外部入侵，作为另一个特殊法则<sup>〔170〕</sup>。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些法则的确立在历史学家努力使中国历史理论化或者说科学化的范围内是有其意义的，它是历史科学“中国化”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翦又发表了一篇历史理论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1938年提出的观点。首先在历史方法的定义方面他把重点放到了与《历史哲学教程》中的重点不同的地方。他在1938年形式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遗留下来的“辩证唯物论”理解为历史方法，现在他从内容上把历史方法定义为：“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与之相应他把历史学家的任务表述为：“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sup>〔171〕</sup>他重申他关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基本命题，并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使之具体化。他再次要求研究中国历史应当包括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民族，必须彻底抛弃传统

的大汉族主义。同时，他也呼吁把中国以外的世界结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并且强调指出：

“当我们研究中国史的时候 不应强不同以为同 但同时 也不应因为形式上的不同而遂怀疑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翦举例说，殷代的奴隶制

世纪才开始出

伯赞身上特别清楚地表现

起来，从这种结合中便可以产生出“中国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但是翦伯赞、胡绳也一样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如果我们现在把他对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的认识放到马克思主义上的话，那么他所追求的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法则与那些已经从具体事实上获得的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法则结合起来，最终——胡绳和侯外庐也如此——是在理论层面上的结合，而不是把外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sup>[176]</sup>。

### 6.1.3 何干之

何干之早在 3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历史问题了<sup>[177]</sup>。他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发表了三篇比较大的论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他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观点<sup>[178]</sup>，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历史学家早川二郎的著作为依据的，但并没有把后者当作史料而予以特别强调。另外两部出版于 1937 年的著作《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从书名上便可以看出主要是对 30 年代初期同样名称的论战的综述和对论战中各派观点的评析。何干之主要是通过评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日本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的发展的论述及其命题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与吕振羽和翦伯赞不同，他没有亲身做过史料研究工作，就是后来他也不是通过研究史料来论证或深化自己的观点的。他所拟定的编

写一部中国通史<sup>〔179〕</sup>或者说编写中国思想史、中国奴隶制度史和中国启蒙运动史的计划<sup>〔180〕</sup>基本上未能实现。这也是由于 1937 年年中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导致的；他只完成了上述最后一部著作的写作计划<sup>〔181〕</sup>。

何干之承认历史的发展是合乎规律的，承认中国历史是这个合乎规律的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与吕振羽和翦伯赞的观点一致，然而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他与吕和翦的看法不同：其一，如何确定那些属于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的社会形态？其二，如何具体地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此外，在方法论上，他也与吕和翦的观点颇有分歧。

何干之曾经在若干地方声称，在关于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度、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历史学家当中存在着很大的“混乱”<sup>〔182〕</sup>。然而他也没有成功地澄清这种混乱。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停留在次要的分析的层面上，所以他的论述和他对其他历史学家的评论经常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sup>〔183〕</sup>。与本论文有关的主要是何干之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早期社会形态的界定与确定的论述，特别是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包括他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思考。他的核心思想是形成于 1937 年的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介于氏族社会和奴隶制度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的命题，而这个命题很大程度上是从早川二郎那里得来的。对于何来说，这个过渡阶段属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连续时期”，这就意味着何把该形态的存在看作有一般约束力的了。

据我所知，何干之最早的分期建议出自 1936 年，但是这些建议只给出了一个粗略的划分：夏代（公元前 2205 年以前）以前是原始公产制，夏代和殷代是奴隶制，自周代起开始了封建制<sup>〔184〕</sup>。大约一年以后，何对这些建议作了修改，并使之精确。现在他说，殷代以前的社会是亚细亚社会，殷代和西周时代是奴隶制阶段，东周时期是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而自秦代起便可以称作封建社会了<sup>〔185〕</sup>。

1936 年何也表述了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的思想。次年，他在分析苏联、日本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的时候，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这些基本思想，并视之为一个在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问题的讨论中达到的“粗大的轮廓”<sup>〔186〕</sup>。何干之没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出明确的分析，就已经在 1936 年着手研究那些与希腊—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不同的中国历史的现象了，他在这里提出了，一年以后他又联系和区别其他观点重新提出了这样的基本问题：即中国奴隶制发展的不完全和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对于手工业的压迫作用。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是其论述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他在早期的文章中也发表过意见<sup>〔187〕</sup>。

在这里，何还把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奴隶制的形成过程说成是相对于希腊罗马的“正常”发展而言的“不正常”发展<sup>〔188〕</sup>，与之相应，他也称中国的奴隶制度是一种“变态”的制度，它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不同，没有完全发展起来<sup>〔189〕</sup>。何还把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进程说成是相对

于英国法国封建主义的“正常”发展而言的“不正常”发展<sup>[190]</sup>。但是同时他又提到“中国型奴隶制”和“希腊罗马型”<sup>[191]</sup>或者提到不同的“路子”<sup>[192]</sup>。这样，何一方面讲中国的发展偏离了希腊罗马的正常类型，中国的形式是不正常不完备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大谈希腊罗马“类型”或者“路子”，中国的“类型”、“路子”这就暗示两种不同的模式作为各自社会形态的表现具有同等价值，或者说同样有效。后一情形在一年以后更加显著了，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现在他明确声称中国的奴隶制同希腊罗马或日耳曼的奴隶制完全一样，也是一条一般的发展“路径”，而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只是在农村公社制度解体过程中形成的，他在此也援引了恩格斯的论述<sup>[193]</sup>。不过，这些特殊性的产生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法则，根本谈不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变则”。不能像那些主张日耳曼人缺少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历史学家那样，设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错过某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方面，何首先批评了科瓦列夫和吕振羽<sup>[194]</sup>。

同吕振羽和翦伯赞一样，何干之也出于政治原因反对特殊的中国社会的观点<sup>[195]</sup>。他虽然在1936年就已经着手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现象，而且也把这些现象当作特殊的现象加以突出，但他并不愿意把这些特殊性与独特的亚细亚社会在中国的存在联系起来，或者把它们集结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他在1937年虽然采用了亚细亚社会概念，正如马克思在其有关停滞性特点的论述中使用亚细亚社会概念的情形一样，并且反对那种视

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为经济学派的玩艺而不屑一顾的做法<sup>[196]</sup>，但是他仍然对那些想借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而赋予中国特殊的发展原理的观点表示拒绝。何认为，马克思承认亚细亚的(东洋的)古代的(即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是历史发展的累进时期，并且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在奴隶制之前，还有一个历史时代——“亚细亚的”<sup>[197]</sup>。

何干之赞同日本学者早川二郎的观点，后者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在原始公社末期存在的进贡制等同了起来<sup>[198]</sup>。这种进贡制产生于东方原始社会解体的特殊过程，当时，在农村公社中，一方面阶级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公社已经屈服于另一些农村公社了。与希腊罗马征服者曾经改变了被征服者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征服者并未想改变被战败的氏族的社会制度，而是只强迫它们，用本地的产品进贡。在进贡制的基础上，被征服者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它们能够在旧的农村公社的形式中继续生存下去<sup>[199]</sup>。何进一步论证说，进贡制的存在导致了奴隶主不会意识到役使奴隶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充当劳动奴隶；他们也懂得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维持被征服民族的生存。这样，进贡制的存在和由此而来的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便阻碍了奴隶制从家内奴隶制向劳动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制只能如此‘不完全’地发展着<sup>[200]</sup>。

按照早川二郎的意见，这种进贡制存在于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它是一个历史的过渡阶段，而不

是像科瓦列夫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断言的那样，是地理条件的产物<sup>〔201〕</sup>。何干之进一步介绍早川的观点说，进贡制是农村公社制度与已经开始的家内奴隶制的一种混合，因此并不代表独特的生产方式。因为没有像在希腊罗马那样形成劳动奴隶制<sup>〔202〕</sup>，所以农村公社未彻底解体，它们在奴隶制时代经常重新出现<sup>〔203〕</sup>甚至在封建社会中也是如此。在农村公社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续存在，这是由于缺少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而造成的，与之相应，交换关系也得不到进一步发展<sup>〔204〕</sup>。进贡制也存在于封建社会，例如在晋代（265—420年）和隋代（581—618年）它曾以平均分配土地制度（均田制）的形式出现<sup>〔205〕</sup>。直到唐代和宋代它才逐渐解体，私人所有制发展了起来<sup>〔206〕</sup>。

农村公社的不断恢复阻碍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而城市里的手工业本身也因受到专制的封建国家的压制，不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工业的手工业<sup>〔207〕</sup>。同样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地租也没有经历过劳役地租<sup>〔208〕</sup>、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形式，而是滞留在实物地租阶段<sup>〔209〕</sup>。虽然在唐、宋时期私人所有制形成后，许多农民开始用货币形式交纳地租了，但这只是没有普遍扩展开来的现象<sup>〔210〕</sup>。

从上述的一切，何得出了下列结论，中国直到19世纪外国列强入侵为止，已经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资格<sup>〔211〕</sup>，就是说没有力量独立地进入资本主义了<sup>〔212〕</sup>。何干之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看作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

过渡，他的这个命题主要是从早川二郎那里得来的<sup>〔213〕</sup>。然而何又进一步把这个命题与封建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命题结合起来，指出，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但也只像乌龟一样蹒跚而行<sup>〔214〕</sup>。何在进贡制的存在和以该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存在、经常的再生和孤立隔绝中看到了产生停滞的原因<sup>〔215〕</sup>。他在论证过程中完全接受并进一步精确了马克思关于停滞的原因的分析，即土地公有制的残存和劳动分工的不发达<sup>〔216〕</sup>。但是对于有人关于停滞性问题所发表的不同观点<sup>〔217〕</sup>何未加任何分析。

何干之详细分析了马札亚尔、郭沫若<sup>〔218〕</sup>和李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他把郭和李的观点看作是马札亚尔观点的翻版，并且首先指出了他们的方法论错误，指责他们在分析社会形态时，不是从经济基础而是从政治形式出发。在此，何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进贡关系也算作经济基础了<sup>〔219〕</sup>。与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过渡时期的观点相应，他反对科瓦列夫（因而也反对吕振羽和翦伯赞）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奴隶制的“东洋变种”的解释。他坚决否认任何“变则”的存在，无论是对于日耳曼人的社会还是对于日本或中国社会来说<sup>〔220〕</sup>。农村公社制度解体后的一般情况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形成，但是恰恰这一点在各民族那里表现出了它的特殊性<sup>〔221〕</sup>。

正如何干之断言历史学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意见十分“混乱”，并要求根据具体史料重新分析国际

研究的结果和证据的情况一样<sup>〔222〕</sup> 他也在关于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中看到了这种混乱局面<sup>〔223〕</sup>。他称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至今还是“一块未开垦的田野”<sup>〔224〕</sup> 但是同时又说下列情况是被证实了的，即自东周时代（公元前 770 年）以来直至清朝末年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它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发展；何拒绝了所谓不同“国情”的命题，说它纯属民族偏见，没有丝毫真实性<sup>〔225〕</sup>。在确定社会形态方面，何认为确定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在此他再次把所有关系看作是主要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只是没有土地。土地的独占，是地主支配的物质条件，地主榨取农民的唯一手段<sup>〔226〕</sup>。与所有关系相比，何认为国家形式是次要的。按照他的意见，像亚细亚式的中央集权或西欧罗巴式的地方分权等不同国家形式，并不能“掩饰封建国家是地主贵族用以维持封建关系的一种政治组织”<sup>〔227〕</sup>。

在何看来，进贡制和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对于东方模式的奴隶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对于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出现同样极其重要；何把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出现理解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特殊性。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央集权发生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国家管理灌溉事业或在国境上建筑防敌的堡垒，也不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和调剂粮食，而且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残存。在不具备共同利益条件下，农村公社就代表了其他人来行使政治权了，它到后来又脱离了这些人并俨然成为他们的主人<sup>〔228〕</sup>。

在关于封建社会一章的最后，何还提出了三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应当怎样划分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并说明它的演变？(2)农村公社在封建制度中停留的原因是什么？怎样估计它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3)氏族制度是按照什么样的“曲线”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比较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清楚地说明中国社会决不存在偏离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变则”<sup>[229]</sup>。何认识到，他必须给他上面的重复论述再加上命题的性质，而这些命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证明<sup>[230]</sup>。

最后，在结束对何干之对于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观点的评论时，我还想介绍一下何干之在确定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方面的见解。

何干之曾在某个地方抓住郭沫若关于“全人类的共同性”<sup>[231]</sup>等话语，并且具体地联系封建制度论述道：“英国人的、俄国人的、中国人的社会，它们的发展过程，大抵是互相一致的。”世界各国的封建制都有一般的性质，无论是较正常的英法封建制，或较不正常的中俄封建制，都具有这一共同性。然而，各国的封建制，决不是千篇一律，从一个死板的公式来的，有的发生较早或较迟，有的历史较长或较短，有的国家形式是分散，也有的是集权。这是说，各国封建制，并非单纯的公式，并不是说，各国历史没有普遍的法则<sup>[232]</sup>。1937年何在这个现象中看到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表现。一般是特殊的一般，特殊是一般的特殊，彼此是相依为命地联系着<sup>[233]</sup>。何不承认一般和特殊有冲突，而是主张，为了不陷入机械论的观察方法之中，

人们必须重视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要把两者分离开来<sup>〔234〕</sup>。然而，何干之只是从理论上把他关于一般与特殊的相互联系的见解和他关于奴隶制度的“不同道路”——就是说特殊——与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发展没有任何“变则”（正面讲：一般规律的普遍有效）——就是说一般——的表述转用到历史之中。随着对历史发展的不同道路的用语的采用——这是针对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等位的情形而言的——，何干之也开始反对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吕振羽和翦伯赞的观点了，后者把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奴隶制，并且仅仅是奴隶制，不包括封建制说成是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变种<sup>〔235〕</sup>。侯外庐在40年代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的观点，并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中国历史上。

#### 6.1.4 侯 外 庐

侯外庐直到1939年才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但他自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以来，就是说自30年代初以来，就开始注意有关问题了<sup>〔236〕</sup>。他把古代社会定在周代，后来在40年代，又把对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与对作为古代东方“维新的”路线”或者说“路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把握结合在一起<sup>〔237〕</sup>。对于侯外庐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古代的历史资料与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达到使“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的目的<sup>〔238〕</sup>。

当侯外庐同吕振羽和翦伯赞一样广泛涉猎中国历史的史料时，他基本上遵循了吕和翦的方法。但是他既否定后者的分期建议，也否定他们把中国的奴隶制看作“古代东洋奴隶制度的变种”的方法论<sup>[239]</sup>。就是在对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作具体的内容规定方面，他也确立了不同的重点。他也与何干之不同，这除了其他问题，主要是他认为：如果只从早川二郎所强调的进贡制方面来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殊性”未免太过分了<sup>[240]</sup>。他也否定了那种与之相关的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从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过渡时期的观点<sup>[241]</sup>。然而同何干之一样，侯外庐的论著同样紧紧追随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的不同道路<sup>[242]</sup>的思考，而且对这些思考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并把它们放到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

侯外庐早在他第一个出版物中就已经以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作为基本前提，对于他说这是不言而喻的<sup>[243]</sup>。他的全部论著的主要要求就是，从中国的历史资料出发，具体说明与其他发展道路不同的中国道路。而他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关于古代各民族平列的发展道路的思想，这些发展道路都各自表现了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具体性和特殊性。

在划分历史时期时，侯外庐不像何干之等人那样从马克思的下列著名论断，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244]</sup>出发，认为这个次序并不合适<sup>[245]</sup>，并且指出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话与上述论

断不同 是把‘古代的’放在‘亚细亚的’前面的<sup>[246]</sup>。他以此来进一步论证他的下列命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生产方式是处于共同的古代范畴之内的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两条平列的发展道路<sup>[247]</sup>。“古代”是指奴隶制阶段。侯认为中国的周代便是奴隶社会<sup>[248]</sup> 该社会在春秋时期逐渐趋于没落。周代以前是氏族社会的构成，而春秋之后则是封建主义的构成了<sup>[249]</sup>。

侯在后来的论著中也坚持了这种分期<sup>[250]</sup>。他还把他的理论观点转用到其他民族和其他社会形态上。他进一步发挥说，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到过的情形一样 不仅存在过亚细亚的、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道路 而且在某一独特的社会形态 即奴隶制 范围内 可能还有别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sup>[251]</sup>。另一方面，他不只把这些不同的道路看作古代奴隶制构成的特殊特征，而是认为它们也适合于其他社会形态，中世纪和近代早期<sup>[252]</sup>，就是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后还有社会主义阶段，正如他在他的政治观念中所表达的思想那样<sup>[253]</sup>。1939年侯外庐在《社会史论导言》中明确阐述了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sup>[254]</sup>。他曾经花了很多年时间翻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sup>[255]</sup> 现在 他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确信，确定社会性质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和生产力<sup>[256]</sup>或者商品流通和商业关系。生产方式在这里被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绍介者”<sup>[257]</sup>。

对于侯来说，诱使他发表关于中国历史的具体论著

的契机是围绕诗人屈原（约公元前 332—前 295 年）评价而在 1942 年与郭沫若展开的争论<sup>〔258〕</sup>。为了能够更好地评价屈原，侯外庐转向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般性问题了<sup>〔259〕</sup>。

侯外庐称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社会制度，即由氏族制残余所束缚的奴隶制虽然还存在着，但是同时新的封建制度也“出生”了。与其关于“亚细亚的”与“古代的”平行或者说相互交错的认识相对应，他也试图确定古代社会的“亚细亚性”。按照他的意见，这种“亚细亚性”就在于“城市与乡村之不可分裂的统一”。在亚洲，没有形成典型的城市国家的统治，因为古代的贵族们仍顽固坚持氏族社会的旧习俗（礼）<sup>〔260〕</sup>。土地私有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诸侯公有出现的，并且采取了国家所有的形式。直接的生产者是贵族家中的奴隶，由士大夫阶级统领。按照侯的意见，这就构成了“亚细亚古代的生产方法（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特殊的结合关系）”<sup>〔261〕</sup>。侯外庐也在下列情况中看到了亚细亚历史的其他特殊性，即由秦国完成的帝国的统一（公元前 221 年）只改变了旧的氏族国家的形式，有很多法制是和旧公族政治妥协的<sup>〔262〕</sup>。

侯外庐在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转变”特征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后，便把屈原安排到这个变革的形势当中了。他认为，屈原颂扬“楚国的腐败制度”——亚细亚的古代社会——是反对秦国——新的封建社会力量——的代表者<sup>〔263〕</sup>。

1943年初，侯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他在该书具体阐述了他关于古代亚细亚的东方道路的观点<sup>[264]</sup>。他首先批评指出在社会史论战中，有的人把氏族公社社会论、奴隶制变种论或封建制变种论机械地搬到中国历史上，并且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信徵者做基本的立足点。他本人则对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下列四点要求：(1)必须接受清代考据的传统<sup>[265]</sup>；(2)必须接受卜辞金文家的传统<sup>[266]</sup>；(3)基本上遵守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4)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sup>[267]</sup>。从物质条件是决定社会构成的基础的观点出发，侯紧紧抓住他已经在其论文中反复强调过的两条法则：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二是生产方式，即特殊的生产手段与特殊的劳动力之结合关系，并以此作为《史论》的准绳<sup>[268]</sup>。与之相应，他在论述中涉及了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成立与发展、生产方式、商人与自由民以及政治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城市国家和生产方式的“亚细亚性”被加以突出强调，以区别于希腊和罗马<sup>[269]</sup>。侯原则上主张周代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完全同何干之一样，他也依据恩格斯的观点论述道，在古代社会内部曾经有过不同的“路径”<sup>[270]</sup>——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也是如此——即“希腊、罗马、日耳曼以及亚细亚诸路径”<sup>[271]</sup>。中国走的是亚细亚“路径”。侯列举中国的下列标志作为古代亚细亚“路径”的特殊性：土地国有、城市与农村不可分裂的统一——这两者已经在关于屈原评价的争论中得到过阐述<sup>[272]</sup>——以及自由民从“不合法的小生

产者”当中产生，并在贵族内部的激烈斗争中逐渐站住了脚，而不像在希腊那样从旧氏族贵族中出现<sup>[273]</sup>。

与这部《史论》同时侯还写了一部《古代中国思想学说史》<sup>[274]</sup>发表于1944年。他在序言中以充满民族自豪感的笔调写道，中国人现在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人的著作，而活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自己的历史了。他们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指马克思主义——作者）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并不妨碍侯坚决与“夸张中国文化”的倾向划清界限<sup>[275]</sup>。

侯在这部《思想学说史》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和学派的分期，它与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分期平行不悖。侯区分了古代思想史发展的三个阶段：（1）西周畴官贵族之学（显学）；（2）春秋诗书传授之学，《诗经》和《书经》据此而批判了显学；（3）战国私人创著的形成和百家争鸣的盛行<sup>[276]</sup>。

以后几年，中国古代的亚细亚道路仍是侯外庐的主要研究课题。1943年7月侯再次呼吁要突出强调中国古代历史的特殊性，不要把像贤者一类的中国历史的现象简单地等同于希腊的历史现象而导致不科学的推论<sup>[277]</sup>。1944年他又一次从理论上对他关于古代不同道路的命题作了总结并使之进一步深化。在这里，他更广泛地参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但没有提名道姓。他把他先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定义精确为氏族国家土地所有的生产工具与集体的家内奴隶劳动力的结合。他把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区分为两个

阶段 古代东方‘早熟’的国家阶段和‘维新’<sup>〔278〕</sup>的国家阶段<sup>〔279〕</sup>。

在此，侯估计，作为一个特殊情况，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早熟阶段早于古典古代的开始；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特殊的地理因素<sup>〔280〕</sup>。在‘维新’的国家阶段 部落首领和诸侯开始出现，他们后来也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是，氏族公社仍被维持下来<sup>〔281〕</sup>。部落不是大多数土地的所有者 而只是‘占有者’<sup>〔282〕</sup>。与先前的著作相比 在这种关于亚细亚的东方道路的定性分析中，所有关系更加明显地占首要地位。侯重新表述了他关于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在古代共同的社会形态中不同但又平列的发展道路的思想<sup>〔283〕</sup>。他不仅主张古代有这样不同的道路，而且也主张封建制也有不同的发展道路<sup>〔284〕</sup>。这是与他的命题的非共时扩展相对应的。与之相应，他也作出了共时的，或者说水平的扩展，并且坚信，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举出的奴隶制构成的亚细亚路径和古典路径外，还会有其他的发展道路。在这里，侯外庐的理论出发点非常清楚。对于他来说，这些不同的道路都分别是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化，是一般的特殊的具体化，而这种一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侯也用一般与特殊的理论范畴表达了这一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道路总是在一般的“合法则性”的内部包含各自特殊的‘合法则性’的<sup>〔285〕</sup>。

侯还列举了东方的古代与古典古代的许多不同点，其中也反映出他的上述见解。他说，在古代东方，一开始

就存在着大土地占有，而在古典古代却有一个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发展过程<sup>[286]</sup>。在东方国家，家族直接被国家所替代，而在古典古代却有一个从家族经私有的形成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东方的道路是一条“维新的路径”其中旧的被新的所取代<sup>[287]</sup>。侯也把古代东方的这条“维新的路径”与思想领域内的发展情况联系了起来。在此，旧的也不是被激进地彻底变革掉了，而是有着曲折的思想进程，旧的习俗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彻底根除。人们只有理解这种合乎规律的运动，才能把握具体的历史真相<sup>[288]</sup>。

侯外庐在 1946 年（实际是 1945 年——译者）出版的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中，总结了他迄今为止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侯对苏联和日本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详细分析<sup>[289]</sup>。他既强调了在确定社会性质，即生产方式方面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又指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种种观点的差异<sup>[290]</sup>。

与之相反 侯在 1949 年 8 月发表的《汉代社会新论》一文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迄今为止的研究的扩大，他第一次触及了“秦人从古代进入中古的路径”<sup>[291]</sup>。他在文章中考察了秦汉时期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考察了秦汉社会的诸编制<sup>[292]</sup>——在此 他主要探讨了农村—城市关系和超经济剥削等问题——并得出结论说 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构成已经成功地取代了古代社会的经济构成<sup>[293]</sup>。他称汉代的生产方式是领主地主所有的生产手段与农奴的劳动力二者间之结合关系<sup>[294]</sup>。他在论述

中力图说明亚细亚的古代社会向封建的中古的路径的过渡，其中，亚细亚路径的残余继续存在，例如由氏族制沿袭下来的大家室集团制直到唐代仍继续以家内奴隶的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中，这样，按照侯的意见，死的便束缚着活的了〔295〕。

1949年，侯外庐的第二部《中国古代社会史》出版了，该书主要收集了他在1940—1945年间所写的论文，包括他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部分内容〔296〕。与1943年的《史论》不同，侯现在更普遍地使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而不再使用他先前所表述的“古典社会及其亚细亚性的生产方法”的措辞。侯自称这部著作是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加强，是史料〔297〕和理论〔298〕的结合说明。他再次论述道：“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均指奴隶制社会。但是不允许把两者等一而视。在‘一般的合法则性’方面，人们必须以经典作家为依据，但在‘特殊的合法则性’方面，却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299〕。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希望细致地研究中国国家、财产、奴隶或法律的特别条件，弄清它们与希腊城市国家中相应的东西的差异。对于侯来说，一方面是广泛细致的史料研究，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原理的理论学习，两者缺一不可。人们应当“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侯外庐说：“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的延长”〔300〕。侯也把他至今为止的全部尝试，即把中国的发

展的特殊性当作在一般的合乎规律性范围内的具体特征来加以说明，置于这一关系之中了。

### 6.1.5 范文澜

范文澜就其所受的教育和到此时为止的活动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毫不沾边，他也没有参加过 30 年代初的论战。直到 1940 年 1 月到达延安后，他才开始接触关于中国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问题<sup>[301]</sup>。但是，由于他的学术名望，他还是在 1940 年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接受委托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从一开始他的工作就与我们前面考察过的其他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后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著作理解为个人对历史作历史唯物主义解说的尝试，并且大都在广泛的史料研究基础上，依据现有的一种或多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理论，或者在与一种或多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的，但是范文澜的《简编》——这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从一开始就以撰写通俗历史为目的，它将被中共用作解放区教育机构的教材。由于这种类似官方性质的工作性质，范文澜便在理论和方法上处于特殊地位了。又因为他本人对于社会史并无多少研究，所以这种官方性质也导致他特别地以“官方的”立场为导向。

属于这种官方立场的既有毛泽东在 1939 年末针对中国历史所发表的意见<sup>[302]</sup>，也有斯大林在其《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阐述并被人们树立为权威的关于世界历史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经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过程的观点<sup>[303]</sup>。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时，我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几位历史学家在其论著中都没有明确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而《简编》被确定为教材的事实却迫使范文澜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法。在此，与对政治史的叙述相比，理论的阐述和从经济发展推论历史事件的尝试便退居次要地位了。对于范文澜来说，描写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反对压迫者的历史是最为重要的，于是，历史便被说成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历史<sup>[304]</sup>。范尤其侧重于现实关系的制造并运用了“借古说今”的方法。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与当前的联系，他也宁可对历史事件作一些“改正”<sup>[305]</sup>。对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或者历史的合乎规律性问题，范文澜未作任何说明。这里在本章中，之所以也研究他的历史著作，不只是因为完整性的需要，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所赖以产生但又没有说出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素的采纳。

早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卷出版的前一年即1941年，范文澜就发表过一篇论文<sup>[306]</sup>，对于确定社会性质和划分中国历史的诸阶段提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他完全同意当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吴玉章的观点<sup>[307]</sup>，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斯大林1938年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所阐述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sup>[308]</sup>。

范文澜把殷代（公元前 16 世纪—前 11 世纪）规定为奴隶社会，西周时代（公元前 11 世纪—前 771 年）为封建社会，这种分期法与吕振羽和翦伯赞的意见一致，但是范并没有读过后者的著作。相反，他却与郭沫若展开了争论。郭（侯外庐也一样）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而西周是奴隶社会，这一主张遭到了范的拒绝。不过，与其后来的著作不同，范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因为材料的奇缺，现在还无法准确考证中国的奴隶制度究竟开始于何时<sup>〔309〕</sup>。范主张以生产关系而不是以生产力作为估价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准，这也使他与郭沫若形成了鲜明的对立<sup>〔310〕</sup>。

范文澜完全接受了已经被斯大林在 1938 年所认可的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生产方式及其由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序的观点，但他未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讨论，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提及。在分析奴隶制生产方法和封建制生产方法的性质时，他首先采用了斯大林的定义，然后再列举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事例，以便证明斯大林的定义完全符合殷代或者西周时代的实际情况。照此说来，斯大林的下列描述是适合于殷代的：

(1) 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而这些作为奴隶的生产工作者可以被当作牲畜来买卖，甚或屠杀；

(2) 金属工具；

(3) 生产部门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

(4) 产品在各个人之间和各部落之间的交换；

(5) 财富和生产资料已经积累在少数人手中；

(6) 少数人迫使大多数人成为奴隶；

(7) 奴隶的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

(8)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彼此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sup>〔311〕</sup>。

不过，这些在斯大林那里被当作同义词而使用的“穷人”、“被剥削者”、“毫无权利的人”等等概念，却被范错误地理解为殷社会中不同团体的名称。这就导致他把在史料中出现的不同社会团体归并到这些主观臆想的斯大林式的范畴当中。范把“贫人阶级”——即旧氏族社会残留下来的大批“破落户”——“被剥削阶级”——这些人经营小农业，地位在奴隶和农奴中间——和“奴隶阶级”——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人——当作三个不同的阶级而加以区别开来<sup>〔312〕</sup>。

就是在描述西周的封建制度时，范文澜也援引了斯大林关于封建主义的论述：

(1)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者，生产者被当作农奴来对待，但不允许被屠杀（范在这里特别明显地与郭沫若产生了分歧，后者认为西周仍然属于奴隶社会，但是范却认为，在西周时期，奴隶虽然也作为农奴而从事农业生产，但主要的生产者却是农奴）；

(2) 已经出现农民和手工业者对生产资料和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人经济的个体所有；

(3) 铁制工具已有改进；

(4)农业和畜牧业继续发展；

(5)已经出现工场手工业企业；

(6)剥削者——地主——和被剥削者——人身依附的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

范认为所有这些标准都适合于西周时期 因此 西周已经是封建社会了。他承认在这个时期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仍继续存在，但他又说这些残余之能保留下来 只是由于“传统”及“惰性力”不能再有所发展了<sup>[313]</sup>。

范文澜在 1941 年前后又成为中共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此时《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一卷出版了 该书包括到五代( 907—960 年 ) 为止的中国历史时期。1942 年第二卷出版，该书叙述到清朝中叶。数年后第三卷也出版了，该书后来被更名为《中国近代史》 涉及从 1840 年到 1901 年的时间范围。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也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论述<sup>[314]</sup>。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在 1940 年的论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标准；但是那些在前面介绍过的历史学家的论著中以不同方式提出来的关于中国的发展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和历史学家力图突出中国在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中的特殊发展的实际尝试，在范文澜的著作中却没有相应的对应物。下面，我只想简要介绍一下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以便说明他是怎样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发展原理的观点与中国的具体发展协调起来的。

按照范的意见，在夏代（公元前 2205—前 1766 年）

和殷商时期，原始公社便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生产力发展了，战俘的数量增加了，私人所有出现了。与公社制度不断衰落的同时，国家组织慢慢地发展起来。在生产力发展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这是由奴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奴隶占有制不可能完全破坏传统的公社制度，因此，公社制度依然保存了很大的残余<sup>〔315〕</sup>。范划分殷代的两个主要阶级为百姓、小人和畜民、万民，前者构成了奴隶占有者阶级，而后者则是奴隶阶级。有些民已经有了家室，并从商的老奴隶中发展起来，成为农奴的前身；有些民则没有家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主人，而且毫无权利，他们被范称为新奴隶。那些耕种一小块土地的贫穷农民在范的论文中还被称为中间阶层<sup>〔316〕</sup>现在则被当作“自由民”而归到奴隶占有者的下层之中了<sup>〔317〕</sup>。对于西周，即封建制度开始的时期，范断言，庶民被分配给小块土地耕种，诸侯则被授予封地，而且还引进了贡赋制。这个时期，主要由战俘、罪犯和被出卖的穷人构成的奴隶，同先前一样参加农业和手工业（在此，范错误地称手工业为“工业”）生产，也从事商业活动，但总的说来，他们在全体居民中的数量很少。因此可以公正地说，农奴是主要的生产者<sup>〔318〕</sup>。

范文澜从政治史的角度称东周（公元前770—前475年）为“列国兼并时期”，但仍把它算作封建社会的开始阶段。不过，在这个时期，变化已经发生了。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大小宗族之间的兼并战争。宗族制度曾经集氏族制度的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于一身，曾经统治一切，但是

现在却被家族制度取代了，庶民被从其束缚下解放出来。除了领主所有外<sup>[319]</sup>，非贵族家族的土地所有也发展了起来，他们上升为地主。未被利用的荒地被私人开发，并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sup>[320]</sup>。

范文澜把战国称作“兼并剧烈时期”。他根据恩格斯的论述，把战国时期的战争称作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封建战争，把整个时代称作“必然的合法的阶段”。现在他又把在国家政治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加到已经列举过的东周时期的社会变化之中，即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诸侯统治被秦朝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所取代。他在秦国的胜利（公元前 221 年）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成就”。束缚于宗族制度的农奴得到了自由，成为农民，由此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大发展。除了作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外，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发展了<sup>[321]</sup>。在战国时期人民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种苦难，也有它一定的代价，那就是从战争中取得了中国的统一，从养士中发展了灿烂的文化”<sup>[322]</sup>。

随着帝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开始，范文澜叙述的重点也转移了。现在，农民起义、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异族侵略者的斗争越来越突出。叙述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则是帝国的统一或者分裂，就是农民起义也被结合着在这个方面的作用而加以评价<sup>[323]</sup>。范文澜还以很大篇幅描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化，描述了他们的争斗和宫廷里的派系斗争<sup>[324]</sup>。政治因素、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也是他的《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结构因素，就是在此，对于合乎

规律的发展问题的强调也远不及对于继承历史遗产问题的重视，而且继承历史遗产问题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sup>[325]</sup>。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的见解，可以从他在1946年作的一个报告中得到一些启发。范在这里强调研究西周时代以来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钥匙”是“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展开的斗争。他从所有关系出发，首先致力于划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诸阶段，但对于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他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考察所有关系。在此，他区分了：(1)下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6年）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时期；(2)自太平天国起，下迄1919年五四运动在资产阶级号召下的农民争取土地时期；(3)自1919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农民收回土地时期<sup>[326]</sup>。把直到目前（1946年）的斗争说成是合法的斗争，这恰恰是该报告的政治意念之所在，因为当时，中共正在大力推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关，范也极力打破旧历史学家所谓历史发展进程是由“治”到“乱”的不断交替的传统观念。按照这种传统观念，农民起义是在帝国内部制造“混乱”的祸患。但是，范虽然批评“治”“乱”，范畴太“肤浅”却反其道而行，或许也是在“财富是劫”的怪论的影响下，又把它们运用到历史进程上了。不是农民，而是地主，通过不断的土地集中制造了“混乱”，恰恰经过农民起义这种“混乱”才被克服。当然，农民起义在重建秩序“治”的过程中，虽可取得某些成功，却不能完全根除“混乱”<sup>[327]</sup>。马克思主义

关于中国历史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在这里最终与传统的由‘治’到‘乱’循环往复的圆圈形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混为一谈，即使其内容得到了重新规定。

传统的循环论的影响也表现在范文澜后来的一篇文章中<sup>[328]</sup>。在此，范第一次触及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他论述了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不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虽然范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50年，但是为了便于同其他历史学家进行比较，我仍把它安排在此处论述。在文章中，范重新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过程之中，他确信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与欧洲封建社会相同的。随后，他便试图说明中国封建制度长期延续和停滞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不同，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了<sup>[329]</sup>。对于范文澜来说，这里也出现了下列问题，即怎样把中国的发展的这个特殊性与一般的合乎规律性统一起来？范显然认为这个一般的合乎规律性体现在欧洲的发展之中，但他并没有如此提出问题，他只想概括说明关于中国停滞性问题的不同解释模式，他没有细致地研究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或者其他关于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的命题。

范文澜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停滞的原因的。首先是农业生产力的迟缓发展：地理条件与人口数量曾经导致疆域的逐渐扩大和新土地的开发，这就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人满’的地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特别尖锐，以致于阶级斗争，即农民起义因此而

爆发，它毁灭了村庄，破坏了田园，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苦难。同时，农民起义也迫使地主做出让步和改革，使这些居民群中的矛盾相对地得到松弛。荒芜的土地又可以耕种了，生产设备得以改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内显示其进步<sup>〔330〕</sup>。这一点早在 30 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了，范文澜在此只是重提，不过他没有明确采纳由此而得出的所谓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结论<sup>〔331〕</sup>。

其次，范也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方面考察封建制度的延续。他在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对生产的破坏中看到了停滞的主要原因<sup>〔332〕</sup>。毛泽东曾经指出，农业生产无法进步、甚止停滞的原因在于剥削的沉重。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范深表赞同<sup>〔333〕</sup>。他在其他的论述中又重复了他在第一点中已经提到的中国的循环发展的因素：土地集中——人口过剩——剥削加重——农民起义——让步和新一轮土地集中。此外，按照他的意见，各地军阀的混战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导致了生产的破坏。最后，但并非不重要，那些入侵中国的异族也带来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它同样阻碍了社会的发展<sup>〔334〕</sup>。

第三，范还研究了工业生产发展的缓慢问题。在中国，与欧洲不同，由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也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市民阶级难以形成。农民本身是不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的<sup>〔335〕</sup>因此与旧的方法相适应，农业经济只能缓慢发展：

“这些自给自足的村社经常以同一形式重

新恢复起来 他们被破坏了 又在原处用原有的名称重新产生，他们的生产结构底简单就足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的秘密。”<sup>〔336〕</sup>

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农村公社的不变性，同样被范文澜看作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部分地被打破了<sup>〔337〕</sup>。

从范文澜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停滞原因：

(1)农民起义的轮番兴起——它们主要是由残酷的剥削、人口过剩和某些地理条件所造成的——和大量的内战与频繁的民族战争使生产力一再遭到破坏；

(2)农村公社的不断重建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优先理论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虽然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封建社会的停滞性，或者说长期延续，但是他并未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不过，范仍然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他也是从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理解出发的，正如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所显示的情形一样。总起来说，范与其他作家不同，他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理解是非辩证法的；事实上他把两者等而为一了。他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的发展便是一般的体现，他把这个意义上的一般天衣无缝地与具体的特殊，即中国历史的具体

发展过程等同了起来。由此便产生了他的历史发展规律思想，他把斯大林以极其简单的形式所表述的一般的公式当作中国的发展规律的充分说明。这样，他就带着这种认识而在理论方面落到其他历史学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后面去了，其结果便是在他的论述中所表现出的某些公式化倾向。

### 6.1.6 胡 绳

胡绳只从哲学—理论方面研究了中国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的问题。他虽然在 1948 年发表了一部篇幅较大的近代史著作<sup>〔338〕</sup>，但是该书的首要目的是想说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革命传统，它不包含任何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sup>〔339〕</sup>，也未展示作者对中国的发展规律问题和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的认识。然而，我们可以从胡的哲学历史理论著作中获悉一些信息。

对于胡绳来说，历史也是在量和质的变化中合法则地向前发展的<sup>〔340〕</sup>。它经历了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诸社会形态。但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的问题，胡未发表任何意见。在分期问题上，他至少也未能确定古代历史的起迄年代，直到 1946 年他还著文介绍他的马克思主义同事评估西周时期的不同观点。然而，他似乎更倾向侯外庐的观点，把周代断为奴隶制，因为他多次讲道秦代是封建社会的确切开始<sup>〔341〕</sup>。

胡绳直到 40 年代初才开始注意历史的发展规律问

题和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不过，他在出版于 1938 年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一书中已经指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有不同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因此，“它们自身之发展形态及其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表现为不同的方式”<sup>[342]</sup>。

40 年代初，钱穆等人又开始鼓吹所谓中国的特殊发展了。胡绳在与钱穆和其他旧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就中国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进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sup>[343]</sup>。除了钱穆以外，胡也批判了林语堂、何林和冯友兰等学者。与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偏重社会史的历史学家在 30 年代初的论战中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存在等等，论证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的做法不同，传统型学者现在则从传统文化的博大方面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钱穆提出了一个曾经存在于整个帝国时代的特殊的“中国式民主”的命题<sup>[344]</sup>。他一方面用宰相制度的设制和向各阶层居民开放的科举制度的实施<sup>[345]</sup> 另一方面又用传统文化的优越性<sup>[346]</sup> 来论证这一点。其他历史学家则把帝国过去的秦汉唐宋历代说成是“国富民强”、“民安物阜”的“好时代”其中也实行过一种“非常好的政治”<sup>[347]</sup>。这种历史观的政治含义实际是否认当前实行民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既然民主早已有之，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去创建了 既然中华帝国曾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就没有理由再搞什么进步的变革了。

胡绳紧紧抓住这种政治含义，逐一驳斥了这些主张中国的特殊发展的新代表们的论据。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过分夸大了科举制度等特殊现象，把各民族之间的不同绝对化，根本没有看到各民族之间的类同处。他说，钱穆断言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相反，是在和平中发展的，这就根本违背了现有的历史事实。这种过分强调特殊性的做法，只能使中国的全部发展成为罕见的和无法解释的事情。

与其反对过分强调发展的特殊性的做法一样，胡也抨击了个别历史学家仅仅公式主义地看待历史发展中的一般性的倾向<sup>[348]</sup>。他说，人们不可以把一般的发展规律直接用以解释中国历史，并用一个概念或一种公式来“笼括”中国历史，而不再具体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为了遵守在研究过程中把一般与特殊结合起来的要求，胡绳从相同处和相异处的角度，把一般与特殊的范畴综合了起来。他说，考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心的着眼点其实并不是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同处，也不是其间的相异处，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为了找出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们必须看到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相同处和相异处，并使两者综合起来。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单从同的方面看，人们只能得到抽象的空洞的认识，而单从异的方面看，人们也只能得到片面的畸形的认识，因为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异处并非主要因素<sup>[349]</sup>。

用相同处和相异处来替代一般和特殊的范畴是否带来了方法上的优势呢？这一问题在胡绳那里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胡绳似乎不知道相同处和相异处这对概念因以抽象的方式强调了现象之间对立性而造成的缺点，没有把握住一般和特殊范畴所暗示的辩证的统一。

这种理论观点至少不比其他历史学家的尝试更有创造性，这一点也表现在胡绳把他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封建时期的努力上，在此，胡一面从他与别的民族封建时期历史的相同处，另一面又从其特殊性来看<sup>[350]</sup>。胡绳认为下述三点是“根本点”：(1)自秦以来 2000 年是专制的；(2)在这 2000 年中的支配思想是与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中世纪思想”；(3)2000 年来的社会形态是落后的封建经济<sup>[351]</sup>。胡并不希望把这些评价规定为不容更改的“一般性的判断”。尤其因为它们太一般了，所以要求周密地考察历史发展中更具体的迹象和规律。

对此，胡一方面不想把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解释为中国社会的停滞或无变化性；另一方面却又明确地指出，所有已经发生过的变化都没有冲决封建制度的框架。在封建社会中虽然曾经有过不少变化：就政治上说，有从“治”到“乱”<sup>[352]</sup>、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从兴盛到没落的变化，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都未能超出“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条路线”。同样，在社会经济范围内也有过从上升到下降的变化，土地分配制度和租佃制度也发生过变动，然而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胡还以同样的方式断言意识形态—文化领域

内的变化，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的产物<sup>〔353〕</sup>。

胡绳指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历史并不像那些坚持传统观点的人所说的那样能够证明中国的情形特殊。他强调说，中国国情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对于他们的历史的意义决没有什么不同<sup>〔354〕</sup>。

与侯外庐类似<sup>〔355〕</sup> 胡绳在 1946 年也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上同新历史学的中国化联系起来。他也想从历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把 5000 年中国文明的经验与当前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并使之理论化。由此而得到的理论（特殊的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的理论？）中国化的前提。这样 胡实际上已经疏远了他本人先前曾经赞同过的中国化观念，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一般科学和一般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事例结合起来<sup>〔356〕</sup>，而且这种结合应当在理论的层面上发生<sup>〔357〕</sup>。他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的范畴下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的关系。为了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强调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的必要性。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通过学术的中国化，才能避免外来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sup>〔358〕</sup>。正如他在别处所论述的那样，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恰恰是由于下列情况造成的，即从外国“原封不动地”搬了来某些对于中国有一定作用的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sup>〔359〕</sup>。

## 6.2 把历史当作历史遗产来继承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许多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与本国的历史遗产决裂的要求。这种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吴虞“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上。本国的历史被看作一种过去的历史，必须受到批判而决不可加以继承。这种虚无主义地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也存在于 30 年代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直到 1936—1937 年，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才比较广泛地出现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出现了把本国的传统当作民族文化遗产来看待的新态度<sup>[360]</sup>。历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遗产的理论，开始认识到：历史不是死的累赘，不是怀旧式的美化或回忆的对象，而是可以通过总结经验 and 掌握规律使之为当前服务的。这种积极接近历史的行为似乎在把历史当作“事例宝库”的传统观念中有其对应物，并且尽管在规律性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历史学家仍然经常会把两者混为一谈。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近现代史；胡绳、何干之以及其他人都要求继承和发扬 19 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启蒙运动和文化革新的传统。

讨论是否是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1935 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激起的，我们不得而知。季米特洛夫反对那种自愿地把民族史上的一切宝贵事迹奉送给法西斯主义历史曲解家，让他们愚弄民众的做法，

坚决主张，必须继承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并使之与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他的出发点是，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也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应当利用明显的、通俗的论据，正确而又充分理解地研究人民群众的民族心理的特征<sup>〔361〕</sup>。

季米特洛夫关于继承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辩护词，远远超出了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继承启蒙的传统的传统的要求。此外，它的着重点也不在知识界的文化传统领域，而在于本民族整个的历史当中。1938年吴玉章在一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中回顾了季米特洛夫的上述观点。同季米特洛夫一样，吴玉章也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并且依据列宁的论述，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进行辩护<sup>〔362〕</sup>。

吴玉章说，恰恰是中国人应当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因为他们有漫长的历史，有许多先进的发明，曾经推出过像洪秀全和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革命的工人阶级业已产生，最后，他们还能够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过去迭次推翻外族压迫统治的革命传统。他们也可以像列宁针对俄国所说的那样，“给人类标榜为为自由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模范”<sup>〔363〕</sup>。从这种民族自豪感出发，吴最终希望“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为此，必须深化历史研究，使历史科学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强有力的斗争工具，吴指出，研究历史首先应当研究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革命的民族传统，应当研究诸如岳飞（1103—1142年）、文天祥（1236—1283年）、郑所南和史可法（1601—

1645年)等民族英雄,他们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被列入了革命的传统之中,而中国共产党也与这些传统紧密相联<sup>[364]</sup>。与此相关特别明显的是研究民族历史的传统首先需要界定民族的概念。这对于具有大汉族主义传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来说,不是没有困难的。吴玉章现在把中华民族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它不仅包括汉族,而且也包括中国境内所有的其他民族,其中有蒙古民族和满洲民族。与之相应,历史上汉族和蒙古民族,或者汉族和满洲民族之间的斗争,则被看作“国内民族的斗争”就其性质而言,它们是与抗日战争大不相同的<sup>[365]</sup>。这个观点的逻辑结论便是要求放弃以往历史编纂常有的把元朝或者清朝评价为“异族王朝”的观点,但是吴还没有走得那样远。就连这个新的“民族”概念后来也没有被所有历史学家所采用。

吴玉章以其文章向历史学家们昭示了一个新方向,后者的研究工作应当而且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不一定必须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脱离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正如他所论述的那样。这样在历史学家那里,在以后几年当中,关于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自卫斗争的论述便成为翻新历史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了。但是,与吴玉章的意图相反,反对满洲民族和蒙古民族,或者说“鞑鞑人”的斗争也被当作民族自卫斗争了。毛泽东在1937年的时候还说要清算哲学遗产<sup>[366]</sup>,但到1938年底也放弃了这种否定历史遗产的态度。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研究历史和继承历史遗产的必要性。他说,为了

“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应当学习历史遗产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总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367]</sup>

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也提到了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个革命传统既表现在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中，又表现在反抗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在他看来。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为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368]</sup>。

但是，对于吴玉章明显地把民族传统当作应当正面继承的遗产而加以突出的做法，毛泽东却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发表于 1940 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并从阶级观点出发 规定了民族文化之中应当继承的成分。他把文化的民主性精华等同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sup>[369]</sup>。

毛泽东坚持反对“封建性的糟粕”，主张把它们剔除掉。总体文化的形式应当同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一样，采取民族的形式。毛泽东赞同整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深化历史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其主要动机，是要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 除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以外 学习中国历史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sup>[370]</sup>。从民族遗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

一，它可以提高，或者说只是唤醒人民群众在抗战（反对日本人）中的民族意识；其二，它可以为创建具体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两个必要前提中的一个（另一个前提是当前的现实和实践），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其中第二个方面是从第一个方面推导出来的。历史学家虽然都赞成继承历史遗产，宣传民族抗日，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意地进一步把这份遗产与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

历史学家既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即在具体的内容涉及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致力于研究民族遗产问题。他们在理论方面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哪些历史遗产成分可以被继承和发扬？怎样继承？这些问题既涉及全部的中国文化遗产，也涉及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在实际的继承历史遗产的行动中，大体可以区别出四个对象范围，它们是与抗战的政治需要和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态需要相适应而形成的。这四个对象范围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近代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封建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以及哲学史。

### 6.2.1 民族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sup>[371]</sup>首次表示拥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阐发了一种把过去和历史当作民族文化遗产的新观念，并希望与其进步的传统联结起来。

1938年7月有人发出了“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的呼吁，对于这一呼吁，延安一些主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和张如心等人接连发表文章，表示响应。他们在文章中同样对中国历史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或整个文化和中国的现实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基础，决不当抽象地和公式化地采用马克思主义<sup>〔372〕</sup>。吴玉章也强调历史科学作为“有力工具”不仅在社会革命中而且也在民族革命中肩负着重要的民族任务。他还依据章太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尤其依据季米特洛夫和列宁的论述，强调把当前的斗争与人民群众历史上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的必要性<sup>〔373〕</sup>。如前所述就是毛泽东在1939和1940年也把采用传统形式和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的观点当作创建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了。不过，与吴玉章不同，毛泽东除了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更明确地把人民群众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传统称作积极的传统<sup>〔374〕</sup>。

把中国的传统当作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新内容，并使两者结合起来，这种做法范文澜在整风运动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sup>〔375〕</sup>。范在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中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思想方法的综合，它包含了全部的唯物辩证法。范解释说古和今等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概念，中和外则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概念。“中”即“中国”、“反法西斯主义”和“无产者”；“外”即“法西斯主义”和“其他阶级”。同样列宁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也是“中”他的

“各社会间的相互联系”则是“外”<sup>[376]</sup>。范还以相同的方式采纳了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口号所作的解说<sup>[377]</sup>。不过，在这种把旧形式与新内容结合起来的转换中，范是否意识到使用旧术语，即旧形式，是为了使新内容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呢？抑或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内容和形式本来就顽固地存留着，以致于把它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标签化？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

总起来说，范文澜对于历史遗产采取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他概括地区分了“好的”和“坏的”两大因素。他从当前的需要出发定义“好的”因素，并把它们与那些人们直觉地爱好并高度重视的事物等同起来。他强调说，这并非因为它们特别是中国的事物。按照他的意见，历史遗产中绝大多数是坏的因素，所以他坚决主张与封建专制主义的遗产决裂<sup>[378]</sup>。

胡绳采取了类似于范文澜的态度。他也赞成与历史遗产决裂，因为他担心占优势的坏因素——毒素——会为害当前。然而，既然要使历史研究有益于当前的实践，那么胡便同范一样要求分析批判地继承那些指示未来的积极的因素了<sup>[379]</sup>。不过，他坚决反对用对历史的分析代替对现实的分析的做法，他向保守派历史学家钱穆发出了这一指责：人们必须在现实中明确地把握新生力量，以求得革新之道<sup>[380]</sup>。恰恰在分析钱穆所谓的历史是当前的镜子的观点时，胡表示了他对继承历史遗产，主要是儒家学说的担心，并与一种仅仅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决定的历史研究保持一定距离。他特别强调儒家学说，例如

“孝”的观念的阶级性，并且指出了一种与之对立的人民群众的反孝的文化传统，虽然这种传统未能得到充分发展<sup>[381]</sup>。

胡绳并不十分刻意反对采用旧传统道德法则的形式，他虽然坚决反对40年代初冯友兰复活儒家道德法则的旧内容的尝试，但相信可以把这种儒家道德法则当作“空洞的形式”，给它装入新的内容并使它与新的现实一致起来<sup>[382]</sup>。但是无论怎样，他都不愿意毫无改变地采用儒家的原则，例如“忠”<sup>[383]</sup>。胡绳把传统的民间形式看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和主要内容<sup>[384]</sup>。

侯外庐和吕振羽也主张批判继承民族的历史遗产。但是他们不满意范文澜和胡绳等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并加以批判。他们两人虽然主张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继续历史遗产，但决不赞成把继续历史遗产理解为“利用旧形式”<sup>[385]</sup>。他们不仅怀疑旧的传统形式的可用性，而且也怀疑那种宣传性的、被动地（就是说公式主义地——作者）把新内容转换成旧的为人熟悉的形式的做法的可用性<sup>[386]</sup>。吕认为利用旧形式甚至会造成危害，因为恰恰是“有觉悟的大众”<sup>[387]</sup>坚决反对那些属于旧文化的东西。这两位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完全可以接受能够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即使是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sup>[388]</sup>。侯进一步论述道，不是利用旧的形式，而只是全部民主生活——人民群众的苦难、他们的反抗、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整个的觉悟过程——的艺术表现就可以唤醒广大的人民群众了<sup>[389]</sup>。

侯和吕担心下面两种情况：第一，在把旧形式与新内容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新内容会受到旧形式的束缚；第二，旧形式比新内容更有优势，这样，通过旧形式，旧的传统的内容最终也会流传下来。他们两人虽然都拥护文学、学术、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但是他们，尤其是侯外庐，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把这种民族形式等同于民间形式。按照侯的意见，农民的传统文艺形式只可以有限地和批判地继承，因为它们不是中性的空洞的公式，而是有“阶级性”的。对于他来说，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并非表面地表现在文字符号的使用上，例如用“逼上梁山”来代替“游击战”，用“鬼子”代替“帝国主义”，即旧瓶装新酒，而是只表现在政治事物上，只表现在关于中国社会的全部论著中。正如在政治领域里的情形那样，侯外庐在文学和整个文化领域里也孜孜追求民族形式与社会的民主形式的统一。他的榜样不是那些把新内容与传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作品，而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相互适应；作为例子，侯枚举了高尔基的《母亲》一书<sup>[390]</sup>。

吕振羽，正如他在1961年明确说明的那样，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才写作他关于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的文章的，他的目的是，“主观上并试图从一个角度来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sup>[391]</sup>。他虽然赞成新文化不可以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观点<sup>[392]</sup>，但是他反对把旧文化的民族遗产看作创造新文化的“中心源泉”的观点<sup>[393]</sup>。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奴隶

制的文化、封建的文化，它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只可以继承它的某些对于现实有积极意义的，也就是有‘生命力’<sup>〔394〕</sup>并且符合抗战建国之需要的因素。按照吕的见解，对于这些因素本身人们却不可以不加理解就马上采用和继承，而是应当使之成为有用的东西，经过批判地改造‘变旧质为新质’<sup>〔395〕</sup>。吕振羽详细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那些被他当作优秀传统而主张继承下来的因素。作为继承的对象，他列举了若干伟大的历史人物、思想家、革命家、成汤和武王的伟大革命<sup>〔396〕</sup>、1911年和1925—1927年的革命及其领导人、农民反抗其压迫者的革命战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民族英雄。除了吴玉章已经提到过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等人外，吕在这里又列举了戚继光（1528—1587年）、袁崇焕（1584—1630年）和吕留良（1629—1683年）。

在哲学领域，吕不仅致力于研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王阳明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也致力于研究朱熹等的二元论哲学、原始的直观的辩证唯物观的八卦哲学、墨子的革命的经验主义哲学、王充、吕才、王夫之、戴震、颜元等人的唯物论哲学以及谭嗣同革命的观念论哲学。按照吕的意见，它们都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即使没有像在黑格尔那里那样发展。在政治思想领域，吕则把墨子的民主思想看作优秀的传统，其次有王夫之的进化论、鲍敬言（4世纪）的无政府主义、黄梨洲的民主论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革命的农民阶级的民主纲领。在

社会伦理领域，吕把热爱和平、重信义等看作优秀的传统<sup>[397]</sup>。他没有研究农民、人民民间的文艺形式，但这些形式却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使这些优秀的传统得以继续，吕振羽认为，必须从“进步的世界观”<sup>[398]</sup>出发，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认识哲学、学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对此还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也没有出现一本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系统的通史著作。

侯外庐没有如此具体地列举中国历史上应当继续的传统，其他历史学家也没有这样做，侯只希望继承“最好的”、“进步的”、“民主的”历史传统和“好的思想传统”。对于这些传统，他只在近代史范围内作了精确说明。在此，他列举了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sup>[399]</sup>。

同胡绳一样，侯也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反对把历史现代化的倾向。但是除此之外，他在民族形式的问题上，却否定了胡的意见，要求把历史遗产科学地放回它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去<sup>[400]</sup>。

总的说来，我所研究的这些历史学家都主张，为了不使历史中断，必须继续民族的历史遗产，应当使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得到发扬光大<sup>[401]</sup>。不过，他们也指出，不能毫无批判地采用这些传统，而是应当批判继承，要把它们改造成符合当前需要的东西。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当前的现实，当前抗战和革命的需要。

不同的观点主要出现在下列问题上，即应当继承哪些遗产？怎样继承？继承的目的是什么？吕振羽曾经比较精确地规定过“应当继承的东西”，他既希望继承农民阶级革命的民族传统，也希望继承该阶级革命的社会传统。侯外庐把民主的启蒙的传统作为继承对象推到了首位。但是在论证过程中，占优势的仍然是对“积极的”、“好的”、“最好的”传统因素的继承和对“消极的”、“坏的”因素的否定这样极不精确的规定。那么，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即在他们各自具体的历史著述中，是怎样贯彻他们的意见的呢？他们更偏重哪些因素呢？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予以论述。

胡绳和范文澜把继续传统、继承历史遗产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对此，他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通过联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现成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可以提高，或者说培养他们抗战的民族意识。由此类推，第二，可以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中的一个。除了当前的现实外，中国的历史也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导致人们不仅在民族的古代的遗产中，而且也在民间的遗产中，寻求概念和形式；这些概念和形式适合于与抗战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完成“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宣传任务。另一方面，这种处理方法又往往容易造成在张贴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情况下，继续拖着旧的传统思想和旧传统前进的情况，正如吕振羽和侯外庐所担心和批评过的

情形一样。吕和侯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地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他们在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民族形式的规定等问题上，观点更接近胡风、冯雪峰和那位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当作主要攻击目标的王实味的观点<sup>[402]</sup>。他们希望把历史遗产科学地放回到它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去，并以这种方法来继承这个遗产，而不把它当作“旧形式的利用”来理解。他们不仅担心封建社会的反动内容会在旧形式下继续发生影响，而且担心对个别历史现象或个别哲学思想进行功利主义的处理会使它们脱离原来整体的历史背景和哲学背景。他们虽然希望把进步的历史传统纳入新文学、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过程之中，但却不希望掩饰它们的革命目标。他们主张以新的形式来表明这个目标，而对民间形式持怀疑态度。

从吕和侯对继承旧形式，特别是民间形式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下列做法的怀疑，即把中国的历史遗产当作一个组成部分带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之中，或者说使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与传统的形式结合起来。吕振羽和侯外庐的这种怀疑态度也表现在对民族形式的不同规定上。有的人以其把民族的形式与农民的形式等同起来的做法，使新的民族形式的文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仅仅以农民为基准，而侯和吕则不只以农民，甚或“三家村老妇”<sup>[403]</sup>，而是以整个人民群众，或者确切地说“有觉悟的大众”<sup>[404]</sup>为基准。

## 6.2.2 外国遗产的概念和评价

历史学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国的思想、外国的科学和文化的态度主要是由传统的继承观念所决定的。在‘中国化’概念之下，一般地学习外国文化同特殊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被置于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这个较大的范围之中<sup>[405]</sup>，正如“中国化”这个概念随着唐代（618—907年）佛教的“中国化”而第一次出现<sup>[406]</sup>和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对峙以来而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讨论的对象的情形一样。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和‘更新中国本位文化’<sup>[407]</sup>等口号下，那些反对闭关主义、反对与西方隔离的政策的人们聚集了起来。赞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来表达他们利用这个外国理论的主张。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提出过使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文化中国化的要求，而且对于侯外庐来说，李大钊因其在20年代的功绩有理由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者”<sup>[408]</sup>。

但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它部分地被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一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被这种处理方法所遮盖。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把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实践的中国结合起来？

历史学家关于外国文化和外国的思想财富问题的争论大致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是在‘中国化’的

概念下，围绕着如何对待外国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其次是依据理论与实践的范畴，围绕着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最后则是在继承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观点下，围绕着如何分析外国文化的问题展开的；在此，可以比较那种把中国的传统当作民族文化遗产来研究的做法。这一点与前面两点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有侯外庐对它饶有兴趣。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对于西方的思想财富，既不能采取闭关主义<sup>[409]</sup>或者干脆排外主义<sup>[410]</sup>的态度，也不能无原则地一概采纳<sup>[411]</sup>，既不能骄傲自大、自我满足或者自以为是，把中国的一切都说成好的，也不能对外国的一切评价过高<sup>[412]</sup>。历史学家赞成把中国的东西与外国的东西均衡地结合起来的主张，特别反对过分强调西方因素的倾向。他们认为，这种倾向之所以产生，也是与下列情况有关系的，即在中共建立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片面地强调过西方的因素<sup>[413]</sup>。在此，他们坚决批判了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及其追随者。他们也在新社会科学的运动中看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新社会科学运动这一概念系指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无原则地采纳西方的思想财富的做法，既表现在运动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公式主义上，也表现在把西方文化当作中心点并用只从欧洲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事物的倾向上<sup>[414]</sup>；历史学家试图把外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试图找到既能吸收外国文化和外国思想的进步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能保持中国的本色的可能

性。问题是：这种结合的外貌应当是什么样子？哪些外国的或中国的因素应当进入这种结合之中 在此 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

所有人都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相对落后性方面来论证学习外国的必要性，即使有的人，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吕振羽和侯外庐进一步说明了要学习的内容。侯要求批判地接受启蒙运动，辩证地采纳人文主义——一种被他等同于中国统一战线的人文主义，革命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sup>[415]</sup>。除了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外，侯也高度评价了俄国革命的基本价值<sup>[416]</sup>。他在此指出，人文主义最好传统的核心在中国已经被接受下来了，而且，它在新科学、新生活观、实用主义、大众化和反对法西斯主义武力争取实行三民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sup>[417]</sup>。他要求在“批判继承”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中，使世界最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相互配合<sup>[418]</sup>。

吕振羽同样赞成继承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因素。他特别列举了启蒙思想，然后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他们的理论时曾经联系过的三大哲学思潮，此外还有德国和美国的自然科学、英法美三国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和自由思想、法德两国资本主义早期的文学和艺术。除了资产阶级进步的民主文化外，吕振羽同侯外庐及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也要求继承社会主义文化<sup>[419]</sup>。吕振羽主张从全部的西方文化中挑选和学习与抗

战建国相适应的东西。在他看来，为了使这种文化变换成为可能，必须进行必要的翻译介绍，此外，他还要求系统地批判引进，包括制造新词汇以填补中国迄今还没有的概念的空白<sup>[420]</sup>。

所有历史学家的出发点都是，不可以公式主义、形式主义和毫无改变地采纳外国文化。他们认为，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全盘“移植”到中国来<sup>[421]</sup>。正如何干之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哲学，可能会“更加丰富更加光大”<sup>[422]</sup>并被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sup>[423]</sup>。然而在这种结合观中，何干之最终还是赋予中国的因素以优先权，外国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则只被当作工具来利用，被用于弘扬“国粹”。

为了进一步说明吸收外国文化进步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的重要性，有的历史学家同毛泽东 1940 年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一样，用人的进食来描绘学习和利用的方法<sup>[424]</sup>。外国的事物被视为原材料，必须被改造和消化为民族的东西<sup>[425]</sup>。在这个消化过程中，中国这个“人体”将吸收所有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营养成分，去掉“糟粕”。那么中国的现实中的哪些因素可以构成这个“人体”就是说学习的基础呢？这里有不同的规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代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学习的基础<sup>[426]</sup>。在吕振羽那里稍加改动，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现实的社会条件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外国文化将被接受下来<sup>[427]</sup>。对于

胡绳来说也是一样，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构成了吸收外国的营养的基础。不过，胡绳直到 40 年代初才开始向内容的层面过渡。他在 1938 年还只把‘中国化’理解为一个叙述问题，当作把中国的哲学史遗产和近 30 年来的思想斗争纳入论证之中的行为，当作“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的行为<sup>[428]</sup>。

不论是吕振羽还是侯外庐和胡绳，他们都承认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外国文化，必须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出发。然而与毛泽东、何干之等人不同，他们并不把这些条件，特别是历史条件，看作创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吕振羽明显地不把历史算作学习的基础。他说，人们不能因为在中国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已经有辩证法、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因素便要拒绝吸收进步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思想<sup>[429]</sup>。吕坚决反对下列观点，即认为新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只有当它们在本民族的地盘上生长出来时，才符合于历史的逻辑<sup>[430]</sup>。胡绳和侯外庐的不同意见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关于继承问题的讨论中，这一讨论是联系理论和实践范畴而提出继承问题的。胡绳首先致力于使中国的过去和现实“科学化”就是说使全部的历史资料和经验理论化。在他看来，借助于这种特殊的理论，（一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实现中国化了<sup>[431]</sup>。

侯外庐同样详细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明确反对把外国的东西等同于理论，把中国的东西等同于实践的做法，他说，理论和实践以相同的方式存在

于中国和世界之中。只有在一般的理论，其中，中国的理论作为特殊的理论也占有一定地位，与实践，包括作为特殊实践的中国的实践，普遍地结合起来的时候，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真正发生。侯外庐的这个观点是以他本人对于世界文化和科学的中国化的认识为基础的。在此，他把“中国化”理解为“创造性”的继承<sup>[432]</sup>。在他看来，“世界学术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学术”适应中国的现实实践而“中国化”只不过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应当把世界学术中国化，同时也应当扩大中国学术的世界性。“使世界认识与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sup>[433]</sup>

侯外庐就此否定了把理论和实践范畴移植到外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关系上的做法。在他看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不论对于中国来说<sup>[434]</sup>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都是存在的<sup>[435]</sup>。与之不同，他把中国——世界的关系处理为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此，由于选用了“世界”这个概念，那种与“外国”概念相关的对立面就被取消，而使统一面居于首位了<sup>[436]</sup>。这样，在关系外国的思想财富方面，传统的继承观便被抛弃了，并且，与把中国的过去当作民族遗产的情形相似，世界历史和世界学术也被视为国际遗产了。

### 6.2.3 继承历史遗产的实际行动和受到偏爱的对象

历史学家为继承历史遗产而作的辩护词，在抗战过程中被具体地转变成实践了。首当其冲的是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问题起初尚未被提出。当历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他们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有的人，例如侯外庐、胡绳等，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继承外国思想文化财富的要求才开始出现<sup>[437]</sup>。此外，也有人针对外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观点展开了争论<sup>[438]</sup>。

继承历史遗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那些所谓积极的历史传统被说成是当前的榜样；另一方面，消极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则被当作反面教材而突出出来。在此，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当前的需要，人们很难明确指出，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把现实的要求反映到历史之中了，在什么情况下又从过去选择某些对于完成当前的任务真正有启发作用的因素。为了清楚起见，有必要根据相应的史料，重新考虑历史学家针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所作出的评价。在继承历史遗产的时候，某些特殊的，欲从历史的反面经验中发现规律性作为历史教训的试图，往往与中国历史编纂的传统方法，即把历史当作事例宝库，通过影射或者类比来批判现实的做法，混合在一起。以继承历史遗产为宗旨而研究中国历史的活动，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其次

是同作为反面教材的消极传统划清界限，最后则是借助影射方法批判现实现象。下面将根据不同的对象，对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逐一作出说明。有四个主要对象：(1)中国的启蒙运动，它在抗战早期阶段，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曾是主题之一；(2)近现代史 特别是反封建民主运动中的个别历史事件和个别历史人物，这些事件和人物自 40 年代初起就受到较多的研究，有关论著越来越多地以改良政策和反动政治为对象，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对国民党政权提出了批评；(3)反对异族统治和外国入侵的民族斗争，以及农民反抗封建社会中的压迫的斗争，它们在整个抗战时期都颇受关注；(4)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它们之受到重视，一方面是为了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立场重新评价中国哲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本国历史的连续发展之中。此外，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人们还采用了旧形式，具体地说就是旧的哲学术语，并通过补充新内容——即马克思主义——使之有益于现行的政治宣传。哲学史与其他对象相比，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同在一般历史中的情形一样，在哲学史上，分期问题、民族遗产及其对于创造本民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可用性问题也以一种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规模相对应的广泛方式得以研究。因为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式的，所以这个对象范围不属于我的问题的提出，如果作广泛叙述，势必要扩大本论文的篇幅。哲学史问题只在对于说明历史科学和历史理论的形成确实必要的地方才予以考虑<sup>[439]</sup>。

与各位历史学家不同的专业修养和特殊的学术兴趣相对应，他们在研究上述对象时重点也有所不同。何干之、侯外庐等人特别注意研究启蒙运动，而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则特别强调民族传统和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传统，涉猎哲学史问题的则主要有吕振羽和侯外庐等人。

### 6.2.3.1 中国的启蒙和启蒙运动

早在 1933 年就有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的长文，在抗战前夕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被转移到这场在 19 世纪中国开始的关于一种新文化的运动上了<sup>[440]</sup>。这一运动在相对于欧洲的发展而言的新启蒙运动的讨论中被理解为启蒙运动，它的传统应被批判继续下去。历史学家正处于这个文化运动的继续之中，而该文化运动则是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的。在有关历史学家在文化领域中的立场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为民族统一战线制订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的角度对新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它们的拥护者所提出的继承中国和国外的启蒙传统的要求进行了论述。与之相反，现在将要考察的是历史学家对作为历史科学研究对象的中国启蒙时代的介绍<sup>[441]</sup>及其在此明显形成的方法论前提。

在研究作为历史传统的中国启蒙运动或者说中国启蒙运动时代时，启蒙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启蒙概念是历史学家借自欧洲历史并转用到中国历史上的。该概念具有功能和内容两个方面的意义。联系其功能方面，历史学

家一致认为，启蒙意味着背叛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联系其内容方面，人们口头上都同意把启蒙理解为一种历史思潮，它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平行的，但是实际上，关于启蒙却有两种不同观点，由此在学术认识上也形成了两个极端立场。与这些不同观点相对应，启蒙时代也受到了不同评价。

何干之宁愿从一个表面的比喻的启蒙概念出发。他按照字面意思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人们借助外部的推动——启蒙，从无知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对于他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在 19 世纪末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样“启蒙”不只与背叛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关而且还可以被任意转用到思想解放上，即从僵化的非理性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启蒙活动的对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当中也有一些教条主义的因素。这种人的意识从外部得到启发的启蒙概念是以一种自然理性原则观点为基础的，而这个自然理性原则又是以使人自觉认识人的本性为目标的。事实上，此类思想在欧洲的启蒙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个自然理性原则与启蒙概念密切相关，但是它在这里并不涉及整个人类本性的品质，而只涉及特殊的中国人的本性，中国人的本质。有了这个限定也就可以解释下列问题了，即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虽然也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形成密切相关，但与启蒙的观点相比却处于次要地位。人文主义关系着人的一般价值的光大，并且不受民族或种族界限的约束。与之相反“民族的精华”或者说“国粹”的思想把自己局限

在中国和特殊的中国人价值的光大上。事实上，继承民族精华是评价近代哲学史积极传统的标准，而近代的哲学史又被理解为启蒙。这样“民族精华”概念作为一个脱离了阶级立场的范畴便与同样脱离了资产阶级思想赖以形成的阶级关系的启蒙范畴结合在一起。把这些最终非历史地加以利用的、不受阶级关系约束的范畴转用到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做法，后来也表现在下列倾向之中，即脱离历史关系地论述个别中国历史人物和启蒙思想家，并着眼于他们对当前的现实政治的意义来论述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按照当前的标准来评价他们。

与这种非历史的处理方式不同，在吕振羽那里，特别是在侯外庐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运用却非常明显，即使这两位作家本人对这个原则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的出发点是历史的启蒙概念，正是这个概念的历史性阻止了他们把启蒙理解为一般人类的、特殊中国人的，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分阶级的。他们把启蒙、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形成的标志，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从外部闯入中国历史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自身中形成的。吕振羽十分赞同那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在 19 世纪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观点<sup>[442]</sup> 同时他也和侯外庐一样 试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中国的思想传统本身推论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sup>[443]</sup>，并且相应地判断它的早期思想路线发展的连续和中断。

这样，吕和侯便把中国的启蒙时代定在 17 世纪，即

早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只被（例如侯外庐）看作是“文艺复兴”的一种推动力量<sup>[444]</sup>。侯外庐根本不关心继承“民族精华”问题，因为他是从历史的阶级的启蒙概念出发的。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和启蒙归根到底是与世界性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带有一般人性观念的欧洲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那里的情形一样。

下面，我将对何干之、侯外庐和吕振羽有关中国启蒙运动的评价作一详细分析。其他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未发表意见。在此，我必须局限在他们的基本论断上，即使也可能涉及到对于个别启蒙思想家的评介，我不能复述他们的论证方法和每一种评价的理由。

何干之在其《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启蒙运动的政治追求。他突出强调了启蒙运动的下列发展阶段：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政策、五四时代（1919年）的文化运动和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sup>[445]</sup>。何把特别自维新运动以来的启蒙运动理解为一个逐渐向所有居民阶层扩展的启蒙和觉醒进程。维新运动仍局限于少数开明的官员，而1911年的革命则影响到大部分海外中国人和大学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运动更扩展到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而在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运动则波及南方省份和长江沿岸的人民群众。目前，全国各社会阶级都被卷入启蒙运动之中了<sup>[446]</sup>。何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概念在这个分期中抓住各个阶段之间的本质区别，据此，他把五四运动说成是辛亥革命的否定，把当前的运动，即抗战前夕的新启蒙运动以及抗战期间的文化运动，说成是五四运动的否定<sup>[447]</sup>。在这里，何的努力十分清楚，他一方面努力与上述运动的积极思想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却按照他的观点与先前启蒙思想家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区别开来。

何在这里针对启蒙运动而阐述的观点大体上复述了那些参与新启蒙运动讨论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包括胡绳等人的观点。但是，侯外庐却又从马克思主义方面向如此把启蒙运动概念运用于中国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与那些参加过新启蒙运动的讨论的人不同，侯外庐把中国启蒙运动的发轫大大提前了。他决不承认中国的启蒙运动比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逊色。在他看来，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早在 17 世纪就出现了。在这里，他除了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 年）以外，还突出了顾亭林（顾炎武，1613—1682 年）和颜习斋（颜元 1635—1704 年）特别是黄梨洲（黄宗羲 1610—1695 年）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地位<sup>[448]</sup>。侯指出，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在西方科学的直接影响下，在与现今的文化直接发生联系的情况下，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又出现了<sup>[449]</sup>。侯外庐比较了例如王船山与费尔巴哈在推广近代早期的思想方法方面的成就<sup>[450]</sup>，而何干之却只敢以谭嗣同（1865—1898 年）与费尔巴哈或法国的唯物论者相比，并把谭嗣同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称作小巫之见大巫<sup>[451]</sup>。

新启蒙运动讨论的参加者主要想在中国近代思想与西方的启蒙运动之间作一个比较，与之不同，侯外庐则首先致力于把中国的思想家编排到本国的传统之中，并以此说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连续和中断。他评价近代早期思想家的标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提出了民主的、启蒙的和反传统的思想，并且与先前的思想家相比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进步<sup>[452]</sup>。吕振羽在他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按照与侯外庐的意见类似的标准，也赞成把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开始定在17世纪，而且好像还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早于启蒙运动。吕也试图说明这种思想与传统思想相比的进步性质。他把王船山、黄宗羲、朱瑜（朱舜水，1600—1682年）、唐甄（1630—1704年）、戴震（1723—1777年）以及龚自珍（1792—1841年）和魏源（1794—1856年）视为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sup>[453]</sup>。

下面我想进一步分析一下历史学家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几种不同的评价。在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和梁启超最为引人注目。在康有为那里，他对古典作家的批判怀疑“精神”以及他的“大同”的政治乌托邦处于首要地位。何干之把《大同书》理解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甚至把它放到与欧洲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著作相同的层次上<sup>[454]</sup>。但是何同时批评指出，康有为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著作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样没有科学的基础<sup>[455]</sup>。此外，也有人认为，“大同”思想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倾向，它虽然包含有许多主观臆想

的成分，但总的说来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反映。对此，侯外庐表示反对，他说《大同书》是反动的、非社会主义的。

在关于启蒙运动讨论的背景下，辛亥革命阶段未能引起人们多大重视。人们一般不在这个关系中提及孙中山的思想，而是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讨论中提及，对此，我将在下一节里予以论述。但是人们却研究了章太炎（章炳麟，1868—1936年），后者被划归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列。侯外庐特别强调章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财富和他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充分表现在他拥护反清的革命、拥护人民的权利以及反对改良派和立宪主义者的斗争之中，凡此种种都被侯称之为积极的遗产<sup>〔456〕</sup>。与之不同，有的人却强调指出章太炎在整理和发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华方面的贡献。光大民族精华，被看作是肯定康有为、孙中山、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许炳昶和郭沫若等思想家的主要标准。这些人不管其政治立场怎样，都是有杰出贡献的，都是真正‘国粹’的真正保护者。

继承 1919 年五四运动的传统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对此，何干之曾概述如下：“五四运动的价值，平心静气地说来，还很有限度，可是对于民主主义的提倡，对于哲学方法论的介绍，对于怀疑精神的培养，对于独断盲从的反对，对于文学的改革，的确使人对世界、对社会、对自己，都抱着重新估定它的价值的眼光，使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都要求解放，要求改造。”<sup>〔457〕</sup>何干之指出，这些优秀的传统应当在今天，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

到继承。不过，新的运动决不应当只是五四运动的翻版。它首先应当避免那些已经受到批评的弱点，即对中国的过去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和知识分子片面地向西方看齐的做法<sup>[458]</sup>。还有人从总体上把五四运动评价为“全部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但也指出，五四运动尽管口头上否定过去，而在批判儒家学说的行动上并没有走得足够远，特别是没有认清这一学说的历史基础。五四运动的哲学基础总的说来还是有局限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侯外庐特别致力于制造孙中山哲学与五四运动的密切联系。与之相应，他也称五四运动是“市民觉悟”和“思想启蒙”的运动。不论对于五四运动还是对于孙中山，侯外庐都明确地强调下列情况是积极的标志，即它们都曾反对过“国粹主义”<sup>[459]</sup>。这种否定“国粹主义”的态度和与之相联的否定“民族精华”思想的态度，与有人对民族精华思想的肯定评价恰好形成对立。对于侯外庐来说，五四运动也意味着孙中山的民主、自由理论和他的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sup>[460]</sup>。据此，直到1945年，侯还主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密切联系，但是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以其对1911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和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分而使这一联系成为问题了<sup>[461]</sup>。

### 6.2.3.2 近代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关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此，我从总体上称之为“近代史”——本论文所涉及的只是历史学家发表过的两部一般性论著和一些关于个别历史

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论文。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 范文澜叙述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01 年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此书于 1945 年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卷成书并于 1947 年第一次出版。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发表于 1948 年，它同样从鸦片战争开始叙述，但却结束于 1924—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形成的前夕。在历史人物方面“反动分子”“卖国贼”如袁世凯<sup>[462]</sup>和曾国藩<sup>[463]</sup>，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sup>[464]</sup>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sup>[465]</sup>，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和冯云山<sup>[466]</sup>一样 都得到了论述。作为个别的历史事件 人们主要抓住了社会运动如 1925 年的五卅运动<sup>[467]</sup>、太平天国运动<sup>[468]</sup>或者 1936 年 5 月 5 日的宪政运动<sup>[469]</sup>。关于同盟会<sup>[470]</sup>、辛亥革命<sup>[471]</sup>或者关于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鸦片战争的意义<sup>[472]</sup>的论文，其主题往往超出事件叙述的范围，部分地涉及到历史观问题。

上述历史论著在问题提出和动机上与政治评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两部专著的问题提出同个别文章的问题提出一样，都是直接产生于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它们的结论也都以政治效果为目的。这些论著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向特定的居民群，例如知识分子或别的通常被共产党人评判为动摇的中间阶层的社会团体，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自己，一般性地介绍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政策，以及特别地介绍中共的立场，并争取他们支持这一政策和立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政治工具。

在这些历史学家的上述论著中，就其处理和论述的

方法而言，有两种不同的历史科学和历史编纂解说：其一是试图通过描写过去，论证、说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从中推导出它们对于当前的意义。它最终是以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和历史的因果联系假设为基础的，它在过去的事物中看到了当前发展的根源和原因。这样，例如胡绳便要求人们在考察资本对于当前生产发展的影响之前，必须研究官僚资本和买办在近百年间的发展<sup>〔473〕</sup>。只有在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基础上，历史比较才是可能的，它将在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背景下，突出社会事件主要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样的比较是一个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可以从历史中为当前找出积极的和消极的经验教训。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处理历史问题的方法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与之不同，另有一种方法，它纯粹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评论现实政治问题而研究历史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思想的社会里，这种方法可以使政治评论具有更重的份量。同时，这种以影射和历史类比形式把现实政治反映到历史之中的做法，还可以使政治评论以历史论文的，因而是非直接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政治评论的公开表述似乎不适宜，这种情形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可能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既适合于对国民党政策的批判和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揭露，也适合于传递中共自身政策的变化和进一步发展的信息，例如关于 1945 年 11 月内战问题的政策。

这里已经初步涉及到历史比较和历史类比的区分了。历史比较是以一种对要比较的历史对象，或者客观事实各自具体的历史关系的分析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恰如其分地说明比较物之间的不同点和一致性。相反，在类比当中，个别的现象、人物或者行为方式，也即局部的东西被当作整体现象，只是因为它与其他现象中的局部的东西类似，便被不加考虑地当作与后一种局部的东西可比较了。在这样的类比中，许多只从非本质的外表着眼、凭直觉得来的对比物便构成了进一步等同的基础。历史教训在这里最终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而是从个别现象和个别人物的等同中推导出来的。

这里简要叙述的处理方法的不同，即或者借助历史比较在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基础上总结历史教训，或者从历史类比中推论历史教训，最终表明了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依据的历史分析与前科学的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编纂学两者之间的不同。

同样事实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应用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理的不同行为上。那些在科学的基础上从事历史比较的作家，也十分重视历史主义原则，即根据时代背景叙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相反，可以肯定，与历史类比法平行的则是按照当前的标准评判历史事件的倾向。属于此类做法的比如有只从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的意义方面来评价这种革命的行为。这个问题在 60 年初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观点”的争论中曾经受到详细探讨<sup>[474]</sup>但在 30 和 40 年

代，它还没有被当作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它只表现在实际行为当中。

在与近现代史有关的论著中，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观点与传统的理论观点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各个作家对于这种或那种理论观点的倾向表现得十分不同。在翦伯赞、侯外庐和胡绳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特点比较显著，而在范文澜的著作中，传统观念的影响十分突出。不过，不应过高地估计这些不同；历史学家的理论意识当时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与之相应，大部分著作只可有限地被归类于用这种处理方法写成还是用那种处理方法写成，在它们当中存在着许多交叉点和共同点。

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叙述事件的政治经过，并且也主要在政治范围内解释历史事件。相反，比较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分析、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处于次要地位，即使它们作为这些也被简单地列举了出来。这种情况不光适合于传记作品，而且也适合于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和 1925 年 5 月 30 日的罢工运动的论文以及两部总体论述的著作。

下面，我想借助某些论著，示范性地分析一下上面所提到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历史传记。在 40 年代，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编写了头一批历史传记。因为此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关于近代史的一般性论著刚刚开始，所以这些传记就其历史科学的价值而言完全同有关个别历史事件的论著一样，都试图把典型的历史

[475]

(1811—1872

1944 7 [476]

[477] 。

差别，范主要是从个人和政治方面分析的：今天的法西斯分子比过去的汉奸刽子手更愚蠢，而中国共产党的风纪比太平天国的更先进<sup>[478]</sup>。范把下列历史结果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证，即曾国藩的军队虽然暂时在太平天国面前挽救了清朝，但它客观上也削弱了清朝，而且到后来还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有利因素<sup>[479]</sup>。范在这里区分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主观努力和客观作用，也列举了曾国藩的历史活动的积极后果，即推动历史前进的结果。但是范文澜借用与曾国藩的历史类比来批判蒋介石的政策并把这一政策说成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政策。当时，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上还没有破裂，这种做法纯粹是传统型的，它妨碍着范客观地认识自 19 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当前的社会条件。对此，有必要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太平天国与中共之间大大超出了组织程度范围的不同。

还有人以类似的方法对袁世凯进行了评论。在此现实的政治关系更清晰可见。1945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与国民党达成所谓的“双十协定”。双方均表示要制止迫在眉睫的内战，在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中国。为了追随这个目标，国共两党议决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四个星期过后，国共两党军队间的军事冲突仍持续不已。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袁世凯的评论文章出现了，其写作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批评“双十协定”警告与政治协商会议有关的种种幻想——蒋介石曾许诺将他一贯拥有的独裁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协商会

议。文章指出：不论袁世凯还是历史上其他反革命反人民的大独裁者都是不愿意分权的。文章用诸如“新袁世凯”、“袁的政治后裔”和“袁世凯穿了新装复活了”等措辞直接针对蒋介石而发表议论。袁世凯被称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由于机智，具有军事权力和精通军事策略等而被反动分子，同样也被维新派选出来做他们的制度的保卫者的。

胡绳那些广义上可以被看作关于改良主义者、农民运动领袖和孙中山等人的历史传记作品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全部出齐。它们就问题的提出而言，同范文澜的传记一样，也是由政治决定的。不过，胡绳也抓住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的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sup>〔480〕</sup>分析了改良运动和改良的作用<sup>〔481〕</sup>，并且研究了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问题<sup>〔482〕</sup>。

与范文澜等人不同，胡绳不想通过人物或事件的类比来制造某种政治联系，而是强调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意义，并且在较高的抽象层面上，比如在对改良作总体评价上，制造与当前政治的联系。这也符合他的下列观点，即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只是“讽喻式地以古论今”。他更多地要求“从历史研究中发现规律由这些规律而使人对于现实的某一方面得到启示”<sup>〔483〕</sup>。他也把这种观点具体地运用到他的孙中山传记之中，下面就示范性地分析一下这部传记。

胡绳希望“严格地根据事实来从侮蔑与歪曲之下显露出孙中山的真面目”，他试图说明在孙中山一生奋斗过

程中每一时期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点，说明怎样的历史条件形成了这些弱点，并且说明他是怎样摆脱和克服这些弱点的，更说明他怎样地用他一生的奋斗的发展过程来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sup>[484]</sup>。胡强调孙中山从改良主义者到民族革命家并最终成为自觉的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家的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在这种政治描述中，孙中山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属性又退居次要地位了。为了说明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的作用和成果，胡虽然也使用了诸如“社会需要”等超出政治范围的范畴<sup>[485]</sup>，但是它们的内容却未受到精确规定。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也没有得到论述。集中于政治发展过程的做法还表现在胡对孙中山的弱点的分析当中。胡把孙中山最初未能充分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意义这一点算作他的一个弱点。在这里，胡不是按照 1911 年以前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标准，而是按照 1948 年的标准来衡量的。这就是说，胡绳在其论述中虽然遵循了历史主义原则，并且突出了孙中山在政治背景下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在其评价中却是以现今的标准，即胡绳自我认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尺度的。

对于那些叙述个别历史事件的论文，我仅就范文澜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和翦伯赞、侯外庐关于 1925 年五卅运动的文章作一些分析。

范文澜的文章就其方法而言应当算作传统型的。他完全不受限制地把太平天国运动联系等同于共产主义运

动。范的文章最早于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sup>[486]</sup>。他在文章中把中共及其控制下的地区说成是中国历史的继续，准确地说是太平天国的继续，并试图以此来说明中共政治权力要求的合法性<sup>[487]</sup>。范在关于曾国藩的文章中已经开始把太平天国运动和太平天国国家当作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在边区建立的政权的先驱来论述了，在此，他继续这种做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因其政治经济平等、民族平等和男人与女人平等的要求，被评价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sup>[488]</sup>。

范把近几年的实际政治经历和刚刚制定的政治纲领反射到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之中，并且把运动的弱点当作当前的“反面的历史教训”而加以特别强调，其目的在于明确指出 1945 年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中胜利的可能性，尽管他已经指出了中共的历史连续性。作为反面的历史教训，范举出了以下三点：（1）太平天国错误的军事路线，即在开始北伐或西伐之前，没有在一个地区牢牢地站稳脚跟<sup>[489]</sup>；（2）对外国人错误被动的政策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利用国际形势和外交策略方面的无能；（3）领导层内部的争论。它破坏了农业政策的成功<sup>[490]</sup>。

叙述的方法是编年体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开始到高潮直至失败依次描述出来，而且主要集中于运动的军事过程。范虽然也概括介绍了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的要点，例如土地改革法案和男女平等法案，但是，运动的社会经济原因只被附带提及。这样，范也没有

深入探讨决定运动失败的社会原因。直到 1948 年补充再版时，他才为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在此，他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保守思想和他们耽于享乐的行为看作运动失败的原因<sup>〔491〕</sup>，农民运动的社会局限性被一般地降到个别领导人的保守思想上了。

范文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是在 1945 年的政治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于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

翦伯赞和侯外庐关于 1925 年 5 月 30 日的运动的论文，就其动机和问题的提出而言，同范文澜和胡绳的论文一样，也是由政治决定的。研究这个发生在作者本人亲身经历过的过去的事件，其直接导因是该运动的周年纪念<sup>〔492〕</sup>。很难用我在前面所定义的概念来确定他们的理论观点是传统型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方面，对于这些文章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作者希望通过研究五卅运动，帮助解决当前的政治策略问题，例如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同范文澜文章中的情形类似，也不排除下列可能性，即翦和侯在此只把他们当前对于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信念——即使在 1939 年和 1940 年国共两党军队发生了军事冲突之后——反射到历史当中去。不过这两篇文章又不完全与范文澜的文章相同，它们决不在脱离社会背景的情况下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当前的人物和事件等同起来，而是要求在较高的抽象的层面上，在类似的历史运动中——例如把被当作反帝统一

战线来看待的五卅运动与 1940 年的反帝或者说反对日本人的统一战线等同起来——，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在这里，翦伯赞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由于同样的社会形势，特别是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为特征的社会形势而产生的共同性上。这样，他们就在形成于反帝斗争的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中看到了运动胜利的希望<sup>[493]</sup>。但是相反，恰恰是统一战线的破裂，正如它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队的破坏下而出现的情形那样，导致了五卅运动的失败，并且也会在当前导致整个革命运动的失败，这就是翦伯赞一再强调指出的五卅运动对于当前有益的经验教训<sup>[494]</sup>

前面所列举的其他关于近代史历史事件的文章，在它们的动机、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法方面，均可以与我们已经介绍过的文章进行比较。不过，我在这里还想更详细地分析一下范文澜和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部总体论著。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共分 8 章 或者说 8 个时期：(1)第一次鸦片战争；(2)1841—1850 年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3)太平天国革命；(4)第二次鸦片战争；(5)1862—1894 年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6)甲午中日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7)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8)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sup>[495]</sup>。在这里，社会发展进程与社会运动被并列地、紧密联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民族因素而加以论述。

相反 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 把重点

放在论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上放在“中国统治者”改良主义者和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sup>[496]</sup>。由此便引出了下列的章节划分：(1) 新关系的建立 1840—1864年；(2) “中兴”与媚外 1864—1894年；(3) “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4) “强”的人上 1911—1916年；(5) “强”的人下 (1916—1919年)；(6) 革命和反革命 1919—1924年。胡绳著作的主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无力抵抗、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广州人民反对 1842 年南京条约的斗争开始直到 1925 年五卅运动中的群众斗争<sup>[497]</sup>。人民群众被描述为反帝斗争、反对外国侵略者斗争最坚决的、唯一的承担者，而改良主义者则完全同买办资产阶级一样，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倾向于妥协、投降，不能进行坚决的反帝斗争。

在范文澜那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被理解为民族解放运动<sup>[498]</sup>，并且也处于论述的中心。但是范同样论述了人民群众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反对本国统治者的斗争。这种同时考虑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做法，导致范不是首先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方面来评价改良主义者（维新派），而是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方面来评价。这样，与胡绳不同，他也把改良主义者看作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了<sup>[499]</sup>。他在不淡化改良主义运动的弱点的情况下，描绘出了一幅不同的关于中国的社会力量的画面。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范的下列做法上，

即他以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政治团体或社会运动中的个别派别和集团，或者在宫廷内部、或者在 1898 年的改良主义运动之中，或者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中。

这两部著作同其他论文一样，也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政治发展上，经济的发展进程虽然也被提及，但未得到系统的研究。例如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就未被详加说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联系虽然被制造了出来，但又常常短路<sup>[500]</sup>。

在这两部总体论述的著作中，与政治的联系没有像在单篇论文中的情形那样，借助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的简单的等同而发生，胡绳指出，要通过“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更加清楚地说明当前的问题，这一点也适合于他自己的著作<sup>[501]</sup>。胡进一步论述道：《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即 1948 年——作者）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因此该书也可以被称作“政论文章”，甚至是在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发表政论文章的唯一形式。但他也明确指出，他在写作这一“政论文章”时不需要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象，相反，他恰恰是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的<sup>[502]</sup>。

### 6.2.3.3 封建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

抗战爆发后，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封建社会史领域里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似乎以某种方式有益于说明当前的形势和现实的政治任务。针对这些对象，历史学家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此外，当时已经出版

的范文澜、吕振羽和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也从类似的角度论述了封建社会史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这些论著，只要涉及历史遗产的继承问题，在此都将得到讨论。事实上，至少在吕振羽和范文澜的著作中，历史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论述封建时代时是占主导地位的，其次才是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中的问题。

抗战初年，历史学家曾经明确指出，他们的政治目标是用他们的文章为争取人民群众支持抗战和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后来在40年代，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国民党的政策当作一种注定要导致失败的政策来论述了与之相反他们也公开声称只有一种革命的前途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这种政治动机相适应，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也进行了选择，并把那些挑选出来的研究对象当作特别的研究题目，撰写论文予以讨论，而在内容和方法上自40年代初开始，又出现了以编写总体论述为重点转移，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

在论文中，历史学家讨论的主题有以下两个：其一是积极的和值得效仿的历史传统；历史学家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及其被当作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来看待的领袖、历史上的社会斗争——农民起义——都列入了这一传统。

另一方面，那些被当作消极的历史事例来论述的统治阶级反动的投降政策也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两个主题也构成一般论著论述的重点。从方法上看，历史学家大都

是这样做的：他们把封建社会中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与当前的事件和人物加以等同，并以此突出正面或者反面的历史事例作为当前的政策的指导，简言之，他们“借古说今”<sup>〔503〕</sup>。在此，不仅现实的事件和人物被反射到历史中，或者通过历史事例加以形象说明，而且连已经理论化了的政治论断，比如改良主义运动的一般意义，也被当作释义学原则而用于历史现象的解说，或者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证实。这些论断就其内容而言，不是经验地从历史中推导出来的，比如可以从历史上许多次改良主义运动（仅限于我们前面所列举的事例）抽象出某些结论，而是与当前政治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翦伯赞和范文澜 50 年代初曾经自我批评地讲道，他们在过去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使用过影射的手法<sup>〔504〕</sup>。但是这些自我批评好象主要涉及事件和人物的影射、类比。并不涉及理论化的政治论断。其实，至少翦伯赞就曾把这些政治论断其中的一个，即在每一次改良运动之后必然会发生一场革命运动当作一种“历史的规律”来看待，认为它是中国历史合乎规律性的发展的反映<sup>〔505〕</sup>。如果我们不把翦伯赞当作个别情况看待的话，那么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关于普遍适应的或者特殊的中国的历史规律的存在观点是怎样与传统的把历史当作论证现实政治的合法性的事例宝库的观点相互渗透的。

运用历史类比的作法不只产生了下列后果，即可作样板地从历史中为当前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随之也带来

了这样的后果，即反过来，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比如用现代的概念分析封建时代的社会集团的性质。吕振羽就曾使用现代的“干部”概念称呼那些为刘邦效力，帮助他战胜竞争对手项羽的同乡、朋友和亲戚，而刘邦却是生活在公元前 3 世纪向公元前 2 世纪过渡的时期的<sup>[506]</sup>。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作为传统处理方法的历史类比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组成部分的历史比较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这两者都可以在关于近代史的论述中发现，部分地还会互相转移。现在，在有关封建社会的问题中，传统的处理方法以其历史类比和把历史当作“事例宝库”来理解的观念占有主导地位。倘若近代史——在此可以找到当前发展的直接根源——还能与当前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对比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的话，那么，在论述封建社会的时候，就会出现把现实的事件和人物与那些已经过了数百年的事件和人物在纯形式层面上加以等同的现象，而纯形式的层面通常只在局部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的可能。这一点也表现在下列情况中，即有的历史学家在论述个别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甚至故意歪曲，以便能够根据作者的需要，使历史事例更好地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范文澜 1951 年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批评中承认，他曾经犯有“非历史主义”的错误，未能“实事求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他在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部分地去掉一些东西，部分地又添加一些东西。对于一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他

只突出了他们的政策的消极方面，突出了他们的独裁统治，没有说明他们在历史上有过的积极贡献，例如帝国的统一或者消灭匈奴人落后的奴隶制度。为了斥责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他甚至把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东西加到对武则天的统治的论述之中，而武则天对人民群众根本不曾如此之坏。在论述魏、蜀、吴三国时他同样运用了影射手法。吴和蜀联合拒魏被比作民族统一战线，而吴国的孙权则被等同于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且相应地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反面人物<sup>[507]</sup>。

下面应当对那些被历史学家算作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历史传统的对象及其通过历史来说明的理论观点作一详细分析，并揭示这些理论观点所赖以形成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明朝（1369—1644年）末年和宋代（960—1279年）构成了一个题目重点，对此，翦伯赞在一系列杂志文章中进行了探讨。翦把这两个王朝的没落归因于外族（契丹、女真和鞑靼）的入侵。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这些入侵不仅未作坚决抵抗，相反却推行一种投降妥协的政策<sup>[508]</sup>。作为这种对于外来侵略的态度的对应物，在国内则是统治者的腐败、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压迫<sup>[509]</sup>和各派力量包括“流寇”在内的统一战线的无法建立<sup>[510]</sup>。由此推论，客观存在的战胜外来侵略者的可能性肯定不会成为现实，这些王朝的没落是因其缺乏内部团结和改革以及政治腐败的“合乎规律的历史结果”<sup>[511]</sup>。

在这里，翦伯赞明显地把王朝的没落这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展示为正处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好的

“教育材料”了<sup>[512]</sup>。当然，他在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他在各派力量缺少主观努力的历史事例中看不到战胜外来侵略者的可能性，但对于1938年的现实来说，他认为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因为现在与宋代不同，主观的努力已经具备，即“蒋介石领导下的革命政府”也决心抵抗了<sup>[513]</sup>。相反，他在1940年却不只在历史中，而且也在现实中，又看到由于缺乏主观努力而不能取得胜利的危<sup>[514]</sup>。

与这些似乎被当作警示性的反面事例来理解的关于宋、明王朝的没落的论述相反，翦伯赞同范文澜和吕振羽一样，也在积极的历史传统方面突出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属于此类的一方面有爱国的皇帝和其他统治者的抵抗，例如汉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和汉宣帝（公元前73—前48年）抗击匈奴人的斗争<sup>[515]</sup>，唐代李世民（太宗，627—649年）他开创了一个“空前庞大和繁荣的封建帝国”<sup>[516]</sup>，以及后周王朝皇帝世宗（955—959年）他同契丹人的进一步南侵进行了坚决斗争<sup>[517]</sup>。岳飞（1103—1142年）、文天祥（1236—1283年）和史可法（1601—1645年）等将领也因为他们反抗女真人、蒙古人或者满清人贵族压迫的“正义”斗争而被列入中国人民的优秀传统之中<sup>[518]</sup>，而宋代的杨家将更因其保国卫民的英勇斗争被颂扬为民族英雄<sup>[519]</sup>。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也经常当作与统治阶级中的爱国者一起进行的共同斗争而加以突出。翦伯赞曾专门撰文既描写了中国人民反对“鞑鞑

统治者’的抵抗斗争<sup>〔520〕</sup>，又描写了南宋 1127—1279 年）“义军”的反金斗争<sup>〔521〕</sup>。吕振羽除了其他方面也描写了春秋时期（公元前 771—前 475 年）人民群众与诸侯共同反抗外来民族的斗争<sup>〔522〕</sup>。

阶级斗争 包括农民起义 尤其在抗战时期经常因为它们的同时性作用而被描述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例如翦伯赞把元朝（1279—1368 年）中大量的农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同时看作是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表现<sup>〔523〕</sup>。1945 年以后，至少有翦伯赞曾经在民族问题之外，单独讨论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内部发展问题。翦把西晋（265—316 年）的政治说成是典型的豪族政治，并描写了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sup>〔524〕</sup>。他研究了王莽（8—23 年）改制的失败<sup>〔525〕</sup>把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08 年）的“焚书坑儒”政策评论为文化领域中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统治促使知识分子拥护陈胜起义（公元前 209 年）<sup>〔526〕</sup>。在一篇关于汉代的文章中，翦还描写了专制皇帝怎样把中央政权移到他自己的卧室，从而导致其政策必然失败的结局<sup>〔527〕</sup>。

除了这些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论述外，也出现了第一批未把民族问题放在首位的关于农民起义的论著。翦伯赞论述了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 209 年），这次起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粉碎了专制和独裁的政权<sup>〔528〕</sup>。对于吕振羽和范文澜来说，对农民起义的描述在他们的通史著作中也占有中心地位。吕振羽在农民起义中看到了农民群众无限伟大的力量和智慧<sup>〔529〕</sup> 他称赞个别的农民革命领

袖的精神志节给后世革命农民留下了“优良传统”<sup>[530]</sup>。然而这种把农民起义当作优良的历史传统来论述的做法在我所涉及的作家当中并未导致他们只论述起义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而不讲其阻碍作用，只论述农民及其领袖的革命性，而不讲他们的保守性。对于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曾经作过最全面的概括。他强调指出，农民起义是捍卫民族统一、消灭腐败王朝、驱逐外来统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sup>[531]</sup>。范对于这里所讲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作了如下精确说明：农民起义迫使地主阶级作出让步和实行社会改良，由此便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范也提到了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因为它毁灭了村庄、荒弃了田地并给农民造成巨大的伤害<sup>[532]</sup>。翦伯赞没有泛泛地谈论这个问题，而是具体地针对陈胜吴广起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翦指出，农民叛乱解除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叛乱中，人口的数量减少了，特别是旧地主抛出了大量的土地<sup>[533]</sup>。

吕振羽同范文澜一样，也列举了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作用，认为农民战争阻碍了生产的连续发展，因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sup>[534]</sup>。

在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功能时，历史学家大都能够联系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分析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失败原因时，他们却很少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一个人的解释模式。农民起义的失败往往被归咎于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斗争<sup>[535]</sup>和统治阶级对农民领袖的利用，与农民领袖相比，统治阶级在“政

治教育和军事教育”方面更胜一筹，他们能够通过收买、陷害和武力镇压等手段重新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sup>[536]</sup>。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思想的保守性的观点，明确指出，反抗秦王朝的陈胜起义错误和弱点的不可避免，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进步阶级的领导，农民自己又没有前进的方向<sup>[537]</sup>。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对待农民起义及其领导人还是比较有区别的，即使他们强调农民优良的斗争传统<sup>[538]</sup>。这样，正如从社会和民族角度来论述农民起义的做法是以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观点为依据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的论著，也是由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统一的定理所决定的。翦伯赞在1945年以后发表的几篇论文可能例外。这一点也表现在由此而推导出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表述上。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两者统一的观点最早是由列宁在其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理论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中共，包括隶属于中共的、这里所研究的历史学家，针对抗日战争而进一步精确化了<sup>[539]</sup>。事实上，历史学家又把它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定理而转用到整个历史上了。

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在下列做法中，即在统治阶级对于外来敌人的妥协投降与他们不愿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这两种行为之间制造一种必然的联系<sup>[540]</sup>，或者相反，爱国者和民族独立的捍卫者同时也被评价为社会改革

家<sup>[541]</sup>。另一方面，反对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同时被理解为社会斗争。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把人民群众描述为民族独立最好的捍卫者上<sup>[542]</sup>而且也表现在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并且据此把民族自卫斗争，甚至侵略战争，说成是先进的社会反对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上，正如在吕振羽那里的情形一样。例如，抗击蒙古人或者在汉、隋和唐代抗击其他外来民族的自卫斗争都被说成是先进的封建制度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甚或氏族制的斗争<sup>[543]</sup>。

与之相应，历史学家还为那些例如在唐代被称为封建侵略战争的战争添加上一种进步的、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作用，因为据说它们促进了文化交流，使相对落后的社会接受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影响。这样，对于吕振羽来说，唐王朝对朝鲜的侵略（太宗在 644 年和 646 年，高宗在 658 年和 659 年）也意味着日本奴隶主贵族对朝鲜的奴隶制侵略被相对进步的封建唐王朝的统治所取代。吕振羽称这种情况对于朝鲜来说“客观上是要好一些的”<sup>[544]</sup>他根本不考虑朝鲜这个被侵略者的社会制度。显而易见，吕振羽试图以牺牲历史，也以牺牲历史真相为代价，来验证他那带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当中国侵略朝鲜的时候，朝鲜王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残存在本国一部分地区，即佳耶地区的日本侵略者<sup>[545]</sup>。

这些论断是以一种关于中国“民族”的认识为基础的，这种认识最终把中国看作历史上主要与汉民族居住

地和由汉民族统治的区域一致的。蒙古人、满洲人、匈奴人、靺鞨人和其他非汉民族则被理解为外来民族，至少对于历史发展来说如此。吴玉章 1938 年所宣扬的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的概念——它不只包括汉族而且也包括蒙古人、满洲人等等<sup>[546]</sup>——并没有被应用到历史叙述之中，虽然吕振羽和翦伯赞曾经表示反对历史编纂中的大汉族主义观点<sup>[547]</sup>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地在他们的论著中完全摆脱这些观点的影响<sup>[548]</sup>正如吕振羽在评价唐王朝的侵略战争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情形一样。这种民族决定论观点也表现在对帝国统一的积极意义的强调上。在范文澜看来，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战争的帝国的统一，尽管人民群众深受其苦，但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这里，一种“灿烂的文化”发展起来了<sup>[549]</sup>。

在现实的政治形势中，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改良与革命、改良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和改良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的问题。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往往是由现实的考虑所决定的，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关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的论著中。首先在这些著作中在此我特别想到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吕在该书中把改良与改良主义运动区别开来。在“改良”中居于首位的是“自上而下”即由皇室宫廷推行的政府措施。“改良主义运动”则把目光转向那些本身属于统治者成员但又在宫廷中致力于争取实现改良的集团上。

吕论述了改良的种种矛盾：一方面它是积极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但另一方面却也仅仅是统治者被迫向农民

作出的让步 甚或只是“ 欺骗 ”农民的措施。作为积极的例子，吕列举了明太祖 1368—1399 年 的改良<sup>[550]</sup>和王安石( 1021—1086 年 )的变法<sup>[551]</sup>，而由刘邦推行的改良措施<sup>[552]</sup>和满清皇帝的改良<sup>[553]</sup>则被说成是消极的。与这种区别对待改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做法相反，在评价改良主义运动时，认为改良主义运动不能解决历史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的看法更占优势。在吕振羽看来，这一点既适合于王莽改制，也适合于那些被当作改良主义运动来看待的公元 2 世纪的“ 清谈 ”运动<sup>[554]</sup>。作为后者的失败原因，吕不仅列举了下列事实，即这个被他确定为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运动没有与农民起义结合起来，而且还提出了“ 改良主义是没有历史前途的 ”<sup>[555]</sup>这样的原则。

就是在翦伯赞 1943 年以后的论著中，也反映出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手段的改良主义运动的怀疑。翦试图用王莽改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民起义两者的失败这样的历史事例来说明他的理论思考<sup>[556]</sup>。他同吕振羽一样，也认为改良主义运动必然要失败。此外，他还在改良主义运动与农民起义，或者说改良主义运动与革命之间制造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并把它看作中国历史的“ 历史规律 ”之<sup>[557]</sup>。他在从汉代末年的“ 清谈 ”——翦视之为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专制统治的政治抗争——开始 直至 1898 年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运动中，看到了在巨大的政治压迫时期由知识分子倡导的作为政治运动先驱的行动。改良主义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它也发出了预示后来农民

起义的爆发的信号。辛亥革命也是这样紧随戊戌变法的<sup>[558]</sup>

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对于改良主义运动和改良未作这样的分析<sup>[559]</sup> 例如范把东汉时期的“清谈”运动只看作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sup>[560]</sup> 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 范也提出了与之相应的思考。在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情形亦然。这两位作家在各自的著作中同 翦伯赞和吕振羽之于封建社会的历史一样，对于1898年以来的近代史也是从改良主义运动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见解出发的。然而他们在评判例如戊戌变法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范认为这个改良主义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从下列情况出发来说明它的失败——正如从那时起所有改良主义运动的结局一样——即帝国主义者联合中国的“保守派”和“洋务派”可以镇压任何有妨碍的改革<sup>[561]</sup>，而胡绳却坚决把改良主义运动评价为当时时代的“进步运动”强调它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没有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后者的主要承担者是人民群众<sup>[562]</sup>。在此 胡也暗示 恰恰因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这种阶级性质，使得那些属于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不能与之结合。

这样，整个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为历史学家的下列观点提供了充分证据，这个观点就是：不是统治阶级成员的改良和改良主义运动，而是只有革命才能扫清社会进步的道路，革命的承担者非受压迫的人民群众莫属。

## 7 结 语

近现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于深刻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这是中国在 19 世纪因为遭遇在军事、科学、经济、政治诸方面都占有优势的西方而陷入的危机。力量低下和毫无抵抗能力这种经历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导致了调和主义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唤起了重新评价本国历史的需要。

在意识形态重新定向的过程中，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许多人看来，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消除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方面的可行性；在此，按照中国人的要求，恢复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尤为重要。与之相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政治实践的信念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首先发现了一种对于中国也行之有效的进行民族革命的科学的政治工具。与这种考虑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的科学的特殊性质便退居次要了。在 20 年代的早期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只表现为西方关于社会革命的种种思想流派之一，人们刚刚开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它有所认识。相反，在

1919年五四运动的部分人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动机却进一步加强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一开始就深受下列两种处理方式的影响：（1）功利主义的处理方法。马克思主义首先被解释为被压迫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武器，其次才是被压迫者反对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本国统治阶级的一般的斗争工具。（2）与功利主义的处理方法相对应，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也采用了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的接受方法，这种情况同学习出自资产阶级传统的其他西方思想的行为几乎完全一样。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见，人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统一的科学理论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来接受，但是这一点不仅由于民族动机而退居次要，而且在中国工人阶级刚刚开始形成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只能根据下列的简单公式行事，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武器，不论哪个民族、阶级和阶层。因此，与调和主义的接受方法一起便产生了至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特征仍具有重要意义的重点。

从上述理解出发，在 20 年代，李大钊便首先开始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他也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重新编写中国历史。这样，中国历史编纂科学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支就出现了。

1927年的政治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关于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的讨论则为此提供了现实的机缘。在这个基础上,30年代初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又得到了建设性的讨论,头一批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著也问世了,它们就其自我意识来说,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论战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承认历史的因果关系原理;过去的社会现象被看作当前发展的原因,据此,那种把历史当作事例宝库的传统历史观便被否定了。

(2)承认世界历史的存在,承认世界历史是按照普遍适应的合乎规律性原则发展的,并且,这一发展具有进步性质。

(3)承认中国历史是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据此,传统的关于中国的独特性和不可比较性观点便同刚刚出现的关于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观点一起遭到了否定。

(4)承认重新划分中国历史分期的必要性;在此,不是传统的王朝分期法,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标准相对应的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起决定作用。

(5)承认历史的整体性,这一点与采纳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合乎规律性原理密切相关。

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论著中,历史学家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分,把论证的重点放在经济因素上。但是当他们强调与偏重个人和政治因素的传统的历史编纂

划清界限时，又经常显露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另一种危险则表现在把中国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之中的试图上；在此，历史学家第一次遭遇了一般——即世界历史——和特殊——即中国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类哲学—历史理论问题。论战的参加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不同处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出现专题论述，也没有使之成为特别的思考对象。

当时，接近中共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一般和世界历史的原理绝对化，而他们那些同样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对手们却强调中国的发展的特殊性。这种不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发展的具体进程结成一体的做法后来以一种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论证方式表现了出来。

上述情况便是 30 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发展水平。当时，我所研究的那些历史学家还没有决定性地进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进程之中。他们在这个进程中的活动或至少他们的影响开始于 30 年代下半期，是与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则为中国进步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政治活动要求历史学家制订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纲领，并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问题。

本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学家在紧紧依据中共——该党创立于 1921 年——的政治论断的情况下，阐述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和学术思想，而中共的政治论断，又

主要是依据共产国际在 1926—1927 年和中共“六大”在 1928 年表述，并在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中进一步深化了的对于中国社会的评估。按照这个评估，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之相应，它的社会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具体规定中国的特殊形势的尝试；在此，中国的发展已被置于世界历史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之中了。历史学家谋求一种政治观念的努力归根到底是 30 年代初的论战的继续，它在此范围内集中于两大问题：(1)详细规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确定反封建斗争与反帝斗争的关系，这一点具体表现为确定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系。

就政治目标而言，这里所涉及的历史学家一致主张：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特殊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民主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不同，中国必须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各位作家在说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系时，采用的方式方法并不相同，而且在那些以中共为向导的人群当中，也表现出某些细微的政治差别。

侯外庐、翦伯赞和 1940 年以前的胡绳、吕振羽都把民族任务放在社会任务之前，并且大谈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统一。他们强调各党派在统一战线内的合作，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和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与之相反，何干之以及后来的胡绳、吕振羽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强调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等位（也以此暗示了两者的不同）。

他们坚决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把农民说成是革命和抗战的主要承担者，把共产党的解放区说成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式，把游击战说成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政治观念上的这些差别也影响到历史理论思想上。

随着抗战的开始，在政治与历史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又增添了一个附加方面。直到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它的战略形成功能一直居于首位。现在，在抗战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成的功能，或者换言之，一种以影响日常政治为目的的宣传的功能。

集中一切政治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抗战，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在历史学家那里，同在一般的知识分子那里的情形一样，在下列问题上导致了一种一致意见，即为了能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完全为民族任务服务，必须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实行重大变革。对此，广泛的宣传工作，并且与之相应，政治、科学知识的普及也是必要的。

在宣传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普及有着特殊意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广义的文化概念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化概念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文学、科学、艺术和思想等等作为等位的、具有类似作用并互相联系的部分领域而发挥作用。正如外国文学应当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应当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应当“中国化”而不可以被简单地引进或者被简单地采用。

“中国化”概念实际上概括了自1938年开始的关于

文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或其他部分领域与当前的需要相适应问题的讨论的主要内容。“中国化”一方面标志着广泛接受和普及世界文化的进步成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现实，以便创立一种上述定义意义上的新文化。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尽管其理论的目标设置和论证不同，但结论一致。

另一方面“中国化”也包括把中国历史的因素——它在现实的政治形势旁边被看作中国的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创立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和与之相应地创立一种民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的行为对于历史科学来说，这种观念具有明显的后果；研究中国历史因此便被赋予了一个新任务，即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发展独特的中国化了的学术奠定基础。

那些与抗战联系在一起而得以发挥的政治一意识形态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科学产生了影响：

(1) 它们在历史科学的政治功能方面确立了新的重点。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和历史科学应当有利于现实的民族政治任务，应当为新政策提供论证，应当增强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活动能力。

(2) 它们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方法 在此 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统一的政治命题和关于特殊的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政治概念——该概念有时只被形式地在关于世界历史的发展的框架内提出——，被当作解释历史事件的唯一的解释模式。

(3) 它们把历史科学纳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进程。

总的说来，历史科学由此便获得一种新的、主要以实际变革为目标的性质，它大大地超出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的框架。而这种性质只有在继承历史遗产的概念下才可以理解；它涉及到历史科学发展进程的实践方面。

在继承历史遗产方面，人们首先提出了继承历史遗产的意义问题和对于所有民族的和外国的传统的态度问题：哪些因素可以作为遗产而被继承和继续？应当怎样继承？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不能中断与本民族遗产的联系，而是应当批判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并使之转化为有益于当前需要的东西。他们只在具体规定要继承的遗产和继承的目的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侯外庐尤其强调继承近代民主的和启蒙的传统，而吕振羽认为继承革命的民族传统与继承革命的社会传统同样重要。

在范文澜和胡绳那里，继承历史遗产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联系存在于日常意识中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这一基础，创立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和吕振羽反对这种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处理民族遗产的方法。他们反对只利用民族遗产的旧形式来普及新内容的做法，主张科学地从历史背景入手分析遗产，继承由此推导出来的历史经验。

历史学家也一致认为，应当吸收外国的文化成分，特别是进步资产阶级的传统以及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

想俄国革命的思想。但是 必须注意 不要公式化地、形式主义和一成不变地采纳这些传统和思想，而是要使之中国化。对于何干之来说，继承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中国的实践，包括它的历史；相反，侯外庐却只把当前的社会条件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传统看作继承的基础。

从这些思考出发，历史学家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实践中，在他们的著述中，主要研究了下列对象：(1)中国的启蒙运动；(2)近代史的事件和人物；(3)封建社会中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4)哲学史。

继承历史遗产的概念揭示了历史学家研究本国历史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通过他们认识和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尝试表现出来。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角度来看，主要问题是确定以世界历史的发展及其一般历史为一方面与以具体的中国历史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态度十分认真，他们从事于具体的、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工作，并试图超越 30 年代早期论战形式主义的、抽象的论证水平。

历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也深受苏联和日本的论著的影响。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题目的选择上，更多地表现在方法上。斯大林所规定的作为普遍适应的历史发展原理五阶段图式和他在 1938 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说以及毛泽东与之相关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在此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历史学家加强了那些同样接近中共的 30 年代早期

论战参加者所发表的意见，即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一般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进程。而中国的发展则是这个进程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他们也同先前一样，否定所有在一般的合乎规律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从特殊的中国的独特发展出发的观点。

新阶段的讨论在此突出了以下两点，第一，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分期建议。它们反映了历史学家在把中国历史纳入一般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立场。第二，接受马克思主义“一般”与“特殊”的范畴并把它们运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上。与这些范畴的不同运用平行，也有不同的方法论观点。历史学家虽然都把“一般”理解为普遍适应的、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致的规律，但在确定“特殊”的范畴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在“特殊”的范畴中只看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相反，侯外庐却看到了由具体的中国历史所验证的中国的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的论著中，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处于中心位置。按照历史学家的意见，这个范畴也意味着承认它空间的普遍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它作为分析历史发展的理论概念被所有历史学家所承认，并且构成了一个具体的联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个别的历史事实被放到一般的历史关系之中，而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则经历了不同的称量。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原则上的承认并没有转变为在历史编纂中的完全应用。这一点尤其在从历史遗

产方面整理中国历史时更显而易见，各位历史学家不同程度地仍然受传统的历史编纂思想和观点束缚。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传统的历史编纂思想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说结合在一起，或者被这些解说所遮掩。

首先是从历史的消极经历中推导某些规律性的尝试，这些尝试往往与传统的借助历史类比批判现实的方法混合在一起。其次是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当作停滞或者说缓慢发展来理解的做法上，而且也表现在采用传统的“治”与“乱”转化的发展观念的做法上 即使其内容被反了过来。再者，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在下列情况中也清晰可见，除了一个例外，所有论著都是从汉族中国人立场出发的。就是在把农民领袖个人的失误看作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上也反映了把杰出人物和个人的活动当作历史的决定因素的历史观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是可以作为轴心来论述的，这个发展是由历史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两者的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的规律性问题是核心问题，它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呈现在几乎所有的论著之中。在政治方面，使历史科学工作为社会服务和继承历史遗产的种种努力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继承历史遗产只有在承认历史的合法则性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这样说来，上述两个方面最终只标志着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方面，在这里 或者是客观方面 或者是主观方面 处于首位。客观的

方面见之于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主观的方面则说明人们能够认识这种规律性，因为历史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只有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从不自觉的发展主体转为自觉的发展主体。

这一论断标志着一个被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理论上研究过的事实情况，这个事实情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形成过程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到。没有人会惊诧实际的过程有时与上面概述的理想形式有很大偏差。30年代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中国历史学家是在异常特殊的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即抗战——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以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同时也以使它的结果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己任。现实经常迫使他们把刚刚进入他们视野的出自某一特定关系的假设当作确实可靠的结论而引入另一种关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当时本身尚未完全成熟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与继承历史遗产的行为之间制造一条相关联的切线，或者换言之，把他们关于继承历史遗产的思想与他们对于历史的合乎规律性的理解调和起来。在如此出现的断裂处，传统的历史观因素便可以找到入口，它们的影响直到现在也还清晰可见。

# 注 释<sup>\*</sup>

## 第 1 章

- 〔1〕这里我是根据查尔斯·S·加德纳著《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剑桥 马萨诸塞 1973 年第 3 版)一书而使用“传统的历史编纂”概念的。
- 〔2〕详见第 2 章。
- 〔3〕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著主要在涉及历史学家的政治观念时才予以分析利用。
- 〔4〕这里值得提及的有郭沫若、徐文珊、克兴和齐思和等人。
- 〔5〕详细的图书目录见文献索引。
- 〔6〕范文澜的著作清单最早见于 1979 年发表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
- 〔7〕不过，有一部分著作的初版我手头没有，与之相关的问题将在适当的地方论述。
- 〔8〕见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 年版 1961 年版序第 2 页。
- 〔9〕这里值得提及的有 H·布劳依蒂加姆、J·柴斯奈斯、刘大年和 T·波考拉的文章。

\* 本注释中作者姓名和书名多用缩写。参见本书《文献及缩写目录》——译者。

- [10] 钟安民、N· 达斯、A· 德里克、B· 埃伯斯坦、P· 库夫斯和石椁（音译——译者）曾写过有关这个时期的论文。
- [11] 这个问题在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林甘泉著《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载于《红旗》1978年1月第1期第68页及以下几页；张岂之等著《坚持历史科学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载于《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史学版第88期；也见罗梅君著《实用主义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历史编撰》。
- [12] 见费尔维克和卡恩第5页及下一页。
- [13] 关于李大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大量文献。再者他的一部分著作还被翻译成了德文：《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 [14] 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等。
- [15] 在这里我与C· 贝克尔不同，不把‘历史事实’理解为关于某一事件的陈述并且只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意识之中，而是理解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事实情况，它在实际上接近于真实的事件。参见策琳娜·波宾斯卡著：《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柏林1967年版；京特·帕茨希著：《客观性与事实概念的问题》载于R·科塞莱克、W·莫姆森和J·吕森主编：《历史理论——历史科学中的客观性和党性原则》慕尼黑1977年版。
- [16] “符号”在这里意味着控制论意义上的语言符号，一种作为信息载体的信号。
- [17] 德语的‘Klass’术语不仅可用汉语的‘阶级’术语而且也可用“集团”等术语加以复述，这种情况或许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是把‘Arbeitsrente’翻译成中文的‘劳动地租’（翦

伯赞或‘役劳地租’何干之却是另一回事。

- [18] 这些翻译说明是以奥托·卡德著《翻译中的偶然和规律性》（外语杂志副刊 莱比锡 1968 年版）为依据的。
- [19] 这个问题最终也是以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讨论为基础的，对此我将在第 6.2.1 章节中加以分析。但是在讨论中尚未有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 第 2 章

- [1] 见《吕振羽悼词》和《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482 页。后一史料与《吕振羽悼词》不同，指出吕早在 1927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吕直到 1929 年在他的《中国外交》中还站在接近国民党的立场上，他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入侵，攻击中共的行为。见第 221 页。
- [2] 1928 年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时，把北京（即“北方的京都”）更名为北平（“北方的和平”），此次更名目的在于强调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权力要求。
- [3] 见《吕振羽悼词》和《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482 页。
- [4] 见《吕振羽悼词》。
- [5] 吕：《中国外交》第 211、214 页。
- [6] 吕振羽和翦伯赞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 [7] 见《吕振羽悼词》。
- [8] 同上。
- [9] 同上。
- [10] 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482 页。在《吕振羽悼词》中没有提到吕旅居日本的情况。

- 〔11〕见吕：《殷周时代》1946年修订版序第1页。
- 〔12〕吕振羽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诸阶段》曾在日本《益世报》上发表过。我手头没有此文。
- 〔13〕吕：《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版。
- 〔14〕吕：《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5年版。吕振羽在该书中已经开始反对“托洛茨基分子陈伯达”了。在此之前，后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攻击过他。见宋扬之和邓壮，第1页。
- 〔15〕见吕：《史前期》1934年版自序第3页。
- 〔16〕同上第3页。
- 〔17〕见侯：《屈原思想渊源》载于1942年4月20日的《新华日报》。
- 〔18〕吕：《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1949年版，1937年版序第1页。
- 〔19〕同上第1页。
- 〔20〕见《吕振羽悼词》。
- 〔21〕见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北京1961年版，1961年版序，第2页。
- 〔22〕同上。
- 〔23〕同上。
- 〔24〕见《吕振羽悼词》。
- 〔25〕同上和《吕振羽同志》。
- 〔26〕这里主要涉及吕振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和《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等论文，这些论文曾于1950年（最早在1942年——译者）在上海结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出版。

- 〔27〕吕：《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和《本国史研究提纲》。
- 〔28〕吕：《评佐野袈沙美的中国历史读本》和《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
- 〔29〕见吕：《创造民族》北京 1961 年版 第 114 页按语。
- 〔30〕见《吕振羽悼词》和《吕振羽同志》。
- 〔31〕见《共匪 干部记要》第 56 页。
- 〔32〕见伍文 第 36 页及下一页。
- 〔33〕见《共匪 干部记要》第 56 页。
- 〔34〕吕：《国共两党》载于 1943 年 8 月 7 日的《解放日报》第 4 页。
- 〔35〕同上 第 4 页。在后来 1961 年北京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 169 页中，吕不再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概念称作一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 〔36〕同上，1943 年的《解放日报》第 4 页。
- 〔37〕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72 页。
- 〔38〕吕：《简明中国通史》1941 年版序。
- 〔39〕吕：《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汉时期》。
- 〔40〕吕：《由封建专制国家的恢复一统到外族侵略——两晋南北朝》。
- 〔41〕吕：《进入专制主义》。
- 〔42〕见《共匪 干部记要》第 56 页。
- 〔43〕见《吕振羽悼词》。
- 〔44〕见吕：《中国民族简史》1947 年版序。
- 〔45〕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482 页。

- 〔46〕见《吕振羽悼词》。
- 〔47〕同上。
- 〔48〕同上和《吕振羽同志》。
- 〔49〕《吕振羽悼词》和宋扬之、邓壮 第 1 页。
- 〔50〕见《吕振羽悼词》。
- 〔51〕同上。
- 〔52〕这样重新出版了《殷周时代》、《史前期》和《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书。
- 〔53〕见《吕振羽同志》。
- 〔54〕关于翦伯赞的小传部分地参照了我在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翦伯赞与 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中的论述。
- 〔55〕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5 页。
- 〔56〕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142 页和《中共人名录》第 672 页。
- 〔57〕这里主要涉及《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两篇发表在《三民半月刊》上的论文。这两篇论文我手头没有。
- 〔58〕翦伯赞和吕振羽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 〔59〕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6 页和《中共人名录》第 672 页。
- 〔60〕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6 页及下一页。
- 〔61〕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142 页。
- 〔62〕翦：《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和翦：《历史哲学教程》。
- 〔63〕对此，在我关于翦伯赞的硕士论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该论文

主要以翦的《历史哲学教程》为研究对象。

- [64] 翦：《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该论文早在 1940 年就以《中国历史科学的实用主义》的题目发表在《读书月报》上。
- [65] 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1938 年版序第 3 页。
- [66] 同上第 3 页。
- [67] 见翦：《略论中国文献学》第 3 页及下一页。
- [68] 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7 页。
- [69] 见翦：《中国史论集》第 2 卷，序第 1 页及下一页。
- [70] 见翦：《略论中国文献学》第 3 页及下一页。
- [71] 翦：《略论十八年前的“首都革命”》。
- [72] 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7 页。
- [73] 见邓：《中国的历史编纂学》第 147 页。
- [74] 格雷：《历史编撰》第 211 页。
- [75] 翦：《论司马迁的历史学》。
- [76] 翦：《文化史的教育与中国前进文化》。
- [77] 见翦：《邓初民和吴泽》第 4 页。此处原文是：“我们不必亦不应强不同以为同，因为真理是在彼此的辩论中发见的。”
- [78] 同上第 4 页。
- [79] 翦：《略论中国史研究》。
- [80] 同上 厦门 1945 年版第 44 页。
- [81] 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7 页。
- [82] 翦：《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 [83] 翦：《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
- [84] 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8 页。
- [85] 在《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中还指出翦曾与他的“战友”茅盾、侯外庐等分别主编过《文汇报》每周一期的《史地》、

《文艺》、《新思潮》和《经济》副刊。

〔86〕同上第28页。

〔87〕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142页。

〔88〕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28页。

〔89〕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142页和《主要科学机构人名录》第366页。

〔90〕1955年翦曾随一个学术代表团赴日访问，1955年和1956年他参加了在莱登和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见柴斯奈斯：《历史著作》第274页和《中共人名录》第673页。

〔91〕见钟安民第132页及下一页。

〔92〕江达锋第2页。

〔93〕见黎澍：《“四人帮”》第3页和《翦伯赞悼词》第4页。

〔94〕见《翦伯赞同志追悼会》第1页。

〔95〕见《中共人名录》第276页。与之不同，《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238页以1898年，《新中国人物志》第106页以1905年为侯的生年。侯外庐本人则在1980年5月29日在北京与作者谈话时证实1906年为其生年。

〔96〕这些说法是侯外庐与作者谈话时讲的。与之相应有大量史料证明侯于1923年来到北京，不过也有一些材料记载侯去北京的时间是1924年。

〔97〕根据侯外庐1980年5月29日与作者的谈话。

〔98〕见侯：《抗日民族》序。

〔99〕根据侯外庐1980年5月29日与作者的谈话。

〔100〕见侯：《中国学术》第21页。

〔101〕见侯：《新的时代与新的文化》。

〔102〕侯：《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

- [103] 侯:《阿 Q 年代的“问题”》和《伟大的高尔基如何教训我们把握现实》。
- [104] 见侯:《谈法制》。
- [105] 见佩 原著 误 应为佩 ——译者 巽关于侯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书评 载于 1943 年 3 月 21 日的《新华日报》和侯外庐 1980 年 5 月 29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06] 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 [107] 见侯:《东方古文明理解之钥匙》。
- [108] 侯:《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
- [109] 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238 页。
- [110] 同上。
- [111] 侯外庐和罗克汀:《新哲学教程》。
- [112] 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
- [113] 侯:《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
- [114] 见布里勒《50 年》第 81 页。
- [115] 见 1978 年 2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第 2 页。
- [116] 《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239 页。
- [117] 根据侯外庐 1980 年 5 月 29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18] 见 1977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
- [119] 侯:《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 1979 年版。早在 1978 年《中国近代哲学史》就出版了,该书的主编是侯外庐。1980 年《中国思想史纲》和《中国思想通史》各自的第 1 卷被重新编辑出版。
- [120] 范文澜的详细传记见于《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第 11 页及下一页。此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 1979 年版)中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也提供了大量资

料。不过，这些资料部分地与《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中的资料有矛盾。就是表格式的简历也不完全，例如缺少范文澜在 1942 年整风运动中的作用的报道。

〔121〕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13 页。

〔122〕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0 页。

〔123〕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12 页。

〔124〕同上 第 12 页和《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0 页。

〔125〕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4 页。

〔126〕同上 第 355 页及下一页。

〔127〕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12 页。

〔128〕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7 页。

〔129〕见《中共人名录》第 268 页。

〔130〕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7 页。

〔131〕范：《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

〔132〕范：《大丈夫》。

〔133〕范著《论抗战期文化人的任务斗争》发表在 1938 年第 1 期的《前卫文化》上。该论文我没有见到。

〔134〕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60 页。

〔135〕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65 年版 第 1 卷，1954 年版绪言 第 5 页；《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12 页及下一页。

〔136〕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60 页。《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第 13 页以 1945 年为其出版年代 就是在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俄文版序言第 VI 页中 也说《近代史》写于 1945 年，1947 年第一次出版。

〔137〕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59 页。

- [138] 见范《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
- [139] 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65 年版，第 1 卷，1954 年版绪言 第 5 页。
- [140] 同上 第 5 页。
- [141] 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12 页。
- [142] 见戈尔德曼著：《文人异议》第 38 页。
- [143] 见范：《古今中外》第 4 页。
- [144] 见范：《王实味》第 4 页和戈尔德曼：《文人异议》第 42 页。
- [145] 范：《古今中外》第 4 页。
- [146] 范：《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
- [147] 范：《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 [148] 范：《谁革命》载于 1943 年 8 月 1 日的《解放日报》第 3 页。
- [149] 范：《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袁世凯再版》。
- [150] 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61 页。
- [151] 1978 年新版《中国通史》出版。该书前 4 卷包括唐朝和五代 直到 960 年 以前的时期 范文澜为主编，而第 5 卷 宋代 的作者有蔡美彪、朱瑞熙、李瑚、卞孝萱、王会安等人。
- [152] 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 376 页。
- [153] 戈尔德曼：《文人异议》第 68 页。
- [154] 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
- [155] 胡：《青年思想的独立》。胡绳在 1980 年 7 月 25 日的谈话中称新启蒙运动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运动”，它没有发展成为有实际影响的运动。
- [156] 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57] 同上并见胡：《在东江》第 4 页。

- [158] 见胡:《新的中国人》第 254 页。
- [159] 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第 2 页。
- [160] 见胡:《评冯友兰著 新世训》第 155 页。胡绳在 1980 年 7 月 25 日的谈话中也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并肯定了整风运动的积极意义。
- [161] 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62] 胡:《发展生产力》第 30 页。
- [163] 见胡:《新文化》第 38 页。
- [164] 见胡:《学术工作》第 2 页。
- [165] 见胡:《谈历史》第 5 页及下一页。
- [166] 见胡:《辛亥革命》第 21 页和胡:《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第 5 页及以下几页。
- [167] 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68] 见戈尔德曼:《文人异议》第 68 页。
- [169] 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290 页并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70] 见《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第 290 页。
- [171] 根据胡绳 1980 年 7 月 25 日与作者的谈话。
- [172] 胡的再版书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 1978 年第 8 版和《枣下论丛》北京 1978 年第 3 版。
- [173] 见 1978 年 2 月 28 日的《人民日报》第 3 页。胡在《哲学研究》1979 年 6 月第 6 期第 28—40 页发表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一文。
- [174] 刘炼 第 42 页。
- [175] 在我所有的人名词典中,何干之均未被注意到。1979 年联系他的平反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刘炼一篇关于

他的生平和著作的文章。该文是下列叙述的基础。

〔176〕刘炼第 42 页。

〔177〕同上第 42 页及下一页。

〔178〕见何：《中国历史》第 344 页。

〔179〕见刘炼第 44 页。

〔180〕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1 卷第 222 页。

〔181〕根据刘炼第 45 页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刘炼还引用了毛泽东信中的另一段话，在这里，毛抱怨“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此外，毛还讲到他自己为中国战争史搜集资料的计划，他到目前为止只进展到“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和列宁主义等。毛泽东的这封信附印在刘炼的文章中，见第 43 页。

〔182〕何：《文艺上的主观主义》和《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后者 1941 年在延安发表于《鲁迅研究丛刊》并于 1946 年作为一章收入何著《鲁迅作品研究》一书中。

〔183〕见刘炼第 46 页。

〔184〕何：《命运二种》第 41 页。

〔185〕见刘炼第 46 页。

〔186〕何：《马克思主义》第 41 页。

〔187〕同上第 41 页。

〔188〕见何：《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第 17 页。

〔189〕见何：《土地改革》第 2 页及以下几页。

〔190〕何：《五四运动》第 10 页。

〔191〕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张如心著《毛泽东的作风》（1：4，第 30—38 页）《毛泽东的科学方法》（1：2 第 39—51 页）和《毛泽东的科学预见》（1：3 第 10—18 页）篇文章。

- [192] 见何：《鲁迅的人生思想》第 14 页及以下几页。
- [193] 何：《刘邦与项羽》。
- [194]《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
- [195] 见刘炼 第 46 页。
- [196] 何：《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 1956 年版。
- [197] 何干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英文版)北京 1962 年第 2 版。
- [198] 刘炼 第 46 页还隐密地谈到“那个理论权威”。这种措辞是在对康生不公开的批判的开始阶段使用的。
- [199] 见刘炼 第 46 页。
- [200] 作为“三反分子”系指那些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人。
- [201] 见刘炼 第 46 页。
- [202] 同上 第 42 页。

### 第 3 章

- [1] 奥皮茨 第 9 页。
- [2]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64 页。
- [3] 见格雷 第 188 页。
- [4] 见利文森：《儒家学说的中国》第 1 卷 第 79 页及以下几页。
- [5] 见周策纵 第 294 页。在以后几年里 梁启超更加强调中国和欧美思想财富的综合了。吕振羽因此称他为半个儒家和半个实用主义者。见吕：《斗争》第 51 页。
- [6] 参见第 1 章注释 [1]。
- [7]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60 页及下一页。

- [8] 魏特夫:《中国古代史纲要》第 22 页。
- [9] 同上第 24 页。
- [10] 同上第 25 页。也参见普利布兰克第 136 页及以下几页。
- [11] 与一般的政治用语相对应,“进步的”也被用于标识下列社会团体和个人,他们在与他们所想象的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性或者社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致力于改造社会现状。
- [12] 见德米维勒第 183 页及下一页。
- [13] 见格雷第 201 页。
- [14] 梁启超语 参见利文森:《梁启超》第 134 页及以下几页。
- [15] 见梁启超第 7 页。
- [16] 见周策纵第 289 页及以下几页。
- [17] 弗兰克:《中国的文化革命》第 39 页。
- [18] 见克沃克第 135 页。
- [19]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63 页。
- [20] 同上第 263 页。
- [21] 见施奈德第 2 页及以下几页。
- [22]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0 页。
- [23] 见周策纵第 297 页。
- [24] 例如陈独秀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见米勒:《论文集》第 195 页。
- [25] 波考拉第 192 页。
- [26] 《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第 11 页。
- [27] 见侯外庐:《简史》第 117 页。
- [28] 见周策纵第 218 页及下一页。
- [29] 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52 页。

- [30] 见周策纵 第 247 页。
- [31] 同上 第 247 页。对此也可详见利文森：《儒家学说的中国》第 3 卷 第 16 页及以下几页。
- [32] 见周策纵 第 247 页。
- [33] 见李玉宁 音译——译者 )第 109 页。
- [34] 见周策纵 第 247 页和第 435 页。
- [35] 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9 页。
- [36] 见周策纵 第 298 页 以及侯外庐：《简史》第 116 页及下一页。
- [37] 见米勒：《论文集》第 69 页及以下几页。
- [38] 见《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第 14 页。
- [39] 任卓宣 第 154 页。
- [40] 《共产党宣言》的部分中译本出版于 1906 年，它是由朱执信制作的。见周策纵 第 298 页。全译本直到 1920 年才出现。见 1978 年 2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第 2 页。
- [41] 见周策纵 第 298 页及下一页。
- [42] 见任卓宣 第 156 页。
- [43] 例如李大钊就利用了川上一的翻译。见米勒：《论集》第 66 页。
- [44] 见周策纵 第 335 页及以下几页。但是与之不同，O·布里勒仍把 1923 年的争论归属于科学和世界观论战的范围。参见布里勒：《应用》第 313 页及下一页。
- [45]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0 页。侯外庐甚至断言，五四运动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立即就成了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思潮”。见侯外庐：《简史》第 110 页 与之不同，O·布里勒却评价说，“自发地向广大民众宣传辩证唯

物主义的努力’在 1927 年以前并未取得多大成功。见布里勒：《应用》第 314 页。

〔46〕对此详见 D·W·Y·克沃克：《中国人思想中的科学态度，1900—1950 年》纽黑文 1965 年版。

〔47〕米勒著《论集》详细描述了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借助阶级概念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48〕见李大钊《现代史学》第 507 页。

〔49〕见《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第 93 页及下一页。

〔50〕同上 第 97 页。

〔51〕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63 页。

〔52〕同上 第 165 页。

〔53〕米勒：《论集》第 190 页。

〔54〕同上 第 233 页。

〔55〕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73 页。

〔56〕同上 第 192 页。

〔57〕同上 第 230 页。

〔58〕李大钊：《史学要论》。转引自迈斯纳：《李大钊》第 190 页。

〔59〕见迈斯纳：《李大钊》第 174 页。

〔60〕同上 第 155 页。

## 第 4 章

〔1〕我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般都把 1925—1927 年的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称为‘大革命’时期。

〔2〕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论战》第 251 页。

[3]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认国民党部分地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部分地依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根据克莱恩希特，第431页。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和瞿秋白同样把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此详见郭：《共产国际》第62页及以下几页。

[4] 详见郭：《共产国际》第62页及以下几页。

[5] 见费路：《亚细亚》第79页。

[6] 见佐弗里第107页。

[7] 见费路：《亚细亚》第79页。

[8] 这一讨论某种程度上对于苏联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几位讨论的参加者把关于中国的讨论引导到关于苏联的讨论上。

[9] 见佐弗里第122页及下一页。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第9页。

[11] 见何：《中国社会史》第18页及下一页。

[12] 施特帕第81页。

[13]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199页。

[14] 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第142页及以下几页。

[15] 见苗竹晷（音译——译者）第91页。

[16] 见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101页。

[17] 同上第100页及下一页和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纪实》第134页及下一页。在英文版中，这份文献未被压缩。

[18] 见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99页及以下几页。共产国际早在1926年12月就把蒋介石说成是大资产

阶级的代表了。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63 页。

[19] 瞿秋白早在 20 年代中期就要求无产阶级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61 页。

[20] 见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 99 页及以下几页和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纪实》第 131 页及以下几页；英文版未被压缩。

[21] 见费路：《“亚细亚”》第 79 页。

[22] 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123 页，这是唯一特别论述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的史料。

[23]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147 页及下一页。

[24] 何：《研究中国》第 39 页。

[25] 参见同上第 39 页和吕：《斗争》第 53 页及下一页。

[26]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69 页。

[27] 见吕：《斗争》第 54 页。克里莫夫第 115 页此处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作了区别，后者通过《新生命》杂志周围的团体而获得了保护。

[28] 见吕：《斗争》第 59 页。

[29] 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17 页，此处关于 1933 年以后的情况只谈道一些小论战，其中大多数对于相同题目的旧见解被重复提出。

[30]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123 页及下一页。

[31] 我在这里对于论战的参加者使用了“共产党人”的术语 他们大多数本身就是中共党员，普遍拥护中共的观点。在这个用语中，“共产党人”只标识那些接近中共的人，决不意味把其余的讨论参加者当作非共产党人。我对讨论参加者

所作的团体划分同样是以德里克著《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69 页及以下几页为依据的。

〔32〕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123 页。

〔33〕 见克里莫夫第 116 页。不过关于范文澜我没有见到任何相应的有关他参加这场论战情况的报道。对吕振羽和翦伯赞将在下面第 6.1.2 章节中予以详细分析。

〔34〕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123 页。

〔35〕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70 页。

〔36〕 见吕：《斗争》第 53 页。

〔37〕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90 页。

〔38〕 同上第 72 页。

〔39〕 同上第 90 页。

〔40〕 同上第 90 页和第 77 页。

〔41〕 同上第 72 页。

〔42〕 见吕：《斗争》第 55 页。

〔43〕 克里莫夫第 115 页 此处指出 陈独秀认为 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在具备了客观条件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才有可能。这就意味着，托洛茨基分子当时也不以革命变革为追求的目标。

〔44〕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73 页。

〔45〕 见同上第 59 页及下一页。

〔46〕 见克里莫夫第 116 页。

〔47〕 在论战中，经济和经济发展处于中心地位，它们被等同于社会 and 总的社会发展。

〔48〕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66 页和吕：《斗争》第 60 页。

〔49〕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84 页。

- [50] 同上第 55 页和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72 页。
- [51]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74 页。
- [52]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85 页。
- [53] 同上第 71 页和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76 页。
- [54]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64 页。
- [55] 见克里莫夫第 114 页及下二页。
- [56] 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74 页及以下几页。
- [57] 同上第 84 页及以下几页。
- [58] 同上第 75 页。
- [59] 同上第 127 页。
- [60] 同上第 122 页。
- [61] 同上第 153 页及下一页。
- [62] 同上第 35 页和 123 页。
- [63] 同上第 130 页及以下几页和第 146 页及以下几页。
- [64]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85 页。
- [65] 同上第 181 页。
- [66] 同上第 185 页。
- [67] 这个名称在此有助于说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与我所研究的历史学家的关系。参见第 1.1 章节中的论述。
- [68] 见克里莫夫第 116 页。
- [69] 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136 页。
- [70] 同上第 114 页及下一页。
- [71] 同上第 95 页及以下几页。
- [72] 同上第 107 页。不过，在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陶希圣的观点与拉狄克的观点有所不同。
- [73] 同上第 190 页和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第 157

页及以下几页。

〔74〕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99 页。

〔75〕同上 第 101 页。

〔76〕见吕：《斗争》第 63 页及以下几页。

〔77〕郭沫若：《中国古代》序 第 1 页。

〔78〕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146 页。

〔79〕同上 第 189 页。郭沫若在这里称资本主义时期早在 1840 年就开始了。

〔80〕参见同上 第 158 页及以下几页。德里克详细分析了对郭沫若的批判以及他由此而对他的个别观点所作的修正。

〔81〕这里只涉及我所研究的历史学家。

〔82〕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64 页。

〔83〕在 30 年代后半期和 4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讨论中的公式化表现出明确的批判态度。比如翦：《历史哲学》，1946 年版 第 136 页和吕：《关于中国社会》，1950 年版 第 1 页。

## 第 5 章

〔1〕关于 1935 年 8 月 1 日纲领起源的讨论 参见本顿 第 61 页及以下几页 许奎嶷 音译——译者 第 136 页及以下几页和本顿：《答复》第 145 页及以下几页。

〔2〕见郭：《毛的道路》第 26 页。

〔3〕同上 第 53、64 页。

〔4〕同上 第 67 页。

〔5〕见卡塔奥克 第 38 页。

- [6] 见哈里森:《长征》第 413 页及下一页。
- [7] 对于战争末期的党内讨论至今为止尚无细致的研究,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当时存在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不同观点。
- [8] 见郭:《毛的道路》第 98 页及以下几页。
- [9] 见哈里森:《长征》第 415 页。
- [10] 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 2 卷 第 275 页。
- [11] 对于这个时期 申克著《旅行》中有详细的描述。
- [12] 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83—126 页和《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127—228 页。
- [13] 参见申克著《旅行》第 104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国民党领导人的希望的论述。史锋在《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 1976 年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陈绍禹 王明 的速胜论。翦伯赞也怀有速胜的希望,他在 1938 年写道“民族解放战争接近于胜利”。翦:《两宋》第 126 页。
- [14] 见哈里森:《长征》第 427 页。
- [15] 见卡塔奥克 第 74 页。
- [16] 关于中共党内的“无产阶级”路线斗争问题,在托马斯著《“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 特别是在第 103 页及以下几页中有详细的论述。
- [17] 郭著《毛的道路》第 110 页就是这样说的。
- [18] 这里特别涉及到毛泽东关于实践 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47—364 页),关于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第 365—408 页)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 见毛泽东:《论革命》,T·格林编辑 第 312—319 页 筹方面的文章。对此也参见施

拉姆：《毛体制》第 147 页及以下几页。

〔19〕对此 详见罗梅君：《关于‘中国化’的讨论》第 28 页及以下几页。

〔20〕布劳恩 第 330 页。

〔21〕同上 第 332 页。

〔22〕见哈里森：《长征》第 438 页。

〔23〕见白修德和雅各比 第 81 页。

〔24〕白修德和雅各比 第 94 页 此处谈道 早在 1938 年夏天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就已经开始发生冲突了。

〔25〕根据塞维斯 第 258 页引用毛泽东的话。

〔26〕保甲制是一种双向监控的制度，10 户为一甲，有甲长，10 甲为一保，设保长。单位成员互有义务，就是说一个成员要对另一个成员的行为说明理由。参见维特豪夫：《中国古代史纲要》第 147 页及下一页。

〔27〕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7 页。

〔28〕见何干之：《革命史》（英文版 第 353 页。

〔29〕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291 页和 294 页。

〔30〕同上 第 353 页及以下几页。

〔31〕同上 第 395 页及以下几页。《新民主主义论》是正式的翻译“民主主义，本来称作‘Demokratismus’”。

〔32〕同上 第 380 页。

〔33〕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 194 页。

〔34〕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 28 页。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12 页中 毛泽东谈道“没收地主的土地”。

〔35〕转引自卡塔奥克 第 211 页。

〔36〕见塞尔登 第 192 页。

- [37] 见苗竹晃 第 175 页。
- [38] 见白修德和雅各比 第 95 页。
- [39] 塞维斯 第 119 页。
- [40] 见何干之：《革命史》（英文版 第 375 页。
- [41] 见塞维斯 第 171 页。
- [42] 塞尔登突出强调了延安模式的特点。
- [43] 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王春辉 音译——译者 的特许翻译 纽约 1947年版 英文第 1 版），参阅塞维斯 第 88 页及以下几页的论述。
- [44] 根据塞维斯书第 257 页转引的毛泽东的话。
- [45] 见塞维斯 第 251 页。
- [46] 见白修德和雅各比 第 155 页。
- [47] 同上 第 196 页及以下几页。
- [48] 见塞维斯 第 111 页。
- [49] 同上 第 291 页。
- [50] 根据塞维斯 第 313 页及以下几页引用的毛泽东的话。
- [51] 同上 第 377 页及以下几页。
- [52]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273 页及以下几页。
- [53] 见白修德和雅各比 第 333 页和 363 页。
- [54] 关于何干之、胡绳、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没有相应的资料。
- [55] 这一章和下一章的传记性说明，若无别的注释，均取自第 2 章中已经交代过的材料。
- [56] 《读书生活》杂志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57]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 53 页，也见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 99 页及以下几页。

〔58〕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15 页。“资产阶级法权的”民主可能涉及那种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还是由“资产阶级法权”统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在这个社会里，商品交换还按照资产阶级法权，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劳动和不同的贡献。见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 19 卷 第 18—21 页。

〔59〕《新人生观》第 42 页。

〔60〕《文化上》第 42 页。这里把“大同”概念理解为反帝反封建的大变革，同时也把它与资本主义的解说区别开来。

〔61〕范文澜没有发表与之相关的言论。

〔62〕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 第 31 卷 第 132 页及以下几页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 第 31 卷，第 228 页及以下几页。

〔63〕转引自冷和帕尔曼 第 202 页，它从它那方面提供了一份美国的史料 并把毛的这些言论称作“未获证实的评论”。

〔64〕见侯：《抗日民族》第 26 页以下。同样见胡：《统一战线》第 16 页。

〔65〕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44 页。

〔66〕侯：《抗日民族》第 12 页。

〔67〕同上 第 76 页。

〔68〕同上 第 26 页及下一页。

〔69〕同上 第 33 页及下一页。

〔70〕同上 第 24 页。

〔71〕同上 第 14 页。

- 〔72〕同上第 28 页。
- 〔73〕同上第 78 页及以下几页。
- 〔74〕同上第 24 页。
- 〔75〕见《抗战建国论》第 44 页及下一页。侯在这里坚决与那些把对外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看作不同于对内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 〔76〕同上第 1 页及以下几页。
- 〔77〕见侯：《抗日民族》第 24 页及下一页。
- 〔78〕同上第 14 页。
- 〔79〕同上第 45 页及以下几页。
- 〔80〕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21 页。
- 〔81〕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10 页及以下几页。
- 〔82〕同上第 15 页。
- 〔83〕同上第 20 页。
- 〔84〕对此详见第 5.2.2 章节。
- 〔85〕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15 页。
- 〔86〕见侯：《抗战建国与中国》第 5 页。侯同时说，他不认为讨论下列问题有什么特殊意义，即现在处于政治首位的是抗战还是民主？因为两者构成了一个统一。见同上，第 2 页。
- 〔87〕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241 页。
- 〔88〕同上第 235 页。
- 〔89〕见何：《中国资本主义》第 121 页及下一页。
- 〔90〕见何：《转变期》第 141 页及以下几页。
- 〔91〕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48 页。
- 〔92〕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第 69 页和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第 174 页。

- [93] 见翦：《中国抗战》第 302 页。
- [94] 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73 页。
- [95] 翦：《中国抗战》第 303 页。
- [96] 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8 页及下一页。
- [97] 见翦：《“五五”》第 294 页及以下几页。
- [98] 见翦：《辛亥革命》第 269 页。同上，第 283 页写道：“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绪言，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民族抗日战争，正用血与火的文字，替这一革命写着光辉的结论。”
- [99] 胡绳是从 1938 年 12 月 14 日的《新华日报》上采纳“新式的国家”的术语的。见胡：《新的中国人》第 255 页。
- [100] 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第 72 页 和胡：《新的中国人》第 255 页。
- [101] 见胡：《思想方法论初步》第 52 页。这一言论到 1943 年才出现。
- [102] 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第 98 页。
- [103] 见吕：《伟大的历史》第 171 页及下一页。
- [104] 见胡：《新的中国人》第 253 页及以下几页。
- [105] 见胡：《什么是》第 127 页。
- [106] 见易琴 第 517 页。易琴在关于胡绳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书评中指出，并不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只有不同的“样式”。
- [107] 见郭：《毛的道路》第 205 页。
- [108] 同上 第 197 页。
- [109]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 46 页及下一页。
- [110] 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 39 页。在以后的版本中去掉

了这种等同。见《毛泽东集》第 666 页和《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4 页。

〔111〕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0 页，这也适合于原来的版本。见《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 39 页中把“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一样，他也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三民主义革命”等同了起来。

〔112〕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0 页。

〔113〕同上第 380 页及下一页。

〔114〕见胡：《鸦片战争》第 31 页。不过，胡绳的这种言论是以间接的联系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的影射形式出现的。

〔115〕见胡：《发展的两个前途》。

〔116〕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7 页及以下几页。

〔117〕见胡：《思想方法论初步》第 81 页。

〔118〕同上第 79 页。

〔119〕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第 107 页及以下几页。

〔120〕见翦：《中国抗战》第 302 页及下一页。

〔121〕同上第 303 页。

〔122〕见吕：《日本法西斯蒂》第 149 页。

〔123〕见翦：《辛亥革命》第 269 页。翦在这里暗示辛亥革命也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

〔124〕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5 页。

〔125〕侯：《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

〔126〕侯：《民生主义的科学》第 37 页。1938 年在以《科学的民生主义研究》为题目发表的同—论文中，与以后的版本不同，侯在资本的标题下，写有这样一段话，即民生主义为解决

-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性，第 18 页。
- [127] 侯：《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
- [128] 见侯：《孙中山》第 8 页及下一页。
- [129] 见侯：《新民主主义》第 64 页及下一页。
- [130] 同上第 65 页。
- [131] 关于边区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见福尔曼第 62 页及以下几页。
- [132]《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71 页。这些论述关系到毛泽东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的部分内容。
- [133] 胡：《发展生产力》第 30 页。
- [134] 胡：《一年》第 2 页。
- [135] 同上第 2 页。
- [136] 见胡：《发展生产力》第 35 页。
- [137] 同上第 34 页。
- [138] 农村中的桑树意味着丝绸纺织业，并且是同城市里的烟囱一样的富裕的象征。
- [139] 胡：《发展生产力》第 36 页。
- [140] 何：《马克思主义》第 41 页。
- [151] 见何：《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第 17 页。
- [142] 见何：《土地改革》第 2 页及以下几页。
- [143]《中日战争史》第 11 页。
- [144] 对此参见孙中山：《演讲》第 19 页。孙中山是联系种族问题来看待民族压迫的，并且，例如也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抱有“幻想”。
- [145] 同上第 87 页及下一页。
- [146] 孙在这里把“平均地权”理解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在之

地价 仍属原主所有 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 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905年8月同盟会宣言 见孙中山：《演讲》第88页。沃尔夫冈·弗兰克论述道 孙中山的这个思想是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得来的。见弗兰克：《一百年》第100页。

〔147〕见维希特鲍尔 第149页及以下几页。

〔148〕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民大会宣言，见孙中山：《演讲》第269页。

〔149〕同上第272页。

〔150〕同上第273页。

〔151〕冷和帕尔默区别了以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如宋庆龄为一方面和以蒋介石周围的国民党派系为另一方面两者对于三民主义的解说的不同。

〔152〕见冷和帕尔默 第100页。

〔153〕见郭：《毛的道路》第240页和第175页。

〔154〕早在1936年1月和9月，陈绍禹就正面肯定地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讲话。毛泽东也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中说道，中共实现了孙中山的最终愿望。1937年5月，毛又说明了他对三民主义的赞同，他把这个三民主义称为“革命的”。同年7月，毛再次谈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统一。1937年4月中共在10点纲领中，正式宣布拥护三民主义。见冷和帕尔默，第96页及以下几页。

〔155〕见塞尔登 第126页。

〔156〕见冷和帕尔默 第128页。

〔157〕侯正规地谈到关于民生主义的“讨论”见侯：《三民主义》序。

- 〔158〕侯：《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上海 1946 年版。我手头有这些文章一部分的 1938、1939 年版。
- 〔159〕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于关于民生主义的解说 见侯：《科学》第 9 页及以下几页。
- 〔160〕见侯：《解放战》第 96 页及以下几页。
- 〔161〕见吕：《日本法西斯蒂》第 149 页。
- 〔162〕侯：《抗战建国论》第 20 页 和侯：《民权主义》第 70 页及以下几页。
- 〔163〕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65 页。
- 〔164〕见侯：《科学》第 10 页及以下几页。
- 〔165〕见侯：《抗战建国与中国》第 3 页及下一页。
- 〔166〕见吕：《日本法西斯蒂》第 149 页。
- 〔167〕侯：《抗战建国论》第 97 页。
- 〔168〕见侯：《中国学术》第 15 页。
- 〔169〕见侯：《科学》第 11 页。侯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并形象地用一个简图加以说明。见同上。
- 〔170〕见侯：《中山先生论苏联》第 133 页及以下几页。
- 〔171〕参见第 6.1.5 章节中的论述。
- 〔172〕见侯：《抗战建国论》第 10 页及以下几页。
- 〔173〕见吕：《伟大的历史》第 171 页。
- 〔174〕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09 页。
- 〔175〕见例如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9 页 胡：《新的中国人》第 255 页 和侯：《抗日民族》第 24 页。
- 〔176〕何：《转变期》第 138 页及下一页。
- 〔177〕吕：《伟大的历史》第 171 页及下一页。
- 〔178〕同上 第 171 页及下一页。

- [179] 侯：《抗日民族》第 14 页。
- [180] 市民“广义上指‘城市居民’”在此我根据《德汉标准袖珍词典》(未注明出版地点 1951 年版 第 239 页)把这一概念翻译为“资产阶级”。
- [181] 见何：《转变期》第 133 页及下一页。
- [182]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8 页。
- [183] 见侯：《抗日民族》第 24 页。
- [184] 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9 页。
- [185] 见胡：《统一战线》第 17 页。
- [186] 何：《中国的过去》第 127 页。
- [187] 同上 第 127 页。
- [188] 何在其文章《中国思想运动》第 34 页中把中间层、农民层和劳动者算作社会的被压迫者。使用“层”的术语代替“阶级”的术语，在这里是异寻异常的，因为何早在 1936 年就任在其《中国的过去》一书中使用“阶级”术语了。可能在写 1937 年 2 月的文章时，政治考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189] 同上 第 34 页。
- [190] 见翦：《五卅》第 22 页。
- [191] 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第 72 页 和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8 页。
- [192] 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8 页。
- [193] 见胡：《发展的两个前途》第 1648 页及下一页。和胡：《鸦片战争》第 31 页(在这里联系是一个间接的联系)以及吕：《伟大的历史》第 171 页。
- [194]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369 页及以下几页。
- [195] 同上 第 392 页及以下几页。

〔196〕在 1927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之前，中共的策略同样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共同反对国民党右派。

〔197〕见范：《谁革命》何：《命运二种》和吕：《国共两党》。

〔198〕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8 页。《新民主主义论》完全同 1939 年 12 月原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30 页）一样根本没谈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修订本《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80 页中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一语是后来加入的。

〔199〕见侯：《新民主主义》第 65 页。侯在这里称新民主主义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并见第 63 页是东方历史的典范。

〔200〕斯大林曾讲道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见《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 46 页。不过，共产国际在 1926 年却只说“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引自郭：《共产国际》第 170 页。

〔201〕详见郭：《毛的道路》第 112 页及下一页。

〔202〕见吕：《伟大的历史》第 171 页及以下几页。

〔203〕见翦：《两宋》第 137 页。

〔204〕见侯：《抗日民族》第 42 页及下一页。

〔205〕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 53 页。

〔206〕见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241 页。

〔207〕那些在此期间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家，例如侯外庐、胡绳和翦伯赞等人没有参与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运动，这是可以理解的。

〔208〕见范：《谁革命》何：《命运二种》和吕：《国共两党》。

〔209〕从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来看，范文澜和何干之对于这些问题

并无特别的研究。

〔210〕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16 页。侯在《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7 页中明确谈道，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211〕胡：《怎样观察》（1940 年 6 月），第 179 页和胡：《欧洲》第 4 页。

〔212〕吕在这里把“弱小国家”的范畴引入下面所谓的“弱小民族”之中了。他早在 1929 年就提到“弱小民族”并且论述说，中国作为三民主义的祖国……应当领导全世界的弱小民族。见吕：《中国外交》第 311 页。

〔213〕吕著《目前国际》第 1 页和翦著《中国抗战》第 311 页都谈到了“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之一个战役”。

〔214〕见侯：《抗日民族》第 53 页。

〔215〕参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决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5 年版。

〔216〕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8 页及下一页。

〔217〕见例如胡：《欧洲》第 4 页。

〔218〕见侯：《抗日民族》第 69 页。

〔219〕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33 页。

〔220〕见吕：《目前国际》第 3 页。

〔221〕侯：《抗日民族》第 63 页。

〔222〕此处是以 1939 年 9 月 1 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的。关于世界大战开始的日期，中国历史学家曾在 1979 年就下列问题展开过讨论，即世界大战是以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事件还是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参见 1979 年 8 月 19 日的《光明日报》。

- [223] 见胡:《反对思想》第 268 页 和翦:《欧战》第 13 页。
- [224] 见《中日战争史》第 13 页。
- [225] 见勃兰特施瓦茨和费正清:《共产主义》第 175 页。
- [226] 申克著《旅行》第 283 页及以下几页对于动员保卫或者放弃武汉的问题有详细的论述。
- [227] 何:《转变期》第 133 页。
- [228] 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20 页及下一页。
- [229] 见胡:《抗战》第 1 页。
- [230] 见胡:《抗战》第 1 页。
- [231] 见侯:《抗日民族》第 83 页及以下几页。
- [232] 同上 第 87 页。
- [233] 例如翦在《两宋》第 126 页就发表了有关速胜论的见解。
- [234] 见申克:《旅行》第 283 页及以下几页。
- [235] 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20 页及下一页。
- [236] 见吕:《目前国际》第 3 页。
- [237] 见申克:《旅行》第 284 页。
- [238] 参见第 5 章注释 [26]。
- [239] 见胡:《抗战》第 1 页。
- [240] 见胡:《反对思想》第 268 页。
- [241] 见胡:《思想方法论初步》第 21 页。
- [242] 侯:《抗日民族》第 83 页及以下几页。
- [243] 见侯:《三年》第 50 页。因为侯是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下从事写作的,有时不能也不允许表述得极其精确,所以应当对这句话作进一步的解释。
- [244] 详细参见罗梅君:《关于‘中国化’的讨论》第 24 页及以下几页。

- 〔245〕参见第 6.2.1 章节和第 6.2.2 章节。
- 〔246〕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16 页。
- 〔247〕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5 页。
- 〔248〕翦：《文化史》第 71 页。此处好象是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 13 卷）第 8 页及下一页的改写。
- 〔249〕吕振羽的出发点是早在 1935 年文化运动便通过与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和民族抗日运动的结合而被深化和发展了。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00 页。在文学界早在 1936 年初周扬就以建立“中国作家联合会”——该联合会以团结所有主张抗日的作家为宗旨——而开始为统一战线工作了。中国作家联合会拥护“国防文学”。参见戈尔德曼：《文人异议》第 12 页。
- 〔250〕参见罗梅君：《陈伯达和艾思奇》第 67 页及以下几页。
- 〔251〕参见罗梅君：《陈伯达和艾思奇》第 72 页及下一页。
- 〔252〕除何干之以外，艾思奇、吴清友、李凡夫、夏征农、柳乃夫和刘群等人也参加了这次座谈。见艾思奇和吴清友，第 16 页。
- 〔253〕同上 第 16 页及下一页。
- 〔254〕侯在《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中最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 〔255〕这些论文于 1939 年结集为《在文化阵线上》一书出版。
- 〔256〕胡绳关于文化运动的见解最清楚地显示在他结集出版的《理性与自由》一书的论文之中。
- 〔257〕下列集中起来论述的内容，其证据散见于各位作家的论著。

〔258〕吕振羽尤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种种观点，见《日本法西斯蒂》和《评佐野袈沙美》胡绳深刻批判了冯友兰和钱穆的观点（见《理性与自由》中的论文）而翦伯赞则撰写了一篇评论实验主义的论文——《评实验主义》。

〔259〕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1 页及下一页。

〔260〕同上第 4 页。

〔261〕见同上第 4 页。侯说“革命人文主义”一语也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他并没有列举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参见同上注释〔12〕。

〔262〕同上第 3 页及以下几页。侯否定了所有对于文化运动的定性分析 这些分析表现在所谓战时文化、民族文化、“理性运动”或者“科学化运动”等要求之中 因为按照他的意见，上述要求只揭示了文化运动，或者当时的政治要求的某一部分。

〔263〕同上第 16 页。

〔264〕同上第 7 页。

〔265〕同上第 16 页。

〔266〕同上第 22 页。

〔267〕同上第 10 页。

〔268〕同上第 15 页。

〔269〕同上第 16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知”和“行”的概念对子也参见鲍尔第 463 页及以下几页。

〔270〕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16 页。侯外庐因为以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作为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所以与更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陈伯达和胡绳有显著差别，但是就政治宣传的目标而言，这三位作家在争取民族独立，拥护反

封建的启蒙运动方面意见完全一致。

〔271〕参见第 5.2.1 章节。

〔272〕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15 页。

〔273〕在侯外庐那里，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斗争方向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下列情况中，即侯在关于运用旧形式宣传新内容的讨论中，对旧形式的运用持否定态度。参见第 6.2.1 章节。

〔274〕见胡：《青年》第 176 页及以下几页。

〔275〕同上第 177 页。

〔276〕胡：《理性与自由》序第 2 页。

〔277〕胡绳在 1937 年只把理性主义思潮看作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胡：《哲学组 理性主义》第 124 页），但是到 40 年初，他便在以分析冯友兰的“新理性”为重点而写的论文中，把理性主义思潮当作文化和思想界中的主要倾向而置于首位了。见胡：《反理性主义》第 2 页。

〔278〕见胡：《反理性主义》第 2 页。

〔279〕见胡：《这就算》第 41 页。

〔280〕见胡：《什么是》第 130 页。

〔28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4 页及以下几页。

〔282〕见胡：《新文化》第 36 页。

〔283〕同上第 38 页和胡：《理性与自由》第 2 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2 页对这句名言的解说。

〔284〕见胡：《新文化》第 37 页。

〔285〕历史学家谈道“文化遗产的继承”、“吸收和吸取世界文化的进步成果”、“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第 110、119、124 页）；中国学术传统继承（见侯：《中国学术》第 11 页）就本论文所涉及的

史料而言，历史学家是以不同表达方式来标识同一个概念的，该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这两相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同在别文化形式与学术形式相互接触的概念那里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在这里也未作任何区分（参见对于“文化”的理解第5.3章节）。在本论文中，以该概念的历史和历史科学方面为限并通过选用“历史遗产”概念来表示这个方面，是比较合适的。

〔286〕对此范文澜以笔名范蒲韧发表的论文《历史研究和现实》就是一个例子。

〔287〕列宁的两篇主要文献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第31卷第228页及以下几页）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于《列宁全集》（德文版第132页及以下几页）。

〔288〕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53页。

〔289〕胡：《近五年》第18页。

## 第 6 章

〔1〕见徐文珊第133页。关于翦伯赞在重庆具体的生活条件见翦：《中国史论集》第2卷序第3页及下一页。白修德和雅各比第133页及以下几页也详细叙述了知识分子在重庆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2〕这种情况可能也适合于胡绳，但关于他却没有相应的资料。

〔3〕这一点是法兰克斯·程音译——译者教授巴黎告诉我的，他在此期间曾在重庆居住过。

- 〔4〕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7 页。
- 〔5〕同上第 27 页。
- 〔6〕见胡：《近五年》第 18 页。
- 〔7〕见翦：《中国史论集》第 2 卷，序第 1 页及下一页 和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6 年和 1954 年的自序。
- 〔8〕见胡：《近五年》第 18 页 和胡：《新文化的方向》第 38 页。
- 〔9〕见徐文珊第 133 页。
- 〔10〕见白修德和雅各比第 133 页及以下几页的论述，和塞维斯第 105 页及以下几页的论述。
- 〔11〕参见白修德和雅各比，第 135 页关于重庆的教材的论述。
- 〔12〕也有大量知识分子居留在昆明，因为有几所大学撤退到那里去了。
- 〔13〕在罗梅君著《翦伯赞》中 历史学家翦伯赞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关注。
- 〔14〕见徐文珊第 123 页及以下几页。
- 〔15〕同上第 123 页及以下几页。
- 〔16〕在翦著《略论中国史》1945 年版第 32 页和吕著《中国历史研究》第 156 页中，作者明确地与大汉族主义划清了界限。
- 〔17〕见徐文珊第 123 页及以下几页。
- 〔18〕此时，吴玉章是延安的主要科学工作者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人名词典》第 2 卷第 959 页及以下几页中有他的传记。
- 〔19〕吴玉章第 9 页。
- 〔20〕见胡：《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第 36 页。这些评注主要被想象为战争初年对党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批判。
- 〔21〕参见侯：《中国古代史》第 10 页。历史学家吴泽也在 50 年代介绍了这些观点的不同性。参见吴泽，第 8 页。

- 〔22〕参见胡：《近五年》第 18 页及以下几页。
- 〔23〕详细参见第 6.2.2 章节。
- 〔24〕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上海 1950 年版 第 35 页。
- 〔25〕见吕：《关于中国社会》上海 1950 年版 第 1 页。
- 〔26〕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第 2 页。
- 〔27〕同上 序言 第 2 页。
- 〔28〕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36 页。
- 〔29〕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第 2 页。
- 〔30〕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09 页。
- 〔31〕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第 142 页及以下几页。
- 〔32〕这里特别涉及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353 页及以下几页，中文初版见于《毛泽东集》第 7 卷 第 130 页）一文中的论述。
- 〔33〕毛泽东十分宽泛地把封建制度的开始定在周秦时期。他也同样宽泛地指出封建社会的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中，地主、贵族和皇帝构成了统治阶级。毛把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看作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353 页及以下几页。
- 〔34〕何干之虽然有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意图 但没有实现。
- 〔35〕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些论著，所以我在这里是以克里莫夫第 23 页为依据的。在介绍著述情况时，我曾提到吕在 1931 年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章，该文发表在一份日文杂志上。
- 〔36〕见克里莫夫 第 123 页。
- 〔37〕吕在 1934 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使用了“变种

的封建制'的概念 而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里用的却是'专制的封建主义'概念。见翦：《历史哲学》1946年版第165页。

〔38〕见吕：《史前期》。我在这里依据的是北京1961年版。

〔39〕关于出版日期，吕本人讲了几个不同的年份。他在《史前期》自序中以1933年为初次发表的年份 而在《殷周时代》的序中则称之为1934年（实为1933年脱稿，1934年出版——译者）。

〔40〕见本章注释〔4〕。

〔41〕他为这两卷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被容纳到《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简明中国通史》之中了。

〔42〕参见翦伯赞对其史料的批评 载于翦：《历史哲学》1946年版第35页和第36页及下一页。

〔43〕见吕：《史前期》1934年版序第6页。

〔44〕吕在《殷周时代》序第4页中指出 他在写作《史前期》时曾经参考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在行文中也可以见到马克思和列宁对例如奴隶制问题发表的意见，但是这些可能是后来补加的。

〔45〕见吕：《中国原始》第4页。

〔46〕对此 参见何：《中国社会史》第139页。何的批判是针对1933年和1934年版而发的。

〔47〕见吕：《史前期》第15页。波格达诺夫是A·A·马里诺夫斯基的别名，他的《经济理论概要》曾以节选本的形式在1925年和1927年间被翻译成中文。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第23页及下一页。

〔48〕根据何著《中国社会史》第109页 吕在《史前期》1933年和

1934年版第17页中曾提出过下列观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封建主义一致的。这种观点在北京1961年的版本中见不到。

〔49〕吕：《史前期》第9页。

〔50〕参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191页及以下几页，此处详细介绍了马札亚尔的观点。

〔51〕见吕：《史前期》第9页及下一页。

〔52〕吕在1940年就是这样讲的 见《中国社会史上》上海1950年版第64页。

〔53〕吕：《殷周时代》第11页。

〔54〕这一点似乎既与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封建主义的见解相关，又与他否认与亚细亚方式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的历史现象的做法相关。

〔55〕在这里我把吕所使用的“集团”概念统统译为“阶级”。吕在1949年以后再版的著作中也都把“集团”改为“阶级”了。可以认为，1949年以前选用“集团”概念是对国民党书报检查的一种妥协。

〔56〕见吕：《殷周时代》第11页及下一页。

〔57〕同上第84页。

〔58〕同上第11页。

〔59〕同上第11页及下一页。

〔60〕翦也把1936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算作这一类著作了。

〔61〕见翦：《历史哲学》1946年版第17页及下一页。

〔62〕见翦：《历史哲学》1946年版第164页及以下几页。

〔63〕这里主要涉及他的下列论文：《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和《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

〔64〕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年版 第35页。

〔65〕同上 第35页及下一页。

〔66〕普列汉诺夫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即马克思在研究了摩尔根以后改变了自己对亚细亚社会的看法，就是说，他放弃了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一种先于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出现的形态的观点。对此，参见特凯 第5页。

〔67〕这里主要涉及科瓦列夫写于1934年的一篇论文：《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几个根本问题》。

〔68〕见吕：《中国社会史上》1950年版 第64页。

〔69〕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年版 第44页。

〔70〕吕认为 自从科瓦列夫1934年写作《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几个根本问题》和斯大林1935年发表《清算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报告》以及40年代历史科学取得重大成果以来，把奴隶制看作世界史各部分共同必经阶段的观点已经得到‘明确’论述了。见同上 第63页。

〔71〕同上 第39页。

〔72〕见何：《中国社会史》第112页和第118页。

〔73〕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年版 第35页。吕把科瓦列夫的封建主义东洋变种的命题的提出归因于哥德斯的影响。

〔74〕吕在这里使用的是‘集团对立’而不是‘阶级对立’的概念。参见本章注释〔55〕。

〔75〕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年版 第41页及下一页。

- 〔76〕同上第 42 页及以下几页并详见吕：《殷周时代》。
- 〔77〕吕在《“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 年版第 44 页中使用的是“特征”这个概念，而在 1961 年版第 48 页中却改用“特殊性”概念了。
- 〔78〕见同上，1950 年版第 43 页这里用的是“集团构成”的概念，而在 1961 年版第 47 页中改用了“阶级构成”的“阶级结构”概念。在 1961 年版第 47 页中除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外，吕也把生产关系当作亚细亚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
- 〔79〕同上，1950 年 第 38 页及以下几页。
- 〔80〕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08 页。何援引了吕著《史前期》初版的第 47 页。
- 〔81〕根据何：《中国社会史》第 139 页 转引自吕：《史前期》1933 年和 1934 年版 第 25 页及下一页。
- 〔82〕根据同上第 142 页。
- 〔83〕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 年版 第 44 页。
- 〔84〕此处用的似乎是一个别名。
- 〔85〕见吕：《评佐野袈沙美》。
- 〔86〕见吕：《日本法西斯蒂》第 134 页及以下几页。
- 〔87〕见同上第 147 页及以下几页。吕之所以要特别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一种同先前一样在中国存在的拜外主义的基础上看到了下列危险，即这些思想可能会在中国产生影响，特别是因为按照吕的见解秋泽修二利用了错误的大民族主义的波克罗夫斯基的思想。也见同上，第 133 页。
- 〔88〕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 年版 第 52 页。
- 〔89〕同上，1950 年版 第 52 页。
- 〔90〕吕在这个关系中运用了隐晦的、模棱两可的论证方法。因为

我这方面的总结已经意味着对于某些解说的肯定了，所以特将这几段的内容比较详细地复述出来。

〔91〕见吕 同上，1950年版 第 54 页及下一页；1954 年版 第 68 页及下一页；1961年版 第 62 页及下一页。在后来的版本中只有细微的差别，但与 1950 年版相比却差别甚大。与 1950 年的行文不同，现在，吕不再强调异族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了，他更强调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其他种族人民的压迫及其无法解决民族矛盾以致于发生战争和帝国的分裂等情况。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遭到惨重的破坏、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这样的论证是以把中国视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为基础的。而那些在 1950 年还被称作异族的外来民族，现在则同汉族一起被统一到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中了。也参见 1954 年修订本《简明中国通史》第 8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统一的华族的形成和各种族同化过程的论述。

〔92〕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年版 第 55 页。在 1961 年版第 63 页中 论证更加系统 即对于国内市场扩大、私营手工业和自由商业资本发展的阻碍、对自由商业资本向高利贷和土地投资的转化的促进、国营手工业、商业和国家与官僚、地主与商人三位一体的对外贸易的形成。吕在这里采纳了陈伯达的三位一体概念，而后者是把该概念与封建的土地所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资本这三种所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93〕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 年版 第 55 页。在 1954 年版第 70 页和 1961 年版第 64 页中，吕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谈及明清交替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但是这一

萌芽却被满清绞杀了。他也谈及资本主义萌芽在康熙执政中期在广州等地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但是它后来又被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入侵束缚住了。

〔94〕见吕同上,1950年版,第55页。在1961年版第65页中,这一发展被附带说成是“波浪式”的。

〔95〕同上,1950年版,第55页。

〔96〕见吕:《伟大的历史》第172页。

〔97〕见吕:《中国社会史上》1950年版,第95页及以下几页。

〔98〕同上,1950年版,第66页及以下几页。

〔99〕见同上,1950年版,第77页。在该版中,吕依据的是博古翻译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一书,而在1961年版第92页中,吕又从另一译本中摘录了更长的段落。

〔100〕见吕:《中国历史研究》第150页及以下几页。

〔101〕同上,第153页。

〔102〕就是1961年重新出版的他发表于40年代的文章,也只在个别地方作了加工。见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

〔103〕吕同江明一起编写了《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未加任何改动的第二版出版,一直叙述到鸦片战争。我没有见到该版本,我在这里依据的是1955年经过修订的新版本。经过大幅度修改扩充的两卷本《简明中国通史》是在1961年在北京出版的。

〔104〕见吕:《简明中国通史》1941年序。

〔105〕同上,1948年序,第2页。

〔106〕例如见吕关于向奴隶制社会过渡中的国家所有的形成和  
社会的阶级分化的论述。吕:《简明中国通史》第46页及以

下几页。

〔107〕J·哈里森著《共产党人与中国的农民暴动》第 36 页也赞同这个观点。

〔108〕见吕：《初期封建制》、《国共两党》、《进入专制主义》、《商朝》、《西周初期》、《由初期封建制》、《由封建》、《原始公社》。

〔109〕吕在《史前期》1940 年序中讲道：1934 年《史前期》一书发表后曾受到某些人的热烈反对，但也获得许多人的赞成，甚至被翻译成日文。

〔110〕吕在《中国原始》1945 年序中讲道 他要把《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更名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开始阶段的历史》。

〔111〕在修订那些早在 40 年代就获得过再版的关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殷周时代》)和中国社会史前史(《史前期》)的著作时，胡绳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吕在序言中曾向他和沈志远致谢。见吕：《殷周时代》1946 年序 第 1 页。

〔112〕见吕：《中国民族简史》。吕在这部简史中改正了一些有关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的“错误观点”。他自我批评地承认，他在自己关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中也严重忽视了统治阶级反对少数民族和本国人民的政策。见吕 同上 序 第 3 页。

〔113〕见吕：《中国民族简史》1947 年序 第 3 页。

〔114〕见《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第 26 页和克里莫夫 第 116 页。

〔115〕见克里莫夫 第 123 页。克里莫夫大概利用了翦伯赞 193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三民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

农村社会》等论文。

- [116] 见翦：《中国史纲》和翦：《中国的母系》第 85 页。对吕振羽的部分批评意见见于他的《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64 页及下一页。
- [117] 见翦：《邓初民和吴泽》第 4 页。
- [118] 科瓦列夫和 W·司特鲁威首先在列宁格勒会议上修正了他们先前关于特殊的东方形态的存在的观点。后来在 1933 年，W·司特鲁威这位堪称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东方奴隶制变种的观点的开创者，又把这一变种理论引入了讨论。科瓦列夫采纳了该命题，到 30 年代中期 该命题便充斥于苏联的文献之中了。1938 年它也在《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中得到了认可。参见古尔加 第 1506 页。
- [119] 翦：《介绍一种》第 727 页。
- [120] 翦指责马札亚尔盲目的公式化和抽象的形式主义。见翦：《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第 119 页。
- [121] 按照德里克著《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101 页的说法 胡秋原和王礼锡曾提出过专制主义社会的理论。
- [122] 翦：《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第 119 页及以下几页。
- [123] 同上 第 131 页及下一页。
- [124] 同上 第 119 页及以下几页。
- [125] 见翦：《解释中国》第 1163 页及以下几页。
- [126] 见翦：《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第 120 页 并参见翦：《历史哲学》各处。
- [127] 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2 页及下一页。同上 第 136 页 翦同样批评了 30 年代初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128〕同上 序 第 3 页及下一页。

〔129〕同上 第 1 页及下一页。

〔130〕同上 第 3 页。

〔131〕同上 第 23 页。

〔132〕同上 第 23 页及以下几页。

〔133〕同上 第 48 页。

〔134〕同上 第 48 页。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问题产生于对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的一般认识。但是，本论文所涉及的其他历史学家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到此处来考察。事实上，他们似乎还不曾把这个问题当作这样的问题来讨论。因此，在本论文的范围內，不便对有关主客观因素在历史中的统一的观点作过多的论述。

〔135〕同上 第 49 页。

〔136〕参见同上 第 49 页及以下几页和 59 页及以下几页。

〔137〕参见同上 第 53 页和第 58 页。在此 翦对吕振羽也作了分析。他认为，吕虽然在其著作中清楚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关联原理，但却没有具体地运用这一原理。因此，吕虽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考虑到了中国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影响。见同上 第 60 页及下一页。

〔138〕同上 第 33 页及以下几页。

〔139〕同上 第 29 页及以下几页。

〔140〕同上 第 30 页。

〔141〕同上 第 31 页。

〔142〕参见同上 第 31 页。按照翦本人的说法，他的这个观点使他接近了郭沫若 但他同时又批评郭“太拘泥于公式”。同

上 第 32 页。

〔143〕同上 第 32 页。

〔144〕同上 第 35 页。

〔145〕参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11 页及以下几页。

〔146〕对此 参见第 6.1 章节。

〔147〕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32 页。

〔148〕至今为止，这个名字尚不能被确认。

〔149〕参见同上 第 168 页。翦批评鲍格呵夫说 鲍对历史阶段所作的划分是公式主义的。见同上，第 168 页。

〔150〕参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24 页及下一页。

〔151〕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68 页。

〔152〕参见翦：《中国史纲》。对于史前史和古代史的个别问题 翦分别以论文的形式进行了讨论。这些论文大都未提供多少原始资料 而主要是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 此外 内容上也另有侧重。参见例如翦：《夏族》第 35 页及以下几页、《殷族》第 70 页及以下几页、《诸夏》第 48 页及以下几页和《中国的母系》第 83 页及以下几页。

〔153〕参见翦：《中国史纲》第 1 卷 第 157 页及以下几页和第 259 页及以下几页 第 2 卷 第 1 页及以下几页。

〔154〕在此 翦是在“社会”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的。也参见翦伯赞作为上层建筑的同义词的文化概念，见翦：《文化史》第 71 页。

〔155〕参见例如翦：《中国史纲》第 1 卷 第 227 页。

〔156〕同上 第 226 页及下一页。

〔157〕邓：《中国的历史编纂学》第 147 页。

〔158〕例如翦早在《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第 62 页中就谈到

了匈奴人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后来他在《中国史纲》第 2 卷第 438 页及以下几页中又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

〔159〕见翦：《中国史纲》第 1 卷 第 174 页及下一页。

〔160〕同上第 2 卷 第 29 页及下一页。在别的地方，翦也十分强调剥削关系 参见翦：《历史哲学》 上海 1946 年版 第 43 页。

〔161〕见翦：《中国史纲》第 2 卷 第 29 页及下一页。

〔162〕同上第 1 卷 第 159 页。

〔163〕同上第 2 卷 第 28 页。

〔164〕同上 第 475 页。

〔165〕同上第 447 页。

〔166〕参见翦：《历史哲学》 上海 1946 年版 第 18 页。

〔167〕见翦：《略论中国史研究》 厦门 1945 年版 第 44 页。

〔168〕见翦：《东汉》第 50 页及以下几页。

〔169〕见翦：《中国史纲》第 2 卷 第 596 页。

〔170〕见翦：《略论中国史研究》 厦门 1945 年版 第 48 页。

〔171〕同上第 33 页。

〔172〕同上第 40 页。

〔173〕同上第 38 页及下一页。

〔174〕参见翦：《历史哲学》 上海 1946 年版 序 第 2 页及下一页。

〔175〕参见第 6.1.6 章节关于胡绳的观点。

〔176〕参见第 6.2.2 章节，其中介绍了历史学家对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

〔177〕参见何：《中国历史》第 344 页。

〔178〕何的著作《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曾在 4 个月内 3 次再

版发行 后来在 1939 年又以《转变期的中国》的新书名出版，这一版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只是增写了开头一章。参见何：《转变期》序。

〔179〕同上 序。

〔180〕参见何：《中国历史》第 345 页。

〔181〕何：《中国启蒙运动史》。

〔182〕何：《关于亚细亚》第 338 页。

〔183〕翦伯赞批评何，说他没有尽量地运用具体的历史材料，仍然偏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参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8 页。

〔184〕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4 页。何在本书中也从他本人先前的著作中抄录了大段引文，参见例如第 10 页和第 17 页，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些较早的著作。

〔185〕德里克著《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15 页参照了何干之的这个分期 但没有 1 认真判断他的史料。与之不同，就我所拥有的何的著作来看，何认为东周时期已经是封建社会了。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3 页和第 156 页。

〔186〕见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2 页。

〔187〕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2 页。何在这里提到了他与邓云特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停滞问题的论战。

〔188〕同上 第 5 页 。

〔189〕同上 第 9 页及下一页。

〔190〕同上 第 28 页及下一页。

〔191〕同上 第 10 页。

〔192〕同上 第 5 页 。

〔193〕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40 页及下一页。不过恩格斯并没

有讲古代奴隶制的三条道路，而是讲氏族社会解体后国家的三种主要形式 雅典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罗马和日耳曼的形式。见 F·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 21 卷 第 164 页。

〔194〕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12 页及以下几页。

〔195〕也参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239 页。

〔196〕见何：《关于亚细亚》第 334 页。

〔197〕同上 第 334 页。在对他的观点的批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何干之为这一观点和其他观点辩解说，他并非只是陈述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以社会科学的发现者的天才指示和大量进步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为基础的。见同上 第 344 页。

〔198〕见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3 页。何的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与他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的论述一样的。

〔199〕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5 页及下一页。在解释马克思关于希腊罗马和古代东方正常的和非正常的艺术的边注时，何也论述道 希腊罗马的艺术 建筑在奴隶劳动之上 与当时的生产水平，并没有什么不调和的，而在东方的进贡制之下，艺术相对于它本来应当适应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却更显繁荣。

〔200〕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8 页及下一页 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3 页及下一页 和何：《关于中国社会》第 458 页。

〔201〕参见何：《中国社会史》第 118 页。

〔202〕同上 前记 第 3 页及下一页。在这个问题上，何与翦伯赞意见一致 参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35 页。

〔203〕见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3 页及下一页。

- [204] 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17 页。
- [205] 参见洛伦茨 第 51 页。
- [206] 见何:《关于中国社会》第 458 页。
- [207] 见何:《转变期》第 10 页和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3 页及下一页。
- [208] 翦伯赞用“劳动地租”一词复述“Arbeitsrente”术语,参见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68 页。
- [209] 例如翦伯赞就不同意这个观点。参见第 6.1.2 章节和翦:《历史哲学》上海 1946 年版 第 168 页及下一页。
- [210] 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24 页及下一页。
- [211] 见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4 页。
- [212] 但是在别的地方何的讲法又有所不同,他说,在封建社会中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参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5 页。
- [213] 吕振羽认为这些命题同雷哈德所谓过渡社会的命题一样,都是科瓦列夫所阐述的亚细亚社会为奴隶制度的变种的命题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他还指出 到现在 进步的史学家对“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的见解 原则上 不是赞同科瓦列夫 就是赞同雷哈德或早川。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上海 1950 年版 第 36 页及下一页。
- [214] 见何:《中国的过去》第 45 页和何:《中国社会史》前记 第 3 页。
- [215] 见何:《转变期》第 9 页及下一页和何:《关于中国社会》第 458 页。
- [216] 参见特凯 第 82 页及下一页。
- [217] 参见第 6.1.1 章节。

- 〔218〕这里提到了郭沫若原先的观点，当时，郭还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同于氏族社会 参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145页及下一页。
- 〔219〕见何：《中国社会史》第201页及以下几页。
- 〔220〕同上第145、156页和第149页及以下几页。
- 〔221〕同上第140页及下一页。
- 〔222〕见何：《关于亚细亚》第338页。
- 〔223〕见何：《中国社会史》第157页。
- 〔224〕同上第200页。
- 〔225〕同上第156页。
- 〔226〕同上第160页。
- 〔227〕同上第161页。
- 〔228〕见何：《中国的过去》第32页及以下几页。
- 〔229〕见何：《中国社会史》第199页及下一页。
- 〔230〕何本人说 他是在三五个星期内写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 他自觉对于中国问题是一个“门外汉”并说自己的书“不成样子”。见何：《转变期》改订版序。
- 〔231〕郭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是这样表述的。
- 〔232〕见何：《中国的过去》第28页及下一页。
- 〔233〕见何：《中国社会性质》第81页。
- 〔234〕同上第81页。
- 〔235〕德里克把何干之的见解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般的一致意见来介绍。他说，这些见解意味着“接受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及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而不一定必须承认中国“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见《革命和历史——起源》第220页。但是德里克没有注意到这两位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变种”和不同“道路”观点之间的差别。

〔236〕见侯：《苏联历史学界》第 26 页和 29 页。侯的第一篇文章是《社会史论导言》。

〔237〕侯经过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在此期间，他消除了先前所怀有的对于苏联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的疑窦。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此处所提及的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古代东方的道路”的观点，为他 1943 年以后的论著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观点却是逐渐形成的。  
见侯：《苏联历史学界》第 26 页。

〔238〕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第 4 页。

〔239〕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第 2 页和在侯著《苏联历史学界》第 29 页及以下几页中对此的详细分析。

〔240〕见侯：《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第 16 页。

〔241〕在侯著《苏联历史学界》第 29 页及以下几页中有对雷哈德“过渡阶段”论的详细分析。

〔242〕恩格斯曾经谈到氏族社会解体后国家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罗马和日耳曼的形式。见 F·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1 卷第 164 页，也参见何：《中国社会史问题》第 140 页及下一页。

〔243〕对于思想史，侯特别强调指出，它也遵循着一般的发展规律，并不存在特殊的东方思想和东方文化结构。参见侯：《中国思想通史》序第 1 页。

〔24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3 卷第 9 页。

〔245〕侯：《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第 21 页。

〔246〕见侯：《东方》第 46 页。

〔247〕同上第 46 页。

〔248〕同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第 4 页。侯在这部著作中详细论证了他的命题。在此他同郭沫若意见一致，也把西周评价为奴隶占有制社会。

〔249〕见侯：《屈原思想的秘密》第 20 页。

〔250〕与之不同，郭沫若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修改了这个观点。对此详见德里克：《革命和历史——起源》第 167 页及以下几页。

〔251〕见侯：《东方》在此这个观点得到了详细论证。

〔252〕详见侯：《中国古代氏族》。

〔253〕参见侯在《新民主主义》中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不用社会形态范畴而代之以编年式的阶段划分——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倾向。这可能是国民党政府实行书报检查的结果，但这种倾向在内容上无法断定。参见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54 年自序第 6 页及下一页中关于由书报检查所限制的表述方式和措辞的说明。

〔254〕见侯：《社会史论导言》。

〔255〕见佩原著误，应为佩——译者巽在其对侯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的书评载于 1943 年 3 月 21 日的《新华日报》中所讲的话。

〔256〕侯在这里也反对郭沫若的观点，后者曾经论证说，中国因为缺少蒸汽机，所以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阶级。见侯：《社会史论导言》第 82 页。

〔257〕见同上第89页。侯外庐在这里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有的人却与之不同，恰恰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看作“社会内部辩证法的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侯外庐曾经呼吁人们，在从事资本主义研究和试图把握中国的未来之前，无论如何，必须首先深入研究诸如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对于这一呼吁，我们也应从上述不同观点的背景来看。见侯外庐著：《社会史论导言》第89页。

〔258〕侯外庐自称是郭沫若的学生侯：《屈原思想渊源》1942年4月20日）他说他从郭的著作中获益匪浅，郭的著作在他本人从事历史研究时曾给予他“不可估计的帮助”（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第5页）但他在关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问题上与郭沫若意见不一。他在自己关于屈原评价的文章中也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观点。论战是由郭沫若1942年1月完成的关于诗人屈原的历史剧而触发的。3月和4月侯的文章侯：《屈原思想渊源和屈原思想的评量》和侯：《屈原思想的秘密》）分别在《新华日报》和《中苏文化》上发表。历史剧《屈原》的主要内容是楚怀王与诗人政治家屈原之间围绕着反抗秦国还是与秦国合作问题而展开的斗争。那位没有能力统治国家的国王准备妥协，而屈原则怀有“高贵的统治者”的幻想，公开而且无畏地主张抵抗，不过他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国王，以致于最终失败，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1978年在北京出版了一个新版本的英译剧本《屈原》）。这个历史剧不光号召抗击外国侵略者，在当时也特别号召抗日，而且也以楚怀王其人影射蒋介石没有能力

也不愿抗日。

在论战中，首先涉及到对屈原的世界观和方法的评价。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世界观是进步的，而他的方法，即消极反抗却是反动的。与之相反，侯外庐认为，屈原的世界观即他对于“高贵的统治者”的信赖是反动的而他探求真理的方法却是进步的（侯：《屈原思想的秘密》第 18 页）。侯还比较了屈原和王国维，后者同样在暴风雨时代“坚持”错误的“世界观”但总起来看却采取了科学的态度（见同上第 18 页）不管怎样有一点不能排除即郭沫若实际把自己等同于屈原了，而且这一讨论最终也是涉及他本人的。

〔259〕见侯：《屈原思想的秘密》第 19 页。

〔260〕对“礼”的概念的解释也见于侯外庐著《简史》（英文版）第 3 页。

〔261〕侯：《屈原思想的秘密》第 19 页及下一页。在《屈原思想渊源》中，城市与农村不可分割的统一也被强调为特殊性。

〔262〕见侯：《屈原思想的秘密》第 20 页。

〔263〕见同上第 20 页。在《屈原思想渊源》中侯也分析了诸如“封建”、“革命”、“维新”、“共和国”、“民主”等概念的转用问题。他认为人们必须摘掉西方的眼镜以便能够正确认识这些“经过装扮的”概念对于中国的真实内容。

〔264〕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265〕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 352 页及以下几页。

〔266〕关于今文学派见利文森：《儒家学说的中国》第 1 卷第 79 页及以下几页。

〔267〕见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第 2 页。侯在这个关系中

也指出：人们必须利用外语这门工具，必须直接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翻求知识。同上 序言 第 3 页。

〔268〕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第 3 页。

〔269〕侯外庐在其论述中虽然是从这个思想出发的，但他的结论却完全是从中国历史的原始史料中推论出来的，即从甲骨文中推论出来的，他曾化费很大气力来释读这些表意文字 还有从《诗经》到司马迁《史记》的文献资料。侯也认真研究了郭沫若、蒋梦麟、顾颉刚和王国维的论证 但他没有提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事吕振羽和翦伯赞。在他的论著中，分析批判别人的观点并不特别重要。他还经常与希腊罗马进行比较，但又不详细论述这些比较。

〔270〕侯在他的《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第 21 页中 明确地把“路径”概念理解为“种”。

〔371〕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第 67 页。

〔272〕见同上 第 88 页及下一页。侯在这里精确地指出，城市与农村的第一次分裂发生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第二次分裂则在战国和秦代。在第二次分裂过程中，农村成为生产的主要出发点，这个时期，土地私有制也出现了。见同上，第 104 页。

〔273〕见同上 第 118 页。该书当时就被一位评论家称作继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之后的“优秀作品之一”侯做了很好的史料研究工作，并“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来把握客观社会性质”。不过 他对民族社会（这里大概是指氏族社会——作者）向古典社会的转化的论述和对东方古典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表述，不易理解。见佩原著误 应为佩——译者巽 载于 1943 年 3 月 21 日的《新华日报》。后一种批评

基本上是恰如其分的，事实上，侯正如他后来在《苏联历史学界》第 26 页中所作的论述一样，已经发展了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而用“古典”这个术语。胡绳在评论侯的《史论》时强调指出它是“一本精致的著作”。见胡：《近五年》第 19 页。

〔274〕侯：《中国古代思想》。

〔275〕见同上，1942 年序。我所依据的是侯外庐 1950 年修订过的版本，因为我手头没有该书的初版。O·布里勒：《50 年》第 81 页指出侯在该书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古代中国的智慧远远超过了古代希腊的文化”。

〔276〕见侯：《中国古代思想》第 1 页。

〔277〕见侯：《中国古代贤者》第 244 页。

〔278〕列宁曾在 1912 年 11 月写过一篇标题为《Das erneuerte China》的文章 该文中译本以《维新的中国》的名称发表。见《列宁全集》（德文版）第 18 卷，第 393 页及下一页。陈伯达在《新人生观的创造》第 22 页介绍过《维新的中国》这个中文题目。该文也从 40 年代初起就在中国著名了。

〔279〕见侯：《东方》第 52 页。早在 1943 年侯就谈道 古代东方奴隶占有制社会国家的使命是“维新（“其命维新”）侯：《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第 4 页。

〔280〕见侯：《东方》第 49 页。

〔281〕同上 第 51 页。

〔282〕见侯：《中国古代文明》第 32 页。

〔283〕例如侯：《东方》第 46 页。

〔284〕见同上 第 52 页和侯：《中国古代氏族》第 37 页。不过，在下一论文中，侯用“变种”论主张者的术语讲道 中国历史

直到中世纪都没有走上“典型的”封建路径。

〔285〕侯：《中国古代文明》第 31 页。

〔286〕见侯：《东方》第 50 页。

〔287〕见同上。这里可能与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参见本论文第 5.2.1 章节。

〔288〕侯：《中国古代氏族》第 37 页。就是翦伯赞也经常强调历史的“具体真理”。见第 6.1.2 章节。

〔289〕侯：《苏联历史学界》。

〔290〕见同上。在这本书中 侯介绍了他下列论文的主要内容 即《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古代贤者》。

〔291〕见侯：《汉代社会》第 30 页。此处没有涉及那些关于近世——包括 17 世纪以来的时间跨度——思想史的论著（侯：《中国近世思想》、《近代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通史》）。

〔292〕侯本人引进了“社会编制”的术语。见侯《汉代社会》第 30 页。

〔293〕同上第 30 页。

〔294〕同上第 37 页。

〔295〕同上第 36 页。侯在该论文中作了仔细的概念说明。例如他指出 那些被称为“自由民”的人事实上就其活动和地位而言具有农奴的身份。同上第 37 页。据此 侯也兑现了他自己提出的澄清概念的要求 参见本章注释〔263〕）。

〔296〕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不过侯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及他早在 1943 年就发表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因为侯外庐当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下写作该书中的主

要论文的，所在，按照他自己的陈述，他也作了一些术语上的让步。他避免使用‘阶级’二字，用‘文明社会’的术语代替‘阶级社会’。侯外庐说：苏联历史学家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把这些术语当成了他的专门语汇。顺便提一下，苏联历史学家同美国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该书的出版都做了积极的反应。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6年和1954年自序。

[297] 中文术语“材料”在这里包含了由德文“Fakten”、“Material”和“Quellen”等术语所表示的内容的总和，它在中文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根据上下文，我选择了不同的德语词汇予以表达。

[298] 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第1页。

[299] 见同上自序第3页。在这个表述中，最终表达了特殊与一般的分离。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他们掌握的所有资料一般化了的的东西，而特殊则指中国历史学家从中国历史一般化了的的东西。

[300] 侯：《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1949年版，1946年自序。1963年该书的修订版以《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为书名在北京出版，1946年自序中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

[301] 克里莫夫第116页却列举范文澜为30年代初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我从未见到过有关材料，就是在《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也没有任何线索。

[302]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于《毛泽东选

集》第2卷第353页及以下几页。

〔303〕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第142—160页。

〔304〕参见《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第2卷第12页及下一页。

〔305〕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1965年第11版第1卷，1954年或者说1962年（修订本）绪言第7页和范：《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第22页在这方面的首次自我批评。

〔306〕见范：《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

〔307〕参见第6.2章节的论述。吴玉章的传记也见于《中国共产党人名词典》第4卷第959页及以下几页。

〔308〕见范：《关于上古历史》第11页及以下几页。范研读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和斯大林1939年写的几篇文章，当时他正在新四军地区从事宣传工作。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359页。

〔309〕见范：《关于上古历史》第113页。

〔310〕同上第111页。

〔311〕同上第112页及下一页。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第150页。

〔312〕见范：《关于上古历史》第113页。

〔313〕同上第114页。

〔314〕见《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第359页及以下几页。他的这些著作早在1947年就经过了第一次加工整理。我所使用的最早版本是经过另一次加工的1953年版（第1编）和1958年版（第2编）以及根据1955年俄文本转译的德文本《中国近代史》。1965年经过大幅度扩充和加工的三卷本新版《中国通史简编》问世了。1978年《中国通史》的头几卷又在北京出版，范文澜为前4卷（直到1960年）的作

者 而第 5 卷 (宋代 ,960—1189 年) 的作者是蔡美彪等人。我个人认为 我所掌握的 50 年代的版本其基本倾向与 40 年代的版本相近。不过这些版本只涉及到南北朝时代 (420—589 年) 的中国历史 此后直到 1840 年的历史在这里未被加以考虑。

〔315〕 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1 编 第 50 页。

〔316〕 见范:《关于上古历史》第 113 页。

〔317〕 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1 编 第 39 页及下一页。

〔318〕 同上 第 82 页。

〔319〕 范在另一个地方也把王、后、卿、大夫等算作领主了。见范:《研究中国》第 108 页。

〔320〕 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1 编 第 152 页。

〔321〕 同上 第 222 页。

〔322〕 同上 第 225 页。

〔323〕 特别参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8 年版 第 2 编 第 23 页。

〔324〕 同上 第 264 页及以下几页。

〔325〕 参见范:《中国近代史》。

〔326〕 见范:《研究中国》第 108 页及以下几页。

〔327〕 同上 第 108 页及以下几页。

〔328〕 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329〕 同上 第 19 页。

〔330〕 同上 第 3 页及以下几页。

〔331〕 参见:《中国社会》第 14 页及以下几页。

〔332〕 见范:《中国封建》第 10 页。

- 〔333〕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6页及下一页。
- 〔334〕见范：《中国封建》第13页及以下几页。
- 〔335〕同上第17页及以下几页。
- 〔336〕马克思：《资本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379页。
- 〔337〕参见范：《中国封建》第23页及下一页。范的这些论述基本上同《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页的论述一样。在后来的修订版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的论述被删掉了。参见施拉姆，《毛体制》第97页。
- 〔338〕这里涉及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该书在1955年被译成英文。
- 〔339〕胡绳本人在1948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版序言中就是这样讲的，这段话也被英文本的出版者所引用。
- 〔340〕见胡：《思想方法论初步》第51页。他在这里也明确反对历史循环论。
- 〔341〕见胡：《近五年》第19页和胡：《历史研究》第91页。
- 〔342〕见易琴第518页。易琴曾对胡绳1938年初版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一书作过评论。
- 〔343〕见胡：《历史能够》和《历史研究》。
- 〔344〕参照胡：《历史能够》和《评钱穆》。
- 〔345〕见胡：《评钱穆》第68页及以下几页。
- 〔346〕同上第73页及以下几页。
- 〔347〕见胡：《历史能够》第102页。
- 〔348〕这一批评大概也是针对30年代初论战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公式化的解说的。
- 〔349〕见胡：《历史研究》第91页及以下几页。

〔350〕同上 第 93 页及下一页。

〔351〕同上 第 91 页。

〔352〕见胡：《历史能够》第 105 页。胡在这方面走得如此远 甚至说，历史是按照“一治、一乱”规律向前发展的。也见范在《研究中国》第 108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治——乱概念对子的意义的说明，并参见第 6.1.5 章节。

〔353〕见胡：《历史研究》第 93 页及以下几页。

〔354〕见胡：《历史能够》第 103 页。

〔355〕参见侯：《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 年版中的 1946 年自序。在第 6.1.4 章节中也有详细论述。

〔356〕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第 2 页。也见罗梅君：《关于“中国化”的讨论》第 31 页。

〔357〕见胡：《近五年》第 18 页。

〔358〕同上 第 20 页。

〔359〕见胡：《新文化》第 37 页。

〔360〕参见罗梅君：《陈伯达和艾思奇》第 79 页。

〔361〕见季米特洛夫 第 150 页。

〔362〕见吴玉章 第 8 页。吴在这里采用了列宁的论述，正如这些论述被季米特洛夫（见注释〔361〕）第 151 页所引用的情形一样。不过，他也作了一点更正。吴只讲“自觉的无产阶级”而在列宁那里却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或者 吴说，人们必须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侵略主义的敌人”，而列宁却说，人们必须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敌人”。

〔363〕同上 第 9 页。

〔364〕同上 第 8 页及下一页。

〔365〕同上 第 9 页。

- [366] 参见维利 第 461 页。
- [367]《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245 页及下一页。
- [368] 同上 第 357 页。
- [369] 同上 第 446 页。
- [370] 参见罗梅君：《关于“中国化”的讨论》第 39 页。R·维利的出发点是，吸收历史遗产是一个“方法论”，它应当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指导具体的革命斗争。见维利，第 473 页。
- [371] 翦伯赞和何干之关于民族遗产的言论很少，因此这两位历史学家在本章中不予以考虑。
- [372] 参见维利 第 471 页。
- [373] 见吴玉章 第 9 页。
- [374]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357 页。
- [375] 范：《古今中外》第 4 页。这篇文章未被收入 1979 年编辑出版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集》，就是该论文集表格格式简历《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也没有提及。
- [376] 同上 第 4 页。
- [377] 同上 第 4 页。胡绳也采用了这个口号。参见第 5.3.2 章节和第 5 章注释 [283]。
- [378] 见范：《历史研究和现实》第 89 页。
- [379] 参见胡：《历史研究》第 91 页及以下几页。胡绳把消极因素说成是“病态”把积极因素说成是“生力”。见同上 第 100 页。历史在这里被比拟为人体组织，其中病态和生力以相同的方式存在着。“生力”概念也在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 1949 年版 关于 1937 年版序 第 2 页）和保守派历史学家钱穆的论著中有所使用，而後者的论著在其他方面受到了胡绳的严厉批判。

- 〔380〕见胡：《历史研究》第 100 页。
- 〔381〕见胡：《评钱穆》第 73 页及以下几页和 77 页。
- 〔382〕见胡：《评冯友兰著 新世训 》第 153 页及以下几页。
- 〔383〕见胡：《思想方法论初步》第 32 页。
- 〔384〕参见胡绳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第 20 页中对这种立场的批判。
- 〔385〕见侯：《抗战文艺》第 21 页和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8 页。
- 〔386〕见侯：《抗战文艺》第 22 页。
- 〔387〕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8 页。或许吕是在“阶级意识”的意义上使用“意识”概念的。参见第 6 章注释〔362〕。
- 〔388〕同上 第 118 页 和侯：《抗战文艺》第 22 页。
- 〔389〕见侯：《抗战文艺》第 22 页。
- 〔390〕同上 第 21 页及下一页。
- 〔391〕吕：《创造民族》北京 1961 年版 第 114 页 按语。
- 〔392〕同上 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0 页。
- 〔393〕同上 第 117 页。
- 〔394〕吕：《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 1949 年版 关于 1937 年版序 第 2 页 参见第 6 章注释〔379〕。
- 〔395〕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4 页。
- 〔396〕成汤革命标志着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的过渡，而武王革命则标志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参见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48 页及以下几页和第 69 页及以下几页。
- 〔397〕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1 页。
- 〔398〕同上 第 113 页及下一页。

- [399] 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3 页及以下几页 第 16 页和第 22 页。
- [400] 见侯:《抗战文艺》第 21 页和胡:《评钱穆》第 66 页及以下几页。就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6 页中也提出了这个要求。
- [401] 何干之和翦伯赞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但在他们的论著中也表示了这种态度。
- [402] 参见戈尔德曼:《文人异议》第 15 页及以下几页和第 37 页 以及胡绳:《论民族形式问题》第 5 页及以下几页。
- [403] 侯:《抗战文艺》第 22 页。
- [404] 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8 页。
- [405] 参见罗梅君:《关于“中国化”的讨论》第 26 页及以下几页。
- [406] 侯外庐也谈论过唐代佛教的“中国化”见侯:《中国学术》第 14 页。
- [407] 参见周策纵 第 332 页及下一页。
- [408] 见侯:《中国学术》第 10 页和第 14 页。翦伯赞和范文澜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化的要求,但是范拥护这一要求,这一点从他写于 1942 年的《古今中外法》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参见第 6.2.1 章节中的论述。
- [409]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24 页及以下几页。
- [410] 见胡:《评钱穆》第 79 页。
- [411]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25 页。
- [412] 见何:《鲁迅思想研究》第 13 页及下一页。
- [413] 参见周策纵对陈独秀的论述,第 35 页及下一页 第 173 页和第 272 页及下一页。
- [414]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26 页。

- [415] 见侯：《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第 8 页。
- [416] 同上 第 22 页。
- [417] 同上 第 8 页。
- [418] 同上 第 21 页。
- [419]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28 页。
- [420] 同上 第 129 页。这种观点是与吕否定使用旧的民族形式的态度相对应的；适应新内容，也应当创造新的民族的形式。参见第 6.2.1 章节。
- [421] 同上 第 120 页 和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257 页及下一页。
- [422] 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254 页。
- [423] 同上 第 257 页。
- [424]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444 页及下一页。毛泽东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已经被鲁迅使用过的例子，参见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H·C·布赫和翁梅 音译——译者 编辑出版 汉堡 1973 年版 第 156 页。这里主要涉及 1934 年 5 月 2 日的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里的论述。
- [425]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5 页。
- [426]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444 页及下一页。也参见维利 第 466 页及下一页。
- [427]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5 页。
- [428] 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前记 第 2 页。
- [429] 见吕：《创造民族》上海 1950 年版 第 114 页。1961 年吕在此处作了小小的更改，他现在讲道，民族的文化遗产因素决不能‘代替’进步的世界观 或者把两者‘混淆’起来。见同上 北京 1961 年版 第 143 页。

〔430〕同上 上海 1950年版 第 114 页及下一页。

〔431〕见胡：《近五年》第 18 页。在胡绳那里，有趣的是他开始时曾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释为辩证的联系，其中，两个因素具有同等价值。参见例如胡：《为什么》第 29 页及以下几页和胡：《青年》第 180 页。后来，在 1938 年 9 月，他又主张实践第一了；最重要的不是书本，而是在特定形势中形成的工作方法。他以战争的具体过程来说明这一个新的重点的确立：在战争过程中，任何公式化的思想和抽象的形式都将不再适合于具体条件了。参见胡：《反对思想》第 268 页。

〔432〕见侯：《中国学术》第 14 页。

〔433〕同上 第 16 页。

〔434〕侯的出发点是，在中国曾经存在过数百年学术理论与社会实践分离的情况，现在，这一分离已被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所克服，实践与思想的分离已经在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中被克服了。见同上，第 15 页。

〔435〕同上 第 15 页及下一页。

〔436〕参见第 6.1.4 章节关于侯外庐对一般与特殊的理解的论述。

〔437〕见胡：《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和《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侯和罗克汀：《新哲学的教程》。

〔438〕见侯：《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和吕：《评佐野袈沙美的中国历史读本》。

〔439〕J·V·迟在其博士论文《为中国近代唯物主义寻找一位本土祖先》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几个主要问题，并特别论述了从把马克思主义放到本国历史

的连续之中的角度，重新评价哲学史的情况。她对对墨子、王充、范缜、柳宗元、李贽和戴震的重新评价为例进行了具体说明。

〔440〕参见第 5.3 章节的文化观。

〔441〕新启蒙运动的拥护者讲“启蒙运动”，而侯外庐却喜欢用“启蒙时期”概念。

〔442〕见吕：《“亚细亚生产方式”》1950 年版 第 55 页。

〔443〕不过，人们只是泛泛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发展之间的联系，例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思想萌芽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行的。见吕：《中国政治思想史》1955 年版，第 583 页及以下几页。

〔444〕侯：《近代中国思想》第 1 卷 序 第 1 页。

〔445〕见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3 页。除了辛亥革命例外，何对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单独写了一章。他最初采用以启蒙运动——该运动是作为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为标准的分期法，后来在毛泽东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64 页及下一页）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他又改正了这种分期。现在，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帮凶”的斗争成为分期的标准了。特别参见胡：《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446〕见何：《中国思想运动》第 40 页。

〔447〕见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211 页。

〔448〕见侯：《近代中国思想》第 1 卷和第 2 卷。

〔449〕同上 第 1 卷 序 第 1 页。

〔450〕同上 第 1 卷 第 1 页。

〔451〕见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76 页。

- 〔452〕见侯：《近代中国思想》。例如侯指出 谭嗣同就深受墨子、黄梨洲、王船山和公羊派的影响。见同上，第 2 卷 第 748 页。
- 〔453〕见吕：《中国政治思想史》1955 年版 第 583 页及下一页。
- 〔454〕见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59 页。
- 〔455〕同上 第 60 页及下一页。
- 〔456〕见侯：《章太炎关于》第 12 页及以下几页。
- 〔457〕何：《中国启蒙运动》第 153 页。
- 〔458〕同上 特别见第 195 页。
- 〔459〕见侯：《五四》第 3 页及下一页。
- 〔460〕同上 第 3 页及下一页。
- 〔461〕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433 页及以下几页。
- 〔462〕见范：《袁世凯》。
- 〔463〕见范：《汉奸》。
- 〔464〕见胡：《康有为》和胡：《梁启超》。
- 〔465〕见胡：《孙中山》。
- 〔466〕见胡：《洪秀全》。
- 〔467〕见侯：《五卅》和翦：《“五卅”》。
- 〔468〕见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和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 〔469〕见翦：《“五五”》。
- 〔470〕见侯：《中国革命》。
- 〔471〕见范：《辛亥革命》和翦：《辛亥革命》。
- 〔472〕见胡：《鸦片战争》。
- 〔473〕见胡：《近五年》第 20 页。
- 〔474〕阶级斗争观点的拥护者只想使现实的革命经历成为评价

历史现象的决定性标准，而历史主义的拥护者——翦伯赞可算其最突出的代表——则坚决反对把过去当作当前的一个变种来论述的做法 翦：《目前史学》第 27 页）这场论战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准备。参见德里克：《问题》第 465 页及以下几页。

〔475〕胡：《近五年》第 20 页。

〔476〕见范：《汉奸》。

〔477〕范著《汉奸》1949年版的出版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发表议论的。

〔478〕见范《汉奸》1949年版 第 24 页。

〔479〕同上 第 31 页。

〔480〕见胡：《孙中山》第 1 页。

〔481〕见胡：《康有为》和胡：《梁启超》。

〔482〕见胡：《洪秀全》。

〔483〕胡：《近五年》第 18 页。

〔484〕见胡：《孙中山》第 1 页。

〔485〕同上 第 25 页。

〔486〕见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

〔487〕关于正统主义——这是帝国时期中国历史编撰在论证新王朝的合法性方面的一个中心问题——范文澜和翦伯赞曾作专文论述。范文澜把正统主义据为己有，他不仅从正统主义中推论出农民阶级对于正统王朝的三个要求，即抵抗异族侵入、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剥削比较缓和的“仁政”，而且还推论出新的合法政府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封建制度的民主政治以及人民的统一。见范：《正统》第 2 页及下

一页。范因此便对正统原则作出了重新解释。正统问题不再像在帝国时期那样，借助于上天的委托这种意识形态的虚构来解决，而是从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角度来作出回答。与范不同，翦伯赞并不在重新解释正统主义上下功夫，而是转向反对所有利用这种传统的历史编纂手段来确定某一政府的合法性或者非法性的尝试。见翦：《中国史纲》。

〔488〕 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 载于 1945年 4月 25日的《解放日报》第 4页。

〔489〕 同上，1945年 4月 25、26、27日的《解放日报》各自的第 4页。

〔490〕 同上，1945年 4月 28日的《解放日报》第 4页。

〔491〕 见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 69页及以下几页。

〔492〕 此外，这些关于五卅运动的文章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以中国工人运动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

〔493〕 见侯：《五卅》第 19页及下一页 和翦：《“五卅”》第 24页。

〔494〕 见翦：《“五卅”》第 24页。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和翦伯赞对于维护统一战线的论证并不完全与毛泽东在 1940年 3月 11日制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卷 第 498页）一致。毛泽东希望不仅要进行反对汉奸的斗争 而且尤其要进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 他把后者定义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见同上，第 501页）就是说尤其要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见同上，第 504页）。

〔495〕 见范：《中国近代史》。

〔496〕 见胡：《帝国主义》上海 1948年版 序言 第 1页。

〔497〕 同上 第 329页。胡虽然列举了五卅运动，但没有予以详

细论述。

[498] 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俄文版 序 第Ⅶ页）。

[499] 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俄文版 第 396 页及以下几页）。

[500] 对此 范文澜的下列论断便是一个例子。范说：“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化物 以通有无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给英王乔治三世 ——George Ⅲ 上谕）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满清政府的严格闭关政策，也养成了满清政府的顽固昏聩思想。”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俄文版 第 10 页）。

[501] 胡：《帝国主义》北京 1978 年版 序言 第 1 页。

[502] 同上 序言 第 1 页。

[503] 范文澜 1951 年的自我批评也这样讲。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65 年版 第 1 编 绪言 第 7 页。

[504] 同上 和翦：《关于历史人物》第 137 页。

[505] 参见第 6.1.2 章节。

[506] 见吕：《进入专制主义》 载于 1943 年 10 月 1 日的《解放日报》第 4 页。

[507] 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65 年版 绪言 第 5 页及以下几页。

[508] 见翦：《两宋》第 125 页，《明代的倭寇》第 203 页，《明代的盐关》第 193 页，《南明第二》第 250 页，《辽沈》第 233 页。

[509] 见翦：《明代的盐关》第 180 页及以下几页 和翦：《辽沈》第 218 页和第 228 页。

[510] 见翦：《辽沈》第 229 页及以下几页。

[511] 翦在《辽沈》第 228 页中就是这样明确谈论明朝的。

[512] 翦：《两宋》第 125 页。

- 〔513〕同上第 125 页及下一页。
- 〔514〕见翦：《辽沈》第 218 页。
- 〔515〕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58 年版第 2 编第 136 页。
- 〔516〕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349 页。
- 〔517〕同上第 397 页。
- 〔518〕见范：《大丈夫》第 86 页及以下几页第 107 页及以下几页和第 146 页及以下几页。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450 页和第 632 页。
- 〔519〕见翦：《杨家》第 70 页及以下几页。
- 〔520〕见翦：《元代》第 138 页及以下几页。
- 〔521〕见翦：《南宋》第 106 页及以下几页。
- 〔522〕见吕：《初期封建制》。
- 〔523〕见翦：《元代》第 138 页及以下几页。
- 〔524〕见翦：《新近》第 10 页及以下几页。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地方是影射国民党统治的，陈伯达著《中国四大家族》中的类似情况也很明显。
- 〔525〕见翦：《王莽》第 9 页及以下几页。
- 〔526〕见翦：《学术》第 20 页及下一页。
- 〔527〕见翦：《两汉》第 16 页及以下几页。
- 〔528〕见翦：《陈涉》第 148 页及以下几页，特别见第 157 页和第 160 页以及翦：《中国史纲》第 2 卷第 84 页及以下几页。
- 〔529〕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194 页。
- 〔530〕见例如吕在《简明中国通史》第 138 页关于吕臣的言论。
- 〔531〕见范：《中国通史简编》北京 1958 年版第 2 编第 23 页。
- 〔532〕见范：《中国封建》第 3 页及以下几页。对此也参见第

#### 6.1.6 章节。

〔533〕见翦：《中国史纲》第2卷第209页。

〔534〕见吕：“亚细亚的生产方法”1950年版第54页及下一页。

〔535〕见翦：《元代》第162页，和吕：《简明中国通史》第138、194、349页。

〔536〕见例如翦著《中国史纲》第2卷第84页及以下几页和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第138页和194页关于陈胜的论述。吕也把这些论断放到黄巾起义上；黄巾军曾在184年举行起义，后来被曹操施计谋骗。范文澜没有采用统治阶级代表欺骗农民领袖的说法来论述陈胜与刘邦的关系，相反，他认为，刘邦相对而言比陈胜更多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并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8年版第2卷第31页和第135页。

〔537〕见吕：《简明中国通史》第141页。

〔538〕J·哈里森在《共产党人与中国的农民暴动》一书第91页指出，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在1949年以前都是按照“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从关于农民的保守性和经济优先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研究农民战争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关于农民的保守性的观点在论述中显然存在，但在这个阶段，历史学家并没有考虑经济优先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就是在评价农民战争方面，也远比经济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重要。用社会经济模式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做法刚刚出现，人们往往着重于从政治方面甚或从军事战略和斗争艺术方面来分析农民起义的失败。

- 〔539〕参见第 5.2 章节。
- 〔540〕参见翦：《两宋》第 131 页和翦：《辽沈》第 217 页及以下几页。
- 〔541〕参见翦：《中国史纲》第 2 卷第 86 页 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349 页和第 397 页及以下几页 和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2 编 第 136 页。
- 〔542〕例如在翦著《元代》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第 2 卷第 23 页中特别明显。
- 〔543〕见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194 页和第 349 页及以下几页。
- 〔544〕同上 第 349 页及下一页。
- 〔545〕见赖绍尔和费正清 第 410 页。
- 〔546〕参见第 6.2 章节。
- 〔547〕见翦：《略论中国史研究》1945 年版 第 34 页 和吕：《本国史》1950 年版 第 153 页。
- 〔548〕就是在吕著《中国民族简史》中 非汉族的中国民族最终也没有被统一到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被分别地加以论述 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发展的整个进程之中。
- 〔549〕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1 卷 第 225 页。
- 〔550〕见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542 页。
- 〔551〕同上 第 400 页和 410 页。
- 〔552〕同上 第 193 页 。
- 〔553〕同上 第 566 页 。
- 〔554〕援引赖绍尔和费正清书第 126 页的概念。
- 〔555〕吕：《简明中国通史》第 193 页及下一页。
- 〔556〕见翦：《王莽》第 9 页及以下几页。
- 〔557〕参见第 6.1.2 章节。

〔558〕见翦：《东汉》第 50 页 和翦：《略论中国史研究》1945 年版 第 44 页。

〔559〕这一点只可以对我所有的 1953 年或者 1958 年和 1965 年版本而言。

〔560〕见范：《中国通史简编》1953 年版 第 2 编 第 146 页及以下几页。

〔561〕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俄文版 第 396 页。

〔562〕见胡：《帝国主义》1948 年版 第 127 页。

# 文献及其缩写目录

( 划线部分为缩写 )

## I. 历史学家 范文澜、何干之、侯外庐、 胡绳、翦伯赞、吕振羽 的中文文本

范文澜:《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 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第3页。

《大丈夫》,上海1946年版。

《古今中外法浅释》 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第4页。

《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 载于《群众》1940年,5:4/5,第111—115页。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载于《新建设》1951年5月4:2,第20—24页。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载于《解放日报》1944年7月25日和26日各自的第4页,也有单行本,上海1949年版。

《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 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1日第4页。

范蒲鞅(范文澜的别名)《(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载于《大学月刊》1944年12月，3：11/12第86—93页。

《谁革命 革谁的命？》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第1页及以下几页。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香港1948年版。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4月25—30日各自的第4页。

《〈论 正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第4页。

《向伟大英勇的革命将士致敬》载于《北方杂志》1946年6月，1：6第2页。

《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载于《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1日。

《学习鲁迅先生的硬骨头》载于《北方杂志》1946年10月，1：5，第2页及下一页。

《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载于《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1979年版第349—380页。

《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载于《范文澜同志历史论文选集》北京1979年版第108—112页。

《袁世凯再版》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8月23日第1页。

《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第4页。

《〈论 正统〉》未注明出版地点1949年版。

《论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北京1950年版。

《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1953年第8版。

《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北京1953年第2版；第2编北京

1958年第2版第1—3编第2编北京1965年第11版。

何干之：《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与答覆》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6月，1：1第7页。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论争》，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5第334—338页。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1：2第15—20页。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的几点疑问和答覆》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1：4第29页。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根本问题》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4月，1：6第457—459页。

《刘邦与项羽》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3月，1：1第32—41页。

《鲁迅思想研究》北京1949年版的翻印，1968年。

《鲁迅的人生思想》载于《时代青年》1946年5月20日，1：6第14—17页。

《鲁迅作品研究》上海1946年版。

《马克思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5月，1：6第38—41页。

《命运二种》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7月22日。

《奴隶制度是什么》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5第430—432页。

《土地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4月，1：4第2—6页。

《文艺上的主观主义》载于《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

《五四运动及其发展》载于《北方文化》1946年5月，1：5第

8—10页。

《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月，1：1第39—47页。

《一技之长》载于《民主青年》1946年4月1日，4第6—7页。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1936年版。

《中国历史上农村公社的再评价》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7月，1：14第343—347页。

《中国启蒙运动史》重庆1947年版。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未注明出版地点1939年版。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1937年版的翻印，香港。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1939年版的翻印，香港。

《中国思想运动的再认识》载于《现阶段》第33—42页。

《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1956年版。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质》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2月，1：2，第120—122页。

《转变期的中国》上海1937年版。

《最可爱的人格》载于《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

侯外庐：《阿Q年代的问题》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7月，9：2/3第67—69页和《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东方古文明理解之钥匙》载于《唯民周刊》1944年5月，1：4/5第46—52页。

《法西斯的司令台——柏林被占领》载于《中苏文化》1945年5月，16：4第0页。

《附论屈原思想》载于侯：《中国古代思想》第311—337页。

《古文献最初发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考》载于《中山文化季刊》

1945年7月,2:1第65—72页。

《关于民生主义研究的方法问题》,载于侯:《三民主义》第46—70页。

《国际危局中苏联和平政策之扩大》载于《时事类编》1939年增刊,43第17—21页。

《汉代社会新论》载于《大学月刊》1947年8月,6:3/4第30—40页。

《黄黎洲底诗文论》载于《民主世界》1944年12月,1:14第17—19页。

《黄黎洲底哲学思想与近代的思维方法》,载于《中苏文化》1944年10月,15:6/7第9—15页。

《论解放战与民族主义》载于侯:《三民主义》第94—103页。

《纪念“九一八”九周年》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9月,7:3,第5—8页。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2卷本,上海1947年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汉口1938年版。

《康有为氏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2月,2第24—26页。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载于《中苏文化》1945年4月,16:3第19—32页。

《抗战二年来中华民族创作出的新历史》,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4:1第20—27页。

《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上海1939年版。

《抗战建国论》汉口1939年版。

《抗战建国与中国的宪政之路》,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1

月 5 : 1 第 2—8 页 和侯 :《三民主义》第 82—94 页。

《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载于《中苏文化》1941 年 1 月 ,文艺增刊 第 14—23 页。

《科学的民生主义研究》载于《时事类编》1938 年 12 月 ,28, 第 9—22 页。

《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载于《中山文化季刊》1943 年 4 月 ,1 : 1 第 125—131 页。

《民权主义的理论与建国》,载于侯 :《三民主义》第 70—82 页。

《民生主义的科学研究》载于侯 :《三民主义》第 20—43 页。

《民生主义的伟大理想》载于《理论与现实》1939 年 8 月 ,1 : 2 第 23—33 页。

《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载于《中山文化季刊》,1944 年 5 月 ,1 : 4 第 547—557 页。

《清议辩》载于《民主星期刊》1945 年 10 月 20 日 第 2 页。

《屈原思想的秘密》载于《新华日报》1942 年 2 月 17 日和《中苏文化》1942 年 6 月 ,11 : 1/2 第 18—21 页。

《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载于《新华日报》1942 年 4 月 20、21 日。

《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上海 1946 年版。

《三年来抗日战争性质的延长认识》载于《中苏文化》1940 年 7 月增刊 第 48—53 页。

《社会史论导言》载于《中苏文化》1939 年 9 月 ,4 : 2 第 80—92 页。

《司马谈著诸子要指的用意》载于《大学月刊》1947 年 7 月 ,6 : 2, 第 8—9 页。

与罗克汀合著：《思想的分裂·哲学讲座》载于《唯民周刊》1946年4月13日，2第8—9页。

《苏联反抗纳粹战争底历史任务》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11月，9：4/5第19—22页。

《苏联建国在现阶段的特点》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3：10第3—8页。

《苏联抗德战的新形势》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1月，10：2第6—8页。

《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上海1946年版。

《苏联外交与现阶段的欧洲局势》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12月，3：3第12—14页。

《苏联现阶段文化革命之意义》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11月增刊第26—29页。

《苏联与英美之平等待我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载于《中苏文化》1943年1月，12：1第33—36页。

《孙中山到毛泽东》载于《群众》1948年7月，I和II，2：25，第8页及下一页和2：26第14页及下一页。

《谈法制》载于《民主星期刊》1945年3月6日，21第2页。

《谭嗣同的社会思想》载于《中苏文化》1945年7月，16：6/7第3—12页。

《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载于《中苏文化》1945年9月，16：8第33—37页。

《伟大高尔基如何教训我们把握现实》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6月，3：12第5—7页。

《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7月，7/8第15—24页。

《五卅的历史意义》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5月,6:4第19—21页。

《“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4月5/6第3—4页。

《戊戌政变健者谭嗣同的思想流派》载于《民主世界》1945年7月,2:12第10—14页。

《写在“苏联最近关于社会发展法则之论争”之后》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1月,8:11第49—51页。

《新的时代与新的文艺》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6月,6:5,第4—7页。

《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认识》载于《理论与现实丛刊》1948年8月,3第59—67页。

与罗克汀合著:《新哲学教程》上海1946年版。

《颜羽齐反玄学的基本思想》载于《中苏文化》1944年7月,15:5第17—27页。

《英国外交“肯定”的趋向》载于《反攻》1939年4月,5:3第4页及下一页。

《在国际形势中纪念“八一三”三周年》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8月,7:1第9—11页。

《章太炎关于民族民主的政论》载于《民主世界》1945年3月,2:6第12—14页。

《章太炎基于“分析名相”底经史一元论》载于《中山文化季刊》1945年9月,2:2第183—192页。

《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1979年版。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精神》载于《时事类编增刊》1939年4月,36第21—25页。

《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 1949 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 1963 年版。

《中国古代氏族专政理论的修正与否定》载于《中苏文化》1945 年 ,16 : 12 第 23—38 页。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海 1950 年版。

《中国古代“贤者”的史的研究》载于《中山文化季刊》1943 年 7 月 ,1 : 2 第 244—255 页。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考》载于《文风杂志》1944 年 1 月 ,1 : 2 , 第 31—47 页。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重庆 1943 年版。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 1944 年版。

《中国思想通史》2 卷本 北京 1950 年第 3 版。

《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载于《理论与现实》1939 年 4 月 ,1 : 1 第 7—17 页。

《论中山先生“打不平”文化的光大》载于侯 :《三民主义》第 103—124 页。

《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从经验论方面考察》载于《中国学术》1946 年 8 月 ,1 第 23—28 页。

《中山先生对于苏联红军之预见》载于《中苏文化》1945 年 3 月 ,16 : 1/2 第 10 页。

《中山先生关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史论》载于《中苏文化》1940 年 1 月 ,5 : 1 第 67—70 页。

《中山先生论苏联》载于侯 :《三民主义》第 124—138 页。

《中山先生宪法思想之理论与实际》载于《理论与现实》1946 年 5 月 ,3 : 1 第 24—30 页。

《中山先生遗教的核心精神》载于侯 :《三民主义》第 1—20

页。

《论纵横家的商人思想》载于《读书与出版》1947年5月,2:5第1—7页。

胡绳:《帮闲的学者》载于《读书生活》1939年9月,2:1第425—426页。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上海1938年版。

《论辩证法的法则与方法》载于《群众》1943年5月,8:8,第201—206页。

《论“诚”》载于胡:《理性》第132—147页。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上海1948年版和北京1978年第6版。

《读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载于《读书生活》1935年11月,3:2第107—110页。

《论发展的两个前途》载于《全民抗战》1940年2月17日,110第1648—1649页。

《论发展生产力》载于《理论与现实》1946年5月,3:1,第30—36页。

《反对思想与行动上的机械论》载于《全民抗战》1938年9月19日,23第268—269页。

《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载于胡:《理性》第1—9页。

《方法与经验》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年10月,6第6页及下一页。

与陈伯达合著:《关于新方法论在理论上和运用上的两个问题》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月,1:1第77—78页。

《关于真理的诸问题》,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9第684—690页。

《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载于《群众》1948年7月,2:28,第11—15页。

《国家是谁的》载于《新文化》1947年2月,3:3,第15—19页。

《洪秀全和冯云山,他们怎样开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I和II载于《读书与出版》1948年6月,3:6,第5—8页和1948年7月,3:7,第13—17页。

《奖券》载于《读书生活》1935年3月,1:10,第3—4页。

《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载于《全民抗战》1938年8月13日,12,第136—137页。

《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于《新文化》1946年9月,2:5,第18—20页。

《康有为与戊戌维新》I和II,载于《读书与出版》1948年1月,3:1,第11—15页和1948年2月,3:2,第7—10页。

《抗战一周年的广大宣传》载于《全民抗战》1938年7月1,第1页。

《科学的物质观与哲学的物质观》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1,第56—58页。

《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载于胡:《理性》第101—115页。

《(论)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联》载于胡:《理性》第87—100页。

《理性与自由》,上海1946年第4版。

《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I和II载于《读书与出版》1948年3月,3:3,第6—11页和1948年4月,3:4,第20—24页。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载于胡绳等主编:《鲁迅思想发展的

道路》香港 1948 年版 第 5—10 页。

《鲁迅与新文字运动》载于夏征农主编：《鲁迅研究》上海 1937 年版 第 149—161 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载于《理论与现实》1948 年 8 月 3 第 3—17 页。

《欧洲新局势与中国》载于《国讯》1939 年 10 月，35 第 3 页及以下几页。

《评冯友兰著 新事论》》载于胡：《理性》第 176—190 页。

《评冯友兰著 新世训》》载于胡：《理性》第 148—175 页。

《评钱穆著 文化与教育》》载于胡：《理性》第 66—86 页。

《论青年思想的独立》载于《现阶段》第 174—181 页。

《认清敌人与认清友人》载于《全民抗战》1940 年，103 第 1534—1535 页。

《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载于胡：《理性》第 116—131 页。

《是圣人还是骗子》》载于胡：《理性》第 52—65 页。

《四十年前的 皖变》》载于《读书与出版》1947 年 3 月，2：3，第 27—29 页。

《思想的漫步》载于胡：《理性》第 17—37 页。

《思想方法论初步》上海 1947 年第 4 版。

《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上海 1949 年版。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香港 1948 年版。

《他还站在我们的前面》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 年 7 月，4，第 1—2 页。

《谈理论研究和文学欣赏》载于《读书月报》1939 年 8 月，1：7 第 305—308 页。

《谈历史研究的必要》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 年 11 月，7 第

5—6 页。

《谈形式对于内容的关系》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 年 12 月，8，第 5—6 页。

《谈学习历史的必要》载于《民主青年》1947 年 7 月，13 第 17 页。

《同兴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从太平天国的失败到甲午中日战争》载于《大学月刊》1947 年 10 月，6：5 第 16—27 页。

《统一战线万岁》载于《少年先锋》1938 年，11 第 15—18 页。  
《为什么要读书？》，载于《读书月报》1937 年 5 月，1：1 第 28—33 页。

《写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评介后》载于《读书月报》1940 年 1 月，1：11 第 521—523 页。

《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载于《新文化》1946 年 9 月，2：6 第 18—21 页。

《新的中国人和新的中国》载于《读书月报》1939 年 7 月，1：6 第 253—256 页。

《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载于《中国建设》1946 年 7 月，2：4，第 35—38 页。

《学术工作的方向》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 年 8 月，5，第 1—2 页。

《〈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载于《理论与现实》1940 年 2 月，1：4 第 19—32 页。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学习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载于《民主周刊》1945 年 3 月，1 第 12—14 页。

《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载于胡：《理性》第 10—16 页。

《一年来人民努力的成就》载于《理论与现实》1946年,3:2,第1—5页。

《在东江抗日根据地》,载于《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第4页。

《在重庆雾中》重庆1946年版。

《枣下论丛》北京1962年版。

《资本论 中的辩证法》载于《读书月报》1940年4月,2:2,第85—91页。

《怎样观察事物》(一)(二)(四)载于《读书月报》,1940年6月2:4第178—181页,1940年6月,2:5第229—232页和1940年9月,2:7第329—332页。

《怎样继续生活下去》载于《全民抗战》1940年6月,126第1906—1907页。

《怎样养成读书的兴趣》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4月,1:4,第283—286页。

《战争与文化》载于《读书月报》1940年6月,2:5第208—211页。

《这就算是批评吗》载于胡:《理性》第38—51页。

《哲学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11第122—125页。

《哲学组 怀疑论》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13第266—269页。

《哲学组 概念》载于《自修大学》1937年,1:10第48—50页。

翦伯赞:《常德桃源沦陷记》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354—366页。

《陈东与靖康元年太学生的伏阙》载于《大学月刊》1947年7月,6:2第30—33页。

《论陈涉吴广的起义》载于《中国学术》1946年8月,1:1,第84—89页。

《春秋之义》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4第14—15页。

《悼伟大的民主战士》载于《解放日报》1946年4月21日第4页。

《书评 邓初民著 中国社会史教程 和吴泽著〈中国社会简史〉》载于《新华日报》1943年4月12日第4版。

《论东汉末的党锢之祸》载于《理论与现实》1946年,3:2,第50—55页。

《东晋初黄河北的坞屯壁垒》载于《大学月刊》1947年6月,6:1第6—8页。

《杜甫研究》载于《群众》1944年11月,9:21第945—955页。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载于《翦伯赞学说论著集》香港未注明出版年份第3—17页。

《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1月,4:1第119—131页。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载于翦:《历史问题》第130—141页。

《关于孔雀胆》载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31日。

《继承陶先生 学陶先生》载于《读书与出版》1946年8月,5,第4页。

《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载于《新华日报》1943年5月16日。

《捷克斯拉夫的妇女监狱与少年监狱之实况》 载于《中华法学》1936年11月,1:3第106—114页。

《介绍一种历史科学的名著》 载于《中山文化教育季刊》1936年4:8第727—731页。

《解释中国史前史的几个问题》 载于《新文化》1946年12月,2:11/12第5—14页。

《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4:3第1163—1175页。

《历史问题论丛》北京1962年版。

《历史哲学教程》上海1946年版和长春1949年版。

《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 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5/6,第16—19页。

《两宋时代的汉奸及傀儡组织》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125—137页。

《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217—234页。

《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75—118页。

《略论十八年前的“首都革命”》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296—300页。

《略论殷商青铜器文化》 载于《文风杂志》1943年,1:1第3—10页。

《略论中国史研究》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1—20页和《中国历史》第31—35页。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1—37页。

《论 明代的倭寇与御倭战争》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196—216 页。

《论 明代的阉官及阉党政治》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320—325 页。

《论 明代的海外贸易的发展》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164—179 页。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载于《翦伯赞学说论著集》第 18—40 页。

《论 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235—253 页。

《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2 辑 第 274—298 页。

《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106—124 页。

《欧战发展的逻辑倾向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载于《时事类编》增刊，1940 年 8 月，55 第 9—15 页。

《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第 21—34 页。

《人类的尊严与教育的自由》 载于《文萃》1945 年 12 月，9 第 14 页。

《十八年前的革命起义》 载于《新华日报》1942 年 10 月 23 日。

《史料与史学》 上海 1946 年版。

《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2 辑 第 119—133 页和《中苏文化》1944 年 2 月，15：2 第 32—37 页。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37—74页和《中山文化季刊》1945年，2：1第105—120页。

《苏德战争的爆发、展开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7月，9：1第117—121页。

《苏联历史学家对东方史学的贡献》载于《中苏文化》特刊，1940年1月第139—146页。

《苏德战争的现阶段》载于《中苏文化》1941年11月，9：4/5第34—39页。

《贪污列传序》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366—369页。

《桃花扇底看南朝》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53—274页。

《吐蕃种族来源考》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133—148页。

《〈论正葬改制及其失败〉》载于《中华论坛》1945年，1：1第9—13页。

《文化史的教育与中国前进文化》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1月，5：1第71—74页。

《我的姓氏 我的故乡》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369—375页。

《〈论“五卅”运动及其历史教训〉》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5月，6：4第21—25页。

《〈论“五卅”与中国宪政运动之史的发展〉》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284—297页。

《论西晋的豪门政治》载于《大学月刊》1947年10月，6：5第10—15页。

《(论 西晋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乱》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95—105 页。

《(论 夏族的起源与史前之鄂八多斯》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35—47 页。

《(论) 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之新转向》，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269—283 页。

《学术与暴力》载于《中华论坛》1945 年 2 月 ,2 第 20—21 页。

《翦伯赞学说论著集》香港未注明出版年份。

《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载于《中原》1945 年 ,2 : 1 第 41—47 页。

《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70—82 页。

《(论) 元代中国人民反对鞑靼的斗争》，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138—163 页。

《元曲新论》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2 辑 第 231—253 页。

《(论 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 第 83—94 页。

《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的逻辑》 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第 301—312 页。

与邵循正、胡华合著：《中国历史概要》 北京 1956 年版。

与吕振羽、华岗等人主编：《中国历史论集》 厦门 1945 年版。

《中国史纲》第 1 卷 上海 1947 年第 3 版和第 2 卷 上海 1947 年版。

《中国史论集》第 1 辑 上海 1947 年第 2 版和第 2 辑 上海 1948 年第 2 版。

《论中国史上的正统主义》载于《解放日报》1946年4月11日。

《论中日甲午之战》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329—353页。

《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载于翦：《中国史论集》第1辑第48—69页。

《庄周哲学之辩证观》，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10月，2：4第1201—1214页。

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50年版第154—176页和1954年版第177—210页。

《初期封建制的发展——春秋时期》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8月19日。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50年版第95—132页；1954年版第125—176页和1961年版第114—162页。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50年版第1—29页；1954年版第1—34页和1961年版，第1—31页。

《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8月7日第1页及下一页和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第163—179页。

《简明中国通史》北京1954年版。

《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汉时期》（一）（二）（三），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2、4日各自的第4页。

《孔丘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孔丘到荀卿》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7月，2：3第739—766页。

《老聃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老聃到庄周》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4月,3:2第411—425页。

《目前国际形势的认识》载于《中苏文化》1938年6月,2:2,第1—3页。

《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7月,4:3第1231—1235页。

《秦代经济研究》载于《文史》1934年8月,1:3第1—12页。

《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50年版第133—153页。

《商朝奴隶制国家》(一)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6月12日。

《史论集》北京1960年版。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1961年版。

《史学研究论文集》上海1954年版。

《隋唐五代经济概论》载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10月,2:4第1089—1110页。

《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作》载于《中苏文化》1940年7月增刊第168—174页。

《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7月15日第4页。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停滞性”问题》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50年版第30—56页;1954年版第35—72页和1961年版第32—66页。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北京1962年版。

《由初期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封建制的转换——战国时期》,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8月22日第4页。

《由封建专制国家的恢复一统到外族侵略——两晋南北朝》  
(一)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5日第4页。

《原始公社后期我们祖先是怎样生活的》载于《解放日报》  
1943年5月10日第4页。

《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载于《文史》1934年,1:1第  
1—24页。

与翦伯赞、华岗等人主编:《中国历史论集》厦门1945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提纲》载于吕:《中国历史论集》第152—183  
页(与吕振羽著《本国史》一文相同)

《中国民族简史》北京1951年第5版。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1950年版,上海1954年版和北京  
1961年版。

《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载于吕:《中国社会史诸问  
题》1950年版,第57—94页;1954年版,第73—124页和  
1961年版,第67—113页。

《中国外交问题》北京1929年版。

《中国原始社会史》上海1946年版。

《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1949年版和北京1955年第4版。

《中日问题批判》北京1932年版。

## II. 历史学家的非中文文本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840—1901年)达姆施塔特未注  
明出版年份(Fan W ö n-Lan: Neue Geschichte Chinas. Band  
1. (1840—1901). Darmstadt o. J.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1960年第2版(Ho Kan-chi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Peking  
1960<sup>2</sup>).

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北京 1959 年版(Hou Wailu: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eking 1959).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西港 1973 年版(北京 1955 年版  
的翻印)(Hu Sheng: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West-  
port 1973, Nachdruck Peking 1955)。

吕振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和哲学上的斗争》，载于《中国历史和哲学研究》1967  
年和 1968 年，1:2 第 46—80 页(Lü Chen-yu: The struggle  
between Marxism and Pseudomarxism on History and Phi-  
losoph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I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1967/  
68. 1: 2, S. 46—80)。

### Ⅲ. 中文文献

佩(原著误 应为佩——译者 翼：《书评 侯外庐著 中国古典社  
会史论》载于《新华日报》1943 年 3 月 21 日。

《光明日报》。

《“共匪”干部记要》未注明出版地点 1953 年版。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于《中国学术》1946 年 8 月，  
1:1 第 29—33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 1930 年版。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香港 1965 年版。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未注明出版地点和年份 重庆 1941 年

版的翻印)

《翦伯赞悼词》，1979年2月22日未发表的手稿。

《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3第25—34页。

《翦伯赞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载于《北京大学》1979年3月,220第1页。

江达锋:《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 是蒋家王朝的 资治通鉴》载于《光明日报》1966年6月24日第2页。

金汶:《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恶意向推行的‘左’倾路线》载于《光明日报》1979年1月23日第2页。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海1957年版。

克兴:《中国史与中国史研究》载于《群众》1942年10月,7:9,第486—491页。

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人生态度的影响》载于《李大钊选集》北京1978年第2版第504—508页。

黎澍:《“四人帮”与社会科学》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第3页。

林甘泉:《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载于《红旗》1978年,1第68—73页。

刘炼:《用笔和舌战斗的一生·怀念何干之同志》载于《教学与研究》1979年,6第42—47页。

《吕振羽悼词》，1980年7月29日未发表的手稿。

《吕振羽同志因病逝世》载于《人民日报》1980年8月12日第3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于《解放》1940年2月,98和99第22—40页。

竹内实编辑：《毛泽东集》10卷本 东京 1970—1972年版。

《毛泽东选集》北京 1967年版。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载于《大中》1946年，1：1，第33—38页。

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载于《大中》1946年，1：5，第17—21页。

《人民日报》。

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 1976年版。

宋扬之、邓壮：《记一页真实的历史》载于《北京晚报》1980年7月25日第1页。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2月6日第2页。

伍文：《延安内幕》上海 1946年版。

吴淦：《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载于《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2页。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载于《解放》1938年，52第7—9页。

吴泽：《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史学季刊，1955—1957年第1—17页。

吴清友、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座谈》载于《读书日报》1937年5月1：1，第15—19页。

《新华日报》。

夏征农主编：《现阶段的中国思想运动》上海 1937年版。

《新中国人物志》香港 1949年版。

徐文珊：《中国战时学术》未注明出版地点 1946年版。

叶桂生：《访吕振羽同志》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3第

1 页及下一页。

易琴：《〈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评介〉》载于《读书月报》1940年1月，1.11 第517—520页。

吕振羽、翦伯赞、华岗等人主编：《中国历史论集》 厦门 1945年版。

郭华伦主持 中共人名录编修委员会主编：《中共人名录》 台北 1967年版。

#### IV. 非中文文献

鲍尔，沃尔夫冈：《中国与幸福的希望》，慕尼黑 1974年版（Bauer, Wolfgang: 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 München 1974）。

比斯利 W·G·和普利布兰克 E·G·主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 伦敦 1961年版 Beasley, W. G. /Pulleyblank, E. G., Hrs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961）。

本顿 格雷戈：《“第二条王明路线”（1935—1938年）》载于《中国季刊》1975年，61 第61—94页（Benton, Gregor: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 1935—1938).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5, 61, S. 61—94）。

本顿 格雷戈：《答复》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69 第145—155页（Benton, Gregor: Replie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7, 69, S. 145—155.）

《中国共产主义人名词典 1921—1965年》2卷本 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主编 剑桥 马萨诸塞 1971年版（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

1965. 2 Bde. hrsg. von Donald W. Klein und Anne B. Clark. Cambridge, Mass. 1971).

《共和国的中国人名词典》4卷本 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主编，纽约和伦敦 1967年和 1968年版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4Bde. hrsg. von Howard L. Boorman und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und London 1967/68).

波宾斯卡，策琳娜：《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柏林 1967年版 (Bobinska, Celina: Historiker und historische Wahrheit. Berlin 1967).

布劳依蒂加姆 赫伯特：《关于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载于《历史科学杂志》增刊：《新中国的历史科学》1959年第 5—17页 (Bräutigam, Herbert: Zur Entwicklung der neu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onderheft: Neue Chine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59, S. 5—17).

勃兰特 康拉德、施瓦茨 本亚明和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纪实》剑桥 马萨诸塞 1952年版 (Brandt, Conrad/Schwartz, Benjamin/Fairbank, John 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1952).

勃兰特 康拉德、施瓦茨 本亚明和费正清：《共产主义在中国——一部纪实历史》慕尼黑 1955年版 (Brandt, Conrad/Schwartz, Benjamin/Fairbank, John K.: Der Kommunismus in China. Ein Dokumentargeschichte. München 1955).

布劳恩，奥托：《中国札记 1932—1939年》柏林 1973年版 (Braun, Otto: 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 (1932—1939).

Berlin 1973) .

布里勒 ,O:《中国哲学 50 年( 1898—1948 年 ) 》 纽约 1965 年版  
( Brière, O. ;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 1898—1948.  
New York 1965. )

布里勒 ,O:《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 载于《 Aurore 大  
学学报》第 3 期 ,1947 年 ,8:3 第 307—347 页( Brière, O. :  
L'effort de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en Chine. In: Bulletin de  
L'Universite L'Aurore, Série III . 1947, 8: 3, S. 309—347) .

沙波尼尔 让 :《中国当代历史评注》第 1、2 卷 , 巴黎第七大学哲  
学博士论文 ,1978 年 1 月 7 日 , 里尔大学论文复制服务部 ,  
1980 年( Charbonnier, Jean. L'interpretation de L'histoire en  
Chine Contemporaine. Bd. 1 und 2. Phil. Diss.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 Vom 7. 1. 1978. Service de Reproduction des The-  
ses,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 1980) .

柴斯奈斯 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当代历史著作》 载于《历史回  
顾》 1956 年 ,215 ,第 274—282 页( Chesneaux, Jean; Les  
travaux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en Chine popu-  
laire. In : Revue Historique . 1956. 215, S. 274—282) .

迟, J. V. :《为中国近代唯物主义寻找一位本土的祖先》 哲学博  
士论文 悉尼 1970 年 3 月( Chey, J. V. ; The search for a na-  
tive ancestry for modern Chinese materialism. Phil. Diss.  
Sydney, März 1970. )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王春辉经原作者同意的翻译 纽约 1947  
年版 ( 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ey. Autorisierte  
Übersetzung von Wang Chung—Hui. New York 1947) .

乔健 :《四人帮把历史当作一种政治策略来使用》 载于《四人帮

- 倒台后的第一批文章》斯泰夫·S·K·初主编，香港1977年版，第53—57页（Chiao Chien: The Use of History as a Political Strategy by the Gang of Four. In: The Gang of Four: First Essays after the Fall, Hrsg. von Steve S. K. Chiu. Hong Kong 1977, S. 53—57）。
- 周策纵：《五四运动》斯坦福1969年版（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anford 1969）。
- 钟安民：《1966年共产主义中国学院理论的批判》，《共产主义中国1966年》第2卷，香港1968年版（Chung Wah-min: Criticism of Academic Theories in Communist China, 1966. Communist China 1966, Bd. 2, Hong Kong 1968）。
- 达斯·纳拉纳拉雅恩：《当代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载于《中国报道》1975年5、6月，9：3，第6—20页（Das Naranaraya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Report. Mai/Juni 1975. 9: 3, S. 6—20）。
- 德米维勒，P：《章学诚与他的历史编纂学》载于比斯利和普利布兰克，第167—186页（Demiéville, P: 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 In: Beasley/Pulleyblank. S. 167—186）。
-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团结而斗争的任务》，载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法兰克福1975年版，第91—164页（Dimitroff, Georgi: Die Offensive des Fasch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im Kampf für die Einheit der Arbeiterklasse gegen den Faschismus. In: VI. Kongreß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 1975. S. 91

-164).

德里克·阿利夫：《革命和历史——1928—1933年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哲学博士论文 罗彻斯特 1973年版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Debates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1928—1933*. Phil. Diss. Rochester 1973).

德里克·阿利夫：《革命和历史——1919—193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起源》伯克利 1978年版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1978).

德里克·阿利夫：《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对立问题》载于《近代中国》1977年10月, 3;4 第465—488页 (Dirlik, Arif: *The Problem of Class Viewpoint versus Historicis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Okt. 1977. 3. 4, S. 465—488).

多姆斯·于尔根：《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慕尼黑 1975年版 (Domes, Jürgen: *China nach der Kulturrevolution*. München 1975).

埃伯斯坦·伯恩德：《身披中国服装的中国历史——儒法斗争 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最新发展》载于《远东》1977年12月, 24; 1/2, 第145—166页 (Eberstein, Bernd: *China's History in Chinese Dress.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Oriens Extremus*, Dez. 1977. 24. 1/2, S. 145—166).

费路·罗兰德：《“亚细亚”或者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载于《历史科学杂志》1971年, 19;1 第65—91页 (Felber, Roland: *“Asiatische” oder feudale Produktionsweise in China*.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71. 19. 1. S. 65 — 91.)

费尔维克 阿尔伯特和卡恩 哈罗德：《学术思想 中国的新历史编纂学》载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第 1—13 页(Feuerwerker, Albert/Kahn, Harold: 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S. 1—13)

福尔曼 哈里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纽约 1945 年版(Forman, 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1945)

弗兰克 沃尔夫冈：《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 年五四运动》慕尼黑 1957 年版(Franke, Wolfgang: 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n 4. Mai 1919. München 1957)

弗兰克 沃尔夫冈：《中国革命一百年，1851—1949 年》慕尼黑 1958 年版(Franke, Wolfgang: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 München 1958.)

加德纳，查尔斯，S·：《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剑桥 马萨诸塞。1973 年第 3 版(Gardner, Charles, 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1973<sup>3</sup>)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38 年 柏林 1946 年版(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Bolschewiki). Kurzer Lehrgang. 1938. Berlin 1946)

戈尔德曼 默勒：《共产主义中国的文人异议》剑桥 马萨诸塞。1967 年版(Goldman, Merle: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7)

格雷 约翰：《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编撰 关于它的背景和发展的评论》，载于比斯利和普利布兰克，第 186—212 页(Gray,

Joh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otes o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In : Beasley/Pulley-blank, S. 186—212).

古尔加 A·W· :《“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68年,16:12第1504—1510页(Gulyga, A. W. :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 :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8. 16:12, S. 1504—1510).

韩玉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要素》好莱坞1955年版(Han Yu-shan: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ollywood 1955).

哈里森 詹姆斯·P· :《共产党人与中国的农民暴动——关于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问题》纽约1971年版(Harrison, James P. :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1971).

哈里森 詹姆斯·P· :《夺取政权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毛泽东去世的历史》斯图加特和苏黎世1978年版(Harrison, James P. : Der lange Marsch zur Macht. Di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von ihrer Gründung bis zum Tode Mao Tse-tungs. Stuttgart und Zürich 1978).

哈里森 詹姆斯·P· :《共产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训练》载于《亚洲评论》1965年10月第491—501页(Harrison, James P. : The Ideological Training of Intellectuals in Communist China. In : Asian Survey. Okt. 1965. S. 491—501.)

《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阿尔伯特·费尔维克主编 剑桥 马萨诸塞 1969年版(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Hrsg. von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Mass 1969)

《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苏龙隼音译——译者)和常明凯音译——译者 主编 台北 1972年第2版( History of the Sino — Japanese War, 1937 — 1945. Hrsg. von Hsu Long-hsuen und Chang Ming-kai. Taipeh 1972<sup>2</sup>).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年》纽黑文 1961年版 (Hsia, C · T · .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1917 — 1957. New Haven 1961 )。

胡麦尔 阿瑟, W · 《中国历史学家正在用他们的历史做什么》, 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29年7月, 34: 4, 第715—724页 (Hummel, Arthur W. :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with their own history. I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uview, Juli 1929 . 34: 4, S. 715—724).

伊斯拉埃尔 约翰:《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个案研究》 载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第247—276页 (Israel, John: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 A Case Study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 graphy. In :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S. 247—276).

任卓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9—1924年》, 载于《苏维埃思想研究》1970年, 10, 第138—166页( Jen Ch'o-hsüa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 Leninism into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19—1924. In :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970 . 10, S. 138—166).

卡德 奥托:《翻译中的偶然和规律性》 外语杂志副刊 莱比锡

1968 年( Kade , Otto : Zufall und Gesetzmäßigkeit in der Übersetzung. Beiheft zur Zeitschrift Fremdsprachen. Leipzig 1968).

卡塔奥克 特茨尤耶:《中国的抵抗与革命——共产党人与第二次联合战线》伯克利 洛杉矶 伦敦 1974 年版(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74).

克莱恩希特 冈特:《中国革命的理论》载于《社会变革——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史 1911—1949 年》里夏德·洛伦茨主编, 法兰克福 1977 年版 第 405—491 页( Kleinknecht, Günter: Theori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In: Umwälzung einer Gesellschaft.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911 — 1949 ), hrsg. von Richard Lorenz. Frankfurt 1977, S 405—491 )。

克里莫夫 A. G.:《关于中国 20 年和 30 年代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载于《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莫斯科 1971 年版( Krymov , A. G. ; Diskussiji o dokapitalisti ceskich otno se nijach v kitaje v 20-30-ch godach. In: Problemy dokapitalisti v Ceskich obščestv v stranach vostoka. Moskau 1971 )。

郭 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帕德博恩 1979 年版( Kuo, Heng-yü: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Paderborn 1979)。

郭 恒钰:《毛夺取政权的道路与共产国际》帕德博恩 1975 年版( Kuo, Heng-yü: Maos Weg zur Macht und die Komintern. Paderborn 1975)。

库夫斯 彼得·M·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撰》 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 当代中国副刊 , 1978年12月 第1—17页(Kuhfus, Peter M. :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I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eilage zu China aktuell, Dez. 1978, S. 1—17).

克沃克 ,D·W·Y· :《中国人思想中的科学态度 1900—1950年》 纽黑文和伦敦 1965年版 Kwok, D. W. Y. :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und London 1965. )

拉陶雷特 肯尼思·S· :《9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 载于《美国历史评论》 1930年7月 ,35:4 第778—797页( Latourette, Kenneth S. :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i 1930 . 35 . 4 . S. 778—797)

李 罗伯特 H·G· :《历史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些观点》 载于《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约翰·E·莱恩主编, 纽约 1957年版 第18—52页( Lee, Robert, H. G. : *The Study of History. Some Contemporary Chinese Views.* In: *Resear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n China*, hrsg. von John E. Lane. New York 1957, S. 18—52)

李树青 :《中国的知识界》 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 1946年和 1947年 ,52 第489—497页(Lee, Shu Ching: *Intelligentsia of Chin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6/47 . 52, S. 489—497).

冷绍佺和帕尔默 诺曼·O· :《孙中山和共产主义》 未注明出

版地点 1976 年(伦敦 1961 年版的翻印)(Lang, Shao Chuan/  
Palmer Norman O.: Sun Yat -sen and Communism, o. O.,  
1976, Nachdruck London 1961)。

《列宁全集》第 2 卷和第 31 卷 柏林 1974 年版(Lenin, W. I. :  
Werke. Bd. 2 und 31. Berlin 1974)

罗梅君:《1936 年和 1937 年新启蒙运动中的陈伯达和艾思奇》,  
载于《波鸿东亚研究年鉴》1979 年 第 67—91 页(Leutner,  
Mechthild: Ch'en Po-ta und Ai Szu-ch'i in der Neuen Aufk-  
lärungsbewegung von 1936/37. In: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79, S. 67—91)。

罗梅君:《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载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当代中国副刊,1978 年 12 月 第  
18—25 页(Leutner, Mechthild: Der Fall Chien Po-tsan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China. I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eilage zu China aktuell, Dez. 1978, S. 18—25)。

罗梅君:《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国化”的讨论》载于《波鸿东亚  
研究年鉴》1978 年 第 23—53 页(Leutner, Mechthild: Die  
Diskussion um die “Sinisierung” in der Zeit des Anti-  
japanischen Widerstandskrieges. In: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78, S. 23—53)。

利文森,约瑟夫·R·:《儒家学说的中国及其近代命运》贝克  
利 1972 年第 2 版(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1972<sup>2</sup>)。

利文森 约瑟夫·R·:《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剑桥 马萨  
诸塞 1959 年版(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59).
- 《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罗兰德·费路和弗里茨·格鲁纳主编，柏林 1969 年版(Li Da-zhao. Im Kampf für ein Sozialistisches China. Hrsg. von Roland Felber und Fritz Gruner Berlin 1969).
- 李玉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纽约和伦敦 1971 年版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的现状》载于《历史科学杂志》1953 年，1：4，第 661—669 页 (Liu Da-nian: Die Lag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China.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53. 1:4, S. 661—669)
- 洛伦茨 里夏德：《传统的中国社会——一个苏联研究成果的解说》载于《社会变革——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史 1911—1949 年》R. 洛伦茨主编，法兰克福 1977 年版，第 11—93 页 (Lorenz Richard: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Eine Interpretation Sowjetischer Forschungsergebnisse. In: Umwälzung einer Gesellschaft.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911—1949). Hrsg. von R. Lorenz. Frankfurt 1977, S. 11—93)
-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H·C·布赫和翁梅主编 汉堡 1973 年版 Lu Hsün: Der Einsturz der Leifeng Pagode. Hrsg. von H. C. Buch und Wong May. Hambury 1973)。
- 《毛泽东选集》1—4 卷 北京 1968 年版 (Mao Tse-tung: Ausgewählte Werke. Bd. 1—4, Peking 1968)
- 毛泽东：《论革命》蒂尔曼·格林主编，法兰克福 1971 年版

( Mao Tsetung: Über die Revolutio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rsg. von Tilemann Grimm, Frankfurt 197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21、23 卷 柏林 1956—1969 年版  
(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Werke. Bd. 13. 21. 23. Berlin 1956—1969 ).

迈斯纳 莫里斯:《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剑桥 马萨诸塞 1967 年版(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1967 )

苗竹晃:《中国共产党简史》明斯特 1971 年版( 1960 年版的翻印 )( Mjau Tschu-hwang: Kurz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Münster 1971. Nachdruck der Ausgabe von 1960. )

穆适:《冲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束缚》载于《北京评论》1978 年 5 月 19 第 16—19 页( Mu Shi: Die Fesseln der Forschung in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gesprengt. In: Peking Rundschau, Mai 1978. 19, S. 16—19 ).

米勒, R·赖讷:《中国社会理论论集——20 世纪阶级概念的形成》, 柏林 1976 年版( Müller, R. Reiner: Beiträg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China. Die Herausbildung des Klassenbegriffs im 20. Jahrhundert. Berlin. 1976 ).

《中国大学的新开端》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当代中国副刊, 1978 年 12 月 第 30—47 页( Neubeginn an Chinas Universitäten. I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eilage zu China aktuell Dez. 1978. S. 30—47. )

奥皮茨 彼得·J·主编:《中国的大变革》慕尼黑 1972 年版

(Opitz, Peter J. (Hrsg) : *Chinas große Wandlung*. München 1972).

帕茨希 京特:《客观性与事实概念的问题》载于《历史理论——历史科学中的客观性与党性原则》,R·科塞莱克、沃尔夫冈·J·莫姆森和耶尔恩·吕森主编 慕尼黑 1977 年版 Patzig, Günther : *Das Problem der Objektivität und der Tatsachenbegriff*.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Objektivität und Parteilichkeit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Hrsg. von R. Koselleck. Wolfgang J. Mommsen und Jörn Rüssen. München 1977).

皮克威茨 保罗·G·:《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大众文艺观》,载于《中国季刊》1977 年,70 第 296—314 页 (Pickowicz, Paul G. : *Ch'ü Ch'iu-pai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n : *The China Quarterly* 1977, 70, S. 296—314) .

波考拉 ,T:《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编纂学》载于《东南亚评论》1967 年,2 第 191—202 页 (Pokora 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evue du Sud—Est Asiatique*. 1967, 2, S. 191—202) .

普利布兰克 E·G·:《中国的历史批评 刘知几与司马光》载于比斯利和普利布兰克,第 135—166 页 (Pulleyblank, E. G. :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Beasley/Pulleyblank*, S. 135—166. )

赖绍尔 埃德温·O·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 1960 年版 (Reischauer, Edwin O. /Fairbank, John K., :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1960) .

罗伊 戴维·T· :《郭沫若》 剑桥 马萨诸塞 1971 年版( Roy, David T. : 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Cambridge Mass. 1971 )。

申克 沃尔夫 :《黄色阵线的旅行》 柏林 1940 年版( Schenke, Wolf : Reise an der Gelben Front. Berlin 1940)。

施奈德 劳伦斯·A· :《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贝克利 1971 年版( Schneider, Lawrence A. :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Berkeley 1971 )。

施拉姆, 斯图亚特·R· :《毛体制 —— 毛泽东文选 : 分析与发展》 慕尼黑 1972 年版( Schram, Stuart R· : Das Maosystem. Die Schriften von Mao Tse-tung. Analyse und Entwicklung. München 1972)。

许特 汉斯-维尔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新中国的历史科学 —— 50 年代的分期讨论》, 汉堡 1980 年版( Schütte, Hame - Wilm : Marxistische Geschichtstheorie und neue chine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Aspekte der Periodisierungsdebatte der fünfziger Jahre. Hamburg. 1980)。

塞尔登 马克 :《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 剑桥 马萨诸塞 1972 年第 2 版( Selden Mark :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 1972<sup>2</sup>)。

塞维斯 :《在中国失掉了机会 —— 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S·塞维斯的新闻电讯》 约翰夫·W·埃舍里克主编, 纽约 1975 年版(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Hrsg. von Joseph W. Esherrick. New York 1975)。

石松 :《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发展》(一)和(二)载于《问题与研

究》1969年4月,5:7第18—28页和1969年5月,5:8第24—33页(Shue Sung: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I u. II. In: Issues and Studies. April 1969. 5:7, S. 18—28, und Mai 1969, 5:8, S. 24—33).

施特帕 康斯坦丁·F·:《俄罗斯历史学家与苏维埃国家》新不伦瑞克 纽约 1962年版(Shteppa, Konstantin F.: Russian Historians and the Soviet State. New Brunswick. N. Y. 1962).

许奎崆:《“第二条王明路线”(1935—1938年)》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69第136—145页(Shum kui kwong: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1935—1938).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7. 69, S. 136—145).

佐弗里 吉亚尼:《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有争议的范畴的历史》法兰克福 1972年版(Sofri, Gianni: Über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Zur Geschichte einer strittigen Kategori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 1972).

斯大林 J·W·:《时事问题简评》载于《中国革命研究资料》第2卷,《斯大林和中国革命》慕尼黑 1971年第2版第139—173页(Stalin, J. W. Notizen über Gegenwartsthemen. In: Materialien zum Studium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Bd. 2, 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München 1971<sup>2</sup>, S. 139—173).

斯大林 J·W·:《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载于《中国革命研究资料》第2卷,《斯大林和中国革命》慕尼黑 1971年第2版第45—60页(Stalin, J. W.: Über die Perspektiven der Revolu-

tion in China. In: Materialien zum Studium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Bd. 2. Stali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München 1971<sup>2</sup>, S. 45—60).

孙中山:《演讲和文章》 布里吉特·沙伊伯尔和黑尔加·舍纳翻译、摘选、导读和注释 莱比锡 1974 年版 Sun Yatsen: Reden und Schriften. Ubersetzung. Auswahl.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Brigitte Scheibner und Helga Scherner. Leipzig 1974).

邓嗣禹:《近五十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 载于《远东季刊》1948 年 11 月, 1 第 131—156 页(Teng, S. Y.: S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Nov. 1948. 1, S. 131—156).

托马斯·伯恩纳德·S·:《1927 年的广州公社和中国革命中的“无产者专政”》 安阿伯 1975 年版(Thomas, Bernard S. “Proletarian Hegemon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anton Commune of 1927. Ann Arbor 1975).

特凯·费伦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新维德和柏林 1969 年版(T ökei, Ferenc: Zur Frag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Neuwied und Berlin 1969).

维希特鲍尔·赫尔穆特:《孙中山(1866—1925 年)》 载于《龙的儿子——中国从儒家学说到共产主义之路》 彼得·J·奥皮茨主编 慕尼黑 1974 年版 第 128—159 页(Viechtbauer, Helmut: Sun Yat-sen (1866—1925). In: Die Söhne des Drachen. Chinas Weg vom Konfuzianismus zum Kommunismus. Hrsg. von Peter J. Opitz. München 1974, S. 128—159).

王刚武:《今日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并列》 载于《中国季刊》1975

年,61,第1—24页(Wang Gungwu: Juxtaposing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Today.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5, 61, S. 1—24).

魏盖尔·奥斯卡:《中国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审判 四人帮和十人帮 的法律程序问题》载于《当代中国》1981年1月,第32—40页(Weggel, Oska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chinesischen Rechtspflege (Anmerkungen zur juristischen Handhabung des Prozesses gegen die “Vier/Zehnerbande”). In: China aktuell, Januar 1981, S. 32—40).

白修德和雅各比·安娜丽:《中国的雷声》斯图加特·汉堡·巴登·巴登1949年版(White, Theodore H. / Jacoby, Annalee: Donner aus China. Stuttgart, Hamburg, Baden Baden 1949). 《共产主义中国名人录》2卷本,香港1969年版(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2 Bde. Hong Kong 1969).

维特豪夫·博多:《中国》汉诺威1975年第4版(Wiethoff, Bodo: China. Hannover 1975<sup>4</sup>).

维特豪夫·博多:《中国古代史纲要》达姆施塔特1971年版(Wiethoff, Bodo: Grundzüge der älter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mstadt 1971).

维特豪夫·博多:《中国近代史纲要》,达姆施塔特1977年版(Wiethoff, Bodo: Grundzüg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mstadt 1977).

瓦拉蒂米罗夫·P·P·:《中国的特别地区,1942—1945年》柏林1976年版(Wladimirow, P. P.: Das Sondergebiet Chinas, 1942—1945. Berlin 1976).

维利·拉蒙德·F·:《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1936—1938年》载于《中国季刊》1979年，79第447—480页(Wylie, Raymond F.: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1936—1938.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9, 79, S. 447—480)。

## 30 和 40 年代的期刊目录

- |         |             |
|---------|-------------|
| 《北方文化》  | 《少年先锋》      |
| 《大中》    | 《时事类编》      |
| 《大学月刊》  | 《唯民周刊》      |
| 《读书丛刊》  | 《文萃》        |
| 《读书生活》  | 《文风杂志》      |
| 《读书与出版》 | 《文史》        |
| 《读书月报》  | 《新华日报》      |
| 《反攻》    | 《新中华报》      |
| 《解放》    | 《新文化》       |
| 《解放日报》  | 《中国建设》      |
| 《国讯》    | 《中国文化》      |
| 《理论与现实》 | 《中国学术》      |
| 《民主青年》  | 《中华论坛》      |
| 《民主世界》  |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
| 《民主星期刊》 | 《中山文化季刊》    |
| 《群众》    | 《中苏文化》      |
| 《全民抗战》  | 《中原》        |

## 英文提要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riginated in the deep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risis which China fac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t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military, scientif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periority of the West. The impact of t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defenselessness led to a syncretistic reception of Western bourgeois id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aroused the felt need to reevaluate Chinese history.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t and Marxist concep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ideological reevaluation process. To man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eemed to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Marxism for overcoming national and social oppression.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priority was given to the aspect of regaining national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Accordingly, when adopting Marxist conceptions, the thought prevailed that Marxism provided a promising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means for carrying out a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as well. The specific quality of Marxism as defined by its founders, namely as a scientific the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to carry out a revolution against the

rule of the bourgeoisie was only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During the earlier discussions of the 1920's, Marxism represented just one line of thinking among the social-revolutionary ideas of the West, and interest in it varied considerably. With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owever, the national motivation for the reception of Marxis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mong certain groups participating in the movemen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were two specific approaches to the reception of Marxist concepts in China, first, the utilitarian, and second, the eclectic and syncretistic approach. Concerning the former, Marxism was, above all, considered to be a weapon in the fight of a suppressed nation against foreign aggressors and, moreover, a universal means of the oppressed against the ruling class of any country, regardless of that country's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utilitarian approach, Marxist concepts were, second, understood in an eclectic and syncretistic way that did not show any marked difference from the adoption of other Western ideas.

The reception of Marxism as a uniform scientific theory and mea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its struggle against bourgeoisie, as its originators had seen it, was not only thrust into the background by national motive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a working class in Chinese society was only just emerging, it could only take on simplified form, thus Marxism was seen as a weapon of the oppressed against their oppressors, whichever nation, class or social group these belonged to.

The emphases which were connected with this syncretistic approach have remained significant for the specific expressions of Marxist theory in China up to the present. The first to propagate Marxism as a theory and method to analyse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view was Li Dazhao in the 1920's. He also advocated rewriting Chinese history according to Marxist criteria.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arxist scientific analysi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most immediate reason for the beginning were the political event of 1927 and the discussions which ensued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uniqu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Furthermo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30s, central issu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re touched on in debates relating to the character of society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reatises on Chinese history were published by authors following the Marxist line. These discussion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

1. The accep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 causality. Social occurrences of the past were considered the causes of present development. Thu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history as a treasury of examples having relevance for the present was principally rejected.
2.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 world history, whose development is governed by universal laws and has a progres-

sive character.

3.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s part of world history.

This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views on the uniqueness and incomparability of China as well as of more recent views expressed at the time on the unique road which China would take.

4.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ecessity to periodize Chinese history. The decisive criterion was to b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criteria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no longer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according to dynasties.

5. The recognition of society as a totality,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ceptance both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causality and of the existence of objective laws.

In historical works applying elements of Marxist theory in this period emphasis was often put on economic factors. Frequently deterministic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predominated over political or personal factors which had priority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Chinese history into a universal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other element of uncertainty became evident. For the first time historian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roblem of relating generality, namely the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 particularity, name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participants of these discussions approached this problem in various ways. However, they had not yet begun to think

about this problem systematically.

Historians who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ended at that time to lay particular emphasis on gene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world history, whereas their opponents, who also considered themselves Marxists, emphasized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This lack of integr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pecific cours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was expressed in mechanistic and stereotypical forms of reasoning.

The above description depicts the particular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30s, that is, at a time before the historians I investigated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ir activities, or at least, their influence on this process were first appar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30s. Their activities at this time were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 figh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for the progressive elements in China, initiated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a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and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challenged them to work out new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views and provided new tasks and problems for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views of the historians discussed here were worked out using particularly the political statements of the CCP, founded in

1921. They were based mainly on reflections concerning Chinese society, as propagated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character of society and social history by the Comintern in 1926/27 and the 6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CP in 1928. Chinese society was considered half-colonial and half-feudal. As a consequence, the fight against feud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bourgeoisie, accompanied by a simultaneously carried out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were declared major tasks for revolution. This represented an attempt to define in concrete term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na, without pl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outside of world history, which followed general laws. The attempts of the historians to find a political framework of analysis, an effort which basically represented a continuation of deb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30s, revolved around two basic problems:

1.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2.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nti-feudal and anti-imperialistic struggle, which took the concrete form of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fight. The historians I investigated agreed in the main both that 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particular 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classical form of bourgeois democracy, and that China had to find its own way toward socialism.

Each of the authors, however, judge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relation of national and social

struggle differently and thereby conveyed political nuances of views expressed by influential persons in the CCP.

Hou Wailu, Jian Bozan, and - until 1940 - also Hu Sheng and Lü Zhenyu set the national task before the social one and spoke of a unity of national and social struggle. Therefore they stressed cooperation with all parties in a united front and acknowledg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GMD both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On the other side, He Ganzhi and the other at a later stage also Hu Sheng and Lü Zhenyu str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Mao Zedong the equal importance (thus implicitly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social struggle. Consequently, they pointed out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CP, defined the peasants as the main force of the revolution an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depicted both the communist areas as models of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guerilla warfare as the main form of warfare. Thes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onceptions are also evident in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the theory of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historiography acquired another aspect. Up to this time - as far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to practice is concerned - the aspect of building up a strategy had been in the foregroun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Now,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other ideological or consciousness-raising function, or in other words, a propaganda function aimed at influencing daily politics was added.

The new line, which concentrated all political force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led to general agreement among historians and intellectuals that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ields we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have these fully serve the national cause. This required extensive propaganda work as well as the popular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ideas.

In the propaganda work,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ide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arxism represented in this context one part of a broader concept of culture, which included apart from Marxism, literature, science, the arts and thought as equal, functionally similar and interconnected aspects. Just as foreign literature was to be adapted to meet existing Chinese needs, so also was Marxism to be adjusted, that is, sinicized.

The concept of *sinification* does, indeed, summarize best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discussions carried on from about 1938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adapting culture, Marxism or various specific cultural aspect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Sinification refers on the one hand, both to a widespread recep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progressive elements of world culture including Marxism, and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se elements to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 new culture in the sense defined above. Despite differing theoretical objectives and modes of reasoning among the historians at the time, there was general agreement in this resp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pt of sinification included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y considered to have immediate impact on Chinese reality into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 Chinese Marxism.

This conception had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historiography. The new task now faced historiographer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basis for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and to develop China's own sinicized sciences.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conceptions which develop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ar of resistance affected historiography in three ways:

1. They set new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were to be utilized for existing national political tasks, the new policy was to be legitimated and the masses were to be enabled to stand up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ocial liberation.
2. They influenced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analysis, because the political claims both that national and social tasks were united and that China's path of development was unique were used as the sole framework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3. They involved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Chinese Marxism.

In this way, historiography took on a new quality connected with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practical changes. This orientation went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history. It can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adopt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it is related to the pragmatic 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was referred to as "sin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opting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the question historians first asked concerned the evaluation of all national and foreign traditions; which elements could be adopted and used, and how should this adoption take place? The historians concerned agreed to maintain continuity in their own national heritage, to adopt critically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s of the past and to adopt them according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present. Opinions differed as to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the heritage to be adopted and the objectives of adoption. Hou Wailu stressed taking over the more recent democratic ideas and thoughts of the Enlightenment, another placed popular, national philosophic and ethic traditions in the foreground, while Lü Zhenyu emphasized the adoption of both revolutionary national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 traditions.

With the adoption of historical heritage, Fan Wenlan and Hu Sheng aimed at raising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masses, by linking up both with everyday ideas about history, and with prevailing values, with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over the long run a national form of Marxism. Hou Wailu and Lü Zhenyu, however, rejected this utilitarian and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y did not just want to use old elements of this heritage to popularize new ones, but in-

tended instead to analyse their heritage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scientifically, and to adop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derived from that analysis.

The historians agreed on adopting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s of the progressive bourgeoisie and the idea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as well a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owever, it was felt to be very important that these elements not be adopted unchanged but be sinicized. For He Ganzhi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asis for adoption was China'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cluding its history. In contrast Hou Wailu considered the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contained in China's more recent history to be the appropriate basis for adoption.

Using these criteria in the selective adoption from their historical heritage, the historians concentrated on the following fields:

1.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China,
2. events and personalities of recent history,
3. national and social struggles in feudal society, and
4.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conception of appropriating historical heritage was one of the two principal aspects which guided the historians'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the other one involved the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objective laws.

Under this latter aspect, the central problem was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general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specific nature of Chinese history on the other. This problem became more acute as the historians engaged increasingly in research based on the use of empirical source material and tried to move away from the abstract and formalistic level on which the debates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early '30s.

The analyses of the historians investigated here were influenced in this realm by Soviet and Japanese works. This can be seen not only in the themes selected but also, and more obviously, in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adopted. Particularly, Stalin's claim that al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goes through five stages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pagated in 1938 as well as Mao Zedong's views on the nature and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strongly influenced their work.

In this context, the historians supported the position taken by participants in the debate, who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CP, during the early '30s, that world history proceeded according to universally valid laws, and that the specific Chinese development was part of this process. In line with this view, they rejected all positions claiming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was unique and was therefore not subject to the laws governing a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new stage which the discussion had reached was indicated by two facts - first,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suggestions concerning periodiz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diverging

positions held by the historian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place China's history within the process of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was expressed secondly in the adoption of the Marxist categories,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actual course of history.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these categories were accompanied by differ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Whereas all historians defined as "generality" universally valid law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 were a number of different views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category "particularity". For one, this meant simply the concrete empirical history of China. Hou Wailu, in contrast, also included the specific laws, which he believed governed the course of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historians' research on the regular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entered around the category of the social-economic formation which in the historians' eyes entailed recogni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space and of temporal continuity. It was accepted by all historians as a theoretical device to analy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represented the framework by which both individual historical facts and events could be placed in a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general and particular aspec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uld be given their respective weight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 case. Althoug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re generally recognized, they were not always strictly applied in the historical works.

Particularly the historians' work in appropriating aspects

of their historical heritage revealed that the historians continued to be influenc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views connected with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se ideas in part coincided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in part, Marxist views were superimposed on them. Attempts to deduce certain laws from negativ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or instance, mix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criticizing the present by way of historical analogy. Furthermor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yclical thinking can be identified not only in the view that the long duration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should be explained as due either to economic stagnation or delayed development, but also in the ado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alternation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 even when the contents of this view were reversed. The influence of Han-centered thought can be observed in the fact that, except for one, all works took a Han-Chinese point of view. Also the thought that peasant rebellions were defeated mainly because of the specific personalities of peasant leaders is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a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ch consid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actions as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n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can be depicted as an axis resulting from the penetration of two planes, namely the historico-theoretical and the political plane. On the level of the theory of history, the main problem concerned the question of the laws governing history. Although

phrased and approached differently, it can be found in almost all of the works. On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main task was to make historiography socially useful. This was exemplified in the attempt to appropriate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Marxist historians consider the appropriation of historical heritage only possible if the course of history is seen as governed by specific law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bove-mentioned levels represent two sides of a uniform proces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which either the objective or the subjective aspect predominates. The objective aspect denotes the regular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ubjective side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is regularity and - since history is based on the actions of people - thereby become conscious subjects of development. This dual natur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nalysed by many Marxist historians. The problems which it entails can also be observed in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practical utilization and the ideal theoretical form described above resulting from this dual nature should be of no surprise.

Chinese historians of the '30s who considered themselves to be Marxists were working under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y had set themselves the task to develop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nd to utilize its result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The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forced them often enough to take hypotheses which they themselves had just developed and not yet adequately verified out of the context and put them in another.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y were not able to define clearly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respective planes of historical regularity and the adoption of historical heritage, neither of which had been fully developed as disciplines. In other words, they were unable to put their ideas of adopting history adequately in relation t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regularity. At the points where breaks in this relationship existed, elements of a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could seep in. These elements have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p to the present time.

本书由波恩 **Inter Nationes** 基金会资助翻译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  
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

Von Mechthild Leutner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2

根据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1982年版译出